

谨以此书献给长眠在寻梦路上的无名英烈



# 目录

引子



1

第一章



瞿秋白现身中东铁路

7

第二章



T字形大动脉  
与五一劳动节

29

第三章



华工血染十月红旗

43

第四章



俞秀松与盛世同  
的传奇人生

75

第五章



红色之路助力建党

95

**第六章**

**领袖们信赖东华学校**

109



**第七章**

**父爱深深大于天**

127



**第八章**

**割不断的跨国深情**

175



第九章



六大从这里出发

195

第十章



隐蔽战线保畅通

217

第十一章



向往红色的远方

251

第十二章



巾帼女杰铸传奇  
283

第十三章



红色基因代代传  
315

后记



341

**受访者及资料提供  
者名录**



345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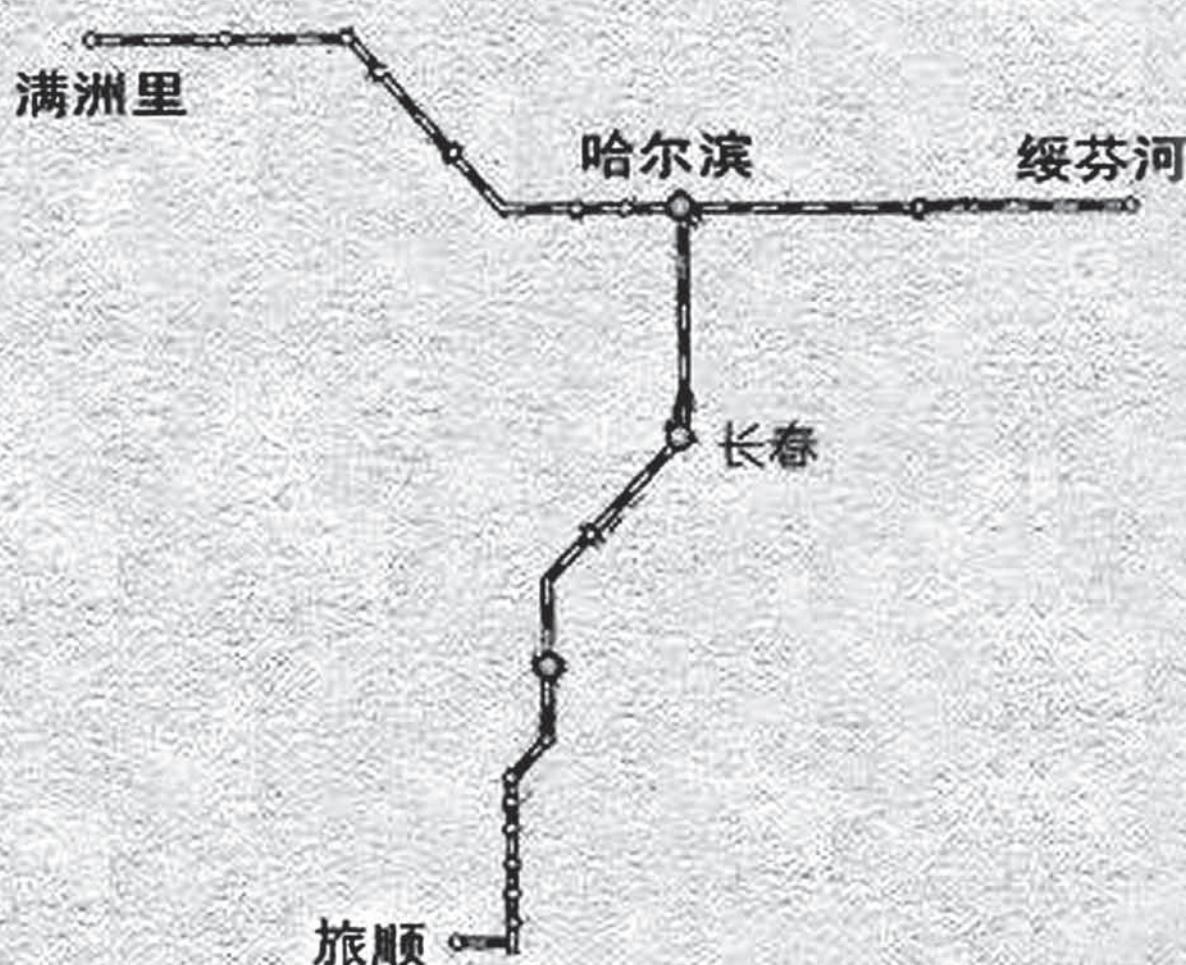
355

# Расписаніє станцій

Китай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ѣзной дороги.

Манчжурская линія.

1898.8 — 1903.7



中东铁路图

引子

这一天，天灰灰，雪霏霏。

这一刻，我正站在哈尔滨铁路文化宫门前，也就是当年的中东铁路俱乐部门前，依稀听到有人在身后的半球露天剧场朗诵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自由颂》；我也仿佛置身于当年世界歌王俄罗斯人夏里亚宾在这里演出的盛况，那位伟大的歌唱家正在用他浑厚的低音演唱古老的《伏尔加船歌》。这当然是我的幻觉，当年的半球露天剧场已在动乱的年代毁掉，按照莫斯科大剧院风格设计的中东铁路俱乐部只剩下部分建筑。

雪越下越大，越下越急，宛如银白色的瀑布，纷纷扬扬，铺天盖地。

放眼望去，街道对面是原中东铁路局管理局办公大楼，现在是哈尔滨铁路局办公楼，院子里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毛泽东全身塑像，面南背北，清晰可辨。这样的雕像在全国也不多见了。他老人家站在那里，仿佛在吟唱“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雪花随风劲舞向我撞来，也似乎撞击着我的心灵。

此时此刻，我有一种抒发胸臆的冲动。几年前，我得到了一个特殊题材的选题并开始了我的采访。这几年我辗转于东北与内地之间，走过二十几个省市，寻访过百余人，到过众多的部门，去过很多遗址遗迹。我采访过的一些当事人或当事人后代，年事已高，在我采访后不久，已陆续有人离世。他们感人肺腑的讲述，已成为永远的绝唱。回想一次次被感动的场景，我的内心波涛汹涌，起伏不平。我的内心告诉我，要把采访到的故事写出来。这是一段渐行渐远的历史，当年秘而不宣，如今鲜为人知。这段历史和中国早期革命息息相关，这段

历史和其中的人物都指向一条路，这就是沙俄在中国境内修建的中东铁路，众多中共早期领袖及革命者曾走过的中东铁路。

“中东铁路”这几个字此时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1896年4月20日，李鸿章作为大清王朝的特使抵达彼得堡，祝贺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而除了参加这热热闹闹的仪式外，李鸿章其实还肩负大清朝一个更重大的使命，那就是和俄国商讨俄国人在大清朝境内修建铁路一事。所谓的大原则在李鸿章出国之前就定下了，大清朝同意俄国在中国境内修建这样一条铁路，这次只是讨论一些细节罢了。

为什么封闭的大清朝同意红鼻子老毛子在中国修建铁路呢？这还得从小日本欺负大清朝说起。1894年的甲午战争让大清朝颜面扫地，北洋舰队没了，附属国没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了，最可气的是小日本在中国境内把中国的大好河山打得一塌糊涂，百姓痛不欲生，大清朝却还得赔偿小日本白银两亿两。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哪，这可是中国百姓的血汗哪。老佛爷西太后窝囊，李鸿章等一班大臣窝囊，中国人全都窝囊，可也没什么辙，地还得割，银子也还得捧给人家。落后就要挨打，这真是一成不变的真理。不过事态的发展为以后修建中东铁路埋下了伏笔。

在《马关条约》签订六天后，沙皇俄国不干了，沙俄一直把向东方扩张当作既定的目标，你日本现在把辽东半岛给占了，那我们在中国满洲的利益怎么来实现？于是联合法、德干涉，向日本发话，逼迫日本让出辽东半岛。小日本难受了，可要和俄国开战，掂量掂量还不是时候，实力也有些不济，但到嘴的肥肉怎么能随便吐出来呢？小日本心生一计，你要我还给大清辽东半岛也行，让大清朝再出3000万两白银赎金。大清朝不情愿把自己的国土拱手相让，可打又打不过小日本，没别的办法，最后只能答应小日本的条件。这时，沙俄又朝大清说话了，日本人没准日后还会来，我们俄国正在修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好可以在你们满洲通过，支线可以一直修到辽东半岛，一旦日本人再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条铁路快速运兵来帮你们打日本人。你们大清朝想要我们来保护，就得让我们在满洲借地修铁路，咱们可以就此

事签个约。大清朝被小日本欺负得够呛，觉得俄国能帮助“攻倭胁倭”是一个不错的事，“联络西洋，牵制东洋”“以夷制夷”是大清王朝很好的生存之道，于是就有了同意签约一说。

1896年6月3日，一纸《中俄密约》（也叫《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将西伯利亚铁路带到了中国境内。沙俄最初将这条铁路定名为“满洲铁路”，李鸿章倒是坚持了原则，说“必须名曰‘大清东省铁路’，若名为‘满洲铁路’，即须取消允给之应需地亩权”。沙俄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也就没有坚持原来的名称，算给了大清一些面子。这条铁路最终命名为大清东省铁路。1898年8月开始修建，1903年7月通车，从此中国境内有了第一条正式运营的铁路。1920年到了民国时期，这条铁路改名为“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为“中东铁路”，并一直沿袭下来。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条铁路我们就能看清当时大清朝的状况。彼时的大清，就像是一个患了绝症的巨人，虽百般挣扎，却力不从心，只能眼睁睁渐渐地往死里去。一个封建政体的帝国，在欧洲文明面前，在新式资本主义国家机器面前就是不堪一击，只能不断往后缩，在列强的夹缝中求得一丝喘息的空间。

猝然而至的漫天大雪，好似鬼斧神工的大手笔，让城市尽显一派神奇的风光，如梦如幻。

雪花飘落在身上，好似并没有带来寒意，却让人心中不断升腾着股股暖流。中东铁路啊，中东铁路，你是一条昭示当年中国国力孱弱的铁路，可你也是一条神奇的铁路，你把欧洲文明、欧洲工业革命的成果直接带入了中国境内，你也是欧洲的各种思想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最重要通道。特别是十月革命后，对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你更成为一条充满传奇的红色之路。中共派遣干部到共产国际开会、接受指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甚至疗伤养伤，回国进行革命斗争，走的都是这条路。在国内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绝大多数代表走的就是这条路。可以说，这条路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神奇而又特殊的中东铁路！承载着红色

梦想的中东铁路！

雪中，街对面毛泽东的塑像气势非凡。他老人家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标志，他面向铁路俱乐部方向挥舞着大手，好似在夸赞中东铁路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也好似在告慰为中华民族崛起而流血流汗甚至牺牲的英魂。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近代中国社会的精英们没有停止过探索与思考。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搞起了洋务运动，希望“师夷长技”，让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但甲午战争让他们的希望破灭了。戊戌变法仅持续了103天，主张变法的光绪皇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四散奔命，谭嗣同人头落地，又一个梦想破灭了。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革命只成功了一半，革命领袖孙中山对当时现状的描述是“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革命军起矣，民国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孙中山多年奋斗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5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国向何处去？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如同久旱的大地逢甘霖。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了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这给中国无产阶级如何掌握自己命运带来了范本。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先进分子兴奋异常，积极宣传马列主义。五四运动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让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也成为中国革命的真正转折点。中共早期领袖如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邓颖超、李立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罗章龙、蔡和森等人怀揣红色梦想，踏上中东铁路，为中华民族的梦想而寻找出路。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革命先驱同样充满向往走在这条铁路上，有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革命先烈的血没有白流，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前人无法实现的梦想。

白云苍狗，世事流转，不变的是信仰，是坚定的道路选择。当年先驱们走上这条中东铁路，就意味着要为劳苦大众辛劳一生，要为

建设一个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奋斗一生。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许多先驱为中国梦倒下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怎能忘记？我要写出我知道的一切，我要为他们圆梦。

中国梦，会实现的梦。

皑皑白雪，让大地分外妖娆。

## “八七”中共紧急会议纪要

## “八七”会议记录

Le 7-7-27 + 7

卷之六

五、古事記。皇代傳記。此二書皆從日本傳來者也。其書之文體，與《古事記》、《國語》、《史記》、《漢書》、《後漢書》、《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南史》、《北史》、《周書》、《隋書》、《唐書》、《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等書之文體，大同小異。故此二書，實當歸於《古文真義》之類。五、古事記。皇代傳記。

# 第一章 瞿秋白现身中东铁路

1920年10月20日，夜色已浓，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一辆从中东铁路南线开来的列车，喘着粗气、鸣着汽笛徐徐驶入了中东铁路枢纽站——哈尔滨火车站。疲惫的旅客们纷纷下车向出站口拥去，一行六人的小队伍也随人流走出了检票口。走在前面的一人，文质彬彬，略显瘦弱，戴着圆框眼镜，目光却炯炯有神，他就是后来继陈独秀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瞿秋白等人无暇欣赏哈尔滨火车站那俄式风格的建筑，乘上站外俄罗斯人驾驶的马车，向哈尔滨最繁华的地段——中央大街方向匆匆而去。瞿秋白怎么会出现在中东铁路枢纽哈尔滨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原来在10月初，瞿秋白遇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之前他翻译的托尔斯泰作品在上海《时事新报》连载，他在北京《晨报》发表的政论文章《不签字后之办法》也深受读者好评，恰好二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情况，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美、英、德、法、俄诸国，这样一来，二报决定聘请瞿秋白为特邀记者，到苏俄莫斯科采访。

瞿秋白喜出望外，苏俄是十月革命的故乡，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地方，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还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不十分清晰”。如今可以身临其境，亲自去感受另外一个天地崭新的景象，去探索、寻求改变中国的道路，这怎么能不让风华正茂、憧憬未来的瞿秋白激动不已？

瞿秋白如此激动，是和他之前的经历、命运紧紧相连的。

1899年1月29日，下午五六点钟光景，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府城一个世代为宦的封建大家庭中。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是大清朝的末期。

瞿秋白的少年时代是在风雨飘摇中度过的，他所在的封建大家庭，已洗尽往昔的繁华，全靠典当和借钱度日。他的母亲就是在饥寒交迫和债主的催逼中，自尽而亡的。

瞿秋白曾在他的散文集《饿乡纪程》一书中写道：“我幼时的环境完全在破产的大家庭制度的反映里，我母亲已经为‘穷’所驱逐出宇宙之外，我父亲也只是这‘穷’的遗物，我的心性在这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中，融陶铸炼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不能知道。”

家庭的破败，使瞿秋白的父母成为穷人，可是他们却堪称是精神层面的富有者。瞿秋白的博学通达、多才多艺完全源于父母的谆谆教诲。

在那个年代，流行的话语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但瞿秋白的母亲恰恰相反，瞿秋白的母亲金璇不仅善良贤淑，而且国学根底深厚，偏爱诗词，尤其是写得一手好字，她是瞿秋白学习诗词、国学和书法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对《庄子》研究颇深，同时特擅长山水画，篆刻也是造诣颇深。他和妻子金璇在国学领域是珠联璧合，在引领孩子成才的道路上是绝好的搭档。每日里，瞿世玮都要手把手地教儿子画山水画。瞿秋白向父母轮流求教，受益颇丰。

瞿秋白故居及纪念馆坐落于江苏省常州市觅渡河边。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是全国优秀社会教育基地。

纪念馆前，由邓小平亲笔题写的“瞿秋白同志纪念馆”八个大字十分醒目。纪念馆为两层楼四合院式的仿古建筑，粉墙黛瓦，长檐耸脊，属明清居室风格。来到大厅，正面矗立着瞿秋白站立远望的铜像。毛泽东主席于1950年12月31日为《瞿秋白文集》的题词展示在主要位置，有一段写的是：“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大厅内还展示有胡锦涛在福建长汀瞿秋白牺牲地纪念碑前敬献花圈的照片，还有江泽民在江苏常州参观瞿秋白纪念馆的照片。

放眼望去，展厅内展示着一排排代表瞿秋白辉煌革命事迹的照片、图片、书籍、书法和文物，它们昭示着这位中共早期领袖短暂而非凡的人生。瞿秋白留下的几百万字的著作，也令人赞叹不已。其中有一组图片和实物，折射出一代伟人感情丰富的一面。

这组图片和实物，有当年瞿秋白送给新婚妻子杨之华的礼物，是带着“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的金别针（胸针），其中每一个字、每一笔、每一画，都是瞿秋白亲自镌刻的。

瞿秋白给女儿瞿独伊的贺年卡也在其中。对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女儿瞿独伊，瞿秋白寄予了浓浓的父爱。他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总会挤出时间带女儿出去踏青游玩，他给女儿写信，总要画上几笔带有童趣的图画，他给女儿寄去的贺年卡“勿忘我”非常精美别致，是他亲手制作、亲笔题字和绘画的。展厅的图片贺年卡是复制的，真正的原件珍藏在北京已九十多岁的瞿独伊手里。她说：“看到爸爸亲笔写的‘勿忘我’，我就掉眼泪。每每拿着这张爸爸亲手做的‘勿忘我’贺卡，我会闻到爸爸的气息，和爸爸在一起的往事会历历在目。”

纪念馆内还有一件瞿秋白送给鲁迅先生儿子周海婴的礼物，是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铁制的零部件，需要动脑筋组装成各种各样的形象，也叫铁成像玩具。瞿秋白希望能及早给孩子们科学教育，助其成长。

瞿秋白在上海为掩护自己真实的身份，起的名字叫何苦，人称何先生，他让周海婴也叫他“何先生”。何先生，何苦，这名字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寓意，为什么称自己的名字为“何苦”呢？这一个“苦”字，难道仅仅是在白色恐怖中便于掩护，随意而起的假名字吗？

在展厅里还有一幅国画，让人心动。那是瞿秋白在中央苏区工作时，组织上配给他一匹马，尽管他肺病缠身，他还是坚持将这匹马让给了和他同事、比他年长的徐特立来骑。明明是照顾病号的马，他却转让了。画面中表现的是瞿秋白搀扶徐特立上马的情景。

众多图片和实物乃至国画，印证了瞿秋白重情重义、侠骨柔肠的一面，体现出这位大才子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中也有几分革命者的情趣和浪漫色彩。

展厅内有一个摆放发黄卢布的展柜，玻璃窗下面的说明是：瞿秋白同志在哈尔滨曾使用过的卢布。

一代伟人瞿秋白的生命历程中，曾与中东铁路、哈尔滨有过不解之缘，那里是他远赴苏俄走向职业革命家之路的红色驿站。

在瞿秋白纪念馆里，还可以看到瞿秋白父母的作品。有不少冒雨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对瞿秋白父亲的山水画和他母亲的书法作品，赞不绝口。

此时秋雨迷蒙，过了一会儿，秋雨已不再绵绵，而是愈下愈大，蚕豆般大小的雨滴，已缺失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优雅，随风而至，密密麻麻，其迅疾如道道闪电，其音如马蹄嗒嗒，掷地有声。

雨滴敲打着留下瞿秋白身影和足迹的地面，敲打着历史的印记，也叩问着对历史的反思。

瞿秋白的故居紧邻西院的纪念馆，原为清光绪年间瞿秋白的叔祖父瞿庚甫修建的私家祠堂，是瞿氏大家族供奉和祭祀祖宗的宅院。

“瞿秋白同志故居”的横匾为茅盾手书。

11

在常州市，如此规模宏大的豪宅寥寥无几。江南老建筑上的雕刻十分考究精美，房间庭院错落有致，布局幽雅别致。远处一排排的翠竹，近处古香古色月牙形镂空嵌刻图案的窗棂，让人联想到《红楼梦》大观园的景致，可以想象早年间这里曾有过的富丽堂皇。

瞿秋白故居的书房内能够看到往昔父子俩用过的案几课桌，课桌上还摆放着那方原始的砚台。睹物思人，物是人非，却让人依稀觉得那方古老的砚台似乎还是余墨飘香呢。在这书香飘散的地方，瞿秋白父母密切合作，为瞿秋白打下了扎实、深厚的“童子功”。

1917年，18岁的瞿秋白随堂兄瞿纯白来到了北京，本来想考北京大学，却因交不起学费，成为旁听生。后来，他又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可免学费的北京俄文专修馆。

瞿秋白是个读书的胚子，国学功底深厚，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他笔下的山水画灵动飘逸、栩栩如生。善于思考问题，加之特有的生活经历，使他忍得住孤独、贫困、寂寞，能孜孜不倦地求学。他很快就掌握了俄文，粗通法文、英文，了解了当时的各种社会

思想，并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五四运动成为瞿秋白人生经历的重要拐点，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20岁的瞿秋白以俄文专修馆学生会负责人的身份，领导俄专的同学参加了1919年5月4日天安门的示威游行。在爱国反帝的学生运动中，瞿秋白以阅历深、学识博、见解新见长，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所以他成为北京学联的领袖人物之一。遭拘禁后，他仍不屈不挠，坚持斗争。

五四运动后，瞿秋白与郑振铎等友人于1919年11月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出版了19期后被禁。瞿秋白是该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他的文章文采飞扬、哲理深刻，提倡社会改造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是众多刊物中最有分量，也是最受欢迎的。《新社会》刊物的读者遍及四川、两广、东北等地，是五四时期重要的进步刊物之一。同时瞿秋白也开始用白话创作新诗和散文，翻译和介绍俄罗斯古典作家果戈理、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

1920年春，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寻求改造并拯救中国的途径。瞿秋白对郑振铎说：“社会主义之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sup>①</sup>所以，10月初，当瞿秋白接到前往苏俄的通知时，他怎能不激动万分呢。

瞿秋白赴苏俄之行，让他的好友们分外高兴，共同分享着按捺不住的愉悦心情。郑振铎等人为瞿秋白专门写了送别诗：“你们走了，走向红光里去了，新世界的生活，我们羡慕你们……”<sup>②</sup>

在出国前，瞿秋白专程去了济南，看望漂泊异乡的父亲。母亲去世后，所有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父亲的肩上。瞿秋白是家中的长子，家中还有七个弟弟和妹妹。他父亲非常不易，出身于世代为官、书香门第的家庭，不会经商做生意，只能是受朋友之邀，来济南教书卖画以贴补家用。

在大明湖畔的小酒馆里，灯光暗淡，新月初上，湖上水云相映，45岁的瞿世玮特意为儿子瞿秋白点了几盘小菜，父子依依话别。瞿秋白凝望着父亲有些憔悴的面容和已有些斑白的两鬓，想起少年时父亲手把手教他绘画的情景，他身为家中的长子，而今却不能帮助父亲

减轻些生活的压力，内心有些酸楚和自责。他连连对父亲说保重，多保重。父亲对他说：“快趁热吃点菜。”并说，“你不要惦记我和家里，你的前程要紧，只是去俄国，万里之遥，一路要照顾好自己。”边说着边掏出身上带的所有钱币，让瞿秋白收好。瞿秋白说什么也不收，希望留给家用，父亲硬塞到瞿秋白的手中，感叹道：“穷家富路，出远门，一定要多带些盘缠啊。”告别了父亲，望着父亲渐渐远去、有些步履蹒跚的背影，瞿秋白禁不住泪湿眼角。

此次同瞿秋白到苏俄采访的另外二人是李宗武、俞颂华，他们到苏俄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那里办完出国手续后，其秘书告诉他们，如果能与即将赴任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驻莫斯科总领事同行，专车可以由哈尔滨直达赤塔。于是瞿秋白三人于10月16日从北京启程，坐火车来到天津。在天津，瞿秋白看望了同乡和好友张太雷后，10月18日与总领事陈广平、副领事刘雯、随习领事郑炎三人会合后，继续坐火车奔赴哈尔滨。

“从天津到哈尔滨，走过三国的铁路，似乎经过了三国的边界，奉天（沈阳）是中日相混，长春、哈尔滨又是中、俄、日三国的复版彩画，哈尔滨简直一大半是俄国化的生活了。”<sup>③</sup>这就是作为记者的瞿秋白初到东北的所闻所感，形象地道出了三城市的特点。

10月20日，瞿秋白抵达哈尔滨，就出现了我们开头见到的一幕。下了火车得到的消息是，苏俄红军正在与谢米诺夫白匪军作战，满洲里至赤塔一段铁路遭到破坏，火车停运。于是瞿秋白一行六人出了哈尔滨站，经别人指点，乘马车到了与中央大街毗邻的地段街的福顺客栈。这是一家很普通的旅店，因这里离火车站不远，价格也比较便宜，他们就住在了二楼，折腾到半夜才上床休息。

本是匆匆过客，却由于火车意外不通，瞿秋白只能在哈尔滨停留等待。这段日子竟然长达五十多天。

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参与过党的十一大至十五大报告以及许多党的重要文件起草的龚育之，是中国著名理论家，中共党史界公认的党史大家，儒雅而又睿智。生前，在他那浩如书海的家中，他谈起瞿秋白年轻时

赴苏俄的经历，意味深长地说：“1920年10月，瞿秋白以记者的身份远赴莫斯科访问，这次赴苏俄考察，是瞿秋白一生中最关键的一步，决定了他的革命道路。那个年代，很多革命者和进步青年都向往苏俄。可是苏俄的情况究竟如何，真相是怎么样的，他们也仅是道听途说，如同雾里看花，并不是真正的了解。瞿秋白作为先行者，作为一名记者，深入广泛比较全面地作了客观真实的记录，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是不可替代的。他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全面客观地向国内介绍苏俄十月革命后的真实情况的人，这及时地为国内很多迫切想了解红色苏俄的人指点了迷津，成为了引路人。瞿秋白曾说过，他总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他的此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他访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写的大量文章和著作，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

“瞿秋白所撰写的两本书《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我过去读过，非常感兴趣。我想，今天还值得一读。”

龚育之的父亲龚饮冰曾担任过中联部副部长，是中共六大代表，曾多次见过瞿秋白。龚育之深情地回忆说：“我父亲是1976年病逝的，他生前曾对我讲过，在莫斯科党的六大期间，他多次听过瞿秋白的报告和讲话。瞿秋白的讲话知识很渊博、很有哲理，表面看，他很儒雅有书卷气，可是他骨子里充满了革命的斗志、魄力和智慧。我父亲对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印象很深，很敬重。”

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枢纽和中转站，所有远赴俄国的过客必须在此处停留，但一般也就几天的时间。或许是缘分，阴差阳错，让哈尔滨留住了瞿秋白，瞿秋白也通过他的名作《饿乡纪程》及他在哈尔滨撰写的新闻通讯，留住了哈尔滨的历史。

瞿秋白写道：“中东铁路关系哈尔滨甚大，哈尔滨久已是俄国人的商埠，中国和俄国的商业显然分出两个区域，道里道外市面不大相同，道外是中国人的，道里是俄国人的。”“道里和秦家岗（南岗）两部分完全是俄国化的，街道都是俄国的名字。”“上上下下都能讲几句俄国语，哈尔滨人叫毛子语。”<sup>④</sup>

瞿秋白在哈尔滨期间，就已经开始了他的特邀记者的使命，进行

社会调查，了解当时的社会问题。

他在附近的饭馆里吃饭。“饭馆主人和我们也熟了，我问他，为什么哈尔滨盒饭这样贵？他说：啊！不用说，哈尔滨什么都贵，我们吃的米都是日本东京米，贵得很！”

瞿秋白听很多人说过，哈尔滨几乎是俄国人一统天下，日本的商品是很难进到哈尔滨的。可日本的东京米已在普通的饭馆里司空见惯，且价格很贵，这让乐于思考问题的瞿秋白有些吃惊。他将调查的焦点转移到对日本问题的剖析上，他开始分外注意日本人在哈尔滨的情况。

瞿秋白最早发给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闻》的报道题目是《哈尔滨四日见闻》，除了记录他在哈尔滨头几天的所见所闻外，让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的是，他以独特的视角和观点报道了日本人在哈尔滨的动态。

“日本人在哈埠有五千多人，却也很有势力，满街插着日本旗的汽车、红十字会车、兵车，触目皆是，有日本的银行，有日本剧院三处，其余饭馆、旅馆、理发馆、大商铺触目皆是。”<sup>⑤</sup>

在哈尔滨，日本人仅有五千多，俄国人多达二十多万，俄国人如过江之鲫，人多势众。瞿秋白却不以眼下人数众寡和势力的大小而论，显示出他强烈的新闻敏感性以及政治家的智慧眼光和洞察力，他向国人发出警告：“现在俄国人的势力衰微，日本人的势力一天胜过一天！”<sup>⑥</sup>

瞿秋白在报道中敲响警钟，是想告诉中国人要警惕，一旦从睡梦中惊起，噩梦将很可能是日本人对哈尔滨乃至东北的侵占。十年后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凶残的铁蹄践踏在东北大地上，再回望瞿秋白报道中的警示，怎能不让人感叹一代伟人的卓识远见呢。

在哈尔滨期间，精通俄文、口语也非常流利的瞿秋白，广泛地同俄国人交朋友，其中既有布尔什维克，也有普通百姓，通过与他们的交往，全面了解苏俄的情况，为赴苏俄做准备。

当时哈尔滨的俄侨人数众多，进步的人士早在1905年就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支部，随之又成立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使哈尔滨一直涌动着革命的浪潮。布尔什维克创办了《前进报》等许多红色报刊，在哈尔滨的一些书店里，随处可以买到马克

思和列宁的著作。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组织发动了中俄工人多次大罢工，并且组织群众与盘踞在中东铁路的沙俄残余势力和外国干涉者进行斗争，为捍卫苏维埃新政权做出了贡献。

在中国的版图上，哈尔滨是距离苏维埃俄国最近的一个都市。近水楼台先得月，21岁的瞿秋白仿佛听到了十月革命炮声的余音，感受到了苏俄大革命带来的震撼，他在《饿乡纪程》一书中，几次提到在哈尔滨闻着“共产党”的空气。

瞿秋白在哈尔滨共发出报道13篇，其中自己撰写9篇，与人合作4篇。他报道最多的是十月革命后苏俄对哈尔滨的影响，如《哈埠俄人庆祝纪念之情形》《哈尔滨劳工之大学》《中东路工党首领之谈话》《俄工党会长对中国之陈情》《哈埠工会联合会长访问记》《哈尔滨俄侨之舆论》等。

瞿秋白深入到三十六棚中东铁路总工厂、道外戎通轮船公司和哈尔滨邮政局等，了解考察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当他在三十六棚总工厂听到中俄工人通过多次联合大罢工，终于将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赶下台的消息时，非常振奋，他为工人阶级奋起抗争而感到欢欣鼓舞。

瞿秋白在哈尔滨停留期间，察觉到这座城市飘荡着一缕缕苏俄的气息。特别是参加哈尔滨工党联合会庆祝十月革命纪念会，第一次听到《国际歌》时，他为之一振。对此，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一书中作了详细描述：

“十一月七日是彼得堡发生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日子（俄国向来用希腊历，比西历迟十三天，十一月七日乃俄历十月二十五日，所以谓之十月革命），我当时还行止未定，得一俄国友人的介绍去参观他们的庆祝会。会场是哈尔滨工党联合会预备开劳工大学的新房子，那天居然得到中国警察厅的许可，召集大会，会场里拥挤得不得了，走不进去。我们就同会长商量，到演说坛坐下。看坛下挤满了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轰然起立唱《国际歌》，声调雄壮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到俄国后差不多随处随时听见，苏维埃俄国就以这歌为国歌……”<sup>⑦</sup>

《国际歌》震撼着瞿秋白的心扉，让他热血沸腾，力量倍增，他决心要让《国际歌》在中国大地上唱响。

1923年初，刚回国的瞿秋白住在北京堂兄家中，擅长音乐的他踩着一架风琴，一边弹琴，一边吟唱。他用俄文和中译文交互吟唱，发现译成中文的“国际”两个字中间音节有8拍，很难与原曲调合拍。瞿秋白别具匠心，将“国际”采用音译“英特纳雄耐尔”的方式，与原曲调水乳交融。

瞿秋白将他亲自译成中文并配有简谱的《国际歌》，发表于1923年《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他是我国第一位将《国际歌》的曲谱与中文歌词配合译出者，是《国际歌》在中国传唱的首倡者。时隔90年，凝聚着瞿秋白心血的“英特纳雄耐尔”雄壮的旋律和歌声，依然回响在中国大地上。

瞿秋白在哈尔滨五十几天，对这个中东铁路枢纽站城市也多有记述。

瞿秋白写道：“蓝蓝的天色、白云似堆锦一样拥着，冷悄悄的江风，映着清澄的寒浪。松花江畔的景色，着实叫人留恋。那天我同俄文专修馆的同学特地去游一游，乘着小船从道里到道外。在江中远看着中东铁路的铁桥，后面还耸起几处四五层的洋房，远远衬着疏林枯树，带着些积雪，映着晴日，亮晶晶光灿灿露出些‘满洲’珠光剑气。”

“在船上谈起俄文专修馆同学，原来哈尔滨我们的同学很多，审判厅、俄白党报馆、中东铁路、戎通公司等等都有。不但哈尔滨，从奉天至满洲里以及中东路小站都有我们同学。他们的教育程度是‘如此’，他们的生活也比上海洋行买办式的英文学学生，甚至于北京、天津研究英法文的‘大学生’寒俭得多。然而大家是知道的，满洲三省文化程度几等于零，他们还要算此地的明星呢。”

“我这次到松花江畔，本是顺便找我的俄文馆同学，一个船长，可惜他没有在那里，所以趁此乘小船逛一逛，到道外上岸，沿着中国地界茅屋土舍污秽不洁的小路，向前走。道外这种偏远街巷，沿松花江边，几间土屋，围着洋铁皮木板乱七八糟钉成的短墙，养着几只泥猪，这就是中国人的写生。”<sup>⑧</sup>

瞿秋白和同学们来到道外七道街江苏饭馆吃饭，能在异地和已分

别很久的同学聚餐畅谈，回首往事，回忆同窗时光，展望未来，谈人生，谈社会，天南海北，十分畅快。纯真浓郁的同学情让第一次来哈尔滨的瞿秋白倍感亲切和温馨，再加上品尝着江苏家乡菜，让瞿秋白那颗游子的心也平添几分惬意。

“吃完饭，沿着俄国人所谓中国大街（中央大街）回家，已是傍晚时分。走过一家俄国报馆，看见许多中国卖报的，领着报，争先恐后地跑到中国大街去抢生意做，抢着跑着，口里乱喘、脚下跌滑也顾不得，逢着路人，喘吁吁叫着报上的抢眼标题，为的是生活竞争。

“沿大街两旁，俄国人，有携着一大包裹出来的，雪亮的街灯，电灯光底下，男男女女花蝶蝶似的来来往往，云香鬓影，紫狐披肩，蓝绸领结，映着大商铺窗帘里放出的电光，还想努力显一显西欧化的‘俄国资产阶级文明’。还有一阵一阵俄国青年学生和女郎散步的踪迹。我走着，看见大街对面，乱乱落落的俄国人影背后，雪亮的电灯，从窗子里映出来，照着很晃眼的俄文广告……”<sup>⑨</sup>

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瞿秋白在等待赴苏俄的前夕，迎来了哈尔滨的冬雪。

从小生活在江南的瞿秋白，看惯了细雨绵绵中的小桥流水，到了北京后，也见过下雪天。那雪花是零散的，甚至是温润的，雪中含雨的感觉，下得都不算大。而哈尔滨的大雪却是来势凶猛，让他感叹，北方的雪来得豪迈，来得恣意，来得洒脱。

冬季的一天，瞿秋白从朋友家中回旅馆时，已是晚八点钟左右，街上已经很冷清。走了一段路，瞿秋白才看见一辆马车，是一辆破烂不堪的俄式马车。上了马车后，俄国马车夫要价很贵，他对瞿秋白说：哈尔滨的东西样样都贵，所以车费不得不要高些。瞿秋白询问了他关于俄国工人在哈尔滨的生活情况，由于彼此都用俄语对话，谈的话题也比较宽泛。

一路谈着，夜色渐浓，抬头一看，瞿秋白察觉，哈尔滨的月色，与家乡的月色迥然不同。“其时云影翻开，露出冷冰冰亮晶晶的一轮明月，四周还拥着寒雾，好像美人出浴披着轻纱软帔似的，马路旁寒林矗立，一排一排的武装着银盔银甲，万树枝头都放出寒浸浸的珠光

剑气。”

瞿秋白眼中冰雪凝成霜的树挂，在暗夜中尽显琼枝玉叶的静美，那寒气氤氲着亮晶晶的月色，都是他从未见过的奇妙景致。

“领略一回天然的美，贪看寒月雪影，竟忘告诉车夫，走错了路，越走越远。”

此时马车已走到秦家岗（南岗）的尽头，瞿秋白赶紧告诉俄国车夫，快快掉转马车，赶回道里的旅馆。马车夫还叨叨地说：中国人，中国人怎么今天还不知道哈尔滨街道的俄国名字，真是应了你们中国人的那句话，背道而驰。

“等到了福顺客栈，马车夫说：唔，原来是这个地方，为何不早说清楚！那又怎么说呢？”

瞿秋白的名著《饿乡纪程》是在哈尔滨开始写作的，可以想象到他白天奔波忙碌于采访调研中，晚间就在道里地段街的福顺客栈笔耕不辍的情景。此书《绪言》落款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四日哈尔滨”，此书的前八章也是写于哈尔滨，瞿秋白在此书第九章的结尾处写道：

“自从到哈尔滨一个半月，先得共产党的空气。”

等来等去，苏俄红军战胜了谢米诺夫白匪军，满洲里至赤塔的铁路已经通车，喜不自禁的瞿秋白写道：“天气异常严寒，我心苗里却含着蓬蓬勃勃的春意。”“到红光里去，到红光里去！”

1920年12月10日，瞿秋白一行几人搭上了赴苏俄的第一班火车，离开了与他人生历程结下不解之缘的哈尔滨，走中东铁路来到了满洲里。

瞿秋白在满洲里火车站巧遇了刚从苏俄回国的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泽荣（别名刘绍周），二人用俄语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谈话很默契很投机，彼此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此番经历瞿秋白写入《饿乡纪程》一书，他赞誉：“旅俄华工联合总会会长刘绍周，他是在俄留学生最出色的一个人才。”

在满洲里停留四天后，瞿秋白一行人坐上出境的火车，经过俄国远东地区的名城赤塔，穿过贝加尔湖，飞越乌拉尔山，历经遥远的由亚洲到欧洲的长途跋涉后，终于到达了莫斯科。

瞿秋白初到莫斯科，正逢苏俄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之前国内战争频频，人们的生活困顿，甚至要忍饥挨饿，因此才有了我们熟知的电影中的那句话：“面包会有的！”

这之后，当家做主的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引领下，齐心协力克服了灾难、渡过了难关，让莫斯科又焕发了生机。

瞿秋白在这个充满着奋发向上的斗志和涌动着红色革命浪潮的土地上整整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期间他曾身患重病，却仍然带病四处奔波，采访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人物事件和信息。

在此期间，瞿秋白写下了四本书，《饿乡纪程》出版时改名为《新俄国游记》，还有《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俄罗斯革命论》。

作为特派记者，他在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上，陆续发表了数十篇通讯。其中包括《共产主义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劳农政府之经济前途》《赤俄之第四年》等等。

瞿秋白在赴苏俄前，曾为友人郑振铎等写诗言道：“若说是——采花酿蜜，蜂蜜成时百花谢，再回头，灿烂云华。”<sup>⑩</sup>瞿秋白正是为了中国的前途而万里迢迢“采花酿蜜”的。他是最早向国内读者系统、全面、真实地介绍世界上第一个初创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从政治到经济到外交，既全面又具体，让读者对苏俄的认识和看法不再是道听途说，不再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而是类似于今天的“现场直播”。从某种角度看，瞿秋白也是一盏指路明灯，为国内那些尚在困惑迷茫中摸索中国未来前途的进步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指明了方向，让他们对红色苏俄产生了无限向往，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祖国的前途，这就是走俄国人之路。

莫斯科，是当时世界革命的中心，也是瞿秋白心中的灯塔。他写诗勉励自己：“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摸准船舵，前进，前进！”<sup>⑪</sup>

瞿秋白身在“洒满红光的世界里”，勤奋学习，钻研马克思列宁著作。他在苦苦思索中，坚定了靠马列主义救中国的信念，驱除了思想中的残云余雾。他觉得“从物质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傍于实际，抽象的‘真、善、美’的社会理想，绝不能像飞将

军似的从天而降。劳工神圣、理想的天国，不在知识阶级的笔下，而在劳工阶级实际生活上的精进”。

世界观已发生深刻变化的瞿秋白，在1922年2月，经张太雷介绍，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位才智兼备的先锋战士，瞿秋白也决心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

瞿秋白在旅俄期间曾两次见到世界革命的导师列宁。第一次是在1921年6月，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出席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大会期间，在走廊上与列宁相遇，通过采访，作了简短的交谈。第二次是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瞿秋白和陈独秀、张太雷等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还为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做翻译，并把列宁在大会上的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译成中文，迅速寄回国内，及时地指导中国国内的革命斗争。

瞿秋白的才华与贡献，很快引起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1922年底，瞿秋白随同陈独秀从莫斯科坐火车，途经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满洲里入境，走中东铁路回到北京。

---

21

“总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之路”的瞿秋白，回国后，便投入到大革命运动中，从一介书生成长为运筹帷幄、指点江山的中党早期领袖。

1923年，瞿秋白负责党的宣传工作，他先后主编了党中央机关刊物和《新青年》及《向导》周报。

第一期季刊《新青年》，封面由瞿秋白设计和作画，他亲自撰写了《新青年新宣言》，首次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同时发表了他创作的第一首歌曲《赤潮曲》。“赤潮澎湃，晓霞飞动，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远方古国，四万万同胞同声歌颂神圣的劳动。猛攻，猛攻，捣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奋勇，奋勇，解放我殖民世界劳工……”瞿秋白还将《国际歌》的曲谱与中文歌词配合译出，发表在这一期的杂志上。

集绘画、音乐、诗歌、评论才能于一身的瞿秋白，可谓是学者专家型的政治宣传家。由他主创主编的《新青年》季刊第一期横空出世，内容极富感染力，图文并茂且融入了鲜明的政治导向，引发社会

各层面读者的广泛关注，震撼了全国。

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由他负责起草党纲草案，并在三大上作报告。他还担任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协助促成了国共合作，他和毛泽东同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5年1月，瞿秋白在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成为由陈独秀等五人组成的中央局的成员之一。革命的需要将年仅26岁的瞿秋白推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岗位。

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时受党内右倾路线影响，此文章只在党中央机关报纸《向导》上发表了一部分，其余不许刊登。瞿秋白得知后，非常气愤，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发，还革什么命！”

当时党内有些人受右倾错误路线影响，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过火过分了，瞿秋白据理力争、坚持斗争。之后，他在4月中旬把毛泽东这篇报告交给中共主办的长江书局，刊印了单行本。瞿秋白专为此书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sup>⑫</sup>

当大革命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瞿秋白保持着清醒头脑，较早察觉到国共统一战线内部潜伏着分裂危机和正在发展中的陈独秀右倾错误。他不顾肺病复发的折磨，写出长达7万字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深刻地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状况、阶级关系和各阶级的特点，系统地阐述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问题，为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1927年4月27日—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礼堂召开。在第一天陈独秀做中央报告后，第二天瞿秋白便散发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公开背叛革命，将武装力量变成屠杀革命者的工具和刽子手，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惨遭杀害。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国。

在这危急的时刻，在数以万计的革命者人头落地的血雨腥风中，在人们处于焦虑迷茫、不知所措的时候，28岁的瞿秋白8月7日在武汉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召开的地点是在武汉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路139号），门口是邓小平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牌匾。来到二楼的当年会场，那里保持着原样。会场很简朴，也不算大，桌子周围摆放着几排椅子，普通的桌椅显得有些简陋。

展板上有当年保存下来的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与会者名字真是再简单不过了，都用一个字代替。其中“迈”指罗迈（李维汉），“秋”指瞿秋白，“泽”指毛泽东，“弼”指任弼时，“太”指张太雷，“中”指邓中夏，“兆”指苏兆征，“亦”指罗亦农，“乔”指陈乔年，“和”指蔡和森。

显而易见，当时的形势是何等严峻。

在展厅里，参观者可以按一下按钮，接着就听到了邓小平的讲话录音：“‘八七’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瞿秋白主持了“八七”会议并作了报告，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批准了“八一”起义和秋收暴动的决定，并把秋收起义作为党的最主要任务。这清醒而坚定的系列部署，使受到重创的革命队伍重新聚集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及时扭转了那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在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八七”会议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28岁的瞿秋白受命于危难之际，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极大的政治勇气，担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在他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整顿和恢复了各地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在一些地区相继组织和发动了武装起义，如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等。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也凝聚着瞿秋白的心血和功劳。周恩来曾回忆说：“在‘八一’起义以前，

我曾和瞿秋白等酝酿起义的问题，瞿秋白完全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我去主持。”<sup>⑬</sup>

在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正是拨乱反正时期，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他却沉着应对，运筹帷幄，力挽狂澜，引领着革命航船避开暗礁险滩。虽然他外表儒雅，戴着一副眼镜，透出几分书卷气，但是骨子里却敢于担当、勇于承受风险。虽然他一直是肺病缠身，时常要忍受疾病的折磨，却任劳任怨，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在当时反革命势力猖獗的形势下，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高举工农革命的大旗，没有让革命的进程止步徘徊，而是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壮大。

龚育之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分别谈过瞿秋白与“八七”会议。龚育之说：“‘八七’会议历史贡献是很大的，瞿秋白同志在这中间有他的重大贡献。”金冲及说：“在‘八七’会议上，明确我们要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土地革命，这是一个总方针，给很多处在迷茫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一个方向，看到新的希望。假如说，没有‘八七’会议，党也有可能涣散、瓦解，当时瞿秋白同志在这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论岁月怎样变幻，不论历史怎样演变，瞿秋白的巨大历史贡献都是彪炳史册的。新中国诞生初期，毛主席在为《瞿秋白文集》题词时，其中有一句话是：“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

历史的长河，总是曲折流淌的。

1931年初，瞿秋白受到米夫和王明宗派集团的诬陷和迫害，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剥夺了正常工作的权利，遭受了残酷的打击。命运发生逆转的时刻，他没有消沉和颓唐。

“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是瞿秋白年轻时立下的誓言。即使遇到再大的艰难，再多的委屈，他心中唯独没有想到自己，依然坚持无私奉献，竭尽全力去实现自己的誓言。在逆境中，瞿秋白选择另外一条路、另一种方式，去寻求精神世界的光明。

瞿秋白重返文学园地，来到新文化运动重镇上海，和鲁迅、茅盾等人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了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

重要奠基者之一。茅盾曾说过，左翼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促其由前一向成熟期转变，“应该给瞿秋白记头等功”。

鲁迅被瞿秋白的博学和人品深深折服，曾书赠条幅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鲁迅和瞿秋白成为了挚友。在上海白色恐怖时期，瞿秋白几次避难都是在鲁迅的家里。

鲁迅旧居当年是上海大陆新村9号，现在是山阴路132弄9号，是在一幢老式居民楼房的一隅，一个小三层的结构。到这里参观的每个人都要套上鞋套，也有人数限制。

据解说员介绍，此处旧居是原貌保存的，包括所有的家具摆设都是真迹和原始状态。木楼梯和扶杆都已斑驳陆离，走进每一层，发现房间的物件都透出岁月打磨的印痕，细细查看，没有任何仿制的痕迹。

面积不算很大，透着雅气书香且有南方布局精细、考究特点的鲁迅旧居，充满着家庭温馨的氛围。在这里也曾留下了瞿秋白的身影和足迹。

二层楼的客房，就是瞿秋白两次避难的所在地。

三楼的客厅兼卧室，墙壁上挂着鲁迅和夫人许广平与儿子周海婴合影的原版照片，下有两把南方特色、已显陈旧的竹制藤椅，左侧是一架黑褐色的老式钢琴，右侧靠墙是一张看上去很舒适、很宽松也很考究的古铜色带雕刻图案的铁制大床。

在三楼比较宽敞的房间里，人们会禁不住久久凝望沉思。透过那长长的花纹有些模糊的窗帘，拂去岁月流转的印痕，当年在房间内发生的感人肺腑的一幕幕情景恍若眼前。

1934年1月初，瞿秋白赴中央苏区前，特意前来向鲁迅告别，两人坐在藤椅上，相互倾诉，畅所欲言，谈了很多的话，谈到很晚。鲁迅留瞿秋白住宿，为了表达惜别之情，鲁迅和许广平把自己的床让给瞿秋白，自己搭地铺睡。

鲁迅和瞿秋白都有肺病，可谓同病相怜，鲁迅还特意取出由朋友从国外寄来的止咳药片，倒了开水让瞿秋白服下。

如今止咳药瓶依然摆放在瞿秋白曾睡过的床铺前的桌几上，这瓶

药早已过期失效，可是这份人间最珍贵的真情却是永恒的，永远也不会过期的。

据资料记载，正遭受肺病折磨的鲁迅在话别时，曾劝慰也是长期患肺病的瞿秋白，应该到苏联去疗养治病，这种病是不适宜到艰苦又危险的中央苏区的。

回到家后，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依依惜别。二人结婚整整十年了，因忙于革命事业，聚少离多，却彼此知心，感情甚笃，既是夫妻又是战友。杨之华是老党员，是中央委员和中央妇女部长，她理解丈夫接到通知到中央苏区，如同重回老家的期待和欣慰。因通知瞿秋白一人先去，她不能随行。她听说中央苏区正遭受国民党的“围剿”，担心和牵挂丈夫的肺病是否能适应这严峻的形势，可是党性很强的她，只能殷殷叮嘱丈夫多保重，含泪和丈夫暂别。她不知此别竟成为了永别。

回眸和夫人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上海三年时光，瞿秋白为在失意时没有虚度而感到内心很充实。

瞿秋白在上海期间，不仅成为左翼作家联盟乃至中国文坛一面不可替代的旗帜，也在此期间忙于领导工作之余，辛苦笔耕了一百多万字的著作和译文，为中国的文化事业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1934年1月底，瞿秋白来到了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出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兼管艺术局和苏维埃大学的工作。虽然这时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仍排挤着瞿秋白，使他难以发挥全部的力量。但是胸怀宽广的瞿秋白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照样尽全力做好给他的任何一项工作。他仅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主持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了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集大全的教育法规24部。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前，瞿秋白以为自己要和大家一起出发，便早早地整理好行装，等来的通知却是中央要他留下来坚持工作。或许瞿秋白想象不到会有这样的通知，也许那时的他心中是酸楚和无奈的，但他依然顾全大局，没有计较什么，照旧坚守岗位，继续认真地工作。

中央苏区形势日益险恶，疏散部分留守人员已迫在眉睫。

1935年2月，在突围转移的战斗中，瞿秋白不幸被捕。后经叛徒指认，敌人知道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报纸上也刊登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

心急如焚的杨之华找到了鲁迅，躺在病榻上的鲁迅先生挺身而出，抱病想尽办法营救瞿秋白。鲁迅、茅盾、夏衍、田汉、郑振铎等愤然联名上书要求释放瞿秋白，一些社会团体也纷纷发出呼吁和抗议。

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中央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究竟要不要杀死瞿秋白。社会名流、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像瞿秋白这样天资出众的人，在中国不可多得，主张不要杀他。但是戴季陶等国民党反动分子坚决要杀瞿秋白，戴季陶还扬言：这样的共产党员要人，一旦得势，必将成为无穷的后患。

历尽了种种威逼利诱，瞿秋白始终坚贞不屈，一身浩然正气。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下令杀死瞿秋白。

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罗汉岭，瞿秋白来到一片草坪中间，环顾一下四周，盘腿坐下，对刽子手点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枪声响起，瞿秋白缓缓倒下，年仅36岁。正如毛泽东所说：“他在革命困难的岁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

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将瞿秋白的遗骨由福建长汀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央举行了瞿秋白的遗骨迁葬仪式，由周恩来主祭。

在无数革命烈士中，瞿秋白的遗骨是唯一由中央主持从外地迁葬北京的。





1896年，在俄国彼得堡签署《中俄密约》时签字仪式现场

## 第二章 T字形大动脉与五一劳动节

瞿秋白是我们已知的最早在中东铁路沿线留下足迹的中共早期领袖。神奇的中东铁路承载了太多历史使命。后面的章节我们将陆续揭开那段历史的面纱，共同分享精彩纷呈的红色故事。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先看看中东铁路修建前后的情形。

1898年3月4日，严冬刚刚过去，已是初春时节，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中国人称之为海参崴的城中，一字儿排开30辆大车，正等待出发的命令。待大伙儿和送行的人道别后，领头的俄罗斯人大手一挥，马儿喷着响鼻，撒欢儿向南飞奔而去。这支队伍是中东铁路公司工程局派出的一支先遣队，目的地是中国东北一个叫哈尔滨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十分理想，是建中东铁路枢纽站最理想的地点。先前已经有一支工程局的小队伍在那儿进行考察和勘测，两支队伍要在那儿会合，为中东铁路开工作准备。这支先遣队中有工程师、气象技师、医生、厨师、工人，还有负责保卫事宜的半个连步兵，总共有五十多人，领头的是一个叫希德洛夫斯基的工程师。车队携带着大量辎重，最贵重的是价值10万卢布的银块，这是他们到达哈尔滨后需要的经费。

1898年4月4日下午，经过一个月的跋涉，先遣队与在哈尔滨田家烧锅的那小队俄国技术人员会合了。

那时的哈尔滨可不是像现在这样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19世纪末叶，清朝光绪年间，哈尔滨还只是个塞外村镇，默默地隐居在松花江畔。网场渡口，帆影炊烟，乡间集市，茅舍田园，那便是哈尔滨都邑的韶年。

先期来到哈尔滨的那小队俄罗斯人安营扎寨的地点是田家烧锅，

并在此搭建了简易的住房，这里后来被称为老哈尔滨。他们选择在这里安营是有原因的。这附近原先有一个制酒作坊，当地人叫烧锅，可因遭到土匪的洗劫，作坊主人不敢再干了，这里的二三十间房也就闲置下来了。先来的小队认为这里条件不错，可以利用，就驻扎下来，等待大队人马来定夺。希德洛夫斯基来后亲自查看一番，认为这些房子虽有些破旧，但墙壁和房盖还是完整的，修理起来并不难。于是派翻译找到了烧锅的几位主人，一番讨价还价后，以 8000 两银子买下了此地的全部财产。

1898 年 6 月 9 日，第一批铁路建设人员进驻被中东铁路工程局买下并修葺一新的田家烧锅，中东铁路工程局将这一天确定为中东铁路的纪念日。后来，俄国人也把这一天作为哈尔滨这座城市诞生的日子。从此，松花江畔的这片沃土上永远告别了往日的宁静。招募而来的修铁路的工人越来越多，来自俄国的大批技术人员等也接踵而至。

其实在这之前不到一年，也就是 1897 年 8 月 28 日，在中国黑龙江省东宁县三岔口镇附近，就已经举行了中东铁路的开工典礼。出席典礼的有三岔口的中国官员，有以总工程师尤戈维奇为首的中东铁路建设局的官员，还有乌苏里铁路管理局和临近的俄国地方官员。

由于实际路线的变更，这段奠基时的路基被放弃。整个中东铁路的走向，在 1898 年春天才最终被确定下来。而对于线路的勘测，则伴随着整个工程建设一直进行，直到 1900 年的上半年才宣告结束。

哈尔滨因修建铁路的需要，拥进了大量人员，筑路的工人几乎都是从中国内地招募的。哈尔滨如此，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整个中东铁路的修建需要太多的劳动力。中东铁路开工之初，俄国副总工程师亲自去上海和烟台，一次招募 7 万工人。随后，为修筑铁路主干线，再次从内地招募了 10 万人。

中东铁路就这样在中国东北轰轰烈烈地开建了。那时中国的老百姓还不知铁路为何物，不知修建这样的路有什么用处，也想象不出来铁路会对社会的进程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但其实大清的上层对铁路还是有所了解的。

为全人类带来剧变的人，名叫瓦特，他在 1785 年改良了一种利用

水蒸气产生动能的机械，这种机械可以持续提供动力。1819年，在英国达累姆的帕顿煤矿，33岁的史蒂芬孙制造出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蒸汽机车，这台机车能够牵引8节矿车以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行驶。据说因为当地人看到了火从机车烟囱里喷出来，于是叫它火车。

世界上第一条铁路也是在英国诞生的，始于1825年，总长度为400多公里。有了铁路这样的载体，火车便可纵横驰骋，很快西方国家的铁路遍地开花，四通八达。火车就在人类亲手锻造出的两条钢铁平行线上，穿越了地球上多数陆地覆盖的地方，所到之处是当地景致的改变和命运的变迁。

拥有世界瞩目的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四大发明的中国，曾经是世界之林的翘楚，雄居于世。但昔日的繁华昌盛早已随时光远去，到了清朝中晚期，国力已经逐渐衰败，在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面前，不堪一击。

此时中国的交通工具与西方新兴的工业大国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一边是风驰电掣的火车，一边是骑马坐轿，而且骑马坐轿还必须是有钱有势之人；一边是男人短发轻装上阵，女人双脚自由且要张扬男女平等之风气，一边是男人大辫子长袍马褂，女人三寸金莲裹小脚还要在男尊女卑的樊篱中循规蹈矩。

当时清朝晚期重臣李鸿章却很有眼光。他是那个朝代官僚中，出国次数最多、行程最远、去的国家最多的一个人，甚至在他74岁时，他还晋见了法国和美国总统。在他暮年远行时，携带的众多行李中，居然还有一口棺材。风萧萧雨蒙蒙，远涉重洋、年事已高的晚清重臣李鸿章，随时随地做好了客死他乡的准备，也平添了几分晚景的凄凉和悲怆。

李鸿章年迈而雍容，足智多谋，侃侃健谈，深谙外交辞令和礼仪，他曾受到所到国家的隆重欢迎。据史书记载，在英国，他受到最高礼遇，“办外交，威望日增，饮誉国际”，“洋人希望他做皇帝”。

走遍半个地球的李鸿章，深知也深切地体会到修铁路通火车的至关重要，但多次上奏未果。他曾致函总理衙门说：“火车铁路利益甚大，东西洋均已盛行，中国阻于浮议，至今未能试办，将来欲求富强

制敌之策，舍此莫由。”可是有人反对的理由居然是，修了铁路通了火车，西洋兵到中国会来得更快。<sup>⑭</sup>

在世界上第一条铁路通车的四十多年后，1865年，英国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修建了0.5公里长的一小段“展览铁路”。虽然这条铁路无实际用途，但这是铁路首次公开出现在中国人的眼前，令京城充满恐惧，视为妖物。后来步军统领衙门随即以“观者骇怪”为由急忙拆除该铁路，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中国第一条真正营运的铁路，是于1976年由英国怡和洋行擅自铺设的从上海到吴淞的吴淞铁路，全长14.5公里。当时无论清廷还是民众都视铁路如洪水猛兽，这条铁路通车营运一年后，就被清政府以28万5千两白银赎回，当即拆除。

中国官办的第一条铁路，是1881年由李鸿章下令铺设的唐胥铁路（唐山——胥名庄），全长9.2公里。起初怕反对声太甚，只以骡马为动力，1882年才开始使用蒸汽机车牵引。

封闭，抱残守缺的大清当权者们根本认识不到火车这个工业革命的产物会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他们如井底之蛙，只会臆想中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洋人的火车不过是一个大怪物而已。

到了1898年，俄国人要在大清的土地上修铁路了，一班老臣们心中仍是不爽，但大清的基业要紧，总得制衡东洋的小日本吧。还有你老毛子修铁路的地方是我大清朝顾不过来的地儿，是兔子不拉屎的人烟稀少之地，你修就修吧，只是日后大清若和小日本开战，你能出兵相助就行了。

沙俄可不这么想，他们可是为自己的长远利益着想，所以沙俄全力以赴地在干线支线同时开工。

那个年代，要修建一条穿山越岭、2000多公里的铁路该有多难。但俄国人运用较为成熟的技术，加上中国劳工的艰辛劳作，硬是修建成了这样一条铁路。其中兴安隧道修建的过程就比较有代表性。

有一首歌的歌词是“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山势险峻的大兴安岭是宽广的松嫩平原上高高耸起的边际线，海拔近千米，林海茫茫，人迹罕至。要将其中一段山脉打通，修筑兴安隧道，让火车

从高处通过兴安隧道，穿越大兴安岭，当时这无疑是一个极大胆的构想，也是中东铁路工程中最大的难关。数以千计的工人汇聚在工地上，除了俄国技术人员外，绝大多数是中国工人。由于缺乏开凿和衬砌隧道的熟练技工，沙俄帝国特地从意大利雇佣了500多名专业石匠，这些石匠昼夜兼程，从万里之外、阳光明媚的亚平宁半岛，一头钻进了大清国北方滴水成冰的群山中。为了加快速度，隧道上方开凿了一连串竖井，竖井内部使用了电动升降机。靠着中国工人挥汗如雨，一锹又一锹，一镐又一镐的拼命挖掘，靠着中国和意大利工人，还有俄国技术人员的通力合作，在冰封雪裹、海拔973米的大兴安岭的山脉上，终于创造了奇迹，开通了长达3000多米的兴安隧道。

现如今，横道河子、绥芬河、满洲里等地还有很多的中东铁路遗存遗址，它们记载着那段令人唏嘘的历史。

位于张广才岭山脉的黑龙江省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整体地貌是在半山坡上，由低到高的走势，横道河子火车站，规模不算壮观，却典雅别致，风格独特，依然保持着百年前中东铁路修建的车站的原貌。当年，中东铁路建设局在中东铁路沿线修建了近百个规模大小不等的火车站，这些火车站都是俄式建筑，其造型和风格大同小异。

横道河子镇上的建筑充满着浓郁的俄式风情，除了透着几分神秘色彩的教堂外，大片的米黄色铁路平房，比比皆是。

中东铁路修建时，沿线先有了火车站，接踵而至的便是一座座城市或城镇，不论哪座城市或城镇，都会出现一片片米黄色的铁路平房。这些俄式风格的平房举架较高，窗户很大，窗户上房檐下伸出一片遮风雨的挡板，挡板上嵌刻着西洋油画般的图案。这些平房散落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地，惊人的相似，如同复制的批量产品，人们称之为“铁路房”或“铁路平房”。它构筑了中东铁路特有的建筑文化，是中东铁路特有的建筑风景线。

放眼望去，群山环抱中的横道河子小镇，在重重叠叠的绿色树木掩映下，恬淡幽美。位于山坡镇中心的长长的河水，几乎水清见底，又起起伏伏，水花跌宕，让盛夏中的游人顿觉凉爽惬意。

当地居民介绍说，这条河当年是在镇子的东北角，因修中东铁

路而改道，将河水由东北角牵引到镇子中间的位置，横在了镇中心，横道河子由此而得名。百年前修建中东铁路，山和水都为之让路，那个年代开山移水的工程，没有什么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全靠着人工劳作，何其艰辛。百年前屡创壮举的人和事早已随风远去，横道河子的流水，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历史印痕。

在河水的不远处，是规模宏大的中东铁路机车库，它是国家级保护文物。

走近车库，虽有残垣断壁，但总体轮廓还算完整。据介绍，这两千多平方米的空间，可同时容纳十几列火车头。可以想象，当年此处充满着“呜呜呜”的火车鸣笛声，也弥漫着火车头散发的烟气。如今这里空空荡荡，异常静谧，历经百年，斑驳陆离。

在中东铁路的两个端口绥芬河和满洲里，当年的建筑，如今依然大都存在。

绥芬河的中俄两国交界处，以三号隧道为分界，隧道建成的时间“1898年”被嵌刻在建筑上，三号隧道迄今原貌原样，中俄两国的火车还是在有百年历史的隧道中穿梭。

满洲里的国门新修不久，蔚为壮观，国门下中俄两国火车穿行的路基，还是百年前中东铁路建设局修筑的。

中东铁路修建过程中，也曾遇到巨大波折。1900年6月，中东铁路沿线各处工地骤然停工。原来晚清政府下诏向美、英、法、俄等11国宣战，令各省督抚召令义民成团，掀起一场席卷全国的反洋运动。各地的义和团纷纷成立，东北地区的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的大旗，与沙俄帝国的军队激烈交战。战争胜负终归要靠实力和武器，在先进的洋枪洋炮面前，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和装备落后的清军，付出惨重的代价，以全面失败告终。

大清国如同回光返照的巨人，完成了最后一次痛苦的挣扎之后重重倒地，再也没能站起来。

在此之后，中东铁路各处工地开始全面复工。

中东铁路自1898年开始修建，历时五年多，于1903年全线竣工。

中东铁路和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以哈尔滨为中心，东线

由哈尔滨东向绥芬河出境，西线由哈尔滨西向满洲里出境，南线由哈尔滨经大连通往北京。这一条 T 字形铁路，连接了中国和俄罗斯的首都，贯穿了欧亚大陆。

根据当时的勘测数据，中东铁路东西线加上南部支线全长为 2360 俄里（2522.8 公里）。

伴随中东铁路的修建与开通，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

铁路刚刚通车，1903 年，作为中东铁路枢纽的哈尔滨便成立了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厂，后改为哈尔滨车辆厂。在铁路工业的引领下，哈尔滨的机械、制粉、电业、航运、印刷、纺织、制酒和铁工业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工人的来源也和铁路息息相关。为修筑铁路，沙俄从中国关内和东三省招募了十几万的筑路工人。修完铁路，数以万计的筑路工人留在了哈尔滨。

在中东铁路总工厂里，以伊奥秀夫为首的沙俄管理人员，只知道驱使中国工人为他们组装和修理各种机车，却根本不顾中国工人的利益。不少工人来自清朝洋务运动时期创立的北洋机器局和吉林机器局，他们的技术娴熟，工资却低得可怜，劳动的时间过长，工作量很重，而且居住条件极其恶劣。

工人们住在沼泽地上临时搭起的一片人字形帆布帐篷里，每到盛夏日晒雨淋，帐篷里如同蒸笼，蚊虫成群结队；隆冬时节北风呼啸，帐篷又变成了冰窖。

忍无可忍的工人们在张永贵的领导下冲进了大帐篷，向伊奥秀夫大总管提出抗议：“我们要享受人的待遇。”“我们要房子住。”……脑满肠肥的伊奥秀夫对当年的义和团还心存余悸，便哄骗工人说：“诸位先回去干活，我一定把大家的要求转达给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局长霍尔瓦特。”

许多天过去了，却毫无音信。张永贵带领中国工人，手里拿着大棒子质问伊奥秀夫，声明不给明确答复决不罢休。

此时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为了争夺中国东

北，俄日两国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战争一触即发。出于战略需要，俄国急需大量的列车来运输战争物资。为了缓解中国工人的愤怒情绪，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答应了中国工人的部分要求，责成总工厂拨出一些砖瓦木材和费用来建造工人住宅。

1903年秋天，在总工厂附近一个比较干燥平坦的地方，搭了六排人字形窝棚，工人们总算有了可以勉强居住的地方。窝棚每排六个，共计36个，被工人们称为“三十六棚”。最初，住在棚里的是在总工厂做工的单身汉，一个窝棚少则十余人，多则30人。不久之后，工人家属纷纷来到这里。工人们互相帮助，挨着窝棚盖了不少土坯房，逐渐围绕着三十六棚形成了中国工人住宅区。后来，人们又把总工厂称为“三十六棚大厂”，而“三十六棚”也成了总工厂及工人住宅区的统称。

相比原来风雨飘摇的布帐篷，三十六棚的条件有所改善，可是他们的生活环境还很艰苦。这里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没有厕所，没有水井，工人们用水只能到松花江边用木桶挑。冬季，在这里居住的工人就更遭罪了。生活的困境被工人们编成了歌谣：“三十六棚是冷寒宫，穷人过冬要人命，长夜没火难取暖，跺脚取暖到天明。”<sup>⑯</sup>

沙俄为保障中东铁路通畅，把旅顺的边境地方法院迁到了中东铁路的枢纽哈尔滨，同时设立了警察局和监狱。1907年1月在哈尔滨设立了俄国总领事馆，同年，沙俄成立了哈尔滨自治市，选出的40名议员中没有一名中国人，全是俄国人。自治市按照俄国法律征收赋税，各大商店的招牌全用俄文，所有的公告文告、连同火车票上的字也都是俄文。哈尔滨成为了俄国人的天下。

但在哈尔滨为数众多的俄侨中，有不少革命者。在俄国第一次革命高潮时，他们在哈尔滨遥相呼应，传递着俄国数十万工人奋起抗争，反对沙皇反动统治的革命信息，也传递着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出的各国工人团结战斗的声音。1905年11月，俄国革命者和俄国工人在哈尔滨成立了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该组织的主要基地是俄国与中国工人并肩工作的中东铁路总工厂，即三十六棚大厂。

铁路总工厂从建厂开始，沙俄在招募中国工人的同时，也在俄国

陆续招募了五六百名懂技术的俄国工人。中俄两国工人语言不同，感情却是相融的，因为他们都是苦出身，都受到沙俄的剥削和压迫，两国工人常常是互相帮助。由于朝夕相处，总是一起合作，渐渐地中俄两国工人大体上能听懂对方的意思，甚至可以进行简单的交流了。

在与俄国工人亲密无间的交流中，中国工人第一次听到了“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名词，他们以前从来都不知道劳动者居然拥有自己的节日，况且还是国际性的。

1886年5月1日，美国全国1万多个企业中的35万工人全部停工，上街参加游行，争取8小时工作制。189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规定每年的5月1日这一天为国际劳动节。俄国工人每年五一时都要举行游行来纪念自己的节日，纪念五一的活动已经在俄国的许多城市蔚然成风。

此时已是4月，俄国工人纷纷议论五一的事情。机车分厂有个年轻的中国工人叫吴泰，他是1899年从山东来东北修中东铁路的，其间曾被安排到俄国的海参崴铁路工厂做工，因为积极参加罢工斗争被工厂开除，他又辗转来到哈尔滨铁路总工厂机车分厂做工。他为人热情仗义，又有斗争经验，经常带领工人向总工厂的俄国大小总管讨公平，在工人中很有威望。吴泰不断地在工人中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世界各国工人都在纪念五一，为什么中国工人不能纪念呢？今年五一，我们三十六棚工厂就应该用实际行动来纪念自己的节日。吴泰的倡议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众人一致认同和响应，大家推举吴泰作为中国工人的代表，由他出面联系和交涉纪念五一的事情。

吴泰找到俄国工人，建议中俄两国工人一起召开一个大会来纪念五一。对于吴泰的建议，俄国工人非常赞成，同时向布尔什维克组织进行了汇报。在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和参与下，4月下旬，中俄两国工人推选出的几名代表连续秘密开会，最后商定在松花江边举行大规模的五一纪念大会。这个决定，让中俄工人深受鼓舞，尤其是中国工人首次纪念自己的节日，更是分外激动。他们分头活动，奔走相告，跃跃欲试。

4月30日的早晨，中俄工人代表来到总工厂大账房向俄国大总管

巴切罗夫郑重地提出：“5月1日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我们全体工人准备开会庆祝，要求放假一天。”

巴切罗夫听后先是一愣，稍作沉思，耸耸肩膀，傲慢地摊开双手说：“根据铁路局规章，没有五一放假的规定，不要提出无理的要求，你们赶快回去，明天照常上工干活。”

工人代表没听他那一套，回去后分别通知全厂工人，明天按原定计划到江边聚齐，开大会隆重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工人们欢欣鼓舞，充满期待。

看到这样的局面，想象着明天要出大事的场面，巴切罗夫大总管慌了手脚，心神难安。他连忙挂电话请示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得到的答复是两个字：镇压。

4月30日上午，巴切罗夫派人在总工厂各处张贴用中俄文书写的霍尔瓦特局长下达的命令：“对擅离职守或旷工者，负刑法第三八四条规定的罪责，处以四个月的监禁……”

4月30日下午，霍尔瓦特局长派来军警数十人，荷枪实弹驻守在总工厂的大门口。

一时间，中东铁路总工厂笼罩在乌云中。工人们双眉紧蹙，愤懑不已，有的人说：想要过一个自己的节日都这么难，他们欺人太甚，干脆和他们拼了。

倘若五一的集会照常进行，必将出现一场流血事件，这涉及全厂成百上千人的安危，怎么办？

布尔什维克组织和中俄工人代表立即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对策。俄国工人代表建议，改在5月14日这天举行活动，因为这一天是俄历的5月1日，在俄国有时也在这一天举行活动，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会议还决定，以总工厂为主，同时尽快秘密串联和发动全市各行业的工人及市民参加大会，大会的地点由松花江边改在江北。

5月1日这一天，中俄工人照常上班，连续几天风平浪静。原来对五一的纷纷议论，也销声匿迹了。巴切罗夫大总管长舒了一口气，密切关注局势的霍尔瓦特局长，也放松了警惕，觉得闹事的风波已经烟消云散了。一个星期后，全副武装的军警队也离开了总工厂。

1907年5月14日（俄历5月1日）中午的时候，随着总工厂汽笛鸣响，两千多名中俄工人放下手中的工具，潮水般地离开工厂，与此同时，哈尔滨机车库的工人、面粉厂工人、码头工人、装卸工人也陆续赶到江边，有些店员、市民和学生也闻讯赶来。

猝然间，松花江边汇聚了几千人，还有铁路其他部门的工人和一些市民也正在行进的途中。

罢工领导人事先已协调和联络了江边的客轮及货轮的工人，那儿的工人不仅答应所有的大小船只用来送人过江，而且在他们把人员送过江后，也愿意一同参加纪念五一节大会。

当中俄工人离开总工厂时，毫无准备的大小总管和工头们如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惊慌失措的巴切罗夫大总管急忙挂电话报警，恼羞成怒的霍尔瓦特立即下令动用护路军赶来镇压。上百名护路军警迅速集合，向松花江江边挺进。

出乎预料的是，他们赶到江边时，没见到一个工人，几千名工人已经过江了。

浩瀚的江水款款流淌，风中荡起的层层浪花，不时地拍击着岸边。滚滚的江水在绚丽的阳光照射下，变得波光闪烁，溢彩流金。

上百名护路军警在松花江江边沮丧地徘徊，垂头丧气。

平日里，宽阔的江面上，有许多客轮和货轮穿梭往来，也有各种船只出没其间。可眼下，江面上空空荡荡，见不到一只船，真是一片汪洋都不见啊。

等来等去，江面上依然是空空荡荡，急得直跺脚的俄国军官，只能望江兴叹。

下午1时许，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会在江北临江的一片高坡上召开。此时，正是哈尔滨春意盎然的季节，高坡地周围茂密的树林透出浓浓的翠绿。在绿树掩映下，一簇簇丁香花姹紫嫣红，随风摇曳。高坡地周围插满了红旗，旗上写着“五一万岁”“劳工神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口号，来自全市各工厂企业的工人和市民围了一个大圆圈，前呼后拥，人头攒动。第一次在中国纪念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与会者十分兴奋，尤其是历经坎坷的

三十六棚总工厂的两千多名中俄工人，更是激动不已。其中这次活动最早的发起者吴泰笑着连声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大会以高坡的土堆为讲台，许多中俄工人上来发表演说。有的中国工人指出，沙俄在中国的土地上修铁路、盖工厂，却不把中国工人当人待，他们住着洋房高楼，吃得脑满肠肥，而工人们风餐露宿，住在阴冷的三十六棚。大小总管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工人累死累活无人管，累出病来就被踢出工厂。这些演说，引起强烈的共鸣。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也在会上介绍了俄国内沙皇政府血腥镇压工农革命，人民奋起抗争的情况。同时号召中俄工人要加强团结，为改善工人的生活待遇，争取 8 小时工作制而斗争。

代表们发自肺腑的演说，紧紧地牵动着每个人的心，鼓掌声、欢呼声和口号呼喊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江北附近各村屯的农民也闻讯赶来看热闹，人潮涌动，红旗飘飘，这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的人数达到了一万多人。

大会发言后，为了庆祝自己的节日，中俄工人开始唱歌跳舞，许多市民也伴随其中，简易的会场，却溢满了欢腾的景象，直到晚 5 时左右，纪念活动才算结束。

在俄国大权在握的哈尔滨，竟然出现了上万人参加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这让俄国沙皇政府深感震惊和忧虑，俄国内阁总理斯托雷平亲自下令调查这一事件。

1907 年，在清朝光绪年间，或许有极少数开明进步的中国人，知道世界上有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词。可是在中国版图上，付诸行动来纪念劳动者自己的节日，高呼“五一万岁”“劳工神圣”，这在当时的中国的大地上，无疑是石破天惊的第一次，是中国最早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记载。

中东铁路工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壮举，是中国工人阶级崛起的象征，是中国工人运动史的一个重要篇章。



ВОСТОЧНЫЙ ОТДЕЛ.  
1919 г.  
№ 2153.  
сказа, уг. Спиридоновки и Патриаршего  
пер. д. № 30/1.  
Телефон № 3-10-13.

Дано сие в удостоверение того, что  
предъявитель сего, гражданин Китай-  
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уроженец города Кантона,  
т. ЛАЙ-СИУ-ДЖАУ являетс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объедине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итайских рабо-  
чих,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нно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ративной 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оветов, как легально действую-  
щей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под именем  
"Союза Китайских Рабочих", что означенны  
т. ЛАЙ-СИУ-ДЖАУ является единственным  
Уполномоченным кита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и рабо-  
чих в России по охране их интересов, что  
как таковой, он имеет прав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  
но обращаться во вс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по делам,  
касающимся защиты интересов китайцев, и  
пользуется личной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остью.

Всем учреждениям и советам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оказывать ему всяческое содействие и не  
чинить препятствий в пути.

Заместитель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по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делам:



Заведующий Отделом Востока:

Совет Форума очень просит вас сформовать  
учреждение на базе окружного всяческого содей-  
ствия для Лай-Сиу-Джау. Пр. Соб. Кар. Кан. Утв. 1919

### 第三章 华工血染十月红旗

## 一、中国团团长任辅臣

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是为了扩张本国的势力，但长长的中东铁路后来竟成为革命者的红色之路。一战时，通过中东铁路来到俄国的许多旅俄华工也参加了苏俄的十月革命，在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旗帜上，也有中国人血染的风采。那么，一战时旅俄华工从中东铁路走出国门后有着怎样的命运呢？他们和十月革命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地处祖国边陲的黑龙江省黑河市在整理收集华工事迹上做出了很大努力。黑河市和俄罗斯一江之隔，悠悠的江水，隔开了两个国家。

在风光旖旎的江边延伸着一片宽阔的绿草坪，在绿草坪的路边，建有一座气势恢宏的旅俄华工纪念馆。

在旅俄华工纪念馆内，矗立着为捍卫十月革命壮烈牺牲的中国团团长任辅臣的雕像。望着任辅臣的雕像，不禁令人肃然起敬。这样的雕像，在英雄的家乡辽宁铁岭也有一座。辽宁铁岭烈士公园建有一座他的雕像，雕像在高处矗立着，英雄的目光，十分深邃。

任辅臣出生于辽宁铁岭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聪慧过人，又有很强的正义感。他读了五年私塾后，考取了著名的学府铁岭银冈书院，在校学习了三年。1901年，任辅臣通过官费考取了奉天警员教练所，两年后毕业回到家乡铁岭，在县警察署当了一名警官。不久，便与同乡张含光结婚。

和铁岭许多平民百姓饥寒交迫苦不堪言的生活相比，任辅臣的处境比较稳定和安逸。但年轻的任辅臣并没有安于现状、沉湎于新婚夫妻恩爱的小家庭欢乐中。任辅臣在工作中结识了一位年轻的俄国军

官瓦夏，瓦夏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下党员。会说中国话的瓦夏，向任辅臣介绍了很多革命的道理，并指出俄国的百姓和中国的百姓一样，都在遭受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只有穷人联合起来奋起抗争推翻反动的统治政权，老百姓才会获得翻身解放。

两位年轻人尽管国籍和种族不同，但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却使他们志同道合，关系愈发密切。在这以后，任辅臣又认识了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俄国青年军官。

1907年的春天，血气方刚、颇有抱负的23岁的任辅臣，毅然放弃了警官职位，携妻子张含光，经瓦夏介绍来到了哈尔滨，在中东铁路护军司令部主办的俄国军官学堂任汉语教官。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秘密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可以说，中东铁路和哈尔滨这座城市成为了任辅臣命运的拐点和走上革命征途的起点。

1907年，在沙俄管理的自治市哈尔滨，沙俄势力十分强大，同时革命的浪潮也是风起云涌。1905年在哈尔滨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主要基地是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并肩工作的三十六棚铁路总工厂，而且其影响力和号召力已覆盖中东铁路全线。

1908年，24岁的任辅臣在哈尔滨秘密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了最早加入布尔什维克的中国人。<sup>⑯</sup>

1909年夏季，哈尔滨沙俄当局逮捕了几名在军官学堂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党员之后，很快发现了在这里担任汉语教官的任辅臣也在秘密地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任辅臣当过多年的警官，与哈尔滨中国当局某些上层人物有一定联系，沙俄当局不便正面对任辅臣采取过激行为，于是采用卑劣手段，暗中买通了中国土匪对付他。

有一次，任辅臣去道外浴池洗澡，早已暗地跟踪他的土匪，悄悄地藏在了浴池的门后，趁着没有防备的任辅臣开门走进浴池之际，突然开黑枪。任辅臣胸部中弹，右手掌也被击穿。训练有素的任辅臣临危不惧，用左手握枪英勇还击，迫使土匪落荒而逃。负伤流血的任辅臣被送进当时医疗条件较好的铁路医院。

听到消息急速赶到医院的张含光，却被沙俄当局派出的几名监视人员恶狠狠地挡在了铁路医院的门外。见不到丈夫、不知丈夫伤势如何的张含光，无论怎样求情也进不去，这让她忐忑不安。

任辅臣的枪伤得到了及时的救治，伤情明显好转。可是在他的病房周围，沙俄当局却增派岗哨看管很严，外人很难靠近。

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组织倾尽全力设法营救，军官学堂具有正义感的中国教官也竭力帮忙，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打通了铁路医院的关节。几天后，张含光连夜赶制了一件白大褂，买了大口罩，并装扮成俄国护士，在铁路医院俄国医护人员的配合下，进入了病房，背起丈夫从职工通道的后门脱离了虎口。在事先安排好的接应人员的掩护下，任辅臣去往齐齐哈尔。

1911年，通过原铁岭的同乡和原奉天警员训练所同学的推荐，任辅臣出任黑龙江省警察总署巡逻队长。在此期间，任辅臣时常在中俄边境执行公务。受布尔什维克远东委员会的委托，他利用职务之便，想方设法掩护被沙俄流放到西伯利亚地区的“政治犯”越过边境到黑龙江。为了稳妥地掩护那些“政治犯”同志，避免节外生枝暴露自己的身份，任辅臣不惜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遮人耳目。他不仅出没于戏院和茶馆，甚至在赌场和烟馆也能见到他的身影。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偕同妻子到波斯尼亞检阅军事演习，在萨拉热窝遭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这个事件成为一战的导火索。一个月后的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8月1、3日，德国分别向俄、法宣战，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这场战争长达4年之久，前后被卷入战争的有五大洲33个国家，15亿人，大约有7000万人被动员参军。

战争打了两年后，巨大的伤亡给协约国的后方补给线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于是英、法、俄等国将目光转向了劳动力廉价的中国。正如1916年被俄国招募到鄂本斯克修筑铁路的华工唐卿之所言：“谁知道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我们中国劳工突然吃香起来。战争的年代不仅要很多人去打仗，而且要修筑很多新的道路，砍伐许多木材，还要采煤和开矿。这一切都需要工人，可是哪里去找呢？那个时候再没

有一个地方能比我们中国的劳动力更多了。”

英法在中国山东等地有记载的招募华工有 14 万之多。俄罗斯政府原先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一直排斥华工进入其境内。1915 年俄政府鉴于劳动力严重短缺，先后颁布了允许华工入境的临时条例，使招募华工合法化，于是华工开始大量进入俄罗斯。华工进入俄国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中国政府规定的招工程序进行，比较规范，通过这种方式到俄罗斯的有几万人；二是中国政府没有介入，俄方私自招募的，这部分人有几十万。据史料记载，从中东铁路进入俄国的华工应在 50 万人左右。一战结束，当俄国不需要那么多的华工时，许多华工流浪街头，情形十分悲惨。

中国华工为协约国取得一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直接死于前线战场的就达数千人。

1917 年 3 月 14 日北洋政府改变中立态度，通过对德绝交议案。1917 年 8 月 14 日正式宣布对德、奥宣战。1918 年 11 月 11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而告终，中国也终于享受到久违的战胜国的滋味，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

1919 年 1 月 18 日至 6 月 28 日，巴黎和会召开，共有 27 国参会。中国国人当时满以为作为战胜国能够收回山东半岛的主权，但日本却要求把德国的侵华权益转移给日本，理由是中国在一战中没有什么贡献，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英、法等国竟同意日本的要求。中国代表顾维钧以 14 万华工捐躯欧洲，血染沙场的事实进行驳斥，但毫无所获。消息传来，蔡元培先生得知北洋政府准备妥协，就连夜把消息告诉了北大学生罗家论、傅斯年、段锡朋、康白情等人，让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地。这是后话。

由于赴俄国人数极多，同时又传来赴俄华工种种惨遭迫害的消息，社会舆论对此强烈关注。当时的北洋政府迫于压力，决定选派政府派驻的“通商事务员”，以政府的名义出面协调华工事宜，又兼华工的领队。

北洋政府当局为此在华工出国前的集中地哈尔滨，大量张贴告示，广募能够服众的首领人才。

已经回到哈尔滨的任辅臣，刚过 30 岁，风华正茂，为人正直又精明过人，不仅在中东铁路工作过，还担任过黑龙江省警察总署的巡逻队长，见过大世面，且俄语不错，许多人纷纷举荐任辅臣。

任辅臣本可以在哈尔滨继续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也可以过上一段相对安宁的生活，可是他的命运之舟注定不会因贪恋安稳而停泊在风平浪静的港湾。

1914 年底，征得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同意后，任辅臣以中国外交署官员和华工总办的双重身份，率领 2000 名华工奔赴俄国。

随着“呜呜呜”的鸣笛声，裹挟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并夹杂着一团团缭绕的浓浓烟雾，火车缓缓地离开了哈尔滨车站，沿中东铁路向俄国境内驶去。

任辅臣深情地回望着渐渐远去的城市，情不自禁，思绪奔腾。哈尔滨是他的第二故乡，也是他改变命运的加油站。他在这里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在这里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这里演绎了生离死别，在这里，一个转身又让他走进异国他乡的另一个世界。面对未卜的前途，他想到了家乡铁岭，想到了家中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他多么希望能抱一抱自己幼小的孩子，亲一亲他们稚嫩的脸庞，他仿佛听见了从那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呼唤“爸爸”的声音。

轰隆隆的火车行进声，让他那驿动的心难以平静，他期待着不久的将来，从俄国坐上火车回到中国。可是，任辅臣万万没有想到，此行竟成了他人生的不归路。

运载华工的火车走中东铁路从满洲里出境，最后来到了俄国乌拉尔地区的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

一年后，思念丈夫的张含光离开了铁岭老家，带着三个孩子坐中东铁路的火车，来到俄国，总算是一家人在异国他乡团聚了。

阿拉巴耶夫斯克是乌拉尔地区一个新建的小城，位于原始森林地带，是一条铁路支线的终点。华工们在临时用原木搭成的简陋工棚里居住，潮湿黑暗，空气混浊，终日在矿区劳作，劳动条件很差，平时吃的是黑面包加盐粒，几乎没有蔬菜。

任辅臣一方面组织华工团结自救，将简陋的工棚翻盖成一排排的

房子，并在春天挖地种菜，秋天到山里采摘野菜和山货；另一方面反复与俄国当局和矿厂主严正交涉，义正词严地坚决要求俄方履行招工合同中关于华工基本权益的条款。当矿厂主无故扣发华工工钱时，任辅臣便发动华工举行了全矿的大罢工。大罢工胜利后，任辅臣在广大华工的心目中，成为了大家紧紧依靠的主心骨和顶梁柱。

1916年，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指导下，任辅臣开始在华工中秘密建立革命组织，召集会议，给工人们上文化课，宣传工人阶级只有消灭旧的社会制度才能得到自身解放的革命道理。他把俄文传单译成中文散发到工人中去，提高了工人们的思想觉悟，工人们也萌发了对改变命运的憧憬和追求。任辅臣的妻子张含光也经常深入华工中间，关心他们的食宿冷暖，成为了任辅臣的得力助手。

1917年11月7日，改变俄国人命运的十月革命爆发了，任辅臣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他把俄文报纸译成中文，向华工们大声宣讲说：苏维埃俄国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

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权，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国际帝国主义势力非常恐惧和不安，首批英、美、法等国的军队近一万人开始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起进攻，紧接着德国和日本也派出军队干涉，俄国被推翻的沙俄反革命势力也里应外合，向新生的革命政权发动进攻。

在这形势极其严峻的危急关头，党龄已经十年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任辅臣挺身而出。

1918年初，任辅臣向当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提议成立由华工组成的红军部队。有任辅臣的号召，苦大仇深的华工兄弟一呼百应，任辅臣从哈尔滨带来的2000名华工几乎都参军入伍。任辅臣威望很高，附近其他地区的华工们也纷纷投奔任辅臣的队伍。

任辅臣组织的这支华工队伍，经过短暂培训后，被编入苏联红军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九步兵师，命名为“中国团”，番号为二二五团，任辅臣任团长，布尔什维克组织派来一位红军干部任政委。

中国团与白匪军的第一次战斗是在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附近的村镇展开的。白匪军自恃人多势众，武器精良，对中国团根本没放在眼

里。任辅臣抓住敌人骄狂的弱点，趁夜出击，攻其不备，首战告捷，军威大振。白匪军遭此打击，伺机反扑，并扬言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很快就会被攻破。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保卫矿区的任务，任辅臣带领全团战士加强戒备，在重要地段挖战壕设岗哨。一次，白匪军部队前来偷袭，中国团采取扇面式合围战术，四面出击，有力地打击了白匪军，并因此获得了上级指挥机关的嘉奖。

对中国团旺盛的士气和卓越的战绩，当时的《共产主义报》评论说：“中国军队是我们战线上最顽强的部队，中国团所以有这样顽强的战斗力，在于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贞，在于官兵间有着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

警官出身的任辅臣足智多谋，骁勇善战，他对华工士兵关爱有加、亲如兄弟。在他的指挥下，中国团转战在东部战区几个战场上。从这一年的春季到秋季，与敌人战斗近百次，在枪林弹雨中，中国战士们出生入死，屡屡获胜。中国团往往以少胜多，其战术和战略变幻莫测，又以钢铁意志和坚定勇敢著称，杀得敌人闻风丧胆。中国团不仅在乌拉尔地区声名大振，而且在俄国广袤的土地上也遐迩闻名。中国团有力地配合了苏联红军主力部队作战，被苏联人民称为“中国英雄军”。为了表彰中国团的战功和卓越的指挥者任辅臣，苏维埃中央特派员、红军军部、师部的首长还同任辅臣及全团战士合影留念。

任辅臣在前线率团浴血奋战，她的妻子张含光带领部分华工家属在后方奔波忙碌，照顾和救助从前线送回来的伤病员，还为前线送军粮。

1918年11月5日，任辅臣从前线返回后方办事处，这时办事处已转移到乌拉尔地区的洽索沃依城。任辅臣同妻子张含光一起冒着严寒，踏着厚厚的积雪，参加该城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大会。会场上，在皑皑的白雪映衬下，随风飞舞的十月革命的红旗，显得更火红。任辅臣应邀作了大会发言，他坚定地表示：中国团的战士们一定要为捍卫十月革命胜利的旗帜而拼搏奋斗。

参加完大会游行后，任辅臣看望了伤病员和自己的孩子。临行前，他把自己的全部证件、奖章、奖状放在一个皮夹内交给妻子，并说：“要保存好，也许对你和孩子们有用处。”说来也巧，任辅臣归

来的那天晚上，张含光饲养的一对家鸽飞了一只，张含光送丈夫回前线，可在途中雪橇又翻倒了。这些本来也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跟随他俩多年的华工战士陈文友等人却认为是出师不利的征兆，坚决要求团长等雪停了再走。张含光望着丈夫急切的面容，搀扶丈夫上了雪橇车，让车夫继续前行。任辅臣紧紧地拥抱住妻子，激动地说：“我一切都放心了。”

1918年11月下旬，天气异常寒冷，东方战线的局势也进一步恶化。高尔察克白匪军在鄂木斯宣布自己为“全俄最高执政”，在北部发动了空前的攻势，企图打通彼尔姆、维牙特卡、科威拉斯一线，同北方的英国干涉军会合，来包围莫斯科。此时白匪军共集结了几十万士兵，而红军第三集团军仅有35000人，且分布在漫长的战线上，敌我势力十分悬殊。第三集团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甚至存在全军覆没的可能。为了避免被人多势众的敌人包围，迅速转移红军大部队，借以保存第三集团军的有生力量，任辅臣主动请命率领中国团在维牙火车站来阻击敌人的进攻，配合和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

维牙火车站是个小站，地理位置却非常重要。从这里开始的窄轨铁路，可以直接把士兵和装备运到彼尔姆省。高尔察克白匪军要同英美帝国主义远征军会合来围攻莫斯科，就必须占领和彼尔姆省息息相关的这个小站。

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候，中国团被派往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维牙火车站，任辅臣临危受命担任整个左翼战场的指挥。

第三集团军二十九狙击师师长在给上级首长的报告中写道：“最近的几次战斗中，中国团表现得尤为坚强。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团数次陷入敌人的包围中，但是它每一次都凭借着自己的坚强、组织性、革命纪律和指挥员的指挥，用炮火和刺刀为自己开辟了道路，冲出包围并进入新的阵地。因此，敌人打算占领维牙火车站和下图林斯克工厂，以便对红军后方的戈洛布拉哥达茨克车站构成直接威胁的企图，都被中国团的顽强所粉碎。中国人在战斗中无所畏惧，英勇顽强，他们头脑冷静，形势越险恶，他们的军事纪律越强……经过三四

天不间断的战斗，中国团减员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指挥员损失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这样高的减员本身就已证明，这个团的每一个阵地都是经过殊死战斗而后放弃的。鉴于上述情况，我为能代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向中国团和它的指挥员表示由衷的感激而感到幸福。”<sup>⑩</sup>

1918年11月30日，中国团与敌人激战持续了一整夜，敌人以超过中国团近十倍的兵力，连续进攻。硝烟弥漫，枪声四起，任辅臣冷静地指挥中国团的战士们沉着应战。中国团伤亡惨重，终因寡不敌众，除了少数人突围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任辅臣在左臂受伤的情况下，一直战斗到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在维牙车站的站台上，被敌人用刀刺死。任辅臣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政权，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仅34岁。

黎明时分，大雪纷飞铺天盖地，枪声硝烟散尽，显得异常安谧和肃穆。积雪越来越厚，皑皑的白雪遮盖了近千名中国团勇士们的遗体，遮盖了牺牲在异国他乡的英烈们汩汩流淌的鲜血。

任辅臣和中国团的战士们牺牲后，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组织表示了深切的哀悼。1918年12月28日苏维埃《公社社员报》上发出讣告，对任辅臣战斗的一生和不朽的业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任辅臣同志在中国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把他在中国人中的全部威信都贡献给苏维埃俄国……作为一个世界革命中的忠诚战士，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他对伟大事业的忠诚……他永远活在革命战士的心里。”

任辅臣牺牲之后，苏维埃政府把他的妻子张含光和三个孩子送到莫斯科居住，红三集团军第二十九师师部还专门派一个班战士做护卫。他们住在位于红色凯旋门附近的一幢二层楼房里，房间宽敞明亮，备有全套家具。当时由于国际帝国主义封锁和白匪军的疯狂反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极端困难时期，经济萧条，商品奇缺，莫斯科市内的物资供应也相当紧张，但是对于任辅臣家属的日常生活，苏维埃政府处处都给予了特殊的照顾。

在莫斯科生活了大约一年之后，张含光向苏维埃政府正式提出了

回国的申请，为此革命导师列宁亲切地接见了张含光和她的孩子们。六十多年过去了，任辅臣的长子任栋梁对列宁的这次接见仍记忆犹新，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们曾经受到列宁的召见。那是母亲向组织提出回国申请之后不久的一天下午，在我们居住的楼前停了一辆小汽车，为的是送我们到克里姆林宫去。来到克里姆林宫办公大楼前，一位早已迎候在那里的年轻军官把我们领进楼房内，走过一段长长的走廊。母亲悄悄地告诉我们，一会儿就要见到列宁了，这使我们十分激动。年轻军官把我们领到一个陈设品极少、宽敞朴素的房间，列宁从办公桌后走过来，一边亲切热情地同我们握手，一边对母亲说：‘这是任辅臣同志的夫人张含光同志吧！当我得知你们来到莫斯科后，就想和您见见面，可是一直抽不出时间来，今天能见到你们，我很高兴！’列宁向我们每个孩子都问了好，还问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生活得怎么样，连声说：‘很好，很好。’他在同我说话的时候，在我头上抚摸了一阵。列宁个子不高，说话快。列宁说我父亲是勇敢的战士，出色的指挥员，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他还高度评价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谈到我母亲的回国申请，列宁建议我们留在俄国，表示苏维埃政府将尽力照顾我们，回国后会遇到很多困难。母亲对列宁的关怀表示了感谢，同时说：‘任辅臣同志的父亲尚在国内，任辅臣牺牲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我作为他的妻子，应该把我们的子女带回祖国去。’列宁很受感动，安慰母亲说：‘等到东部战事平静时，就安排你们回祖国去。’在这次永生难忘的会见结束时，列宁送我们到办公室门口，我们依依不舍地和他握手告别。”<sup>⑯</sup>

到了1922年，革命在全俄范围内取得胜利，东线白匪军基本肃清，横跨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已全线通车。这时，苏维埃政府发给张含光完备的证件和一份通行无阻的专批文件，用专车并派卫兵护送他们母子一行秘密去往中国。

在满洲里国境线上，张含光和对他们无微不至悉心照料的苏俄护送人员依依惜别。此时，正是初冬时节，满目荒凉，失去了苏俄红军为她撑起的保护伞，即将面对难以预料的风雨人生，她有些瑟瑟发

抖，感到了茫然无助和无奈。七年前带着孩子来到满洲里再苦再累也是充满希望的，因为一家人要在俄国团聚。如今一家人的顶梁柱没有了，她和孩子们变成了生活最艰难的孤儿寡母。再也不能依靠丈夫的臂膀，不能听到丈夫那熟悉的声音，再也不能遇事和丈夫商量，丈夫的遗骨下落不明，连把骨灰都没有，张含光止不住潸然泪下。

她的背后是丈夫和无数中国兄弟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红色土地，她的面前是军阀统治的祖国，踏上朝思暮想寻求归宿的这片土地就有被捕和杀头的危险。任辅臣是苏俄人民人人敬仰的英雄，而在当时黑暗的中国会被定性为“罪犯”。张含光将苏维埃政府签发给她的所有证件看了又看，为预防万一，最后还是忍痛割爱用油纸包上，装入一个小铁桶内并用烛油封好桶口，埋在国境线俄国一侧。同时，她一再严厉要求三个子女回国以后绝对不能向任何人讲起在俄国的一切。就这样，张含光含泪告别了已故的亲人为之战斗的那片广袤的苏联大地。

临回中国前，苏维埃政府发给张含光很大一笔抚恤金，足可以让任辅臣的家属在生活中无后顾之忧。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承认苏俄发行的卢布，张含光只好委托中国商团驻莫斯科领事朱子桥领取由法郎兑换的抚恤金。朱子桥这个奸商兼官僚私吞了抚恤金，不但不给，反而以任辅臣参加苏俄革命和当年哈尔滨当局给任辅臣、张含光发过通缉令相威胁，并声称要把他们回国之事报告警察署。张含光只好忍气吞声，领着孩子们回到老家，隐姓埋名，开始了艰辛的生活。

这时任辅臣的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张含光要侍奉年迈的公公和双目失明的婆婆，还要供养子女读书，她从苏俄带回的一些纸币已成废纸，带回的一点首饰也变卖一空，只好靠给人家洗衣服做针线活挣钱度日。含辛茹苦，历尽磨难和煎熬，心地善良、性格刚强的张含光毅然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任辅臣的双亲去世后，张含光默默地将子女哺育成人。

刚过 30 岁便孑然一身的张含光，始终铭记丈夫任辅臣的嘱托，发誓要将孩子们培养成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她自己省吃俭用，将超常劳作换来的血汗钱都用在孩子们求学进取的花销上。在她的殷殷鼓励下，长子任栋梁考入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学校，小女儿考入哈尔滨政法

学院，另一个女儿任琳琳走上革命征途，后来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女将军。

张含光和她的子女都默默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从不张扬任辅臣的辉煌功绩和一家人受过列宁接见的特殊荣誉。建国初期，《中国战士》一书的两位苏联作者，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想要采访任辅臣烈士的遗属，他们从北京找到辽宁，又从辽宁找到北京，再三寻访，却没有人知，只能怀着遗憾又回到了苏联。

1958年春节，周恩来总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张含光还健在，非常高兴。他满怀深情地说：“任辅臣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他是我们的先烈，他的革命事迹是我们国家的光荣。”<sup>⑯</sup>

周总理派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去与张含光及其子女取得联系，让他们把任辅臣参加十月革命的事迹写成材料报送给他，并提出给张含光终生奉养的待遇。老人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感动，含着泪说：“谢谢总理的关心，现在生活在祖国的大家庭里我很高兴，生活很好，我的子女都在为人民政府工作，我没有任何需求，祖国解放了，我对一切都满意了。”她谢绝了党和政府要给予她的特殊照顾。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儿子、女儿、女婿被抓进“牛棚”，老人对发生的一切也没说什么，只是每到深夜，总是拿出珍藏的俄国放大镜翻看全天的报纸。1974年以后，张含光病重，国务院派人前去探望，并将她由辽宁的医院接到北京特护。1975年5月11日，91岁的张含光病逝于北京同仁医院。有关部门在八宝山为她举行追悼会，她的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4年是任辅臣烈士诞辰100周年。11月5日《中国青年报》登载了一篇对任辅臣儿子任栋梁老人的专访——《苏联红军中的中国团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见到此文后，也播放了一套有关的专题节目，并传到苏联。

1987年9月25日上午，原苏联中央电视台摄制组专程来到北京采访了任栋梁。此后雪片般的信件从苏联飞向北京，飞到任栋梁家中，寄托着苏联人民对任辅臣烈士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苏联《真

理报》和《乌拉尔工人报》等报刊也连续发表文章，追忆任辅臣的英雄壮举，缅怀中国团的英雄事迹。

苏联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任辅臣和他的中国团战友们，在任辅臣壮烈牺牲的乌拉尔地区维牙火车站，早就建有一座巍峨的以任辅臣命名的中国英雄墓碑。每到春天来临的时候，人们就纷纷来到这里，献上一束束鲜花，表达无尽的思念。

1987年11月，原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联名签署的贺信送到了任栋梁的家里。贺信写道：“值此伟大十月革命70周年前夕，谨向您表示共产主义的敬意和衷心祝贺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节日。”<sup>②0</sup>

1988年7月，在任辅臣牺牲70周年之际，应苏联方面的邀请，任栋梁及夫人、儿子访问了苏联，并作了一次扫墓之旅。1989年11月2日，前苏联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受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托，在北京举行仪式，向中国英雄任辅臣追授红旗勋章，表彰任辅臣在苏俄国内战争期间的特殊功勋，表彰他在乌拉尔粉碎高尔察克匪军战斗中的英勇无畏和自我牺牲精神，表彰他个人为铸造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任辅臣的孙子，北京某高校的领导、教授任公伟说：“1988年，我陪同父亲母亲访问前苏联，在莫斯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盛情招待。然后到了我祖父的牺牲地维牙，我悄悄地捧回了一堆土，特意带回老家铁岭陇首山。我亲吻着这堆土，跪拜磕头，心里默默念着：爷爷，爷爷啊，您魂归故里了。”

从来没有见过爷爷的任公伟，仅是小的时候，偶尔听到过奶奶张含光讲述当年中东铁路的一些往事，于是他对祖辈和父辈当年所走过的中东铁路萌发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1991年，前苏联政府再次邀请任栋梁及家人访问苏联，并为任辅臣扫墓。任栋梁当时因病不能前行，于是任公伟代表父母前往。

回忆此行，任公伟说：“我谢绝了飞机票，我一个人坚持要沿着中东铁路去，重走祖辈和父辈走过的这条铁路，这条红色之路。从北京坐火车到沈阳，再到哈尔滨，然后到满洲里出境，接着走西伯利亚

大铁路，最后到莫斯科，几乎每一站我都要下车望一望。我在想我的先人怎么跑得那么远，抛尸在异国他乡，我在思索横贯欧亚大陆的这条非常漫长的铁路对我们中国意味着什么，我还在思索这条当年的铁路对于我们家又意味着什么……”

## 二、列宁的卫士李富清

在黑河市江边的旅俄华工纪念馆里，可以看到一组令人称奇和惊喜的雕塑，展现的是列宁和他的中国卫士站在一起亲切交谈的情景。列宁的这位中国卫士名叫李富清，俄国的名字叫瓦西里。电影《风从东方来》《列宁在十月》《列宁在 1918》中列宁身边的卫士主要原型就是李富清，而且几部电影中列宁卫士的名字也用了李富清的俄文名字瓦西里。

在历史上，中国人能够亲眼见过列宁的，为数寥寥，能够守护列宁，时常和列宁见面，并能够在一起交谈的中国人只有一个，就是李富清，他担任列宁的中国卫士长达一年半的时间。极富传奇色彩的李富清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呢？

1898 年李富清出生于山东，因家境贫寒，随父母闯关东来到东北沈阳。在沈阳，父母又生了五个孩子。因孩子多，本已窘迫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父亲做木匠难以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作为长子的李富清六七岁时就到铁路边去捡煤渣，10 岁时就开始打工。17 岁时，他在抚顺煤矿当装煤工，听说俄国人在沈阳招募华工，一次付给 200 卢布的安家费，当时 200 卢布对穷人来说是意想不到的天文数字，李富清毫不犹豫地到沈阳报了名。他满怀喜悦地将 200 卢布交给了父母，父母拿到钱也很高兴，可是长子要出远门，到很遥远的俄国去做工，父母又是难舍难离。母亲连夜为大儿子赶做了一双新鞋，告别时，全家在一起吃了一顿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的饺子。父母殷殷叮嘱，含泪挥别，一直送到沈阳火车站，并告诉与李富清同行的伙伴一定要互相帮助，互相关心。火车缓缓地开动后，李富清远远地看到父母依然伫立在站台上，轰隆隆的火车冒出的一团团浓烟散尽后，隐约中父母还在

挥手。

这是李富清一生中挥之不去的记忆，也是父母留给他最后的记忆。

1916年初春，李富清和同时报名的老乡约300人，坐上中东铁路火车，从沈阳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中转站，也是旅俄华工的集合点，而且出国前，要在这里由有关机构统一登记办出国手续。

几天后，李富清同3000名华工奔赴俄国。

从沈阳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很干净、很敞亮，送别的亲人们松了一口气。但从哈尔滨开出时，则换了车厢，变成了大闷罐车。每一节车厢都没有窗户，暗无天日，所有的人就如同沙丁鱼一样被封闭在硬壳的铁皮罐头里，吃喝拉撒都在闷罐车里。火车从满洲里出境，沿着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行驶，每到一个车站，才会打开车门透透风。全程历时二十多天，不少华工头晕难忍。

闷罐车拉着3000名华工一直往西开，往西开……最后在一片大森林边上停下，华工们被工头赶下车，这时来了沙皇的军队，逼着华工挖战壕。原来这里是俄军和德军交战的战场。

时隔不久，沙皇的军队溃败，中国苦力和俄军都成了德国军队的俘虏，被关进了集中营。1917年春天，谁也搞不清是什么原因，苦力们连同沙俄士兵一起被释放了，于是他们成群结队地在乌克兰农村流浪。有一天，一个叫伊凡诺夫的人唤住大家说：“我们要活命就只有组织起来去找沙皇军队，他们仓库里有面粉，有衣服。”受尽欺压和侮辱的华工们如干柴一般，一点就着。于是，近200名中国苦力和300名左右的俄国穷人组成了游击队。

随着时间流逝，李富清逐渐学会了俄语，他也弄清楚了这支游击队是属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武装。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这支游击队被改编成苏俄红军。此时，部队中的中国战士已达600多人。这支部队攻打火车站，拦截军用火车，夺军火和粮食，仅在一次突袭小城的战斗中，就打死打伤1800多名沙俄士兵，缴获了机枪20多挺，还俘虏了敌人的司令官。

李富清跟随红军转战各地，奋勇杀敌，即使负伤流血也坚持带伤战斗。因为表现突出，李富清由战士提升为班长，后来又升为排长，

他的革命觉悟也在不断提高，他向往着彻底打垮反动势力，迎来穷人彻底翻身解放的那一天。

1918年初，李富清和其他200多人，其中70多名中国战士，被调往彼得格勒，充实到苏维埃党中央的警卫队中，保卫处在动荡局势中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心脏，保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

警卫由4人编成一个班，李富清为一个警卫班的班长，上级安排李富清班在列宁办公室外面正门口站岗。

李富清上岗的第一天下午3点多钟，看见一位头戴黑皮帽，着装很普通，左腋下夹着一个皮包，年约50多岁的老者从远处走过来。李富清和孙德元挡住了他的去路，要检查他的证件，老者停住脚步，耐心等待他们检查。此时，恰好警卫队长走过来，看到这一情景，立即大声喊道：“敬礼！”李富清等几个新警卫有些莫名其妙，但也只得跟着向老者敬礼，老者颌首答礼，笑着走了进去。李富清问警卫队长：“他是谁？”“他就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嘛！我们就是保卫他呀！”警卫队长边说边轻轻地拍了拍李富清的肩膀。李富清吃惊地说：“他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为什么穿得那么差呀？”警卫队长说：“你以为领袖就得比别人穿得好吗？那你就错了，列宁穿得最朴素。”20岁的李富清想到刚才的事情，有些尴尬，他轻声地问：“我们刚才挡住了他，他不会见怪吗？”“嗨，不要紧，你们越严格，他就越高兴！”<sup>②</sup>李富清和他的战友就这样认识了列宁。

能够为世人敬仰的革命领袖当卫士站岗放哨，年轻的李富清感到这是一种特殊的幸运和荣耀。来自中国，生活在大清王朝的李富清，从来没有见过皇帝，但他听说过对皇帝要三拜九叩马虎不得，不遵守这些繁文缛节是要被砍头的。尽管李富清参加了十月革命，也懂得了不少的革命道理，他知道不能将列宁与中国的皇帝相比，但是作为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列宁毕竟是大人物啊！多少有些封建意识的李富清，从第一次上前挡住路并严肃地要查验证件认识了列宁后，每当远远地发现列宁走来时，便早早地敬礼，心里也未免有些紧张。

有一天，天气很冷，树上缀满晶莹剔透的冰挂，滴水成冰，空气仿佛都因严寒凝固了，李富清和其他三位战士依然精神抖擞地站在列

宁办公室的台阶下。他们鼻孔呼出的一缕缕白气被冷风一吹，在粗呢大衣的领子上凝结了一层又一层的白霜。这时，列宁从外面回来了，李富清响亮地喊了一声：“敬礼。”列宁微笑说：“不用啦，天气这么冷，快站到里面去，那儿暖和一些呀！”四个卫兵都不肯进去，列宁一再召唤，并停在了台阶上，指着李富清说：“快，快让他们都进入到里面去，要不然，我也会进去的。”李富清这才带着三位卫士上了台阶，站到临近门口的走廊里。列宁还拍着李富清的肩膀说：“你们要多暖和一会儿。”李富清凝望着和蔼可亲的“大人物”列宁，竟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觉得平易近人的列宁很像他的父亲，猝然间，他觉得一股暖流涌遍全身，20岁的李富清感动得热泪盈眶。

又有一次，列宁从办公室走出来透透气，碰到李富清等几个中国卫士，就和他们聊天。列宁问他们生活过得惯吗、吃得饱吗、住得怎么样，大家都说生活比以前强多了。列宁说：“生活比以前是好一点点，但这很不够，等把白匪军和外国侵略者赶跑以后，咱们建设一个繁荣的国家，那时候生活就会更好！”列宁又说，“你们的俄语说得不错，不过还应该学习识字，这样就更好些。”有个卫士回答说：“我们正在学。”“正在学，那很好！”列宁鼓励地说，“有没有学习计划？”大家回答说：“没有，高兴了就学一阵。”列宁说：“嗯，应该有个计划。有教员没有？”大家说：“俄国同志都是我们的教员。”列宁笑着说：“当然，俄国同志应该教你们。”列宁又饶有兴趣地问了一些常用的中国话怎么说，于是大家告诉列宁“你好”“吃饭”“喝茶”等常用的词汇是怎样发音的。

列宁高兴地学着，为了加强记忆，他又拿出了本子记下。从此以后，列宁见到中国卫士，就用中国话说：“你好！你好！”

第二天，管理员给中国卫士每人发了一支笔和两本练习本。不久，卫士队又调来了一位女教师教文化课。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列宁吩咐的。李富清和卫士们感激地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要考虑的国家大事太多太多，真是日理万机，他工作这样紧张，还为我们学文化操心，我们一定要好好学才对得起他啊！”

在彼得格勒，李富清几乎天天都能见到列宁，列宁对中国卫士关

怀备至，给李富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918年4月间，李富清和卫士队跟随列宁一道转往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李富清仍担任警卫班长，在克里姆林宫正门外站岗。这里规模宏大，房间太多，列宁又常常不住在这里，这样，李富清直接见到列宁的机会就不是很多了。

有一次，每个警卫都领到了一双新靴子，李富清和另一名中国卫士王佐领到的靴子太大不能穿，他们请仓库管理员给调换两双合脚的，管理员既教条又固执，坚持不肯换，于是性格朴实直率的李富清带着王佐去找列宁。在列宁的办公室前，李富清按下电铃，接着就听见列宁亲切的声音：“请进，请进。”

李富清和王佐脱下帽子走了进去，看到列宁正坐在写字台前聚精会神地赶写东西。为自己生活中的小事而打扰革命领袖的大事，李富清有些不好意思，正在他准备离开时，列宁停下手中的笔，很客气地让他们坐下，询问是什么事情。李富清站着说：“发给我们的靴子不合脚，不能穿，我们想要换一下。”列宁望着李富清笑着说：“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吗？”李富清和王佐都连忙摇头说：“没有。”列宁说：“好，这事可以。”于是便为他们写了条子，还特意起身送他们出去，并且亲切地说，中国卫士不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他。

1919年夏天，俄国被推翻的反动政党和军队，勾结了十多个国家的政府，里应外合向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发动进攻，形势异常严峻。列宁卫队的一部分人也被调往南方前线作战，李富清也在其中。离开克里姆林宫的前夕，列宁召集卫队的战士讲话，他勉励卫士们英勇战斗，不要骄傲，一定要把外国武装和白匪军消灭干净。

有幸整整一年半在列宁的身边担任卫士的李富清，被编入红军骑兵第一集团军，在三十三团担任侦察班班长。他心里始终铭记列宁的教导和嘱托，为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出生入死英勇奋战。李富清冲锋陷阵，敢打敢拼，多次荣立战功，在战火硝烟中，曾四次负伤。其中一次在前线，他负伤后仍在继续战斗，是战友发现后喊道：“瓦西里，你受伤了！看你棉衣背上都是血，头也破了。”在指导员的命令下，李富清被战友背着送到战地临时医院。

1924年1月，列宁逝世，正在军校学习的李富清被选为军校的代表为列宁守灵。默默地伫立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水晶棺椁前，想起了列宁的音容笑貌，想起了自己和列宁在一起的日子，想起了列宁对自己和中国卫士情同父亲的关爱……恍如昨日，又恍若隔世，李富清不禁泪流满面。

1926年夏天，李富清被调到乌克兰的顿巴斯矿区，担任中国工人的总翻译。在此期间，28岁的李富清和一位年轻貌美的苏联姑娘相识相恋了。结婚后，先后有了儿子和女儿。此时苏联的政局已稳定，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李富清非常欣慰。他的苏联妻子非常温柔贤惠，一双儿女活泼又聪明可爱，这个中苏融合的大家庭，在温馨的港湾里，荡起了层层幸福的涟漪。

这种舒适甜蜜的生活仅仅持续了五年。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野蛮残暴地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消息传来后，李富清郁郁寡欢，难以平静。他17岁告别父母，算起来离开家乡15年了，他永远忘不了在奔赴俄国时，火车已开出很远，父母仍留在站台上不肯离去，不停挥手的情景。多年来他的思念从来没有停止过，如今，家乡沦陷，他更是思乡心切，对父母和弟妹的牵挂让他夜不能寐。苏联妻子也非常理解中国丈夫的心情，同意并鼓励李富清回国探亲。

告别的时候，李富清抱起一双儿女，孩子搂住爸爸，将他的面颊亲了又亲。妻子也和他紧紧拥抱，叮嘱他探亲后尽早回来，她会照顾好一双儿女，等着他回来团聚。

1931年底，在依依难舍中，33岁的李富清告别了妻儿，踏上了漫长的回国路。

李富清17岁时到俄国走的是中东铁路，他从沈阳坐火车到了哈尔滨，和同行的3000名华工集合后，从哈尔滨坐上了前往俄国的闷罐车。15年后，他回国还是要走这条铁路。他长途跋涉到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赤塔火车站，想要通过满洲里国境线时，才知道日本侵略者封锁了中俄边境，火车无法前行。不得已，李富清只得计划先绕道去新

疆，然后再去东北。

俗话说的扳道岔，通常指火车改变了轨迹和方向，而李富清归途的扳道岔，也让他人生的轨迹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的命运和中东铁路紧密相关，这条铁路也成为了他人生的节点。

李富清历经艰辛和坎坷来到了新疆，可当时新疆地区正值军阀混战，军阀势力既不许人们去内地，也不准去苏联。在战乱中，李富清只能流落到迪化，开了一个小饭馆混日子。他焦急地等待能回到沈阳老家和亲人相见的日子，他也渴盼回到苏联和妻儿团聚，怎料想，这样的等待竟然是漫长的 19 年。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他和老家、新家都失去了联系。人海茫茫，天各一方，思念父母，不知父母在日本的残暴统治下是否还在人世；呼唤妻儿，也不知妻儿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了，近 20 年了，一双儿女会变成什么样呢？正在成长期却失去了父亲，没有了父亲的陪伴，这是怎样的遗憾和无奈。每每想到此处，李富清总是黯然神伤，倏然泪下。孑然一身，孤灯相伴的李富清时常借酒消愁，夜深人静时，他望着一轮圆月唏嘘喟叹，月有圆的时候，人也有合的时候，可是这合的时候在那天呢？

1950 年，52 岁的李富清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新疆军区工程处呼图壁休养所当炊事班长。李富清在工作中任劳任怨，默默奉献，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57 年，59 岁的李富清的英雄事迹被人发现，《新疆日报》以整版的篇幅予以报道，轰动了新疆。同年 11 月，59 岁的李富清被选入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随同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 40 周年的庆典活动。

在此期间，李富清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赴苏前，11 月 3 日，周总理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了代表团全体人员，当刘宁一团长向周总理介绍李富清曾当过列宁的卫士时，周总理立即高兴地同李富清紧紧握手，并亲切地询问李富清的身体和工作情况。周总理对包括李富清在内的 6 位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战士说：“你们为十月革命做过贡献立过功，不要骄傲啊。”他接着指向李富清说，

“你当过列宁的卫士，还负过四次伤，得过奖，不要骄傲啊。”李富清连连点头。此时，他想到了 1919 年秋赴前线前夕，列宁对卫士队的叮嘱：“你们到前线以后，切切不可以为给我当过卫士就骄傲起来哟。”<sup>②2</sup>

时隔 26 年，重返苏联，感受各方面的巨变，让曾经在这片土地上长期生活和战斗的李富清百感交集。站在莫斯科红场高高的观礼台上，和中苏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纪念十月革命 40 周年盛大的阅兵式，李富清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参观克里姆林宫，瞻仰列宁墓，往事历历在目，李富清止不住心如潮涌。

在苏联的近一个月时间，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受到了苏联人民和政府的热烈欢迎。尤其是李富清作为当年列宁的卫士，并且为十月革命浴血奋战的事迹被苏联各大媒体报道后，李富清所到之处，更是鲜花云集掌声一片。

许多老战友也都纷纷前来看望李富清，其中一些战友还联合起来，为李富清寻找妻儿，四处奔波。

虽多方努力找寻，却没有得到叫人喜悦的音讯。老战友说：“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我们死了很多，也许你的妻儿不幸遇难了。另外，他们可能早已离开乌克兰顿巴斯矿区了。种种可能都是存在的。”李富清和妻儿分离已整整 26 年了，物换星移，沧桑多变，世事难料，这让他十分伤感。

李富清访苏回国后一如往常，为人很低调，从不张扬自己的荣耀和辉煌。他被调到新疆乌鲁木齐建工医院担任后勤班长，仍然是起早贪黑积极工作，甚至节假日也在加班工作。这期间，李富清应邀到新疆的一些单位和许多中小学校作报告。尽管他文化水平有限，可在演讲时表达的是真情实感，所以颇富感染力。

在乌鲁木齐两位曾听过李富清演讲报告的市民回忆说，上世纪 60 年代初，在学校听过李富清充满感情的演讲，听完后很振奋，大家都喊李富清爷爷是“瓦西里”。

李富清原单位领导说：“李富清是列宁的卫士，是受过伤的老战士，他从来不向组织上提任何个人要求。实际上，组织上就是要负责

照顾好他的晚年生活。他本可以休息，享受一些待遇，可是他70岁时还主动到职工浴池去卖澡票，领导劝他都劝不住，他总想多做点贡献啊。”

作为李富清的老同志和好友的张玉兴，深有感慨地说：“李富清是一位孤独的老人，他喜欢喝酒，我就常陪他边喝边聊。我曾问过他：‘你为什么一直是单身一人，是不是总在想念你的苏联妻子和儿女呢？’他沉思片刻，对我说：‘我33岁告别了他们，唉，想得都麻木了，说不清楚是想还是不想了。’”

1972年，人生充满传奇的74岁李富清在新疆病逝。

### 三、三次见过列宁的刘泽荣

在旅俄华工的史册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他本身并非是被沙俄招募的华工，但他却倾心倾力为华工谋利益，想方设法维护华工的权益。他就是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刘泽荣（别名刘绍周）。

刘泽荣5岁时随父亲到了俄国高加索的巴统，他的父亲是应邀去当地指导种茶、制茶事宜。刘泽荣的父亲凭专家的身份赚了很多的钱，一家人住在郊区的别墅里，衣食无忧，过着富裕恬淡的田园生活。刘泽荣在巴统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彼得堡综合大学数学物理系，毕业后担任了两年的中学教员。1916年秋，他又考入彼得堡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学业优秀的刘泽荣，可谓前程似锦。可是，华工的事情却悄然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俄的华工大约有几十万人。在种种口头许诺的诱惑下，没有文化的穷苦人抱着改变生活的幻想，纷纷坐上了中东铁路的火车远赴俄国，成为旅俄华工。旅俄华工被沙俄称为“黄奴”，工作的条件大都简陋而又艰苦，生活条件很差，衣食住行苦不堪言。“我父亲刘泽荣给我最深的印象，是非常爱国，他特别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的欺辱。”84岁的刘仁发自肺腑地说。

刘泽荣在工业大学学习期间，住在彼得格勒郊区。有一天是星期天，刘泽荣来到市中心的涅瓦大街逛街，看见人行道上坐着一个中国

人，穿得很破烂，面孔清瘦不堪，伸出哆嗦着的手在讨钱。刘泽荣主动上前询问，那人说原先是做工的，现在没活干了，非常想回家，想回国，可是没钱回不去呀。现在没吃没住没工作，只好沦落街头要口饭吃。刘泽荣听后，心里很酸楚，便把身上带的一点钱全都掏出来，送给了这位可怜的华工。

不久，刘泽荣在一份进步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报道在乌拉尔山区一个很大的铁矿厂里华工们悲惨生活的状况，其中一句话“在市外有个山头，满是中国工人的坟头……”让年轻的刘泽荣感到震惊和震撼，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觉得对华工的悲惨处境不能只停留在愤慨和同情上，要用行动来为华工做点什么。于是，刘泽荣找到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问他是否已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华工的利益，是否已经想办法遣返流浪的华工回国。刘公使的回答是关于此事不止一次打电话给中国政府，却没有得到任何指示。另外，要遣返华工，必须要有相当大的一笔款项。使馆没有钱，甚至连馆员的薪俸都已欠发好久了。

对于刘公使的答复刘泽荣大失所望。他和华工非亲非故，作为在校的留学生，满可以一心扑在学业上，可是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浓厚的同胞之情，让他难言放弃。刘泽荣找到当地各校的中国留学生说明情况，大家充满了同情心，一致认为必须想办法为那些贫困无助的华工做一些救济工作。思来想去觉得要想做成事情，应该有一个组织来操办。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团体，名字叫旅俄华侨联合会（后改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大家一致推选 25 岁的刘泽荣担任会长，刘文和张永奎为副会长，并选出 15 名干事，将联合会注册为在俄国拥有法人地位的团体。

1917 年 4 月 18 日，旅俄华工联合会正式成立，在刘泽荣的带领下，工作人员为华工利益竭尽全力，四处奔波。联合会的组成人员都是各校的留学生，从某种角度说，都是志愿者，但是，他们凭借着文化修养、智慧热情和为同胞奉献大爱的情怀，不计个人得失，全力投入工作。仅仅几个月，工作便卓有成效。

刘泽荣带领工作人员找到了俄国临时政府相关部门，慷慨激昂，据理力争。几番争取后，彼得格勒市政府接到上级指示，决定为流浪

华工安排临时住处，并拨出专款用于伙食供应。不久以后规模逐渐扩大，可以同时应付 1000 名华工用餐，并且生病的华工可以送到彼得格勒市医院免费治疗。

至于遣返华工回国，并非易事，关键是资金。刘泽荣再次找到中国驻俄使馆，刘公使还是老调重弹，说已将华工情况向政府报告几次，请求救助资金，一直没有回信。刘泽荣不言放弃，为了同胞之事，决定求助于中国最高当局。他亲自起草了求助电文，将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宗旨和几个月来的收获，以及中国留学生作为志愿者自己捐钱捐物为贫困的华工雪中送炭的情况一并写入电文，恳请当时的总统黎元洪支持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工作，拨付遣返部分华工回国的费用。

刘泽荣和工作人员请刘公使帮助发电报，使馆发电报方便，也名正言顺。刘公使虽觉得刘泽荣的想法幼稚和天真，不会有什么结果。不过，他还是委派一等秘书代发了这篇直接呈给黎元洪总统的长长的电稿。

或许，黎元洪总统为中国留学生关爱同胞的拳拳之心所感动，过了几天，使馆便收到由北京电汇的 10 万卢布。财政部来电说，这笔款项是奉总统指示汇给中华旅俄华工联合会做经费的，并说黎总统本人拿出 5 万大洋，令财政部补加若干，一共折成 10 万卢布汇出。

受到当局政府如此鼎力支持，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倍感鼓舞和振奋。刘公使收到此款后，用商量的口吻说：为了保险起见最好存在使馆里，左右都是你们的专款，联合会需要时随时可以分批支出。刘泽荣等人表示同意，决定先领取 2 万卢布。可是再次支取时，刘公使就不那么痛快了，勉强给了 1 万多卢布。从此以后，明明是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专款，却再也取不出来了。老奸巨猾的刘公使借用种种理由来搪塞，硬是分文不给。刘泽荣等人如梦初醒，他们太书生气、太轻易相信人了，面对在其位不作为，绞尽脑汁谋自己利益的政客，他们是很容易被糊弄的。

刘泽荣用拿到手的经费和工作人员一道开始了部分华工遣返回国的事宜。一些流浪街头走投无路的华工得以通过中东铁路返回国内，圆了和家人团聚的梦想。

急华工之所急，想华工之所想，帮华工之所需，实实在在、兢兢

业业为华工排忧解难，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工作让旅俄华工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工作人员还分别深入到俄国各地去走访调查，争取为当地华工就地解决实际问题。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越来越大，各地华工自发组织的旅俄华工联合会分会也星罗棋布、遍地都是。

有时，生活中发生的一些戏剧性的变化，连当事人都是难以预料的。刘泽荣在回忆录中曾写道：“我恰在十月革命前夕，同我的爱人结婚，两人搬到莫尼秋街一所楼房的四楼一处套间房住下。从那里的阳台望去，可以看到半公里外的一所漂亮的楼房，这就是帝俄时代的斯莫尼尔贵族女子学校的校址。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所楼房已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本营，更未料到几天后它就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大厦、伟大的列宁的指挥所、世界著名的斯莫尼尔宫。”

就在此地，这一对新婚伉俪伫立在四楼阳台，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了黑夜中一道绚丽灿然的闪电。1917年11月7日，列宁亲自领导和指挥的十月革命爆发了。刘泽荣夫妇看到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场景；听到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他们极其幸运地成为了瞬间铸就永恒的见证者。他们相偎相依，惊愕不已，似乎感到新婚房内的吊灯都在悄然抖动。他们在挑开窗帘时，并不知道这场大革命的序幕已拉开，它对俄国对世界乃至对人类的历史进程的意义有多么重大，也不清楚第一个工农政权——苏维埃的诞生将会怎样震撼和改变世界。

代表了劳动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十月革命，让昔日被沙俄称为“黄奴”的中国工人感受到了振奋。苏维埃政府的交通部门，不仅对愿意回国的部分华工继续支持，还特别授予旅俄华工联合会免费遣送之权，所有遣返费用由苏维埃政府承担。这使刘泽荣和其他工作人员原来大伤脑筋、费尽周折的遣返费用问题迎刃而解。据刘泽荣回忆录记载，到1918年俄国东部发生内战导致火车停运为止，这期间遣送了大约一万华工回国。对于留在苏俄的华工，苏维埃政府有关部门公布决定：废除沙俄时代招募华工的黑色合同；废除残暴的工头制度，让华工在工资、工作时间、医疗、保险各方面享受与本地人完全相同的平等待遇。

对于深受中国工人拥护和爱戴的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各方面工作，苏维埃政府都给予了鼎力支持和协助。刘泽荣作为中国工人代表还有幸应邀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此期间，他还受到了列宁的三次接见，其中第二次接见是最让刘泽荣刻骨铭心的。第二次接见是在 1919 年 11 月 19 日，那是因为旅俄华工联合会有些事情希望得到列宁同志的关照。

刘泽荣通过列宁的亲妹妹，在《真理报》担任秘书的玛丽娅·伊利尼求见列宁。之前，曾有人向刘泽荣引见了列宁的妹妹，列宁的妹妹对中国工人的现状很关心，二人彼此坦诚相见，直抒胸臆，相互都留下了深刻友好的印象。当刘泽荣在《真理报》办公室找到玛丽娅说明来意后，玛丽娅毫不犹豫马上给哥哥打电话。当列宁听说旅俄华工联合会有关事求见，虽然当时正值国内战争，国事缠身，但百忙之中的列宁没有推托，约好第二天上午 10 点钟见面。

第二天刘泽荣如约来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正在等候的一位年轻军官将刘泽荣引领到很宽敞却很简朴的列宁主席办公室。列宁非常亲切地接见了刘泽荣，让刘泽荣感到意外的是谈话竟然长达一小时。刘泽荣回忆录曾写道：“列宁主席详细地问我关于我们联合会的工作情况，后来又问我关于中国国内局势和革命运动的情况。很遗憾，那时我对国内情况知道极少（那时连中国报刊都看不到），讲不出比列宁主席知道的更多的情况。列宁主席谈到当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说这样的运动非常重要，并且说中俄两国人民必定会建立最友好的关系，会共同进行反帝斗争。”

最后列宁问刘泽荣苏维埃政府各机关是不是对华工联合会予以足够的协助，刘泽荣回答说：“各机关都很关心，无不大力协助。苏维埃外交部还发给我证明书，使我得到很大方便。”刘泽荣拿出证明书给列宁主席看，证明书的内容如下：

兹证明的执有者，中华民国公民广东籍人刘绍周同志，  
是经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登记为在俄罗斯  
领土内合法活动的“华工联合会”的会长，唯一的由旅俄的

中国公民和工人所授权为保护他们利益的人。该会长有权直接向一切政府机关和社会机构联系，以便办理有关保护中国公民利益的相关事项，并且享有不可侵犯权。希望一切机关和苏维埃对他予以各种协助以及在旅途中予以方便。

列宁主席看完这个证明书后，马上拿起钢笔，在证明书下边用红墨水写了两行字：

务请所有苏维埃机关和主管人员对刘绍周同志予以  
一切协助。

人民委员会议主席乌里扬诺夫（列宁）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刘泽荣在回忆录里深情地写道：“列宁的批示把证明书的力度提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列宁主席还叫秘书在批示旁边打上人民委员会的印（那时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即后来的部长会议），使它成为政府主席的正式指示。列宁的批示表现出他对工人的无限关怀和对中国人民亲切的友好态度。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对我表示很大的信任，也是我个人的莫大光荣。我当时的感动是无法形容的，我几乎说不出话来表达我衷心的感激。”

时光流逝，岁月更迭，历尽种种坎坷和磨难，历经命运浮沉起落，许多东西和物件在世事多变中已不复存在，但刘泽荣却一直珍藏着这份证明书。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刘仁更是倍加珍惜。

当年为捍卫十月革命胜利的旗帜，在苏俄红军中，有许多华工出生入死奋勇杀敌，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两万人。刘泽荣回忆录曾写道：“由于中国籍的红军战士作战非常勇敢坚强，极其凶恶的白党匪帮对他们特别地恨，竟然移恨于一般华侨，在内战地区某些城市，白匪进城时看见中国人就杀，杀了不少华侨。”

为此，以刘泽荣为会长的旅俄华工联合会包括各地分会组织，也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做了不少保护华工的工作。

1920年11月中旬，以张斯麐中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准备回国。因为刘泽荣为此团在俄期间做了许多协调工作，彼此关系很融洽。而刘泽荣因为过于劳累，身体欠佳，希望返回祖国。刘泽荣提出携家眷随代表团的专列回国的请求，得到了代表团的同意。

刘泽荣找到了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副会长张永奎和其他同志们，大家看到刘泽荣的身体不是很好，需要好好休养，便同意刘泽荣辞去已担任了近四年的首届华工联合会会长职务。

回国前，刘泽荣写了长信给列宁主席向他告别，并衷心感谢他对华工联合会的关照和对刘泽荣个人的厚意。

因为铁路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刘泽荣等人从莫斯科坐火车前往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中国边境满洲里，已是12月中旬，一路花费很长时间。在满洲里火车站等候中东铁路火车时，以《北京晨报》和上海《世事新报》特邀记者身份赴俄采访的瞿秋白，遇到了刘泽荣。人海茫茫，他们二人相遇没有擦肩而过，可谓是一种缘分。正值寒冬，冰封雪裹，当时的满洲里在风雪迷茫中，更透出几分荒凉。两人素不相识却谈兴正浓，长谈不止，彼此还有相逢恨晚的感觉。

21岁的瞿秋白急于想了解苏俄方方面面的情况，28岁的刘泽荣已在俄国生活了23年，对瞿秋白提问的内容了如指掌，他便如数家珍般道来，使从未去过俄国的瞿秋白兴趣盎然。瞿秋白是毕业于北京俄文专修馆的高才生，为了避免周围人对他们谈论的苏俄革命问题产生疑问，他们使用俄语进行交流。28岁的刘泽荣不会想到小他7岁的瞿秋白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也不会想到他们匆匆的一面之交被瞿秋白写入书中，成为历史的永恒见证。

瞿秋白在他著名的散文《饿乡纪程》一书中写道：“和张斯麐中将同回国的还有一位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会长刘绍周，他是在俄留学生最出色的一个人才，他曾对我说许多华侨的事情，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sup>③</sup>刘泽荣本来想走中东铁路一直回到北京，可是满洲里的地方当局对他很注意，认为他是“红党”，有意对他采取措施。幸好张斯麐中将替他说了不少的好话，并坚决担保他不是“红党”，才使他平安过境。火车到达哈尔滨后，张斯麐中将劝刘泽荣在哈尔滨留下，

因为沈阳一带军阀张作霖是迫害“红党”的，这一关很难过。于是，他们在哈尔滨告别。因此，在俄国生活了23年的刘泽荣回国后的落脚点是哈尔滨。

也许，冥冥之中注定命运的安排。弥漫着欧式风情，充满着俄式生活格调的哈尔滨，让长期在俄国生活的刘泽荣在生活习惯和氛围上如鱼得水。他改变了临时落脚的想法，对这座原来陌生的城市萌发了亲切感，他和家人在这里生活了整整11年。

刘泽荣当年在哈尔滨的住处，是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跃景街附近的一座二楼小洋房，这座造型典雅别致的俄式楼房，直到今天仍旧保持着原貌原样，只是楼依旧，人非昨。

刘泽荣最开始的工作是在中东铁路局做翻译，后来成为中东铁路公司监事会会长。刘泽荣精通俄语，为人正直，工作能力超常。正因如此，他被推选为哈尔滨市公会议员。当时市公议会多数议员都是沙俄时代的俄国人，只有少量的中国人，市公议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都是由沙俄人来把持。刘泽荣没有做一只带媚态的猫，随波逐流、依附权势、随声附和，而是秉持公道，该说就说。

刘泽荣曾说：“议员受市民委托，职责重要，倘再屈服于旧俄殖民时代委托代管制度下，而不是坚决严正之表示，所谓代表市民自治，拥护国家市政，前提之何谓？”<sup>②</sup>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又是个经历过风雨考验、见过世面、涉外经验丰富的人。正直不阿、铮铮铁骨的刘泽荣联络其他的中国议员，坚持不懈地为维护哈尔滨市民的权益，改善市民的生活提出议案。1926年3月，市公议会召开第78次例会。刘泽荣再次联合其他中国议员，在会议上提出在公议会改用中文汉语的议案。刘泽荣在议案中写道：“市公议会沿用俄国语言文字，前后经历过十年之久，市民感受到的痛苦既深且重……今竟在本国土内不能使用本国语言文字，世界各国无此恶例……”

此议案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在中国土地上使用中国语言文字是最起码、最合理的要求和诉求。无奈俄国议员恃众专横，使该议案被无理否决。以刘泽荣为首的中国议员激于义愤，毅然退会，并联名具呈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市政管理局，坚决要求改组市公议会。

刘泽荣等华籍议员坚持收回市政，维护国家主权所进行的斗争，表达了人民的意愿，是匡扶正义的呼声，成为哈尔滨收回市政之发端与缘起，随之全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收回市政运动。在市民的强烈要求下，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发布公告，宣布解散俄国人把持的市政公议会，成立哈尔滨市临时委员会。1926年4月，市自治临时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同时成立了监察委员会，刘泽荣担任了首届监察委员会委员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泽荣离开了生活和工作整整11年的哈尔滨。1945年，刘泽荣担任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1949年9月，刘泽荣积极支持和动员国民党将领陶峙岳将军举行起义，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2012年10月，巍峨矗立的新疆和平解放纪念碑前，广场上花红似锦，群鸽在花丛中盘旋起飞。新疆自治区政协文史委主任李维青说：“刘泽荣在新疆和平解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当时的核心人物之一，做过巨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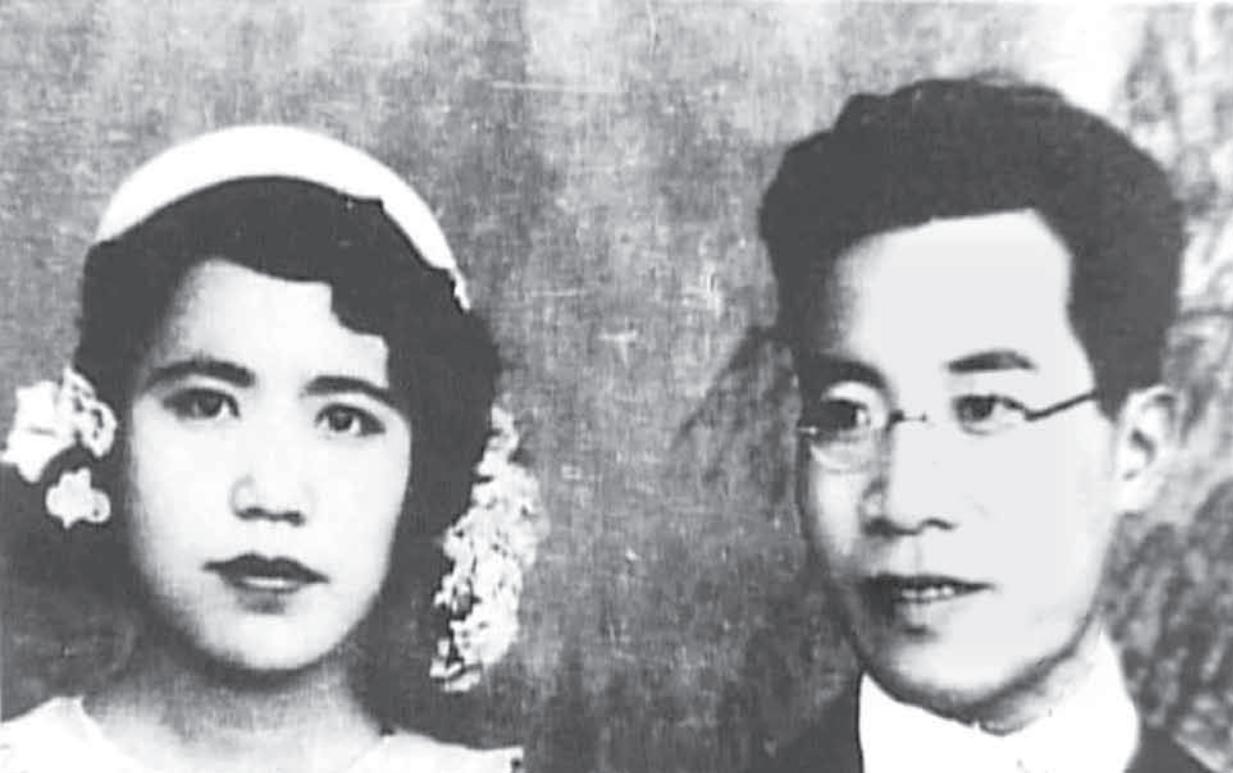
解放后，从1954年起，刘泽荣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64岁的刘泽荣老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刘泽荣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关切地询问了刘泽荣在苏俄的情况，刘泽荣向毛主席汇报了列宁三次接见他的情景。

之后，刘泽荣长期担任了中国外交部的顾问。其间他还应邀到北京外交学院用俄文演讲他曾三次受到列宁接见的情形。1970年7月，78岁的刘泽荣因病在北京逝世。1979年11月21日下午，刘泽荣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礼堂举行。李先念、邓颖超、王震、耿飚等送了花圈，王震、姬鹏飞、包尔汉等数百人参加了追悼会。

所有的中国旅俄华工都是从哈尔滨坐火车走中东铁路迈出国门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苏联红军战士，去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从某种角度讲，他们血染的风采和壮举已经为他们走过的中东铁路拉开了红色之路的序幕。站在黑河市郊区山坡最高处——某部队的岗哨楼上，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壮美和一江之隔两岸中俄城市旖旎多姿的风光，尽收眼底。透过望远镜，甚至可以

清晰地眺望到隔岸俄罗斯沿江某城市的市容和人文景象，令人颇生感慨。

是啊，水悠悠，情悠悠，中俄两国人民建立的深厚友谊将会源远流长。



1936年7月，俞秀松和盛世同（安志洁）的结婚照

#### 第四章 俞秀松与盛世同的传奇人生

在瞿秋白的文字中，留下了中东铁路的历史印记，同样，在共青团创始人俞秀松的经历中，也留下了中东铁路的历史印痕。

2006年，春夏之交时节的上海，有一位看似极普通名叫安志洁的老太太去世了。老人离世时将近九十岁，在病危时和去世后，很多领导前来探望，上海市的主要领导差不多都来了。

有比较知情的邻居说，这位老太太是新疆当年的军阀盛世才的亲妹妹，从前是中共党、团创始人之一的俞秀松的夫人，后来又成了俞秀松弟弟俞寿臧的夫人。俞寿臧与安志洁育有一子叫俞敏，又过继给了俞秀松。从人物的复杂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出里边一定有曲折的故事。

俞秀松是中共党史、团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和中国共青团旧址展览馆中，都详细地陈列着俞秀松的革命事迹。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沈建中说：“俞秀松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0年6月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他是这个组织五个成员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担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俞秀松在党建建团中都是功臣，他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俞秀松，原名俞寿松，他的家乡是浙江省诸暨县。他从小在偏远的农村生活，却视野开阔、志存高远。这与他父亲俞韵琴的影响和熏陶是分不开的。俞韵琴是清朝晚期最末一代秀才，人很开明，积极主张推行新文化，认为学习新文化是救国强民的重要途径之一。俞韵琴当过私塾教师，还曾任过诸暨县劝学。在父亲的鼓励下，俞秀松来到省城杭

州，考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当时第一师范的校长，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经亨颐，是一位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教育家。在校长经亨颐的倡导下，第一师范形成了良好的学风。学生自己出刊物，组织社团，各种思潮学派的观点互相交锋。此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校内广为流传，师生们争相阅读，俞秀松更是被其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深深地吸引。他还如饥似渴地饱览陈独秀和李大钊办的《星期评论》等报刊。俞秀松经常在自修室熄灯后，跑到路灯下，借着昏暗的灯光，一读就是半夜，以致患了严重的近视。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5月6日传到杭州，之后各大学的爱国学生立即行动起来。作为第一师范学生代表的俞秀松，和其他各校的学生代表走在了大游行的最前列。20岁的俞秀松成为了全市各项大行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他还是一位宣传鼓动者，他带领学生到市民中，四处散发传单，在杭州一家日本人开的商店前，向群众讲演。他说：我们堂堂大中华，被小小东洋欺辱，我们不能让军阀政府签订出卖山东的条约，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打倒卖国贼，打倒侵略中华的帝国主义，坚决不买不卖东洋货。俞秀松的讲演富有激情，条理清晰，听众纷纷赞同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五四运动推动下，第一师范采取了与时俱进的教育方针，成了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陈望道、刘大白等老师的指导下，俞秀松等人创办了《浙江新潮》刊物。俞秀松在11月1日《浙江新潮》的发刊词中，明确地写道：“要谋求建立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谋求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sup>②</sup>这是浙江省最早受十月革命影响，高扬社会主义旗帜的刊物，在当时浙江众多刊物中脱颖而出，影响甚广，国内外竟有三十多个代派处。其中湖南长沙的毛泽东很欣赏这本刊物，成为此刊物在湖南长沙的代派联系人。

反动当局将这本在思想上掀起巨大波澜的刊物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浙江新潮》刚出刊三期，就被无情扼杀。12月3日，北洋军阀政府通令各省对《浙江新潮》“立予禁止印刷邮寄”。接着，反动当局又要撤换开明进步的第一师范校长经亨颐，致使俞秀松等人被迫离

开已学习和生活了三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俞秀松逐渐明确了自己一生所要奋斗的目标：“我此后不想做一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意愿），情愿做个冒险的革命家。”

为推动中国建党的步伐，陈独秀于1920年5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俞秀松是成员之一。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联合撰写的文章《俞秀松在上海》这样评价俞秀松：“俞秀松是上海党建团英才中杰出的一员，他在上海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协助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当时党的名称定为社会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五个成员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共同制定了党纲，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

1920年8月22日，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出任第一书记，成为中国共青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年仅21岁的俞秀松，在中国革命事业进程的转折点上，在奔向光明的起跑线上，是当之无愧的引领者，革命追求奏响了他年轻生命的华美乐章。

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此处是临街的一栋老式建筑，很有老上海味道的石库门房子，临街挂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旧址”牌子，当年这里是法租界所在地。

这里曾留下年轻的俞秀松出进、奔波忙碌的足迹和身影，他在这里主持制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并写信指导各地建团。接着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天津、济南等地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各地建团过程中，上海团组织起到了发动和指导的作用。

在俞秀松的组织领导下，仅半年的时间，上海的团员就发展到二百多人。到1921年春，各地团员已有一千多人。

俞秀松没有辜负上海党组织的厚望，在他的带领下，上海团员们

朝气蓬勃，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他们到工厂去协助成立工会，办工人半日学校，并在工人中搞调查，为《劳动界》杂志撰文，发动青年学生声援法电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五一集会，散发传单，不断扩大团的影响。

为了培养和派遣青年干部到红色苏俄去学习十月革命的斗争经验，上海党组织成立了外国语学社，主要是学习俄语和马克思、列宁著作。俞秀松承担了四十多名学员的生活管理和教务工作，并负责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系，协调赴苏俄的有关事宜。

1921年3月下旬，上海已是草长莺飞，春意盎然。22岁的俞秀松独自一人，开始了赴苏俄的漫漫远行之旅。他辗转来到了中东铁路的枢纽哈尔滨。

此时的哈尔滨，虽然已是立春的节气，但和上海同一时间的绿树繁花不可同日而语，也根本谈不上春寒料峭，而是依然寒风凛冽，冰封雪裹。来自南方的俞秀松住进了道里区中国三道街（今西三道街）4号的中华栈。

俞秀松曾亲笔写了一封家书，又亲自从哈尔滨寄到上海，这封家书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俞秀松在家书中写道：

父亲母亲和家中诸人：

我于三月二十九日从上海乘快车北上，三十日到北京，稍有些事，住了三天。四月二日夜八点半从北京乘京奉通车赴奉天（沈阳），三日夜七点钟在南满站换乘日本人所管辖的南满车赴长春，四日早七点四十分到长春，再换乘俄人所管辖的中东铁路的车，上午八点四十分从长春开车，下午一点半到哈尔滨。

我现在住在道里（中东铁路直贯哈尔滨的腹部，铁路之西北叫作道里，外国人多在这区居住，空气较为清洁；铁路之东南处叫作道外，道路极不清洁，为南方所罕见的）。中国三道街中华栈，拟住一二天后，即行再进。我此番虽

是子身孤行，稍觉寂寞，但一路平安，请父亲母亲不以此长程跋涉为念，我一切举动，自知十分谨慎小心。

.....<sup>㉙</sup>

22岁的俞秀松第一次独自远行，他深知儿行千里母担忧，何况是去万里之遥的国外。为了不让父母牵挂，他报喜不报忧，又不能只字不提写得太虚，所以他仅仅提及“稍觉寂寞”“请父亲母亲不以此长程跋涉为念”。

在到达哈尔滨之前的五个多月，瞿秋白从北京来到哈尔滨，瞿秋白在他的名著《饿乡纪程》一书中写道：“从天津到哈尔滨，走过三国的铁路，似乎经过了三国的边界，奉天（沈阳）是中日相混，长春、哈尔滨又是中、俄、日三国的复版彩画。哈尔滨简直一大半是俄国化的生活了。”而俞秀松在家书中提到的是，在奉天（沈阳）“换乘日本人所管辖的南满车赴长春”，在长春“再换乘俄人所管辖的中东铁路的车到哈尔滨”。

不论是书中所写，或是家书所提，比起那些干巴巴的史料，作为乘客的瞿秋白和俞秀松所留下的文字，都令90年前东北三省铁路的概况和特点，变得异常生动，让今天的我们感觉如临其境。

俞秀松不仅勾勒出火车的线路图，而且时间表更是翔实精确，在每一站上车，每一站下车都具体到或是白天或是夜晚的几点几分。如果不是这封家书的记载，恐怕从上海到哈尔滨的火车路程，就考证历史而言，也只能是大致上推测罢了。

俞秀松在家书中还写道：

我此番这样匆促地走，原因事实尚未报告家中，现在就简单说明几句，使家中人不以我为突如其来去了。我这次赴R（苏俄，编者注），有三个目的使我不能不立即就走：

1. 第二次国际少年共产党定于四月十五日在R京（莫斯科，编者注）开大会，他们于前月特派代表来到中国请代表与会，我被上海的同志推选为代表；2. 上海我们的团体有派

学生留俄的事，我又被同志们推为留俄学生代表，因此又不能不先往 R 去接洽了；3. 我早已决定要赴 R，求些知识以弥补我的知识荒，乘了上面的两种公事的时机，我便不顾别的就走了。

父亲，你训勉我的几件事，我当刻刻记在心头；你给我的两封信，我带在身边，不时诵读。父亲，有一件事，你将来不要着急，就是通信的事。因为从 R 京寄信到中国来，要经过几道手续，恐不能直接寄到家中。我没有信来的时候，我总是平安的；但有事要报告的，我当写信或打电报来。

我在北京照了一张照片，过几天，由北京的朋友寄到家中。咳嗽丸两瓶，托大同带到家中。

我遥在几千里之外，引颈南望，惟祝家中个个平安。

寿 松

1921 年 4 月 6 日从哈尔滨发<sup>②</sup>

81

为什么俞秀松能将此行赴俄的三个目的，坦诚地告之家中呢？俞秀松的继子俞敏说：“俞秀松对父亲的感情非常深，彼此也特别信任，俞秀松是将父亲视为知己知音的。”

俞秀松的父亲俞韵琴虽是清朝末年最后的秀才，但他的封建意识很淡，从事教师工作，开明进步，接受新思想，向往着中国能够富强走向光明。俞秀松深深地受到父亲的思想熏陶，父子之间相互交流，几乎无话不谈。“我爷爷经常给俞秀松讲些英雄人物，传播爱国情怀。比方讲在浙江走出了一位了不起的爱国女侠秋瑾啊，讲什么农民起义运动了，所以说，俞秀松最早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爷爷。”

俞秀松在家书中写道：“父亲你训勉我的几件事，我当刻刻记在心头，你给我的两封信，我带在身边，不时诵读。”

父子情深，流露信中，父子相知，不言而喻。

“俞秀松是长子，我爷爷是教书的，俞秀松下面的弟弟妹妹也很

多，家庭人多收入有限，是比较困难的。按照传统来说，长子应该在家里挑大梁。俞秀松为了让中国老百姓都能吃上饭，参加了革命，对家里没有办法照顾，心中总觉愧疚。同时他保存了很纯真的亲情，牢记我爷爷对他的教诲，他跟我母亲说，他看我爷爷的信，一定会热泪盈眶。”俞敏如是说。

十几岁就远离家门的俞秀松，挥不去的是对父母和亲人的思念和牵挂。他在家书中写道，他路过北京，特意拍了一张照片，并给父亲买了两瓶咳嗽丸，由朋友转交。

“因为他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俞秀松就怕我爷爷和奶奶惦记他，他经常想办法照相，把相片寄给我爷爷。”

俞敏讲述了很多从爷爷那里听到的往事。他曾多次见过爷爷，爷爷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爷爷曾视为生命一样，珍藏了俞秀松的二十多封家书，如今都收入了由故耀邦、李先念、薄一波等中央领导题词的《俞秀松纪念文集》一书。

人生在世，无论走得多远，总要回到家中；无论分别得多久，总会盼着与亲人重逢团圆。可是，在俞秀松的人生旅途中命运却是无常的。

十几岁的孩子远离了家门，可谓有“少小离家”，却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再也无缘“老大回”了。

俞韵琴历尽风雨坎坷活到 95 岁，于 1973 年去世。老人如此长寿，拥有了足够长的等待时光，却没能等到父子重逢的那一天。他只能放下又拾起儿子的照片和书信，拾起放不下的是梦萦魂牵的思念和遗憾。

当年俞秀松在哈尔滨停留了三四天，办完出国手续后，走中东铁路从满洲里出境赴苏俄。

1922 年初，在苏俄完成使命的俞秀松从莫斯科坐上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满洲里入境走中东铁路回国。

回国后，他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并奔赴各地协助指导建党建团。同年夏天，他参加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

中央执行委员，后又当选为书记。

身为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的俞秀松，工作是非常繁忙的，他也萌发过回老家探望父母及家人的念头，可是肩负重任、忘我投入到革命事业中的俞秀松根本抽不出探家的时间。

1925年冬天，26岁的俞秀松再次赴苏俄。此行不再是单身一人，而是受党中央派遣，率领一百多名党团员赴苏俄留学，这一百多人的队伍由俞秀松担任临时委员会书记。

此行是从上海坐船走海路到苏俄的海参崴，再换乘西伯利亚铁路火车赴莫斯科。

在茫茫的大海中，海浪在肆虐的狂风中翻滚，轮船摇摇晃晃，颠簸得很厉害，许多学员都开始晕船，甚至呕吐不止。俞秀松精心地照料着晕船的学员，并指挥大家高唱革命歌曲，在迎风破浪的歌唱中，大家精神抖擞、情绪激昂，连晕船的症状也减轻了不少。历经漫漫的海路和铁路旅行，在俞秀松的领导和组织下，一百多名赴苏俄留学的党团员，终于安然无恙地抵达了莫斯科。

俞秀松此行是在苏俄停留时间最长的，他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了近十年。

俞秀松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并担任了教师。他曾担任中山大学联共支部局委员，学生会主席等职，在留苏的中国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有时历史的巧合是很复杂和微妙的。俞秀松率领的一百多名留苏学员中就有王明，在赴苏俄的海船上，王明和俞秀松同舟共济，到了莫斯科后，王明和俞秀松同在中山大学成为了同班同学。

王明在中国留学生中拉拉扯扯，搞宗派活动，擅长对领导投其所好，一来二去得到了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支持。王明清楚俞秀松在党内的资深领导经历和在中国留学生中享有不可替代的威望，便主动向俞秀松示好，企图拉拢俞秀松入伙。可是俞秀松性格耿直，为人正派，敢于秉公直言，他对王明的宗派活动，违背党性和党的组织原则的行径，表示公开反对，却也由此埋下了自己日后惨遭厄运的祸根。

1935年6月，联共中央委派俞秀松等25人，从莫斯科来到新疆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在新疆两年多的时间，俞秀松担任了新疆民众联合反帝会秘书长、新疆学院院长、省第一中学校长和《反帝战线》杂志主编等职务。

为了帮助新疆督办盛世才在新疆建立一个稳定的亲苏的进步政权，俞秀松等人建议和协助盛世才政府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同时俞秀松等人又改组了原来比较涣散靠裙带关系维持的“新疆民众联合反帝会”。改组后，反帝会由盛世才任会长，俞秀松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各部门均由共产党人任部长。焕然一新的反帝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成为深受新疆各族各界民众心中向往的群众性政治团体。一年后，分会和会员都比原来扩大了一倍多。

俞秀松是最早在新疆系统地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公开传播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他创办和主编的刊物《反帝战线》成为介绍和宣传红色苏俄革命成功和建设发展的窗口。刊物一出版，人们就争相购买阅读。俞秀松在全国抗战期间，充分利用《新疆日报》和《反帝战线》两个重要舆论阵地，亲自撰写和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国抗日的胜利》《我们的出路只有死里求生》等很多重要文章。他还调动反帝会的人员采取演讲、歌咏活动和话剧演出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新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俞秀松在新疆期间大力发展战略教育事业，为新疆培养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各方面的人才。曾就读于浙江名校、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俞秀松深知教育救国和教育兴国的道理，在新疆他第一个提出发展师范教育的方针。在他的努力和倡导下，解决了新疆师资严重不足的问题。

俞秀松还积极主张选派学生出国，尤其是侧重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当时新疆曾分三批选送近三百名学生到苏联塔什干中亚大学留学，其中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学生，如赛福鼎、阿巴幸夫、司马义·牙生诺夫等。

俞秀松在新疆学院担任院长时，精心培养了少数民族学生赛福鼎，并亲自引导他走上赴苏联留学之路。

解放后，在庆祝新疆大学建校 60 周年时，已成为国家领导人的赛福鼎代表中央到会祝贺，他深情地回忆起恩师俞秀松，他说：“新疆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高等学校，1935 年新疆学院一经成立，即由著名共产党人俞秀松院长制定了‘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主义为内容’的教育方针。”<sup>⑧</sup>

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包尔汉回忆说：“最使我难忘的是，他经常同我们讲述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述党的历史，讲述毛主席和他领导的长征，讲述中国革命的前途。后来，我在新疆监狱里写了一首歌颂毛主席的诗，同俞秀松向我介绍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功勋是分不开的……所以俞秀松是我认识共产党，引导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启蒙老师，我永远怀念他。”<sup>⑨</sup>

俞秀松在新疆工作期间卓有建树，也赢得了当时还亲苏、联共的新疆督办盛世才的欣赏和青睐。此时他需要俞秀松的鼎力相助，这大大有利于他政权的稳定，并显示他执政的政绩。比如，反帝会的工作红红火火，影响甚大，身为会长的他自然脸面上也风光。当他得知一直忙于学习和工作的俞秀松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便萌发了一个想法，他邀请俞秀松担任刚从北京来新疆不久的妹妹盛世同和自己女儿的兼职家庭教师。

集多种繁忙的社会工作和活动于一身的俞秀松，对于新增加的兼职教师工作，是有过犹豫的。但是他经过慎重的思考后，觉得既然受党的委派来新疆做督办盛世才的统战工作，那么，对盛世才提出的为家属做兼职家教的邀请，即使自己再累为统战工作着想，也是义不容辞的。

担任家庭教师，对于毕业于浙江名校、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高才生，又在苏俄长期留学，并且阅历甚广、智慧超常的俞秀松来说，可以说游刃有余。他在教书时耐心认真，一丝不苟，引经据典，触类旁通，这让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为他的博学多识和才华所折服。

当俞秀松教授俄文时，盛世同更是惊诧不已。不是亲耳所听，她不会相信这位家教的俄文功底和造诣如此之深。

年轻貌美的盛世同刚刚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对于这里特有的民俗民风和少数民族的建筑等一切都感到新鲜。进入女子中学读书后，她不以大小姐的身份自居，也不因是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妹妹而盛气凌人，出来进去，从来都是步行，她不愿意享受高人一等的车接车送待遇。她高挑的身材，白皙的肤色和水汪汪的大眼睛，常常被众人关注。她着装简朴，且思想要求进步，积极参加反帝会、妇女协会和学联等进步组织。

盛世同正值青春妙龄，她的精神世界如同晴空中的一片朝霞，既绚丽灿然，又晶莹纯净。她追求生活中的真善美，正展开理想的双翼，可是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之路来实现理想和追求呢？在寻觅方向中，她有些迷茫，如同彩云一样飘忽不定。

俞秀松用切身经历，由浅入深地给她讲述了什么是人生价值，马列主义为什么能够拯救中国，革命斗争意味着什么，改造后的中国社会未来会是什么样。这些坦诚、发自肺腑的阐述交流，深刻而生动，情理交融，深深地打动了盛世同的心，让她感到受益匪浅。

渐渐地，盛世同对这位家教有一种相见恨晚、不愿分开的感觉。当俞秀松说再见走出院子时，她倚在窗前挥手，凝望着他的背影，竟怅然若失。

从未谈过恋爱的俞秀松内心也悄然滋生了对这位美丽清纯，又追求进步的姑娘的爱慕。

晚年的盛世同（改名安志洁）在《怀念亲人俞秀松》的文章中写道：“在我们接触多了，交流了思想和认识后，他提出愿意与我结成终生伴侣。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未成婚，他说：‘我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父亲要我回家去结婚，女方是我老师蒋先生的女儿，但是我拒绝了这种包办婚姻。我认为必须互相了解，由恋爱而结婚。我曾为此和父亲三击掌，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新女性，终身不婚。’他并且严肃地对我说：‘我是完全了解你的，许多同志也都介绍了你的表现。你不要误会，不是因为你是督办的妹妹，我才

提出这个要求的，你确实是我理想中的新女性。’

“同时，他也提到了苦衷，离家很多年了，孤身一人，没有得到一点家庭温暖，所以时常想家。有一次，他病了，在单身宿舍里不时地把我的照片拿出来看看，思念之情由此可见。”<sup>⑩</sup>

盛世同在征得父母和兄姐的同意后，答应了俞秀松的求婚。由于身份特殊，在经过斯大林批准后，1936年夏天，正是风和日丽、繁花似锦的时节，37岁的俞秀松和21岁的盛世同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新疆政府的官员、少数民族的名流如包尔汉等，俞秀松所在团体的同事及苏联领事馆全体人员都来参加了婚礼，而且苏联领事馆还转交了斯大林送来的礼物，一台当时很少见的照相机。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旷世的婚礼，还连同新疆的建设发展成果、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特有的城市风貌一起被拍成了电影，在新疆各地和苏联放映。

婚后的生活是温馨甜蜜的，俞秀松婉拒了盛世才赠送的豪宅，将新房安置在反帝会宿舍的两间平房里，陈设简陋，没有什么特殊的摆设。新疆省政府索溶主席考虑到俞秀松职务多工作忙，准备给他配一辆专用小轿车，俞秀松说：“我还是走路骑马好！可以锻炼身体和坚强意志，并养成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盛世同在《怀念亲人俞秀松》的文章中写道：“结婚后，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想，生活充实，精神愉快，业余生活也很丰富。他下班后，如无会议或活动，我与他同学写大楷书，他的字很漂亮。画画是我们共同的兴趣。记得有次他画了一对羽毛华丽、活泼可爱的双鸟栖息在花枝上，交头细语；我画了两枝荷花，含苞待放，粉色的花朵下衬托着伞状的绿叶，随风起舞，娇嫩可爱。他触景生情说：‘把日本鬼子赶走后，想回家乡去看看，陪你到西湖划船赏景，你一定会高兴。’星期天，我们不是到公园或郊外走走，就是在家等同志们来学习，过组织生活。我们也经常是星期天约几个朋友到郊外骑马打猎。我们俩都喜欢花草，婚前他早已在院子里种上花，婚后我们就早晚浇水、施肥、除草、修枝。碧绿的庭院，新鲜的空气，加上扑鼻的花

香，给我们的生活平添了乐趣。”

沉浸在幸福生活中的盛世同，万万没有想到，一个不幸的灾难正从天而降。

1937年12月的一天晚上，俞秀松去反帝会了解各部门开会学习情况，并到新疆学院、省一中去查看学生夜自习。盛世同正准备明天考生物学的功课，突然听到门外急促的脚步声，接着进来盛世才的四个卫士，手提马灯说是“督办有要事请秘书长立即就去”。

据盛世同撰写的回忆文章写道：“因秀松尚未回家，我就叫他们在外面等一会儿。晚八点许，秀松回家，见门口停着小汽车，听说来接他去督办公署，就感到异乎寻常。过去盛世才找他有事，总是先拨电话，有时他一人前去，有时我陪他同去，为什么今天用小汽车来接？他对我说：‘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考试呢！我去看一看就回来。’我一直等到深夜12点，就给盛世才打电话，盛说和秀松有事商量，叫我先休息。到后半夜2点钟秀松还不回来，我又打电话问，盛又说秀松去苏联领事馆办事，可能要等到明天才回家。这一夜我一直都昏昏沉沉，心神不安。早上，我参加生物学考试后立即回家。一进门，厨师就满面泪水对我说：‘秘书长被抓起来了，公安处叫你把棉被、洗脸用具送去。’我一听，愤怒万端，立即打电话质问盛世才为什么无故抓人，又直接去找他评理。盛说秀松参加‘阴谋暴动案’要杀他，说是有组织名单，有秀松的盖章，又胡说：‘有证据还与托派有关，过几天公审大会，你可当面听听！’从此我与盛世才展开斗争，揭穿他的种种谎言……”

自己的亲哥哥，要将自己的丈夫置于死地，让盛世同忐忑不安，愤懑不已。

盛世才是典型的两面派，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择手段。他将妹妹嫁给俞秀松是政治需要，抓捕俞秀松也同样也是政治需要。

在被捕前，俞秀松曾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为《中国的法西斯产生的原因、发展过程》，内容明指蒋介石的同时也暗指盛世才在新疆的无法无天，盛世才看后很是恼火。另外，俞秀松在新疆威望越来

越高，他通过他管辖的新疆日报社与新疆学院发展党组织，盛世才大为不满，认为俞秀松的手越伸越长。盛世才从最初的利用和欣赏俞秀松，转变为戒备俞秀松，认为俞秀松等共产党人已对他构成威胁。因此，盛世才在暗中导演了一出“阴谋暴动案”，放出烟雾说俞秀松要杀他。

从某种角度看，盛世才有一段时期执行亲苏联共建设边疆的政策，是有利于促进新疆的稳定和发展的。但是，盛世才图的是苏联的重金援助和共产党的鼎力帮助，这使他这位新疆督办当得很风光。后来他投靠了国民党，双手沾满了血腥，这位反革命的两面派，曾残暴地屠杀了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等。

至于说俞秀松是托派，这完全是诬陷。在俞秀松被捕前夕，王明和康生曾来新疆找到盛世才，大肆罗织俞秀松的罪名，说他是“托派分子”和“日本间谍”等等，竭力鼓动盛世才搞掉俞秀松。

盛世才有此意，王明和康生又推波助澜，盛世才的亲妹妹盛世同的婚姻在无形的政治阴谋掌控下，竟变成了刀尖上的舞蹈。

到新疆时间不算长的盛世同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哥哥会下此毒手，她据理力争，多次同盛世才争吵。但她争取到的仅是每周给俞秀松送一次衣物，每月探监一次的机会。

1938年春天，俞秀松被苏联军用飞机押往莫斯科。

盛世同在《怀念亲人俞秀松》的文章中写道：“在去机场的路上，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没能在一起革命生活一辈子，不知何时能再见你，要记住为革命献身是光荣的。’他预感到押回苏联后问题会更复杂，他说：‘我此去凶多吉少，你要挺起胸膛，不能靠别人，救世主就是共产党，要相信党中央，他们才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我个人的生死微不足道，革命人的头是杀不完的，让鲜血换来新中国的胜利，人民大众共享幸福生活，我心甘情愿。但不能看到祖国明天的胜利，离开祖国锦绣山河和骨肉同胞，不能带你回老家看望父母和家人，心里实在太难受了！’到了机场，看到一家苏联军用飞机停在机场上，还有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催促秀松上飞

机，生离死别就在眼前，秀松紧紧抱住我，含泪说：‘同妹！要坚强，多保重，但愿我们能重逢。’他上飞机后，马达声响了。飞机腾空而起，我的心几乎碎了。他手拿帽子，从机窗口不断向我挥手。飞机渐渐远去，亲人被夺走了！我突然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谁知机场一别竟成永诀。”

俞秀松到苏联后，已在苏联得势的王明和康生变本加厉对俞秀松进行诬陷。1939年2月21日，俞秀松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遇害，时年40岁。

机场分别，成为盛世同心中永远难以湮灭的痛。和俞秀松相识相恋结婚在一起仅有两年半的时光，幸福的时光虽然短暂，却是刻骨铭心的美好记忆，这段时光已成为永恒。

在失去俞秀松的日子里正如盛世同在《怀念亲人俞秀松》的文章中所写：“在痛苦中，茶饭不想，孤灯影只，夜不成寐，精神上遭到沉重打击，但一想到秀松在狱中和机场的言行，就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继续革命事业，积极投身于抗日的救国斗争中。”

至于和盛世才的关系，也发生了剧烈的转变。1935年，18岁的盛世同从北京千里迢迢来新疆投奔哥哥盛世才，而且和先期到达的家人相聚，兄妹重逢其乐融融。可在俞秀松被捕后的半年时间里，盛世同曾多次向哥哥求情，甚至搬出家人来苦苦劝说，但换来的却是盛世才的无动于衷。盛世同心灰意冷，和丈夫俞秀松在机场分别后，改随母姓，更名志洁。从此，她和盛世才水火不容分道扬镳。盛世才在俞秀松被押往苏联后，曾数次登门看望，她都拒之门外，盛世才也曾送来慰问金，她分文不要。1944年盛世才离开新疆时劝她一起走，她置之不理。1948年，盛世才带领全家人飞往台湾，她拒不同行。后来，母亲牵挂女儿心切留了下来，其他的家人都跟随盛世才去了台湾。

1938年，和俞秀松机场分别，安志洁只有23岁，年轻貌美，更何况还是堂堂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妹妹，不少人都劝她，反正也没有孩子，凭这么好的条件，趁着年轻再婚吧，何苦独守空房呢，安志洁一

概拒绝。

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安志洁一直在等待。她忘不了在机场分别时，俞秀松紧紧抱住她，含泪说的那句话：“同妹，但愿我们能重逢。”这期间，她四处打听俞秀松的下落，也多次询问苏联领事馆，却得不到准确的音信。

此时安志洁又牵挂起一件事来，她想到俞秀松曾多次提过，十几岁离开家门，忙于革命事业再顾不上回家，但时常想家，也希望带上妻子回家看望父母和家人。在机场分别时，还提到没能实现这一愿望，感到非常难受。安志洁决定要代替丈夫来完成这一未了的心愿。

安志洁含泪给俞秀松的父母写了信，因战乱邮路受阻不通，信件没有发出去。1945年抗战胜利后，安志洁将压下的信件重新寄出。几个星期后，俞秀松的父亲俞韵琴回信说，因为日寇入侵，家中一贫如洗，负债累累，他现已投奔他的学生，在南京任职做事。

“这样，我和公公有了见面的机会。那天，我带着礼品和秀松在狱中穿过的那套新棉衣去看望老人家。他手捧棉衣，老泪纵横。父子骨肉情深，使我心酸，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后来，安志洁随同公公回到了浙江省诸暨县农村的家中，山水依旧，田园依旧，俞秀松多次梦回老家的心愿，由妻子完成了。

解放初，安志洁便写信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请求帮忙寻找或调查俞秀松的下落。不久，王稼祥大使来信，告之俞秀松已在苏联牺牲，但不知牺牲的详情。

安志洁望着来信，如疾风卷落的秋叶，瑟瑟发抖，她禁不住放声痛哭。她想不到苦苦等待了十多年，竟等到这样的消息。从23岁开始等到了30多岁，一个女性青春的岁月都在漫长的等待中逝去。这十多年，有提亲的，有劝说她再婚的，也有暗暗追求她的小伙子，但在她内心的世界只有俞秀松。看到人家年节的欢乐，看到花好月圆下夫妻携手漫步，孤灯相伴独守空房的她内心充满苦涩和酸楚，但更多的是等待和希望。她深知丈夫是无辜的，总有一天会拨开乌云见到晴日，她相信和俞秀松是会重逢的，想不到满怀的希望变成了绝望。

毕竟，人死不能复生。俞秀松年过七旬的父母强忍住丧子的悲痛，深深地为儿媳的忠贞所感动，他们实在难舍难离这样的好儿媳。在公婆的劝说下，又征得母亲的首肯，安志洁与俞秀松的四弟俞寿臧结为了夫妻。

由于俞秀松生前喜爱孩子，安志洁和俞寿臧婚前商定，如生了孩子就过继给俞秀松，以作纪念。

安志洁的命运似乎注定是一波三折的，她即使改了名字，也改不了她是盛世才妹妹的事实，也脱不掉她与台湾家人的关系，她甚至被怀疑是潜伏特务，曾被剥夺工作的权利。

1961年，组织上追认俞秀松为革命烈士，安志洁成了烈属。

一定要为俞秀松彻底平反，成了安志洁坚定不移的信念。安志洁坚持不懈地向有关部门包括前苏联驻华使馆写信申诉，那时由于康生还在台上，加之中苏关系有过一段曲折，安志洁的心愿没有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重大冤假错案的陆续平反，解决俞秀松的冤案问题已成为现实。安志洁竭尽全力地配合组织还原历史真相。苏联解体后，她又多次写信给俄罗斯驻华使馆及相关机构进行申诉。正如她在文章中所写的：“他冤死在异国他乡已半个多世纪了，我对他的怀念之情丝毫未减。半个多世纪来，我历尽千辛万苦，坎坷曲折寻找他，当得知他被害牺牲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弄清他被害的真相，直至水落石出。而当得知他遭诬陷受冤而亡以后，我发誓一定要争取给他平反昭雪，不然，我死不瞑目啊！”

“这一天终于等到了。1996年国庆前夕，我收到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参赞李桐杰来信，信中说，俄联邦军事检察院正式做出为俞秀松烈士恢复名誉的决定，依据俄罗斯联邦《关于给予在政治大清洗中受害者平反法》第三条，正式决定给俞秀松彻底平反。

“我看到了梦寐以求的俄罗斯为俞秀松彻底平反的证明书后，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欣慰，泪水打湿了衣襟。”<sup>⑩</sup>

很长时间，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当时康生还在台上，俞秀松的革命业绩和精神没有得到应有的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广大党史、青运史工作者的艰苦努力，终于搞清了历史真相，俞秀

松的生平和光辉的业绩已逐渐见诸有关报刊和书籍，也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

1985年，胡耀邦为俞秀松烈士陵园亲笔题词。1988年，李先念题写了“俞秀松烈士永垂不朽”的条幅，其他一些领导人也纷纷题词或撰文表达对这位杰出的革命先驱深深的缅怀之情。

1998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负责同志和俞秀松同志的继子俞敏，专程飞往俄罗斯莫斯科，在俞秀松遇害地拜祭了俞秀松烈士并敬献花圈，俞敏和安志洁同为俞秀松烈士敬立了墓碑。

1999年8月1日，在俞秀松烈士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指导下，隆重地出版和发行了《俞秀松纪念文集》，俞秀松在哈尔滨书写和发出的那封家书也收入其中。

有人曾对俞秀松烈士的继子俞敏说，想要写一写安志洁的人生故事，俞敏说，我母亲的名字是安志洁，原名是盛世同，我的舅舅是盛世才，我母亲的故事如同电视剧，甚至连电视剧也未必能编出来。好多人感到很传奇，也想写一写，可太复杂了，都望而却步了。

俞敏为人热情、坦诚、豪爽，他说他是上海知青，有在黑龙江农场下乡十年的经历，他的性格中已融入了东北人的特点。他说他受俞秀松精神的影响，常常忙于社会公益事业，再苦再累也乐此不疲。

俞敏说，他是俞秀松的继子，就要继承和传承俞秀松的遗志。他又说，他曾专程自费几次来到哈尔滨道里区的西三道街，尽管历史改变了建筑的容颜，当年的中华栈已不复存在，但是他已找到中华栈当年的照片。他在俞秀松住过的中华栈的旧址前，伫立凝望很长时间，想象着当年22岁的俞秀松第一次远赴红色苏俄在中华栈落脚的情景，想象着俞秀松在哈尔滨书写和发出家书的场景，想象着俞秀松独自一人万里之遥赴苏俄的艰辛和坚定。

当有人问俞敏：“以后还会去哈尔滨的那个‘老地方’吗？”俞敏毫不犹豫地说：“会去，一定会去的。”他觉得中华栈是他的人生加油站，在那里灵魂会受到洗礼。那里留下的是俞秀松22岁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身影和足迹，那里他留下的文字，有志存高远的豪

气和魄力。

追溯历史，品味沧桑，回味俞秀松的故事，想起先烈们的往事，禁不住百感交集，泪湿眼角。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合影

## 第五章 红色之路助力建党

## 一、建党的桥梁与纽带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正式成立，接着又在苏俄伊尔库茨克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共产国际十分关注东方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共产国际先后派出维经斯基、斯托扬诺维奇、马林、优林、达林、越飞、鲍罗廷、崔可夫等到中国帮助建党和宣传马列主义。当时，他们来中国的路线除极少数绕道乘船走海路外，绝大多数人走中东铁路来到哈尔滨，然后再到关内去。作为中东铁路的枢纽和中转站的哈尔滨，成为了这条红色之路的纽带和窗口。

哈尔滨市道里区毗邻中央大街的西九道街57号，是当时共产国际驻满办事处。阿勃拉姆是该办事处的负责人。他的任务是秘密接待和护送共产国际代表来往于苏俄与中国之间。

共产国际的代表和中东铁路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他的《中国回忆录》中写道：“……第二天我就坐在中东铁路的国际车厢里了。过去这条铁路属于沙俄，而此时仍为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管理局掌握。我在火车上熬了一昼夜，但终于到哈尔滨了。”达林找到了哈尔滨的共产国际驻满办事处，受到负责人阿勃拉姆的热情接待。达林还在《中国回忆录》中写道：“阿勃拉姆给我介绍了另一个哈尔滨，这就是‘新城’，是铁路工人区，那里存在着俄国党的组织，哈尔滨的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做了许多工作，向中国人传播有关苏俄的真实情况，并同北京的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

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最早派到中国帮助建党的代表，也是来往于中东铁路次数最多的一位。1920年3月，维经斯基从满洲里入境，乘中东铁路的火车到哈尔滨停留后，继续坐火车到北京。在火车上，维经斯基望着窗外广袤的田野、巍巍的群山和宽阔的河流，面对这陌生国度的自然风光，禁不住思绪翻腾。他在思索着中国革命的进程以及怎样在中国帮助建立布尔什维克。

1920年4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了树木葱茏、繁花含苞待放的北京。他在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和伊万诺夫的帮助下首先结识了李大钊。其间，他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许多进步人士举行了多次座谈，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和苏俄的对外政策。维经斯基还同李大钊多次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们的想法几乎是一拍即合，彼此都认为这是中国革命面临的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为了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赴上海会见陈独秀，商量建党大计。1920年5月初，维经斯基到达上海。陈独秀刚刚组织了上海工人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见到了来自苏俄的共产国际代表甚是欣慰。陈独秀本有建党想法，维经斯基的到来使他喜出望外，他们多次交换了在中国组建共产党的意见。在陈独秀的介绍下，维经斯基还同《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杂志的负责人和上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一起座谈讨论了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

在维经斯基的热忱帮助下，1920年6月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由它与各地联系发动建党活动。于是很快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先后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维经斯基对中国革命起了很大作用。维经斯基在上海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帮助中国建党，陈独秀在上海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准备建党，这样陈独秀就和维经斯基合作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上海发起组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当时呢，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维经斯基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沈建中如是说。

为了输送中国革命青年赴苏俄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维经斯基还

协助上海党组织创办了上海外国语学社，还在上海外国语学社设立了“华俄通讯社”，及时翻译和报道有关苏俄和共产国际最新动态的文章和新闻消息，为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留学的革命青年打开了信息之窗。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党组织培训干部的学校，是革命事业的红色摇篮，被后来的革命者称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

上海外国语学社就设在当年的团中央机关内。团中央机关的旧址位于上海当年的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 6 号，今淮海中路 567 弄，是一处石库门房子。如果不是在临街门口挂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旧址”这一醒目的牌子，向里面长长的过道望去，来来往往的居民还有杆子上晾晒的衣物尽显生活常态，此处是不会让人另眼相看的。

时光倒转回到 90 年前，这里是青年团的发祥地和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所在地，是中国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当时有很多各地的青年风尘仆仆而来，有许多毅然远离家门甚至才十几岁的青少年为了寻梦接踵而至。

渔阳里 6 号这座二楼二底的老建筑一大半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纪念馆，近三分之一是上海外国语学社旧址。和规模很大的纪念馆拥有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不同，上海外国语学社作为重要文物单位一般不对外开放。房子的窗户用窗帘遮蔽，很静谧。时隔九十多年，此处楼依旧，一楼的教室黑板桌椅依旧，上海外国语学社的牌子依旧，仅是字迹已略显斑驳。顺着仅容一人通过的窄窄的木板楼梯到二楼，宿舍和办公室也依旧，连古铜色的刻印蜡板机也透着历史的沧桑。

墙上悬挂的照片是异常珍贵的，那是当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夫人库兹涅佐娃还有从苏俄同行来的杨明斋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期间的合影。

前尘往事早已渐行渐远，寂寂的此处，已然看不见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认真而耐心教授俄文的样子，也听不见学员们初学俄语时有些费劲不够标准和整齐的发音，但是可以想到，此处当年汇聚着风华正茂的热血男儿，为中国的未来孜孜以求。这里弥漫着生机勃发的青春气息，升腾着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正能量。在这里学习的最小的学员是来自湖南年仅 16 岁的任弼时，他在这里加入了共青团走上了革命

征途。受上海党组织委派，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担任了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教学和生活管理的秘书，那时也才只有 21 岁。

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既学习俄文又学习革命理论，同时还要深入到工人中间做宣传。

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近四十名学员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后来都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在上海外国语学社走出来的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还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上海外国语学社得到了维经斯基的鼎力支持，在他的联系下，共产国际还为上海外国语学社提供了办学经费。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沈建中说：“办外国语学社，维经斯基的夫人就在里面教俄文，还有和维经斯基一起来的杨明斋担任了外国语学社的负责人。维经斯基还在中国建立了华俄通讯社，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形和苏俄的新变化，吸引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到苏俄。在上海党组织和共产国际的协调安排下，近四十名学员陆续踏上了赴苏俄的征途。

“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从 1921 年 3 月就分批到苏俄去留学，他们行走的路线，从上海到北京，最后到哈尔滨，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枢纽，是必经之路，再经过满洲里或绥芬河，这样就进入苏俄了。一路上险象环生，他们把证明放在鞋底里，缝在衣服里，这样呢，就穿过了军阀控制区和白匪控制区。”

1920 年 12 月下旬，维经斯基一行离开上海。1921 年初到达北京。维经斯基来到北大红楼与李大钊相聚，担任二人翻译的是北京党组织的张太雷。二人再度握手，已是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老朋友。维经斯基介绍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李大钊也介绍了北京党组织的情况。此间，维经斯基曾几次会见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的成员，他谈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共产党的基本信念及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问题。维经斯基一行从北京回到哈尔滨共产国际驻满办事处，停留几天后，从哈尔滨走中东铁路由满洲里出境返回莫斯科。

算起来，维经斯基第一次到中国来传播革命火种帮助中国建党，大约工作了十个月之多。后来，他又多次走中东铁路来中国，相比

较，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是时间最长的一次。

继维经斯基之后，共产国际派出第二位代表马林，从莫斯科走西伯利亚大铁路，然后过境走中东铁路途经哈尔滨，于1921年6月来到北京。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具体负责和中国的联系工作，稍早些已派出代表尼克尔斯基来到北京。马林在北大“红楼”见到了李大钊，进行长谈，并相互交换了意见，对共产国际的中国应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双方看法一致，取得了共识。马林还同北京的共产党员座谈，听取大家的意见和想法。

接着，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同李大钊委派的张国焘一道来到上海，与上海党组织联系筹备中共一大的事宜。此时，陈独秀委托李达和李汉俊筹备相关的工作。

1921年7月，各地推选的一大代表先后抵达上海，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还有一名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党员。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当年的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如今的兴业路74号秘密召开，代表们的住处在附近的博文女校。

当时上海成为各地党组织的中心，一大会址也就顺理成章地选在了上海。代表们都是有主见的知识分子，讨论起来十分热烈。

马林在会上作了发言，北京代表刘仁静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坐在马林旁边担任翻译。马林首先代表共产国际致辞，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sup>②2</sup>在讲话中，马林建议中国共产党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组织。

马林的一席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见斯诺《西行漫记》）

经过代表的充分酝酿和讨论，中共一大通过了载入辉煌史册的第一个党纲和第一个决议。

走进一大纪念馆，在显著的位置会看到当时出席一大会议的全体代表正在开会的塑像。这带有动态的群体塑像非常逼真，栩栩如生，成为永恒的历史经典画面。其中还有两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一位是马林，波兰人；一位是尼克尔斯基，苏俄人。他们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他们的异国风采融入了群体塑像中，他们的名字也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南陈北李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是革命者将陈独秀和李大钊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们的照片被挂在了一大纪念馆最显著的位置上。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许多共产国际的代表先后走中东铁路来到中国，中共代表和许多革命者也是走中东铁路去往苏俄。从某种角度看，被革命者称为红色之路的中东铁路，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桥梁和纽带，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紧密联系。

当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是开天辟地的革命圣地，也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精神坐标。共产党人就像在黑暗的夜里，划着了一根火柴，那晶莹通红的火焰，燃烧着，燃烧着，一直燃烧到全国劳苦大众的心里。

## 二、在中东铁路枢纽建党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十分重视东北的建党工作。当时党中央认为东北尤其是哈尔滨是中共联系共产国际的重要驿站和通道，打通这条国际路线非常重要。另外，东北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基地之一，那里的工人阶级也需要党组织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1年11月，刚刚成立的中共北方区委，尽管工作非常繁忙，需要领导的省份范围也很广泛，但还是将东北工作列入重要议程。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等人酝酿这个问题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和优林等人的关注，他们建议重视东北的工作。因为这一时期，白俄残余势力还盘踞在北满，日本控制着南满，既是对苏维埃政权的威胁，也是中国革命发展不可忽略的阻力。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国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选派了罗章龙赴东北考察工作。罗章龙在《关于东北建党的回忆录》中曾写道：“当时党中央很关心东北工作开展，东北是我们去共产国际来往苏俄的重要通道，我们要打通这条国际路线。”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常好礼说：“正因为在哈尔滨这个地方，红色之路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苏俄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哈尔滨活动也很多，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认为东北这个地方，特别是哈尔滨非常重要，中共北方区委就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到北方调研。他在哈尔滨时间比较长，而且直接深入到基层，到工人中去。”

生长于湖南的罗章龙在湖南读书时就与毛泽东相识并与毛泽东结成管鲍之交。1918年，罗章龙参加了由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湖南长沙新民学会。罗章龙考入北京大学后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并成为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他还与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既是中共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也是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1921年冬天，罗章龙由北京出发来到东北，先后到达沟帮子、沈阳、旅大等地。在南满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22年初北上来到哈尔滨。罗章龙曾担任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负责人，有一些东北籍的同学也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毕业后又回到东北，其中有张昭德、姜琪、张注祯等几位哈尔滨的学生。罗章龙到哈尔滨后，便迅速和他们取得了联系。此时，张昭德在东华学校和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担任俄文教师。他以自己的身份之便帮助罗章龙以学生身份住进了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学生宿舍。罗章龙以此为落脚点，在张昭德等人的协助下，开始了在哈尔滨的走访调研工作。

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址附近的哈工大校史馆，当年就是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的学生宿舍。这是一座比较典型的俄式百年建筑，整个二层楼的墙壁不是用砖瓦而是用石头砌成的。哈尔滨迄今尚存的俄式老建筑大多如此，被哈尔滨人称为大石头房子。其窗户非正方形，而是椭圆形，宽敞明亮，木制嵌铁皮的房门大气厚重。

如今我们已无从考证，罗章龙在这里落脚住的是楼上楼下，究竟

是在什么位置，不过透过偌大的空间，可以想见当年这里出来进去的学生会很多，他们朝夕见面都住在一起。至于罗章龙，时年 26 岁，也比较年轻，又曾毕业于北京大学，以学生身份住进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学生宿舍，如雨入湖，如枝在林，是不会引起别人怀疑的。

罗章龙最先到中东铁路总工厂和工人生活区三十六棚考察。在考察中，他发现三十六棚工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十月革命前后，他们同俄国工人一起，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沙俄统治者的斗争中，团结一致，举行过十几次大罢工，为支援俄国十月革命，保护苏维埃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罗章龙在同工人接触中，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活动以及关内工人斗争情况，号召工人组织起来，为自己阶级利益而奋斗。考察后，罗章龙认为，三十六棚是北满工人运动的中心，也应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北满活动的中心。

接着，罗章龙还到过道外戎通公司、秋林洋行、中东铁路沿线一些站段考察。期间，还与苏俄在哈尔滨的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罗章龙曾当选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在他主编的《铁路年鉴》一书中，还提到了他曾考察过的中东铁路，包括哈尔滨铁路总工厂和三十六棚的情况。

罗章龙的晚年是在北京度过的。1979 年 6 月，罗章龙奉调进京，担任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享受部级待遇，并连任了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罗章龙于 1995 年 2 月病逝，享年 100 岁。罗章龙生前住在北京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隔街相望。虽然是黄金地点，但是他住的临街房子很普通，居室的使用面积不足 60 平方米，这是他进京时组织上临时安排的。后来组织上要给他调房，他一直强调住在此处上班近，方便，谢绝了按级别应享受的住房待遇。

罗章龙生前的卧室兼书房，陈设依旧，非常简朴，客厅不足 20 平方米，连地都是水泥地面的。罗章龙的儿子罗平海说：“我父亲对生活厉行简朴，从不奢求，他多次谢绝了组织的关照。”罗章龙伏案写作的台灯和笔筒都依然完好地置放在写字台上。他晚年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著述颇丰。1991 年，国务院给他颁发了特殊贡献证书。

罗章龙撰写了一批党史回忆录和诗词等文章。其中已出版的《椿

园诗草》中有一首诗是《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留学》，他在说明中写道：“一九一九年冬，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时毛润之（毛泽东）与余（我）等住北京吉安寓所，地点在景山东三眼井胡同西头，旧址今尚存。”另外此书中，还有他为他主编的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工人周刊》创刊号所写的诗，“千年劳动发呼声，地撼天旋海宇惊，亿万工农群起蛰，九州萌动风云生。”<sup>⑨</sup>此诗正写于罗章龙来东北哈尔滨考察工作的前夕。晚年的罗章龙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书写着历史的画卷。在他的笔下，汇聚着时空的沧桑，流转着历史风云的变幻。

在北京照顾父亲晚年生活的罗平海，听过父亲讲述往事，还专为父亲的文稿进行电脑打字，他也记住了许多历史往事。他说：“当年的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所在地就设在北京大学校内，是秘密的，不公开的。”另外，他还听父亲讲述过去哈尔滨的情景。“哈尔滨当年是很洋化的城市，表面上繁华热闹，但是三十六棚工人的生活却十分艰难。那时形势复杂，有时也很危险，我父亲罗章龙平时在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学生宿舍是一身学生着装，深入工厂时就换成普通工人装，这样便于掩护。他还曾在三十六棚住过，为了接近群众和工人交朋友，他还学会一些东北话。他同工人聊家常，他会说‘我也是来闯关东的’。另外为了工作方便，他还学会了一些俄语。”

罗章龙的东北之行，历时四个多月，对东北特别是哈尔滨工人组织状况、觉悟程度及工人运动等方面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返回北京后，他写了一份《关于东北工人状况和建议在东北建立党组织和工会的报告》，并在北京大学校区楼向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等同志作了详细汇报。他在报告中特别提到哈尔滨：“由于地理位置是中东铁路的枢纽，随着这条铁路红色信息的传播，产业工人较早接受了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影响，觉悟程度比较高，有强烈的革命性，并不断进行着斗争。”为此，罗章龙向中共北方区委建议，派专人去哈尔滨开展革命活动和筹备建立党组织，他还建议派出的同志最好是能够明白俄语的。

1923年3月，满怀理想和激情的青年才俊陈为人和李震瀛，裹挟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来到了中东铁路的枢纽哈尔滨。这是中共北方区委

书记李大钊精心挑选的两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同时，李大钊还采纳了罗章龙的建议，挑选的这两位都会俄语。

来自湖南的陈为人曾经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之一，是和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共为同学的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1921年初他被上海党组织派往苏俄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他担任中共北方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其间曾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指导山东党的工作。

另一位家乡是天津的23岁的李震瀛，毕业于天津南开学校，擅长俄文，是周恩来的同学和战友。在五四运动中他冲锋在前，是天津觉悟社重要成员之一。邓颖超晚年时重回天津，望着当年觉悟社成员的合影，其中周恩来身边的那个人，邓颖超还能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

“他就是李震瀛。”李震瀛1921年加入共产党，1922年7月在郑州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运动，担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

陈为人和李震瀛来到哈尔滨以后，便通过进步青年韩迭声的关系，首先来到《哈尔滨晨光》报社工作，以记者身份采访各界人士，了解社会，在群众中开展革命活动，筹建党团组织。

当时的哈尔滨约有32万人，外国人约占半数，来自近20个国家，其中俄国人居多数，日本人也不少。整座城市弥漫着欧式风情，各国领事馆、大洋行、大银行比比皆是。所以，陈为人和李震瀛认为哈尔滨“大有异国之威”。这些外国势力既相互钩心斗角，又经常联手欺凌实施城市管理的东省特别区当局。至于为数较多的俄国人，既有被称为“红党”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也有被称为“白党”的沙俄残余势力。

当时被称为国际都市的哈尔滨的形势，可谓错综复杂，乱象丛生。

陈为人和李震瀛经调查分析，认为：“哈尔滨华文报纸九家，除一家是日本人办的外，余者都无自己的生命，不只不敢针砭时局，有时还助军阀的威势。”“其他外国人的通讯社，实可左右一切政治潮流的消长。”<sup>④4</sup>

作为来哈尔滨履行开辟阵地筹建党团组织使命的陈、李二人，深知舆论宣传的重要，他们要打造让劳动人民发出声音，争取话语权的

载体。于是他们联络组织了韩迭生、彭守初、张昭德、吴春雷等人，于1923年9月16日在道里区中国十四道街（今西十四道街）52号创立了我党领导的哈尔滨通讯社。陈、李二人还结识了爱国人士哈尔滨无线电台副台长刘瀚，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刘瀚在业务上支持通讯社，利用现代电讯手段发新闻稿。其中英文、俄文电讯稿经陈、李二人译成中文，并巧妙地加以改编，再供给本市和外埠的报刊、电台使用。同时陈、李二人还亲自撰写文章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并且发动哈尔滨通讯社的社员深入到各厂各团体采访。以笔做刀枪，为伸张社会正义和进步、反映劳动人民的声音鼓与呼。与电台合作，充分发挥媒体联合作用的哈尔滨通讯社，脱颖而出，独树一帜。据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委文件记载：“哈尔滨通讯社现已有了两个办公处，电话齐备，与无线电收发处合办。”<sup>⑤</sup>

哈尔滨通讯社不仅是宣传阵地，也是发展和建立党、团组织的据点。

1923年10月10日，为纪念辛亥革命12周年，哈尔滨通讯社召开了第一场座谈会。《滨江日报》曾作专文评论：“是日到会者，约有一百余。真靡想到，我们这个偏僻边陲，北塞草地的哈尔滨，竟有这么些爱国志士，同聚一堂讨论国事，宁不教人喜出望外，所经发的维国清议，莫不关于切肤之痛，甚至悲愤交加痛哭流涕，若非具有国家的观念，焉能如此之感叹呢？”<sup>⑥</sup>

当时哈尔滨的教育状况是外国人办的学校很多，而中国人的学校少得可怜，全市仅有两所，均是私立。为了改变这一非常落后的状况，陈、李二人克服重重困难在道里区中医街7号创办了哈尔滨青年学院。

1923年11月，哈尔滨青年学院创办后，吸引了很多青年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参加学习。学院把不识字的学员组成了扫盲班，识字者可以任选一门学科学习。陈、李二人亲自担任教师，一方面讲授语文，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一方面讲述国内外形势，宣传革命思想，启发青年的觉悟。在讲社会科学理论时，由浅入深地介绍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们讲的课通俗易懂、深入人心，来参加学习的青年人越来越多。

陈为人和李震瀛没有辜负中共北方区委的殷殷厚望，不辱使命，全身心地忘我投入工作。其间，北方区委又派来同志协助二人的工作，派来的同志写信给北京的邓中夏、刘仁静介绍二人的情况说：“他们每日工作至少有十五小时以上，都没有固定收入，困苦的程度有进无已。”他们身兼数职，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活动经费的极度匮乏令他们历尽艰辛。

在韩迭生 1964 年撰写的《忆陈为人同志》中写道：“生活极为简单，忍饥受冻在所难免。有一次我和陈为人、李震瀛光忙着翻译电讯稿竟忘了吃午饭。到了晚上，三人凑了三个铜板，买了三片面包充饥。吃完一片后，仍觉得饥肠辘辘，可是没钱了。有时就碍着脸到朋友家混点饭吃。夏天还好过点，到了冬季，日子更难熬了。他们二人要混入工厂办夜校发展组织，奔波于冰天雪地上，每天徒步二三十里，对于来自南方的他们，薄薄寒衣难以挡风，肚子里空空难挺身，又冷又饿，令人难受。”

那时的共产党人只要拥有了坚定的信仰，就会为之不停追寻，追寻生命中的那份忠诚。正如韩迭生在《忆陈为人同志》中所发出的感慨：“备尝艰苦，毫无倦容。”

1923 年 7 月，他们在进步青年中发展了汪洁曼（教员）、李铁钧（广益学校教员）、马新吾（三十六棚铁路工人）、陈毅可（滨江地方审判厅翻译）、刘天佑（东华学校教员）共 5 人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 年 10 月，陈为人和李震瀛秘密建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组。共有党团员 9 名，其中党员 3 名，团员 6 名。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常好礼解释说：“也有人说是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现在一般说法是中共哈尔滨组。为什么说是中共哈尔滨独立组呢，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他是直接归中央领导的，工作范围是中东铁路沿线，还有辽宁、吉林都是要负责的。”

1923 年底，由于遭受反动当局的通缉，陈为人和李震瀛离开了哈尔滨，他们精心创办的哈尔滨通讯社和哈尔滨青年学院也惨遭破坏，但他们在哈尔滨播撒的革命火种却深植于人民心中。野火烧不尽，春

风吹又生。

1925年，中共中央又将在苏俄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吴丽实调回国内，派往哈尔滨，从事党的领导工作，使哈尔滨的革命运动不断蓬勃开展。

1927年10月，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诞生地哈尔滨召开，陈为人再次来到哈尔滨并主持了大会。

根据党中央指示，东北地区最高党组织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在哈尔滨宣告成立，陈为人东北地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满洲临时省委书记。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哈尔滨作为红色之路重要的枢纽和驿站，作为马列主义传播的窗口和前沿阵地，铸就了史册上辉煌夺目的篇章。



东华学校校长邓洁民一家合影

## 第六章 领袖们信赖东华学校

## 一、周恩来帮助建东华

在哈尔滨道外区靖宇街和十九道街交界处，有一座百年老建筑，这里是当年东华学校校长邓洁民的旧居，楼的墙壁上挂着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立的标牌，上写：周恩来住过的旧址。浅灰色二层老楼，墙壁斑驳，看似寻常，但这里曾发生过不平凡的故事。

这里的居民，谈起久远的往事，很多人都会提到：周恩来曾住在这里。

---

<sup>110</sup>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太太说：“我是1952年来这里住的，快六十年了，早就听说周总理在这里住过。光听说，没见过呀。”另一位中年男士说：“听老人说，周恩来1917年和1920年来过两次，当时敲窗户，嘭嘭嘭敲三下，里面的校长就开门了——这是他们联络的暗号。”还有一位中年妇女说：“这里的邻居都说，我们这里是周总理曾经住过的地方，觉得挺荣幸的。”

可以说，哈尔滨东华学校的创办，也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和智慧，融汇着周恩来和邓洁民深厚的学友之情。

邓洁民出生于黑龙江省宾县，年幼时在家乡读私塾，学习俄文。由于刻苦用功学业精良，15岁时便被哈尔滨道台府聘任为俄文通事，获五品顶戴的官职。求学心切的邓洁民任职三年后，赴北京汇文学校读书，1912年又考入闻名全国的天津南开学校。这所学校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学术空气浓厚，教学作风民主，并以管理严格著称，让力求开阔视野、进取心很强的邓洁民受益匪浅。在他入学一年后，1913年周恩来也考入了南开学校。在课余活动中他们接触比较多，

时常在一起畅谈交流。邓洁民和周恩来由此成为了志趣相投、友谊深厚的朋友。

1904年，邓洁民参加留学公费考试被录取，南开学校开欢送会，邓洁民和周恩来紧紧握手，依依惜别。邓洁民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在那里，他和李大钊成为了法政系的同学，且同住一间宿舍，朝夕相处，亲如兄弟。在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中，两人同被推举为留日学生总会负责人。

1917年初，26岁的邓洁民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深感东北教育的落后和人才的匮乏，便决心从振兴教育入手，走教育救国之路。于是，他开始奔波联系，希望在哈尔滨筹办一所学校。

1917年夏，19岁的周恩来在赴日本留学前夕，先去辽宁铁岭看望三堂伯，然后到哈尔滨看望老同学邓洁民。

人海茫茫，能成为校友是缘分，千里迢迢专程来告别，更是真情难得。几年不见，在哈尔滨重逢，邓洁民喜出望外。他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在日本留学的情况以及日本的民风民俗和经济状况。凡是能供参考和借鉴的经验，邓洁民都逐一说出，接着又将准备在哈尔滨办学的设想和在筹办中遇到的困难对周恩来和盘托出，并表示很想听到周恩来的意见和建议。

周恩来充分肯定了邓洁民创办教育的设想，认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周恩来询问学校准备起什么名字，邓洁民意味深长地笑着说：“这名字和你有关呢。”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曾为同学题词留念：“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是邓洁民知道的。周恩来略思片刻，笑着说：“学校的名字是——”“东华！”两人几乎不约而同地说出学校的名字，如此默契让两位南开校友朗声大笑起来。周恩来频频点头说：“好，好啊，为中华东北部崛起！”邓洁民连连拍手说：“学校的名字正是此意，老同学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邓洁民设想的学校规模很大，从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甚至大学、研究院都包括在内。这样的综合学校需要巨额资金支持，师资的需求也很复杂，手续审批也颇为烦琐，因此邓洁民和几位同人

忙得不可开交，但进展却不大。

对于邓洁民急于求成的心情，周恩来是很理解的，但他还是冷静地劝告邓洁民：摊子不宜铺得过大，可以先仿效南开学校的模式办一所中学，办起来以后再慢慢完善。

两位风华正茂的青年推心置腹、促膝长谈，直至深夜仍意犹未尽。

被邓洁民称为“东华学校五君子”之一的霍占一，曾经和周恩来同班的同学王朴山都说：“翔宇（周恩来字）这个人真行，真有才气，他帮我们整理了一下，就大有起色。”

邓洁民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拟定先办中学，他得到了哈尔滨工商界的集资支持。为了筹办学校，邓洁民一家也省吃俭用，点滴积累。1918年的元宵节天寒地冻，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邓洁民提着糨糊桶，让女儿骑在自己的脖子上，拿着长刷，走了一条又一条的街道来张贴东华学校的招生广告。

1918年1月，报纸上刊出筹建东华学校的“缘起”，同年4月1日，由邓洁民担任校长的哈尔滨第一所私立中学——东华学校开学了。

邓洁民和周恩来共同拟定了东华学校的办学宗旨：培养社会中坚人才，兼重德智体三育，养成爱国精神，陶铸济世能力。

周恩来在赴日留学前，写下了那首抒发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看一看东华学校的办学宗旨，品一品周恩来东渡扶桑前望江兴叹的诗词，让人觉得字里行间有一种气韵在融会贯通，昭示着他努力的方向就是济世爱国。

如今在哈尔滨档案馆，可以查阅到当年东华学校成立的文件，在天津的周恩来纪念馆也收藏着同样的文件。

正如周恩来所期望的，东华学校是仿效南开办学的。南开学校的创立人是做过清朝的翰林院编修和学部左侍郎的国学大师严修，校长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南开素以治学严谨、教学风格民主进步、管理规范严格闻名于世。周恩来曾经说过：“我是爱南开的。”邓洁民的同人多数是南开的校友，因而共有一个情结：东华学校要以南开为楷

模。

东华学校既要求学生对待学业紧张严肃，又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学校的社团有青年会、爱国会、崇德会、演说会、辩论会、音乐会、东华季报社、新剧团等近二十个。所学课目中的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世界史、世界地理等都采用英文课本，并提倡学生用英语进行日常对话，这在当时哈尔滨的学校中是独树一帜的。

东华学校办学规模日益扩大。据史料记载，初创时校舍楼房 18 间，仅半年后，就又增租了校舍 39 间，不断增租校舍却仍然难以满足生源剧增的需求。

由于师资力量强、教学方法新、学校生活丰富多彩，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优秀，东华学校蜚声哈市，在整个东北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

1919 年 4 月，东华学校举行成立周年纪念会，滨江道尹和在哈校董都前来祝贺，充分肯定办学成绩，纷纷表示会继续鼎力支持。校董侯延爽撰文称赞：“东华生徒成绩叹未曾有，各教会来之观者，咸啧啧赞叹，谓形式精神南开外无与伦比。”

113

1920 年深秋，哈尔滨已开始飘雪，22 岁的周恩来在赴法国留学前夕，第二次来到哈尔滨向邓洁民辞行，同时也来看看他所牵挂和关注的东华学校办得怎么样了。他在邓洁民的家里住了两个星期。

邓洁民的二女儿邓爽在北京的家中谈及往事，记忆犹新。邓爽深情地说：“这些往事都是母亲生前讲述的。”她望着母亲的照片，望着全家的合影，讲起了很久以前的事情：“周恩来到我们家来过，当时哈尔滨抓过激党，周恩来的警惕性很高，跟我父亲定了暗号，在侧面的窗户敲三下，门就开了。周恩来见了我母亲就亲热地喊大嫂，问长问短，对人可亲啦。母亲总是调着样给他做吃的，他特别喜欢我母亲做的浇汁鱼，一边吃一边说好吃。他非常喜欢孩子，有时我父亲就让我姐姐唱歌跳舞，他边听边看，还有节奏地摆着头拍手助兴。他总是高高兴兴的，笑起来前仰后合。那时哈尔滨已是深秋，下雪了，周恩来一身学生装束，穿着长棉袍，围着围巾，脚上穿着一双擦得干干净净的皮鞋，十分精神。他和我父亲总有说不完的话，母亲记得，

他们曾谈起学校要照南开学校的样子办，还提到学生运动和革命的事情，这时我母亲就搬个小凳坐在门口放哨，因为当时哈尔滨是反过激党反赤化的……”

邓爽特意找出邓洁民在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大街与十九道街交界处临街二层楼住址的老照片，并指着一楼的铁门意味深长地说：“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左侧窗户就是周恩来和我父亲商定好的暗号，嘭嘭嘭敲三下的地方……”

当得知这座楼已被作为重要的文物保护时，邓爽很高兴。

楼依旧，故人非。可随着邓爽老人绘声绘色的讲述，这座老楼竟然变得鲜活和生动起来。

当年，周恩来第二次来到哈尔滨，当他看到倾注了自己心血的东华学校规模越来越大，办学成绩斐然，被哈尔滨人称为“第二个南开”时，他非常高兴。他看望了东华中学教师队伍中多位来自南开的老校友，其中包括于芳洲、张涤非、霍占一等人。周恩来同他们互致问候，畅叙校友情，并鼓励他们发扬南开精神，培育学生济世爱国的情怀。

应邓洁民校长的邀请，周恩来还在东华中学的大礼堂作了演讲。大礼堂内座无虚席，连走廊里都站满了学生。尽管到会者并不完全了解演讲人的经历，但是因他毕业于名校南开，又留学海外，且是五四运动的精英人物，而且还有着英俊儒雅的外表，所有的这些因素都让大家对演讲充满了期待。

22岁的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了演讲台，他激情洋溢地向东华学校广大师生讲述了五四运动的重要意义，介绍了北京和天津的运动情况以及在天津成立觉悟社的初衷。他还热情地赞誉了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说这场运动是指路明灯，并申明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观点。最后，他希望东华学校的学生们要为中华的崛起而刻苦读书，要立志做一个对社会进步发展有用的人才。

在邓洁民校长的引领下，学生们对文明进步的追求已是蔚然成风。五四运动爆发后，在邓洁民的带领下，东华学校的学生站在最前沿。他们上街游行示威，在学校演出新剧《越南亡国泪》，在公园向

市民演讲，要求政府力争主权，废除“二十一条”。学校还资助学生代表赴京津，参观学习学运的经验。

周恩来作为学生运动的领袖，著名的天津觉悟社的创办人，畅谈自身的所见所闻所感，引起了东华学校爱国学生们的强烈共鸣。对中国专制落后的现状感到忧虑甚至迷茫的师生们，被周恩来的演讲深深吸引了，他们对这场精彩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时已经走上革命征途的周恩来，正在寻找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他向邓洁民述说了很多自己对于国家前途和社会发展的想法，也希望东华学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能够成为一个革命运动的据点。

周恩来的一番话让邓洁民得到了新的启示。老友重逢，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披星伴月常至深夜。正如邓洁民的儿子丘琴在《周总理在我家》中所写：“我父亲邓洁民和周总理在客厅里关起门来交谈，谈话很热烈，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有时我母亲将晚饭重新热好，敲门后，给他们送进去……”

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在革命生涯中常留胡须，是美髯公的形象，那么他 1920 年来哈尔滨时是什么样的呢？丘琴当时已是六七岁，他记得很清楚：“有时我和姐姐也到客厅去，我姐表演唱歌跳舞，周恩来一面看一面拍手助兴。他穿一件棉袍，围着围巾，干干净净很精神，没有蓄须（在我父亲的朋友中，只有马骏是个大胡子），他在哈尔滨停留约两周。”

1920 年 11 月 7 日，周恩来由上海乘游船“波尔多斯”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到达巴黎后，周恩来就给在万里之遥的老同学邓洁民寄来一张报平安的明信片，上面用铅笔写道：

洁民兄：

× 月 × 日抵巴黎，醒吾兄来接我。

恭贺新年。

问伯母大人嫂夫人好。

弟周恩来

× 月 × 日

东华学校没有辜负周恩来的厚望，这里不仅成为了培养社会中坚人才的摇篮，也成为了革命的据点和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基地。

邓洁民敬仰列宁，非常关注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新变化，他和十月革命前后曾经多次走中东铁路赴苏联留学考察并且把《俄国共产党党纲》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张西曼也成为了好朋友。张西曼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列主义者之一，作为湖南长沙人，他最早的传播阵地却不是他的家乡，也不是北京、天津和上海，而是哈尔滨东华学校的讲台。

为辛亥革命做出突出贡献的老同盟会会员张西曼，以社会名流的身份鼎力支持邓洁民办学，被邓洁民称为支持创办东华学校的五君子之一。邓洁民还将张西曼聘请为东华学校的俄文教师，并请他为学生们讲述他的红色之行的所闻所感。

张西曼教授的女儿张小曼颇有感触地说：“我父亲张西曼在东华学校期间进行俄语教学，他用切身经历讲述十月革命给苏俄带来的巨大变化，宣读他用中文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他把该校努力创办成一个革命的据点，把哈尔滨作为他从俄罗斯归国后，第一个传播马列主义的城市。”

邓洁民还通过张西曼的介绍，聘请了另一位俄文教师，他就是毕业于北京俄文专修馆，并且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张绍德。

张绍德在东华学校不仅是深受学生欢迎、德才兼备的俄文教师，也是邓洁民校长的得力助手。

1920年10月瞿秋白等赴苏联采访，1921年1月张太雷去苏俄共产国际联络工作，1922年初罗章龙到哈尔滨考察工人运动，都得到了张绍德热心诚恳的帮助。

邓洁民创办的东华学校，吸引了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来校任教，他们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组织革命活动。这一处革命据点，被哈尔滨市党史专家张福山在他所发表的《传播马列的重要基地东华学校》一文中称为“为哈尔滨建党前传播马列主义发挥重要作用，为哈尔滨建立党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3年10月，陈为人和李震瀛在哈尔滨秘密建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中共哈尔滨组，其中两名成员张昭德和刘天佑

就是来自东华学校的教师。

## 二、马骏在东华

东华学校校长邓洁民在天津南开学校结识了周恩来，并且与他成为了莫逆之交，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又与同班同宿舍的李大钊情如兄弟，周恩来和李大钊都是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代伟人，他们的思想境界和博大胸怀，对邓洁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本来就追求文明进步的邓洁民不仅成为了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也成为了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于是，东华学校也成为了革命者的红色驿站。

1920年8月，马骏从天津来哈尔滨找到邓洁民，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南开学校的校友。马骏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和领导者之一，中国革命的先驱人物，第一批入党的回族党员。

马骏烈士的孙子马为平，谈到东华学校，心存感激地说：“邓校长和我祖父很好，邓校长特意将校长办公室隔断，外间办公，里间让我祖父住。当时祖父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被反动当局逮捕，他出狱不久就到了哈尔滨，他的身份是有危险的，邓校长却不在乎惹麻烦、受牵连，尽全力掩护和照顾他。祖父在东华学校住了很长时间，大约有半年。”

马骏的家乡是黑龙江省宁安县。1915年，20岁的马骏从吉林省第一中学考入了天津南开学校。在校期间，他结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后来成为了亲密战友。

个头约有一米八零，身材挺拔、相貌英俊的马骏，堪称是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喜欢体育的他率领篮球队在学校间的比赛中屡屡获奖，吹笛子、弹月琴、拉二胡，韵味十足，他还能创作剧本演出话剧，文笔出众的他还时常在校刊《校风》中发表作品。例如他写的寓言诗《他们为什么不去》：“这是什么时候？暮春天气。这是什么所在？是运动场亦是游戏地。遍地的桃花、梨花、芍药花一望无际；灿烂的阳光映得鲜明有趣……好一幅优雅鲜明，天然的丹青，美丽无

匹……”<sup>⑦</sup>马骏的演讲能力也是一流的，他的语言非常幽默，常常是自己不笑，而同学们却已经忍俊不禁，大笑起来。马为平说：“我祖父会好几种外语，我祖母说他睡觉时说梦话都是一连串的外语。”

规模恢宏的南开学校，临街的主楼大气厚重，楼房的上端镌刻的四个大字“南开学校”凸起醒目，透着沧桑遒劲的风骨。整座楼呈紫铜色，西洋简约的立体造型，又蕴含了古朴凝重的中国特色。该校的创立人是清朝晚期的国学大儒严修，校长是曾长期在美国名校留学、系统接受了西方先进教育模式的张伯苓。严修身着长袍马褂，校长张伯苓西装革履，看上去截然不同的两人却合作默契，这让南开的校风也中西合璧。学校既要求学生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肩须平、背须直，不傲不暴不怠，又要求学生活泼、张扬个性。几十个社团和学社的活动，让学生的思维多元化。南开学校堪称是中西合璧、融会贯通的典范。

天津人都知道，南开学校走出了两位共和国的总理，一位是开国总理周恩来，另一位是温家宝。

偌大的老校区，既有月牙形的拱门通道和古香古色的九曲长廊，也有错落有致欧式的高大建筑。其外墙都是用石头堆砌，异常坚固，内有图书馆、大礼堂等。

在一排排学生宿舍前的绿茵草地上，间隔地放置着一些木长椅。拂去岁月厚厚的灰尘，仿佛依稀看到当年先后入校的邓洁民、周恩来和马骏的身影。他们这些长年住校的学友，在宿舍前后散步交谈，为了追寻理想和抱负，为了中华民族能够在内忧外患中崛起和振兴，坐在木长椅上，侃侃而谈、畅所欲言。

宽敞的大礼堂剧场，是当年同学们聚会、活动的场所。这里面的舞台座椅等设施都保留了当年的原貌。剧场墙壁上悬挂着一张巨幅的剧照，内容是为了纪念南开学校成立 14 周年上演的话剧《新村正》，上面标明左起第三人扮演村夫的是马骏，右起第一人为周恩来。这是一出反映农民抗争剥削、匡扶正义的新剧，演出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这里仿佛可以看到大幕徐徐开启，周恩来和马骏同台演出的话剧《新村正》正在精彩上演，也仿佛能听到台下那潮涌般的掌声和喝彩声不断地响起。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全国政协主席、当年天津觉悟社的重要成员邓颖超重返南开学校时，就是站在大礼堂剧场的舞台上演讲的。马骏的孙子马为平特意录了音。邓颖超回忆天津的反帝爱国运动时高度评价了马骏的表现。邓颖超说：

马骏在学生运动中，非常了不起，他一登高，一呼百应啊！南开校长张伯苓的话没用，马骏一号召罢课，全校就罢课起来。

当年南开学生马骏是学生中的翘楚人物，在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中，更是一位叱咤风云的领袖。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准备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将山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的行为，马骏满腔义愤、怒不可遏。

1919 年五四运动时期，24 岁的马骏当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6 月 10 日，天津商界宣布罢市，11 日在亲日分子的鼓噪下，天津商会突然宣布开市。为了说服商会坚持罢市，马骏出面痛斥当局出卖国家主权的罪恶行径，说到丧失主权的惨痛，马骏头撞商会议事厅的立柱，血溅商号。马骏这种为了救国不惜牺牲生命的举动，震惊了天津商界，推动他们继续坚持了罢市。

6 月 16 日，在北京和天津学联的倡议下，中华全国学联总会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天津选派马骏、刘清扬为代表参加大会。大会后数千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马骏被推选为总指挥。

上海的租界，历来是外国人享有特权的世外桃源，中国人到此游行，是不可想象的。马骏却敢为人先，率领数千人的游行队伍通过了上海租界地，并在日本领事馆门前带头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帝爱国！”“绝不允许出卖国家主权，还我河山！”面对突如其来的游行队伍，听到学生们震耳欲聋的口号，猝不及防的洋人们目

瞪口呆，他们在租界地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势和场面。

马骏率领的游行队伍通过上海租界地，创历史先河，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8月23日，京津学生联合总会派代表两次到总统府请愿，却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

马骏闻讯后，率领京、津、鲁、唐山和烟台等地五千多学生到北京举行学生请愿大示威，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请愿学生代表。反动军阀进行了残酷镇压，并当场逮捕了马骏，要他宣布解散学生队伍，马骏高呼：“学生爱国无罪！”并严词拒绝。

这次斗争的消息传开后，全国震惊，抗议书雪片般飞向北京，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反动当局被迫于8月30日释放了马骏等请愿学生代表。

马骏表现出的浩然正气和英勇气概，令同学们十分钦佩。

周恩来亲自赴北京接马骏出狱。回到天津后，周恩来和南开校友聚餐庆祝斗争胜利。

---

120

为了进一步宣传、组织、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马骏协助周恩来创办了天津觉悟社。

同为觉悟社成员的邓颖超，在晚年时曾撰写文章评价马骏：“在五四运动一开始和整个运动的过程中，他始终站在最前列，是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人。他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性格豪爽，工作干练，认真负责。在当时，他奔走呼号，勇于斗争，他擅长讲演，语言简明有力……他积极参加实际斗争，不怕反动者的迫害，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英勇的革命精神。”<sup>38</sup>

经过五四运动革命风暴的洗礼，马骏日益成熟，他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1920年，马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骏来到哈尔滨是他第二次被捕出狱后不久，邓洁民校长对这位南开的校友，给予了细心的保护和照顾。

校友之间情深意重，马骏积极帮助邓洁民的教育事业，并为他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二人常常在校长办公室里交流如何提升东华学校

的教学质量，如何从内涵上更加全面地仿效天津南开的办学模式，使东华学校更上一层楼。其间，马骏还应邓洁民的邀请向师生演讲，介绍和宣传五四运动，激励学生反帝爱国的革命精神。

当时东华学校也有不少的女学生，在邓洁民校长的倡导下，她们解除了裹脚布，也不扎耳朵眼，追寻着时代的文明脚步。毕竟那个年代封建意识还很重，女子无才便是德，地处边陲的哈尔滨男尊女卑的思想比较浓厚。马骏热心地宣传男女平等的新思想，号召东华学校的女学生要勇于摆脱封建意识的羁绊，争做新时代的新女性。他还提出建议，鼓励女学生大胆登台演讲，在东华学校搞一场男女同学同台的演讲比赛。马骏还亲自为邓洁民的妻妹李淑懿拟写了题为《妇女解放与社会之关系》的演讲稿。

这时的马骏已将关注的焦点转向社会的底层。他觉得应该让革命的火种在工人和农民中生根发芽。他冒着风雪不辞艰辛地深入到三十六棚工人区了解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到偏远的农村去走访进行革命宣传。马骏的孙子马为平说：“听我祖母讲，我祖父在哈尔滨下乡去宣传，条件差，坐牛车，道路坎坷泥泞，有一次牛车翻了，我祖父被碾在车轮底下，一车的粮食袋子都砸在他的身上。”

不论走多远、怎样地艰辛，酷爱音乐的马骏总要带上他心爱的乐器，月琴和笛子几乎总是与马骏形影相伴。马骏在第一次被捕后就留起了胡须，邓洁民称他为“美髯公”，也有时戏称他“大胡子”。在邓洁民的家中，孩子们最盼望能够见到胡子叔叔，因为听马骏演奏乐器是孩子们最惬意的事情。

1922年2月，已成为共产党员的马骏又来到哈尔滨，依然住在东华学校。此时哈尔滨各界群众正在掀起反对华盛顿会议的斗争，因为在这次会议上，美、英、法、日等国提出国际共管中东铁路问题。马骏通过邓洁民的关系结识了进步青年韩迭声，他向韩迭声介绍了北京和天津地区组织救国十人团，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经验，这使韩迭声深受启发和鼓舞。在马骏的引导和支持下，韩迭声等人发起和组织了“哈尔滨救国唤醒团”，让哈尔滨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蓬勃兴起。

之后，马骏回到家乡宁安县，其间领导群众开展了反对当地劣绅

与日本人合谋修筑宁海铁路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在家乡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建立了党小组，接着又到吉林毓文中学，以教员的身份宣传马列主义，秘密发展学生党员和团员。

1925年秋天，受党组织委派，30岁的马骏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马骏的孙子马为平说：“我的祖父马骏很早就向往红色苏俄，能够到十月革命的故乡去留学，他非常高兴。他和我祖母告别的时候，叮嘱我祖母要多保重，把孩子照顾好。临走时，他还给儿子弹奏了一段非常好听的月琴曲子，将儿子抱起来亲了又亲。我父亲一生都很难忘这个温暖的情景。我祖父马骏在上海集中，坐火车到哈尔滨停留几天办理护照，然后走中东铁路从绥芬河出境去往莫斯科。”

1927年，马骏回国后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担负起北京市委重建的工作。正当他竭尽全力将遭受破坏的北京市委逐步恢复起来的时候，因叛徒告密，1927年12月3日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受尽折磨，威武不屈。敌人许以厚禄，他说：“叫我不宣传马列主义，不搞革命，这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难！”1928年2月15日，年仅33岁的马骏英勇就义。

碧血染京城，精神永长存。

在北京日坛公园内绿树丛中有1987年重修的马骏墓，碑文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亲笔题写。透过马骏英姿勃勃的铜像，人们能感受到这位回族烈士特殊的风采。

烈士的家乡没有忘记英雄马骏，在黑龙江省宁安市有一条用英雄名字命名的“马骏街”，在马骏街的正中位置矗立的是马骏烈士纪念馆。

在这个纪念馆和北京日坛公园的马骏烈士纪念馆里，都能看到一张同样的照片，是周恩来总理抱着一个孩子的合影，这不禁引人注意，这个孩子是谁呢？

原来马骏烈士的另一个孙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副总编辑马为公就是那张照片中的孩子，他讲述了照片背后的故事。

“1958年12月的一天，马骏的家属应邀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做客。

我当时只有4岁，周总理让我叫他爷爷，我说我的爷爷已经牺牲了，我奶奶还带我看了我爷爷的墓。周总理抱起我说：‘你爷爷为革命牺牲了，但是你还有爷爷，我就是你爷爷。’于是从那时以后，我就称周总理为爷爷，称邓颖超为奶奶……”

马骏的亲属说：“周总理对过去的老同事老战友始终不忘，解放后，周总理曾对南开的老同学说：‘邓洁民帮助过我们，为早期的共产党人做了很多掩护工作，有机会帮我找一找邓洁民的家属。’”

马骏的儿子、曾任宁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马德钟受周总理之托，曾努力寻访过邓洁民家属的下落。马德钟于1988年12月6日寄给邓洁民大女儿邓育英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

育英大姐，您好：

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您的地址未果，甚憾！……老大姐，多年来深知邓伯伯与我父亲不仅是同学、好友，而且是战友。我父亲进行革命活动时，多蒙邓伯伯的支持与合作。我们是世交了，很早就想见面，畅叙先人之情。周总理生前曾多次谈到“东华”和邓伯伯的情况，给予邓老高度评价。……

北京日坛公园马骏烈士纪念馆中，马骏的照片和遗物，月琴、二胡和笛子安静地躺着，抚琴的人早已远去，琴声也不再回响。但是仍可以说，马骏当年奏响的琴声正是构筑了“中国好声音”的序曲或前奏呢？

马骏烈士纪念馆中陈列的邓洁民和东华学校的照片，那封信件及周总理的评价，都让人对这所学校曾发生的故事肃然起敬。

### 三、张太雷落脚东华

当年，邓洁民校长还接待过另一位党的早期领导人——张太雷。

对于这件往事，邓洁民的二女儿邓爽对此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张太雷到东华学校，是李大钊介绍的。我父亲和李大钊的关系是不

一般的，后来我大姐到北京考师范，要有介绍人，李大钊马上出面说，我来做介绍人。当时张太雷来了就住在校长办公室，因为之前马骏来的时候，我父亲就曾安排马骏住校长办公室。校长办公室被隔断一分为二，这样做既安全又方便。张太雷在校长办公室的里面，白天不出去，夜里工作。”

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法律系的高才生张太雷年轻有为，具有远大的抱负和韬略。他是五四运动的先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是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重要成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马林来北京见李大钊，都是由张太雷做翻译的。

1921年初，张太雷带着李大钊的亲笔信来到东华学校。

此行，张太雷是受李大钊的指派到苏俄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他成为了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1921年6月，张太雷受党的委托，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正在筹备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向大会作报告，介绍中国共产党即将诞生的准备情况和未来的设想。张太雷是中共党出现在共产国际会议上的第一位使者，是少数见过列宁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能够将肩负重大神圣使命的张太雷，介绍给哈尔滨东华学校校长邓洁民，对邓洁民是何等的信任啊。

邓洁民并不了解张太雷此行赴苏联的使命，因为这毕竟是党内的机密。邓洁民和北京的李大钊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他知道老同学李大钊正忙于拯救中国命运的大事，他隐约感觉到李大钊亲笔写介绍信，说明张太雷此行是不寻常的。当时哈尔滨受到东北军阀反过激党和反赤化的影响，形势很紧张。

为了规避风险，邓洁民叮嘱张太雷白天尽量少出去活动。他还特意安排他所信任和器重的曾经也参加过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青年俄文教师张昭德，前去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办理张太雷出国的一切手续，并委托张昭德要尽力照顾张太雷的日常安全。

邓洁民视23岁的张太雷为弟弟，关爱有加。正值寒冬，冰封雪裹，邓洁民生怕老家在南方的张太雷初来滴水成冰的东北患上伤风感

冒，他将炉火烧得更旺，还特意从家中取来了厚厚的棉被。因为张太雷要连夜赶写一些材料，邓洁民便吩咐学校的厨师增加了可口的夜餐。

邓洁民还为张太雷购买了火车票，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亲自护送张太雷登上哈尔滨开往满洲里的中东铁路火车，直到火车在轰隆隆的发动机声中渐渐远去，才转身离开了站台。

1921年至1924年，张太雷曾六次远赴苏联，每次都是来到哈尔滨走中东铁路出境，在哈尔滨停留期间，几乎都是住在东华学校。

在江苏省常州市由邓小平亲笔题写馆名的“张太雷烈士纪念馆”里，看到了张太雷留给爱妻的书信，其中一封用毛笔书写的信长达数千字，殷殷叮嘱，情意绵长。

牵挂家乡冬天的阴冷，身在莫斯科的张太雷为体弱的母亲悉心挑选了厚厚的毛毡，千里万里带回来。这裹挟着浓浓孝心，来自遥远的异国他乡的毛毡，静静地躺在展柜里，不由令人感叹革命者拥有的强烈孝心。

在张太雷烈士纪念馆中，还看到了哈尔滨东华学校旧址的照片。遥想当年，冰雪严寒暗夜笼罩的邓洁民办公室的那一束闪烁的灯光，折射着怎样的人间大爱，又传递着怎样的豪情啊！

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张太雷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为给予了最有力的回击，使得被白色恐怖笼罩、乌云翻滚的中国看到一道灿烂的曙光。正在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担任广州起义总指挥的张太雷在乘车返回指挥部的途中遭敌伏击，身中三枪后，张太雷咬紧牙关拼命还击，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牺牲时，张太雷年仅29岁。他是我党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张太雷以他卓越的才华、高昂的热情和年轻的生命，奉献于中国革命事业，显示出革命者坚定的信念。

张太雷牺牲的消息传到江苏省常州，张太雷的妻子悲恸欲绝，常常是泪水沾湿了枕头。当年迈的婆婆询问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儿子的消息时，她担心体弱的婆婆经受不住痛失爱子的刺激，只好强忍泪

水笑着对婆婆说：“张太雷出国了，又到苏联去开会了。”

张太雷的母亲睡觉的时候，盖着儿子从很远的苏联带回的毛毡，心里牵挂着万里之遥的儿子的冷暖和安危。

老人拄着拐杖，时常在街口远远地望着，盼望着儿子早早地归来。此时，张太雷的妻子就会劝慰婆婆。不知真相，依然在街口苦苦等待的老人，怎会料想到，在凄风苦雨的中国，作为救国救民革命领导人的儿子张太雷已经牺牲，永远做不到忠孝两全了。

# 蓮志兒：

任弼时一九四六年写给大女儿任远志的信

你前函来信及次均收到。我們曾  
寄佈一信，<sup>附</sup>棉衣一盒，你是否收到。  
叔瑞華阿姨說你患宮腫病，不  
知圓已經好了一半。也念，特着即  
昌和和來看。你，望詳細回信  
告我們。

遠志不要原

你妹妹今年有抑上二年級，但絕  
不要因為許多功课已經學過就

## 一、风雨陈独秀

陈独秀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同中东铁路也有着不解之缘。

陈独秀的故乡在安徽省安庆市，周边的景色颇为迷人，远处的丘陵绵延起伏，月山的湖泊波澜壮阔，铺彩叠翠的龙山让人心旷神怡。

哈尔滨已是雪花飘洒的季节，即使不下雪，满街的树木叶子落尽后也只剩枯黄色的枝干了。可是这里的南方景致，依然是绿色一片。夹杂在草地中缤纷的野花，衬着疏密有致古朴的村舍建筑，一切都氤氲在蒙蒙的雨水中，宛如蘸着浓墨描绘出的田园风景画。

安庆位于长江的沿岸，曾经是安徽省的首府所在。

沿江耸立的著名的地标性建筑——古老的振风塔雄风犹存，塔身周边悬空的古铜色的塔铃，在风中摇曳，发出飒飒的响声，塔下的迎江寺香火缭绕。

放眼望去，浩瀚的长江水气势非凡，令人情不自禁想起歌唱家杨洪基演唱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曲的歌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依傍大气磅礴的长江而建立的这座古城，伴着滚滚长江的涛声，从这里走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陈独秀，此地称得上是人杰地灵。

陈独秀的孙女，安庆市政协常委陈长璞，为收集整理爷爷陈独秀及陈延年和陈乔年二位伯父的史料、文物做了很多工作，是一个这方面的专家。

陈长璞的父亲是陈松年，和著名的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是胞兄弟。陈松年于1990年病逝，终年80岁。陈松年曾长期和陈独秀生活在一起，也经常向陈长璞讲述往事，一来二去，陈长璞对爷爷陈独秀的历史萌发了浓厚的兴趣。

陈长璞坦诚地讲述了许多往事。

她说爷爷陈独秀的晚年生活是窘迫凄凉的。1942年5月27日晚，陈独秀怀着满腹的惆怅，带着未圆的梦想，因病在四川省江津县与世长辞，享年64岁。

几年后，为了实现陈独秀魂归故里的遗愿，陈松年决定将父亲的灵柩从江津迁回安庆，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47年2月，当时抗战虽然胜利，但内战又起，运灵柩不容易。江津安徽人多，他们非常敬重陈独秀，热心地帮助我联系到一条小木船。办完手续后，要在灵柩上刻上名字，写上地址和接收人，但父亲的灵柩上不敢刻‘陈独秀’三个字，怕在途中惹出麻烦，只好刻上先父赶考时用的名字‘陈乾生’，这名字很多人不知道……”<sup>⑨</sup>

悠悠的江水，载不动许多怨。或许，陈独秀的命运注定了与江水结缘。他出生长江边的安庆，病故于长江边的江津，不敢用真名刻写的灵柩，也在颠簸跌宕的大江上漂泊。

陈独秀的灵柩运抵安庆后，葬于北郊火龙山陈氏祖坟地，也未举行什么仪式，还是用“陈乾生”立碑，隐其原名。每年清明，陈松年都要带着家人前去扫墓。

陈长璞说：“‘文革’十年，我们不敢去扫墓，怕暴露目标，被造反派挖掉。有一年父亲坐立不安，忍不住思念和牵挂，执意要去扫墓。我陪着父亲东躲西藏生怕被造反派跟踪，偷偷来到墓地，看到的是野草丛生破乱不堪的景象，墓碑也不见了，我父亲浑身颤抖，流出了眼泪。我跪在了爷爷的坟墓前，心里特别酸楚，实在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文革”后，极左路线一去不复返了，陈独秀的墓地发生了变化。陈松年在回忆文章中曾写道：“为便于今后寻找墓地，我在一棵树上划去一块树皮作为标记，哪知第二次去墓地时，树却被砍伐了，

我这才意识到重修墓地和立碑的必要了。但由于我经济拮据，不得不给安徽省和中央负责同志写信，要求资助经费修先父之墓。1979年先父诞辰100周年时，安徽省政府拨款，安庆市政府于1980年重修土墓，并以我的名义重立了青石碑。1982年，再次扩修，并被列为安庆市文物保护单位。”<sup>④0</sup>

位于火龙山的陈独秀墓园，此后不断得到修缮，也立起了陈独秀的铜像，可是铜像却常常落满了厚厚的一层白灰。原来为了经济效益，火龙山经常开山放炮进行开采，山脚下的水泥厂常冒着烟尘。

前些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来到安庆，在拜谒陈独秀墓园时当即指示说：“立即停止火龙山的开采，保护好陈独秀墓园和周边的自然环境。”从此火龙山再也听不到开山放炮声，也没有了溅起的白灰和烟尘。

四面环山绿荫遮盖的陈独秀墓园和墓园左侧的陈独秀纪念馆毗邻而建。

上下两层楼的陈独秀纪念馆，其规模颇为壮观，带有明显的徽派特点，并糅合现代气息。历史资料、图片、文物等在馆中也相当丰富。其中在一楼展厅很大的一面墙上，醒目地题写着毛泽东在1945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陈独秀的评价：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惊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人受到陈独秀和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陈独秀集合起来的，这才成立了党。

纪念馆外，山峦碧绿。陈长璞说：“眼前的火龙山就是我们陈家的祖坟地，几十年的时间这里都很荒凉，由于那个年代对爷爷陈独秀

很有争议，只谈过不谈功，爷爷成了没人敢凭吊的孤魂野鬼，一段时间连家人都不敢扫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恢复了历史的真相和原貌，爷爷在历史中特有的重大贡献和革命者的形象，得以在中国人民心中重新树立起来。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墓园不断拓宽修缮，已累计重修了六次，还打通了通往此地的乡间公路，扩建了纪念馆，同时来此地参观拜谒的人络绎不绝，越来越多。”

墓园前的广场上，首先是一组栩栩如生、反映五四运动和旗手陈独秀辉煌业绩的群体雕像。前方约百米的地方建有一座汉白玉牌坊，正中写着“独秀园”三个大字，两边写着陈独秀一生追求的理想：民主与科学。

陈独秀的雕像巍然挺立着，他左手撑着腰，右手握紧杂志，目光炯炯，透出别样独特的风采。

铜像后矗立着陈独秀一生最伟大的杰作之一——《新青年》杂志雕塑。那是20世纪初的雷电，那是一曲长江大河湍流如啸的时代主旋律，在魂归故里的几十年后，成为他人生最闪耀的历史见证。

再往后面，就是陈独秀的墓。墓冢高四米，直径七米，半球形的墓顶，两层平台墓基，平台四周有雕石栏杆。黑色的大理石碑有两米多高，上面刻着“陈独秀之墓”几个大字。墓葬的两侧，各排列32株挺拔的杉树，喻示着陈独秀走过的64个春秋。5棵龙柏松，则代表他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和委员会执行委员长。

清朝晚期，在科举考试中，陈独秀在家庭逼迫下不情愿地用了“陈乾生”的名字赶考，结果他考取了安庆第一名秀才。1911年，陈独秀担任了安徽省军政府秘书长。

陈独秀不图安逸，更不想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为了寻求新思想，陈独秀曾三次远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他创办了《安徽俗话报》，为的是开拓民智，张扬反帝反封建的意识，此报被蔡元培称为“字字挟严霜”，很快成为全国的大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久陈独秀便遭到当局的陷害被捕入狱。

1913年，陈独秀出狱后，流亡到了上海。从此，陈独秀离别了安庆，生前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上海横空出世。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提出青年应是：

1. 应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2. 应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3. 应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4. 应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5. 应是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6. 应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对青年的六点希望或者说是要求，一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是铿锵有声。一百年前，在闭关锁国、专制落后、封建意识浓厚的中国，陈独秀“敬告青年”的呼声如黄钟大吕般震撼了中国青年的心灵，使许多困惑迷茫的青年，开始在振聋发聩的呼声中反思人生的何去何从。

《新青年》杂志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赢得了知识界的尊重和好评，受到了全国各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许多人爱不释手。陈独秀逐渐成为青年人精神的偶像，《新青年》成为了点亮黑暗世界的一盏明灯。

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知道陈独秀在北京出差，便满京城地寻找他，想聘请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这不止缘于陈独秀办杂志在青年中的影响和威望，而是在学界陈独秀的文学造诣也堪称大家，是和章太炎比肩的人物。陈独秀却拒绝了蔡元培的聘请，他说：

“教书影响一批学生，办报刊可以影响全国人。”蔡元培坚持不放弃，第二天早晨就赶到陈独秀所住的小旅店，发现陈独秀还在睡觉，就搬了一个小板凳在小旅店门前等候。后来，蔡元培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被传为佳话。

陈独秀终于接受了蔡元培校长的聘请，同时将《新青年》杂志迁

来北京。

1917年，上任不久的陈独秀便和他的朋友——北大教授胡适共同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坚决主张摆脱几千年形成的古板的文言文的束缚，反对繁文缛节的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陈独秀被称为“新文化的元勋”和“中国青年人心中的启明星”。

1919年5月3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得到一个重要消息，北京政府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订条约出卖山东。蔡元培认为眼下最要紧的是让国民知道真相，他立刻想到了陈独秀和他创办不到半年的《每周评论》。《每周评论》创刊不到半年就已成为全国性的大报纸，在北京的发行量就达到5万多份，蔡元培深知这个数字的分量。

陈独秀大清早便在北京东城区箭杆胡同的家中迎来了行色匆匆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救国心切的蔡元培将刚得到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告知陈独秀。

一天后，《每周评论》迅速刊出陈独秀的大作《两个和会都无用》。文章中号召全国人民如果想要得到真正的幸福和自由，“都站出来直接解决吧”。这篇文章发表的日子正是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19年5月4日。

5月4日上午，陈独秀在文章中号召国民“都站出来直接解决吧”，当天下午这句话就成为了现实。北京的大学生上街游行，振臂高呼：“坚决反对出卖主权，还我山东！”“反帝爱国，还我河山！”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5月4日下午，北京高校的大学生越聚越多，其中一些愤怒的学生甚至闯进了北京政府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的家中，把主张签订条约的曹汝霖的住宅放火燃烧，付之一炬。但代价是32名学生被捕入狱，其中20多人来自北京大学。

当天晚上，北大学生在北大礼堂商量如何营救被捕的同学，北大校长蔡元培向学生们保证，三天之内将同学们营救出来。果然三天后32名学生全部出狱，而随后的结果是蔡元培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并黯然离开了北京。

在五四运动中颜面尽失的北京政府暗自欢喜，他们认为蔡元培离

开北京后，学潮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但他们忽略了另一个人，也正是这个人将已趋缓和的学潮掀起更大的波澜。

蔡元培为救学生出狱辞职离京，有人劝陈独秀到上海去避祸，但陈独秀的答复是：这个恶浊腐朽的社会，我不愿与它共存，我倒是希望当局把我抓了把我杀了。

从5月4日到6月8日，在三十几天内，陈独秀以每期发表十篇文章的密度，通过《每周评论》向全国人民通告北京所发生的一切，导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反帝的学生运动，各地声援北京学潮的呼声也此起彼伏。

尽管反动当局又一次抓捕了许多游行示威的学生，可是学潮方兴未艾。

陈独秀和李大钊商量要发动北京市民，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帝救国群众运动。6月11日，陈独秀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上火线。当天晚上，他带着刚刚印刷好的由他本人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径直来到了当时最为热闹的新世界商场，40岁的北大著名教授陈独秀爬上商场的最高楼，奋力将印有《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撒向了人群。正在他一次又一次抛撒传单的时候，不幸被捕了。

陈独秀被捕一事很快成了全国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全国各大团体社会名人纷纷致函北洋政府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孙中山专门约见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要求释放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奔走呼号，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大声疾呼：“我祝陈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说：“陈独秀是提倡近代思想最力者，其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崇高品质赢得人们的普遍赞誉。”

三个月后，在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高潮迭起的形势下，在强烈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北京政府不仅拒签了巴黎和约，并且免除了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官职，陈独秀最终也被无罪释放。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虽然陈独秀在被捕事件当中名声大噪，但他发现北京城再也容不下他了。

1920年2月14日，陈独秀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由北大图

书馆主任兼教授李大钊亲自护送出城。他们假扮成下乡讨债的商人，雇了一辆骡车，一路驱车，一路交流。这两位都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中国思想界的领袖，运筹帷幄，审时度势，相约南北呼应，组织建党。

走出城门很远的地方，两位亲密的战友握手告别。此时远处山峰上面的天空已涌起绚丽的晚霞，残阳如血。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专家沈建中说：“毛主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从北京被迫到了上海，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准备建党，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在陈独秀的发起下，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方共产党组织，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建党伟业上尤其有重要贡献。”这是对陈独秀历史功绩的准确评价。

史料中记载，1922年，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曾远赴苏联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当时瞿秋白担任了陈独秀的翻译。

在满洲里中俄两国交界线附近，矗立着一块硕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红色之路纪念碑”的字样，碑文中记载了一些往返于红色之路的著名共产党人的名字，其中陈独秀的名字醒目地排在前列。

陈长璞的父亲陈松年曾经听陈独秀讲过这段往事，陈长璞说：“听父亲说，我爷爷在1922年夏季从上海辗转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停留了几天，至于住在什么地方已记不清了，爷爷是在哈尔滨办完出国手续后，从哈尔滨坐火车走中东铁路远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大约是1922年年底，爷爷从莫斯科回国，也是走的中东铁路，在哈尔滨停留后回到上海。”

让人感到有些意外和惊喜的是，在时间和路线的节点上，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也步父亲的后尘接踵而至，真是应了那句话，“上阵父子兵”。

陈长璞接着说：“爷爷刚刚回到上海，很巧合，1923年初，大伯陈延年、二伯陈乔年，也来到哈尔滨落脚。几天后，也是从哈尔滨坐火车走中东铁路赴苏联莫斯科到东方大学留学。”

同一座城市，同一条铁路，相继留下陈独秀父子三人的足迹和身影，称得上是红色传奇。

陈独秀从中共一大至中共五大，连续五届当选党中央总书记，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陈延年、陈乔年和父亲陈独秀父子三人同时当选为党中央委员，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作为政治家、革命家和国学大师的陈独秀刚正不阿，个性鲜明，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国救民的奋斗中，从没有儿女情长，一些宣传夸大了他的这种形象。陈长璞说：“社会上或资料上反映我爷爷是一个非常严厉的长者，没有一点亲情，其实不是这样。他对子女要求严厉，是想让他们学会做人。但是呢，在生活方面，他就是一个仁厚的长者。”

其实作为孩子的父亲，陈独秀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同时他也和普通的父亲一样，在平凡中渗透着一颗爱子之心。在孩子们的人生旅途中，无论风有多疾，雨有多骤，作为父亲的陈独秀都会为他们撑起一片晴空。

早在 1915 年，陈独秀结束了在日本的流亡生活，回到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这正是他非常忙碌的时候，但牵挂孩子的他还是挤出时间把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从安庆老家接到上海求学。

在学业上，陈独秀再忙也要关心孩子的学习。可是在做人方面，陈独秀坚守着一个原则：人要有独立的人格。这也是他一生的理念，他觉得自强不息的信念才是撑起独立人格的脊梁。

初到上海，延年和弟弟乔年与父亲同住在法租界吉益里 21 号。后来，兄弟俩搬到上海四马路亚东图书馆的《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的地板上。当时和陈独秀在一起生活的高君曼是延年和乔年的小姨，坚持要让孩子们住在家里，为此多次与陈独秀争吵，陈独秀不以为然。他说：“生活艰苦一些未尝不好，自古雄才多磨难，纨绔子弟少伟男。”

由于陈独秀所给的学费和生活费不多，延年和乔年兄弟俩放学以后就到外面去工作，和工人一起劳动。吃的是粗面饼干，喝的是自来水，冬天穿着夹衣，夏天从来不打伞。由于经常劳作，风吹日晒，兄弟两人显得很憔悴。很多人都觉得心疼，甚至埋怨陈独秀也太狠心了。可是陈独秀却说，他们的前途，由他们自己来开创。

但陈延年和陈乔年一直都在父亲的视线内。兄弟俩一旦有谁生病，第一时间到场的就是陈独秀。他会将兄弟俩接回家中，亲自照料，给儿子端水服药，静静地陪伴在儿子的床边，关心孩子的小姨高君曼也会调着样给孩子做一些可口的饭菜。

兄弟俩在上海一边求学一边工作，他们不靠父亲的光环，也不依赖父亲的社会关系为自己铺路搭桥，在感受着父亲外冷内热别样的挚爱时，他们永远忘不了父亲的教诲和厚望。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和品格，也造就着他们“自创前程”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

1917年，兄弟俩以优异的成绩双双考入上海法租界著名的震旦大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青春年少却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的兄弟俩，双双参加了上海的大学生游行活动。

当陈独秀在北京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捕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有人问兄弟俩：“你们有无恐怖？”兄弟俩几乎异口同声慷慨激昂地回答：“既做不怕，怕则不做！”

如果一般的孩子听到自己的父亲突然被捕入狱的消息，一定会感到恐怖，慌作一团忐忑不安。可陈独秀的儿子不只是和父亲血脉相连，父亲的气节，父亲的铮铮铁骨以及临危不惧的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了传承。

1920年1月，在陈独秀的大力支持下，兄弟二人在黄浦江畔登上了一艘开往法国的邮船，开启了在巴黎勤工俭学的岁月。其间，兄弟二人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蔡畅等成为了同学和战友。

1922年，陈延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和旅法同学赵世炎、周恩来共同当选为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

1923年初，陈延年和陈乔年受组织委派来到哈尔滨走中东铁路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陈延年在学习中为了弄清一些重要问题，常常与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与平时的他判若两人。同学们问他为何如此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同学们对于他的这种精神十分钦佩，便送给他一个“小列宁”的雅号。<sup>⑪</sup>

1924年七八月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陈延年和陈乔年及部分同志离开莫斯科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

从小在一起读私塾，离开故乡到上海打拼相依为命，读大学在一起，漂洋过海留学法国在一起，走中东铁路赴莫斯科留学在一起，一直同甘共苦几乎形影不离的兄弟俩，回国后，从此各奔东西，分别肩负起领导革命的重任。

1924年10月，陈延年被派往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驻粤特派员，和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周恩来一起住在东山恤孤院路的一幢楼上。

1925年春，周恩来参加第一次东征，中共中央任命陈延年为广东区委书记，接替周恩来主持区委工作。<sup>②</sup>在此期间，陈延年参加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4月任江浙区委书记。

1927年4月27日，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延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6月初江浙区委撤销，26日江苏省委成立，陈延年被中央任命为江苏省委书记。就在江苏省委成立的当天下午，陈延年因交通员叛变被捕。

1927年7月4日晚，国民党反动军警将陈延年押赴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他昂首挺胸，视死如归。敌人喝令他跪下，他巍然屹立，毫不理会。几个敌人强把他按下去，但敌人刚一松手，他就一跃而起。敌人恼羞成怒，再一次将他强按在地，以乱刀残忍地砍死。壮烈牺牲的陈延年当时年仅29岁。

陈乔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共委员，并在会后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冬，陈乔年奉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监狱中，敌人对陈乔年施尽酷刑，他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狱中同志见他受了重刑，十分难受，他却淡淡地说：“受了几下鞭子，算个啥。”牺牲前，监狱中的战友为他即将被害十分难过。陈乔年却仍然乐观地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枫林桥畔被敌人枪杀，牺牲时年仅26岁。

陈松年曾在晚年的回忆中说道：“那年，我17岁，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噩耗传来，犹如晴天霹雳，祖母和母亲都哭得晕了过去。当时哥哥延年的后事，是我和姐姐玉莹处理的。当我们从安庆赶到上海时，国民党当局不但不让我们收尸，连看都不让看一眼。我和姐姐只好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算是了却了母亲的心愿。

“第二年，二哥乔年又在上海被害，后事又是我和姐姐玉莹经办的。当时国民党当局仍然不让家属收尸。当我们看到倒在血泊中的乔年那种惨状，心中的痛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姐姐玉莹受了强烈刺激，精神失常，一病不起，不久随二哥而去，年仅28岁……”

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可是正遭受国民党通缉的陈独秀连送都不能送，这是怎样的悲痛和无奈啊。

陈独秀强忍接连痛失爱子的悲伤，没有哽咽和泪水，表情甚至很木然。高君曼为两个亲外甥连续遇害难受不已，经常掉眼泪，她要摆设灵堂烧纸焚香，并大哭说要为延年、乔年兄弟俩招魂，陈独秀只说了两个字：迂腐。对此，陈独秀成了很多人眼中不近人情的怪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侵占东北，陈独秀支持抗战，强烈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

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将拒不抗日的蒋介石扣押在西安，消息传来，仍在狱中的陈独秀托人找酒买菜。他对狱友说：“我平时滴酒不沾，今日我要为国仇家恨痛饮一杯。”第一杯酒，他祭奠了革命烈士；端起第二杯酒，他的手有些颤抖，他望着南京老虎桥监狱窗外在冷风中旋起的落叶，呜咽地说：“延年啊，乔年啊，为父为你俩酌此一杯。”说罢，57岁的陈独秀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所谓大悲无声，大爱无形，或许只有陈独秀这样经历的人，才能真正品评这八个字的个中滋味吧。

1937年7月发生“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兴起，陈独秀终于获释出狱。

1938年，陈独秀在儿子陈松年夫妇的陪伴下来到四川省江津县紧

贴长江边的乡村寓居。

从小生长在长江岸边安庆的陈独秀喜欢在这个也是长江岸边的幽静乡村生活。一生叱咤风云命运多舛的陈独秀开始寻求隐居的环境，这样可以静下心来钻研国学。

陈独秀连任五届党的最高领袖。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很多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惨遭蒋介石的血腥屠杀，尽管历史错综复杂，但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也是难辞其咎的。依照陈独秀的性格，他没有承认错误。1927年7月，陈独秀辞去总书记职务，8月被中共中央解除总书记职务，1929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一生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始终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即使在政治失意命运跌入低谷的逆境，他对人格独立的坚守也毫不动摇。

陈松年在江津中学任教，工资很微薄，又要抚养一家人，对父亲陈独秀的资助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尤其是看到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自己又拿不出更多的钱为父亲购买好一些的药品时，无奈无助又非常有孝心的陈松年甚至会躲到墙角无人处，默默地流泪。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北京大学等许多高校也迁往四川。

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穷困潦倒的消息，让很多友人为之心忧。

陈独秀寓居江津的老宅，房间里一床一桌一柜，空空荡荡，地面竟是泥地。如此寒酸的陋室，此时却常迎来一拨拨贵客，包括傅斯年、胡适、段锡鹏、周佛海、包惠僧等老友和学生。

国民政府的上层要人陈立夫也前来探望，就连戴笠和胡宗南等国民党的红人也不期而至。

戴、胡二人请陈独秀针对时局讲一些话，他们认为陈独秀被中共开除了党籍，肯定对共产党有意见，在讲话中就会涉及这些，可以利用这些做文章。当时在场的高语罕后来回忆，陈独秀用一种缓慢的语气说道：“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以至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胡、戴二人听罢悻悻离去，据说他们携带的现金最终也没敢拿出来。

可以说，凭着陈独秀的社会威望和影响，他不应在钱的问题上出

现困难。恰恰是陈独秀有自己的原则和气节，他不会轻易地接受人家的馈赠，更不会为改变生活的艰难而出卖自己。

毛泽东对陈独秀的人格和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早在1919年就给予了很高的赞许。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对陈独秀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陈独秀一生真正做到了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他在悲惨与凄凉中演绎了人格的完美和崇高。

陈独秀在江津乡村度过的人生最后岁月里，尽管生活已经到了吃上顿愁下顿的困境，又是疾病缠身，他却在昏暗的油灯旁，抱病坚持撰写了《小学识字教本》《连语编汇》《古音阴阳互用例表》等十余种关于文字学、声韵学的著作。这位曾与章太炎比肩的国学大师，当年的北大文科学长用超常的智慧和心血所撰写的专著，其特有的价值，中国当下的文字学和声韵学的专家学者仍十分折服和赞叹。

人到晚年，在凄苦的生活中，陈独秀流露出更多的儿女情长。陈松年本想在执教的江津中学租校舍将父亲接来同住，却因为手中的钱不够房租的费用，而不能如愿，于是便尽可能带上家人常回江津乡村和父亲团聚。陈独秀也很乐意享受这种天伦之乐。

陈长璞说：“我姐姐陈长玮当时不到两岁，我爷爷陈独秀看到我姐姐，他马上就从妈妈怀里面把姐姐抢过去，然后一家伙竖起来就放在自己的肩膀上让她骑着。我父亲很孝顺，有时在江津县城买点点心饼干送给爷爷，爷爷有时都不舍得吃，留给我姐姐吃。”

思念犹如一根扯不断的丝线，当岁月的银梭牵着它一点一点编织成牵挂的时候，陈独秀竟然一天甚过一天思念起牺牲的两个儿子来。

陈松年的工资除了家用，既要照料父亲陈独秀还要给安庆的祖母寄钱，因此他在江津第九中学的工作也是不敢耽搁的。一天他刚从父亲陈独秀的寓居赶回学校，就有人来告知他父亲陈独秀病重了，陈松年听后，大脑里顿时一片空白。他昨天去看望父亲时还觉得他的病情无大碍，他痛恨自己没有足够的财力让父亲得到最好的治疗。他赶忙打开抽屉，拿了两块银圆，跟着送信的人疾步往外走，碰到一个穿长衫的老师，连忙让他帮助请个假，说自己父亲病重了。

陈松年火急火燎地赶到鹤山坪石墙院，陈独秀已完全不省人事，

只有微弱的呼吸。

夜深人静，山野中的风吹着响亮的哨子从房顶上越过，室内的煤油灯忽明忽暗闪烁着，那暗淡的灯光没有一点生气，似乎风稍微大一点，就有可能将它吹灭。

此时，陈松年的母亲、陈独秀的结发妻子高晓岚，还有陈松年的小姨高君曼都已先后因病离世。高君曼去世后，有一位比陈独秀小很多的上海女工潘兰珍爱上了陈独秀，陈独秀在南京监狱五年，潘兰珍尽全力照顾他。来到江津乡村，她对陈独秀精心照料，共度风雨，再苦再难，不离不弃，她对陈独秀的人格和博学充满着敬重。陈松年对潘兰珍也非常尊重，直呼为母亲，让孩子叫她奶奶。

屋子里静悄悄的，潘兰珍倚靠在床边，陈松年坐在桌子旁，他们焦虑地看着陈独秀那憔悴衰老的面容，期盼着他尽早醒过来。

到了后半夜，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叮叮当当地敲打着屋顶的瓦片。昏迷数小时的陈独秀，也许是被雨声敲醒了，也许是得到了上天的感应，从昏迷中醒过来，第一句话是：“松年，松年来了吗？”

“我在这儿。”陈松年一把握住父亲的手，眼眶里溢着泪水说，“爹，您说，我听着。”

陈独秀费力地张开嘴说：“年儿，我要走了，阎王招我了，让我去……”

斜靠在床边的潘兰珍为了让屋子更亮些，赶忙拨了拨灯芯，将油灯往床前移了移，以便父子俩看得更真切。昏暗的灯光下，陈独秀那死灰一般的脸，竟然有了一点血色，他嘴唇瑟瑟发抖好一阵，终于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

“我……我就要走了……延年、乔年先我而去，他们可都是父亲的希望，却都被国民党杀害了，我与蒋不共戴天，他杀害了许多人，杀了大钊、秋白……为父一生追求民主、科学、自由，未能如愿……心不甘矣……打败日本人后，你把为父带回安庆，那是我最终可以安息的地方……你的两个哥哥延年、乔年……要立个灵位吧。”

陈独秀几乎拼尽所有的气力，发出了微弱的一声长叹，再无声息。

夜色如墨，沙沙的雨声与屋子里发出的哭声交织在一起。

这一天，是 1942 年 5 月 27 日的夜晚，陈独秀带着许多未了的心愿和遗憾与世长辞，终年 64 岁。

在他弥留之际，他含泪念着陈延年和陈乔年的名字，也怀念着生养他的那片热土，遥远的已离开了近三十载的故乡安庆。

## 二、壮哉李大钊

1942 年 5 月 27 日，陈独秀在弥留之际，还提起了李大钊的名字，可见李大钊在陈独秀心中的分量有多重。此时李大钊已离世 15 载，陈独秀仍然记挂在心至死都不能忘，足以说明这份战友情已是刻骨铭心。

李大钊和陈独秀于 1913 年相识于日本东京。当时两位青年才俊都积极为章士钊在日本主办的《甲寅》杂志撰稿，表达忧国忧民的情怀。二人慷慨陈词，犀利的观点有时竟然不约而同惊人地相似，这让章士钊慨叹：“两文同出一辙呀。”

在《甲寅》编辑部，二人初次见面，34 岁的陈独秀和 24 岁的李大钊两个人都是 10 月出生，而且都是幼年丧父。少年时失去父爱的孤独寂寞，造就了二人相似的性格。两个人谈话很投合，虽然陈独秀比李大钊年长 10 岁，可是陈独秀充满活力、刚直不阿、胸怀大志的情怀，给李大钊留下很深的印象。陈独秀询问李大钊在日本哪个学校留学，梳着平头的李大钊回答是在早稻田大学，陈独秀对李大钊说：

“我们是校友。”尽管不在同一个年级上学，毕竟同在一个学校学习生活，于是两位校友，围绕着早稻田大学留学的话题又谈了很多。

李大钊于 1916 年回国，1918 年初被蔡元培校长聘请到北京大学，担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兼教授，和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教授成为了同事。

1919 年 5 月在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李大钊既是支持者也是领导者之一。5 月 4 日下午，北大和其他高校的大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游行，李大钊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当游行队伍走到北洋政府国务院门前时，只见铁门内架着的机关枪，虎视眈眈地对着学生队伍，走在队伍前面的李大钊气愤之下突然跑出队伍冲了上去，北

大教授赵尔康等人一看不妙，紧紧地把他拖住。

第二天陈独秀来到李大钊的办公室兴奋地说：“听同事说，你昨天要冲进国务院？”陈独秀昨天没有上街游行，他在写带有火药味的文章。

听了陈独秀的话，李大钊憨厚地笑了笑说：“我想他们还不至于敢开枪。”陈独秀又感叹道：“实在看不出来，你平时话不多，关键时刻可真勇敢，英雄气魄。”李大钊又笑笑说：“你不是在文章中号召说要‘直接解决’吗？”

两位战友会心地大声笑了起来。几年来他们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就是期待着中国如五四运动这般觉醒。

6月11日，陈独秀带着油墨未干的《北京市民宣言书》亲上火线，来到城南顾客密集的新世界商场的最高处散发传单，被警察逮捕。在陈独秀被捕的同时，李大钊也带了两个人到城南游艺厅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书》。听说陈独秀被捕，李大钊心急如焚，如何把战友救出来成为他心中第一件大事。在营救陈独秀出狱的行动中，参与者非常多，四处奔波的李大钊是最心急也是最尽力的。

稍后，李大钊也受到了当局的通缉，在危难的时刻，他还牵挂着陈独秀，他叮嘱北大的学生要多关心陈太太，并托人捎信给自己的夫人赵纫兰，说陈家的生活需要帮助。赵纫兰得到消息后，特意买了新鲜的青菜，并把家里的鸡蛋和粮食给陈太太一起送过去，安慰她不要焦急，要照顾好孩子。

陈独秀出狱后，曾感慨地说：“守常（李大钊字守常）为人，无微不至。”

陈独秀表面上被宣布为无罪释放，实际上是北京政府在社会舆论压力下不得已而做的表面文章，陈独秀还是北京政府通缉名单上的第一人。李大钊得知信息后，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京城，建议陈独秀去上海。一路上送战友踏征程，推心置腹畅谈未来的设想，两位中国思想界的领袖达成一致。

李大钊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

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也是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龚育之生前说：“在李大钊之前，也有人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但只是介绍有这样一种学说，这样一种观点，这样一种主义，没有主观上的评价，没有自己的观点，就是这种介绍也是零零散散的。而李大钊是站在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系统而又全面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他比别人都早，比别人都说得清楚，他是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爱不释手深入研究的李大钊，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作为五四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非常关注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思想来引领学生运动。1919年7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重要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受到陈独秀的认同和赞誉。同年9月李大钊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深切地表达了学生运动要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心声。

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在图书馆增加了大量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当时的北大教师梁思成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李大钊是我至熟的故交，通常都称呼他守常先生。我到北京大学讲课，在上课之前我去图书馆，因为很熟，他忙他的事，我进门或离去均不打招呼。有时他给我一些马列的书，又忙他的事情了……”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不仅忙于理论宣传，同时他也开始注重组织的发展，他亲自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会，并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会。当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刚刚25岁，而李大钊也只有29岁。

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回忆道：“正是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受李大钊的影响，使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思想越来越激进，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9月16日，天津觉悟社成立，李大钊应邀去天津演讲，他对周恩来等人发起成立的觉悟社非常赞许，向他们推荐《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刊物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9月26日，李大钊又受觉悟社的邀请到天津维斯礼堂演讲，分析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落后国家的实质，阐述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途径。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等人的发起下，北京大学秘密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有邓中夏、张太雷、罗章龙、蔡和森、高君宇、刘仁静、张国焘等，后来，瞿秋白也参加进来。

1920年8月16日，在李大钊的支持下，以周恩来为首的天津觉悟社来到北京，邀请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四个团体的代表共二十多人，在北京陶然亭召开茶话会，商讨今后救国运动方向问题。周恩来代表觉悟社倡议与会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青年精英，聚集一堂，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为了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崛起振兴而展开热烈讨论，畅所欲言。

李大钊到会发表讲话，他提出各团体须标明主义，并鼓励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说：“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正是李大钊须标明主义的主张，使周恩来更坚定了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去“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的决心，他开始为赴欧洲求学抓紧准备。

在古香古色的北京陶然亭的青年五团体的聚会上，倾听了李大钊重要讲话的在座二十多位与会者中，走出了两位后来拯救和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1920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和史学两系教授的李大钊，还应邀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广州大学等多地的高校演讲。他的一系列演讲与论述，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李大钊既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名教授，又是引导青年走上革命征途的良师益友，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当时北大学生进行了一个民间测验，测验的题目是你在中国和世界最崇拜的人是谁。在几乎是所有的学生答卷中，李大钊的名字是和列宁、孙中山的名字并列的。

李大钊对革命者和他的学生，生活上乐于慷慨解囊雪中送炭，在北京大学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夫人赵纫兰也是深受其影响。在朋友和同志们的眼中，李夫人是一个一身旧式服装，缠过足，身材纤弱，面容端庄，平淡无奇的旧式妇女。时间长了，大家发现她在接人待物上既有大家的胸襟风范，又有平民的朴实坦诚。她把丈夫的同志、朋友视为手足，对来到和住到家中的同志、朋友、革命青年，尽其所能

关心他们的冷暖。五四以后，陈独秀被捕，她不止一次地带着礼物去看望陈夫人，热心地安慰陈夫人。以后，陈独秀、陈乔年、张太雷夫妇、赵世炎、肖三、查良钊（金庸之兄）等都到过或住过李家。这些革命者和朋友大多一无所有，或者生活处于困境，她把他们视为家人，照顾他们吃饭、住宿。在她头上没有“教授夫人”的光环，但是，她比那个时代的教授夫人更受到人们的尊敬。有一次一位被派到外地工作的青年来她家辞行，她见他衣衫单薄，就把刚给儿子葆华做好的棉袍送给他，青年坚辞不过，只好含泪收下。

北京大学中一些生活困窘的学生如刘仁静、蔡和森、高君宇等人，时常得到李大钊的接济，李大钊还将工资的一大半都用做革命活动的经费。本来教授的薪水还是不菲的，但李大钊每次发工资后很快就所剩无几，一家人的生活几乎难以维系。得知情况后，北大校长蔡元培不得已通知财务部门，在李大钊开工资时，留下部分工资直接交给李夫人。

当年北京大学的主楼，是一幢临街气势宏大的红色墙壁的楼房，这里就是当年遐迩闻名的北大图书馆和北大办公楼所在地，这里就是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在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时，北大学生游行队伍就是在这里集结在这里走出去的。

尽管岁月已磨蚀了这里往日的辉煌，在周边高耸的现代建筑群中，它已没有过去独一无二的雄伟，可是时间的长河冲淡不了历史的记忆，人们仍然习惯地叫它北大红楼。

北大红楼一楼的东边，就是当年图书馆主任的办公室，这里的一切还照原样摆放，外间是会客室，里间是李大钊的办公室。

如今这里庄重静谧，当年这里却高朋满座，热闹异常，像磁场一样富有吸引力。因北大校长蔡元培倡导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因而北京大学吸纳了当时中国学界许多泰斗级的人物。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主任一职，一改以往北大图书馆作为藏书楼的模式，引进了大批当时国外的先进思想和理论学说书籍，使北大图书馆成为了解世界的窗口。李大钊被美国图书杂志誉为中国图书馆之父。同时李大钊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作为中国思想界的领袖人物，强烈地吸引了许多同人和学生聚集在他的身旁。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北大的名流陈独秀、胡适、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都是李大钊会客室的常客。他们都直呼李大钊的字号——守常或守常先生。

现在已听不到北大红楼的走廊里纷至沓来的脚步声，也听不到会客室里当年学生们激扬铿锵的言辞、教授们学富五车的渊博宏论。但是在这里，睹物思人，还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搏。

李大钊就是用手中的笔拨动了时代的旋律，用他的思想谱写了时代的乐章。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文章中说：“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大家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那时常去北大红楼的张国焘还回忆道：“那里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集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那间会客室是社会主义和激进人物荟集所在，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会，很是认真，……1920年时，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浓厚起来。……”

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李大钊，建党后担任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中共北方区委的秘密机关就设在北京大学的校内。

1921年7月，李大钊创办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工人周刊》，启发工人觉悟，号召各地成立工会组织，并在刊物上大量介绍国内外劳工消息。《工人周刊》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成为北京最受欢迎的刊物。在李大钊的引领下，中共北方区委在长辛店等地开办了补习学校，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训工人运动的骨干。

李大钊亲自领导了北方工人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仅1922年，罢工的浪潮接二连三风起云涌。8月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10月唐山铁路工厂和唐山五矿联合罢工的人数超过3万人，12月正太路石家庄机

器厂又开始了工人大罢工。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形成了北方工人运动的高潮，显示了在党的领导下，北方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都在不断地提高。

在开展如火如荼的工农群众运动的同时，李大钊还积极派遣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到北方的许多省份，深入播撒革命火种，筹备建立各地的党团组织，使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燃遍北方大地的燎原之势。

李大钊还是党的统一战线的主要决策者和卓越的实践者。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李大钊是大会主席团五个成员之一，他同孙中山一起主持了大会，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共青团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使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全国逐渐形成。

孙中山对李大钊精辟的见解和非凡的才能十分欣赏。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在回忆时说：“中山先生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sup>⑬</sup>

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李大钊的名声越来越大，风云人物李大钊，引起了反动统治者的极端仇视。1924年5月下旬，李大钊被北洋军阀反动政府通缉，不得不暂时躲避到家乡昌黎五峰山。

为了避开敌人的盯梢和跟踪，李大钊在离开北京西城石驸马胡同35号的住宅时，剃掉了胡须，打扮成商人，装上账册，摘掉眼镜，与儿子葆华带了两个轻便的包袱，乘上晚间的京奉路火车直去五峰山。

当晚，北洋政府的警察总监派军警闯到李大钊在西城石驸马胡同35号的家里抓人，扑了空，胡乱搜查一番，扫兴而去。

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看着被军警野蛮搜查后显得凌乱不堪的房间，她由刚才应付搜查的故作镇静，变得忐忑不安，她的心被一缕缕地揪紧。她牵挂着丈夫和儿子，此时他们身在何处，是否安全地登上了去往昌黎五峰山的火车，军警会不会跟踪他们，他们能躲过此劫吗？

望着窗外冷月清光，赵纫兰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丈夫当年东渡扶桑赴日本留学与自己分别三年整，五四运动中险

遭被捕，建党后，多次远离家门在外面奔波，每每分开，都是担心挂念和她做伴。这一次丈夫遭受通缉化装出走，如果稍微走晚些，就会被敌人真的抓走了。

想到这里，她有些心烦意乱。她觉得这一夜是那样黑暗恐怖，又是那样漫长。她恨不得立即动身赶火车去老家五峰山，唯有看见丈夫儿子平安，内心才会安静下来。望着身边受了惊吓后才入睡的孩子，想到丈夫临走前“不要为我焦虑，一定要照顾好孩子”的嘱托，赵纫兰禁不住有些泪湿眼角。

在度日如年的忧虑和苦苦的盼望中，一个星期后，葆华回到了母亲身边。他告诉母亲，在五峰山避难时，父亲接到了组织上派来的交通员给他的通知，党中央决定派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去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父亲化装离开五峰山来到了北京，和其他几位代表集合后，已秘密地登上了中东铁路火车。为了让母亲放心，葆华是亲眼看到这一切后回到家中报信的，葆华还带回了父亲的信件。

听了儿子的讲述后，赵纫兰感到如释重负，她欣慰地看着丈夫的信，信中写道：“……种种的无耻迫害是吓不倒我的，反动派凶恶狰狞的面目只会激起我的愤恨，增强我的斗志。”“以后我再也没有时间顾及家庭了，你要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要振作精神抚养教育好子女……”

丈夫走了，她已经习惯了离别。站在宽阔庭院的海棠树下，在如筛的阳光照耀中，望着夏季茂盛的透着红色的绿叶，一扫心中的阴霾，赵纫兰的脸上现出了几年以来难得的笑容，她在心中祝福丈夫和他的同志一路平安。

1924年6月初，中共代表团悄然登上了北京开往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火车，踏上了中东铁路。与李大钊同行的五位代表是：工人领袖、中央委员王荷波，工人代表姚作民，妇女代表刘清扬，青年代表彭湘、卜士奇。罗章龙也是代表之一，但是后去的。

在硬座客车上，李大钊和五位代表坐在同一车厢中，却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这是为避免发生意外互相牵连。

坐在一个角落的刘清扬在中国妇女界可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她在

五四期间是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她曾和马骏等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赴北京请愿，她还是天津觉悟社的重要成员，也是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1921年她和丈夫张申府在法国留学期间，共同成为了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sup>⑭</sup>

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杰，在火车上装扮成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头上还戴着假发髻，一副谨言慎行的农家女子做派。前几天她从上海到天津给母亲过生日时，邓颖超特意过来看望她，帮她做出国前的准备工作。邓颖超还将自己紫红色的毛衣借给了她，并将所有证件缝在毛衣下摆的一个角上。

每次到站停车或新上来乘客，甚至火车响起“呜呜呜”的鸣叫声，刘清扬表面上是若无其事的样子，内心却很紧张。她悄悄地提醒自己要镇静。她身上藏着中共代表团所有成员的证件，一发动全身，一旦证件被敌人发现，所有的代表都无法出国，而且还将遭遇危险和不测。

所幸一路都很顺利，他们平安到达了哈尔滨。

此时，李大钊的好友东华学校校长邓洁民已迁往北京，李大钊带着一位青年代表投奔他的堂兄李祥年，其他四位代表则住进了一个苏联人开办的小旅馆。

李祥年当时在哈尔滨道外八站与人合资开了一家宏昌远牛店。考虑到李大钊的安全，李祥年安排李大钊住在王芳田在道外太古街开设的宏昌茂杂货店里。王芳田与李祥年是商界的好友磕头兄弟，为人忠厚，老实可靠。

当时，李大钊身穿灰色旧西服，头戴一顶八角帽，脚穿一双旧皮鞋，没有一点来自北京名校教授的架子。受好友之托加之对李大钊人品的好感，王芳田对北京来的李大钊非常关心，在生活上给予了热情周到的照顾。

白天李大钊外出办事，到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会晤朋友，到工人中考察工运，了解哈尔滨建立党组织后开展革命斗争的相关情况。晚间李大钊和王芳田、李祥年亲切交谈，谈到了国内外的形势变化，也谈到了苏联的新变化。

当时的哈尔滨人对红色苏俄是很向往的，多数人对十月革命的故乡都是很敬仰的。宏昌茂杂货店做的是小生意，但当王芳田听说李大钊要到苏联去，便和李祥年等人为李大钊提供了经济上的资助。

那时中共北方区委经费十分紧张，代表团去苏俄的资金还未筹齐。况且李大钊又在被通缉中，他几乎没有时间和自由去筹款，因而李祥年、王芳田等人的资助等于是雪中送炭。

李大钊唯一在世的儿子李光华，依然记得哈尔滨人曾为李大钊提供资助的往事。他说：“我们家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得到好心人的帮助是不能忘的。我听哥哥姐姐讲，我父亲曾几次提到哈尔滨人对他的帮助。父亲到苏联开会是住在道外一个叫宏昌茂的商号里，老板王芳田和我父亲非亲非故，不但热情接待，保护了我父亲的安全，还给了资金上的帮助，李祥年也给了路费和生活费用，听说还有别人的帮助，我父亲很感动，曾说过哈尔滨人很有热情和觉悟。”

当时李大钊在哈尔滨通过组织关系找到了共产国际驻哈尔滨办事处，共产国际驻哈尔滨办事处派出交通员负责护送代表团在满洲里出境。

这次出国，因李大钊还在被通缉中，就不可能在哈尔滨办理出国手续。没有护照，就必须想办法绕过军阀张作霖设在边境上的检查站。

李大钊在哈尔滨住了三天，做了必要的准备后，李祥年陪同交通员全程护送李大钊和五位代表，从哈尔滨坐火车走中东铁路到了边境小城满洲里。

李祥年为代表们换了一些卢布，还为他们准备了一些路上要用的必需品。

在交通员的安排下，李大钊一行住进了一家小旅馆。这时，交通员引来了干练的老板，并介绍说：“自己人。”李大钊紧紧握住店主的手。店老板直率地说：“你们六位同志，起码要坐三辆马车，每辆车连车夫在内不能超过三个人。每辆马车一定要用四匹马拉，这样才能安全地偷越国境。”“怎么需要这么多的马来拉呢？”李大钊惊奇地问。“少了不行。”店主人说，“偷越国境的时候车子一定要跑得快，马多车轻才能跑得快啊！而且要选择膘满肉肥的好马。”

这时，店老板又详细地向李大钊介绍了国境线一带的情况。在越境必经的中苏两国分界处中国一侧有一个光秃秃的山坡，没有一点隐蔽的地方。山头上设有碉堡，不分昼夜有士兵放哨，一旦发现有人偷越国境，哨兵就开枪射击，有时还派出马队追击，所以绝对不能疏忽大意。闯越国境的马车必须要轻便，能一口气闯过山坡。

翌日凌晨，天色还黝黑的时候，交通员已把雇来的三辆马车停在旅店的门前，李大钊和妇女代表刘清扬坐在前面一辆马车上。

天将蒙蒙亮时，12匹快马拉着三辆马车赶到国境线。有经验的马车夫把马车赶进两个碉堡中间的一条草原小路上，扬鞭催马飞快地向国境线冲去。马蹄声惊动了哨兵，顿时，碉堡里传出来高高的吆喝声和密集的枪声。猝然间，枪声、鞭声、马蹄声相融相织汇成一片，震撼着黎明前的国境线。赶车人轻车熟路非常灵敏地左躲右闪避开了纷飞的弹雨，三辆马车终于有惊无险地闯过了国境线。

李大钊从车篷里出来，举目远眺东方冉冉升起的火红的朝阳，绚丽的朝霞辉映着碧绿的草原，他吸了一口散发着野花香味的新鲜空气，不禁慨叹：“终于踏上了自由的土地，到达列宁的故乡了。”

到了苏联控制的85号小站后，李大钊一行被安排在铁路车站站长家，受到了热情款待。站长夫人忙着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站长为他们端茶送饭，这天晚上他们就睡在站长夫妇的卧室里。

李大钊一行乘坐西伯利亚火车经长途跋涉抵达莫斯科后，刘清扬从毛衣下摆中取出白绫绸做的代表证明，上面用鲜红的字写明六位代表的姓名。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举行。这次会议有来自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参加，是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1日，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发言。他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维护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和明确态度，并向共产国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工人运动的状况。

中央电视台从俄罗斯档案馆引进的资料片中可以看到90年前李大

钊出席共产国际五大会议讲话时的历史真实镜头，这些历史影像弥足珍贵。

共产国际五大是在古典俄式建筑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气势恢宏的莫斯科大剧院的剧场既典雅又宽敞，偌大的剧场内汇集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楼上楼下座无虚席。只见站在主席台上的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 35 岁的李大钊戴着金丝眼镜，身着灰色的中山装，梳着整齐的短发，留着浅浅的胡须，神采奕奕、充满活力。讲到要点时还不时地挥舞着拳头，充满了自信和激情。尽管历史的影像没有声音只有画面，但是给人的印象李大钊很大气颇有风度，让人会想到那句话，腹有诗书气自华。李大钊侃侃而谈不温不火，显而易见他非常擅长演讲，他的话语一定是在哲理中透着真诚，在深刻中融入生动，其形象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和坚定的革命家完美的融合。

影像没有声音，不知道他在当时讲了什么，但可以断定，他的讲话真的是激动人心，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画面中出现鼓掌的场面时间很长，足有一分多钟，楼上楼下的人们都从座位上站起来鼓掌。用掌声雷动、掌声如潮、此起彼伏形容半点都不过分，而且从局部特写镜头可以看到不同国度的代表的表情十分振奋，欢呼拍手。这足以显示李大钊的讲话是讲到人们的心里去了，人们听到了最想听到的话。

虽然这段历史影像没有声音，却无声胜有声。党的领袖在国际舞台上的风采和精彩，的确令人折服和感动。

李大钊在参加共产国际五大后，多次应邀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讲学，还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访问考察。

早在 1917 年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就接连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等重要文章，告诉青年、告诉人民苏俄所发生巨大变化，他说：“要翘首看那里面所展示出来人类新的曙光，同时要倾听那里面传出的人类自由的新声音。”

如今，李大钊踏上了他早已向往的这片神圣的热土，感受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和快乐。

李大钊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苏联停留了近半年的时

间，我们可以想象这近半年的时间，应该是李大钊人生中既难忘而又非常幸福的一段时光。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中国北方革命形势急剧好转。11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李大钊怀着“回到战场上去”的革命激情启程回国。

李大钊回国的路线仍然是由满洲里入境走中东铁路来到哈尔滨。到哈尔滨后还是投奔李祥年、王芳田，他又第二次住进了道外太古街宏昌茂杂货店里。

王芳田依然是盛情款待李大钊，其间，王芳田向李大钊询问了苏联的情况。李大钊兴奋地说：“好，好极了，那里的工农群众当家做了主人，中国革命非走俄国人的道路不可。”李大钊向王芳田详细介绍了在苏联的所见所闻。这次李大钊在哈尔滨也是停留了三天。

临行时，李大钊赠给李祥年一对苏联工艺品——木制茄子，赠给王芳田六七枚列宁像章和带有斧头镰刀的苏联建国银币作纪念。

王芳田问他到哪里去，李大钊说回北京。王芳田急忙从行李底下拿出刊有北京反动军阀王怀庆通缉李大钊的《盛京时报》，递给李大钊看。李大钊看后既气愤又蔑视地说：“哼，反动家伙就是与革命者势不两立，有哪个革命者不被通缉，这些玩意儿没什么了不得。”

李祥年、王芳田替李大钊担心，劝他暂时在哈尔滨躲避一下。李大钊坚持要回北京，并说：“不回北京，中国革命怎么能成功？”

李祥年和王芳田见李大钊执意要走，便分别送给了李大钊不少的费用，这让李大钊很感动。李大钊紧紧地握住李祥年和王芳田的手，动情地说：“你们对革命事业的帮助，我是不会忘怀的。”他对王芳田连声道谢，并坚定地说：“总有一天，革命会胜利的。”

重情重义的王芳田第一次见到李大钊就觉得他和蔼可亲，第二次更被李大钊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所打动，他主动为李大钊购买了返回北京的车票，还同李祥年一起到哈尔滨火车站为李大钊送行。分手时，王芳田和李祥年都叮嘱李大钊要多保重，并期待李大钊再来哈尔滨。

李光华深有感触地说：“哥哥和姐姐讲过，父亲曾几次提到，他到苏联开会时经费很困难，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李祥年和王芳田

都给予了不小的经济资助，要记住他们，尤其要记住非亲非故的哈尔滨人王芳田，很热心啊。”

当年，李大钊回到北京后，又积极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1927年4月，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备受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于4月28日英勇就义，年仅38岁。

李大钊壮烈牺牲时，他的儿子李光华只有4岁，4岁的记忆里，没有父亲的丰功伟绩，也没有父亲的豪言壮语，李光华却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慈祥可亲的面容，记住了父亲抱住他用胡须亲吻他的面颊，还记得了坐飞机的情景。

李光华回忆童年的乐趣时说：“我那时最高兴的就是父亲让我坐飞机。父亲喊我大哥葆华过来搭把手，他把我抱起来坐在他们互相搭在一起的胳膊和双手上，他们很协调地将胳膊和双手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地摇晃着，我坐在上面像腾云驾雾似的，感觉很舒服，非常好玩。这时父亲就会笑着说：‘坐飞机喽，光华坐飞机喽，飞哟。’有时，我没坐够，那时我太小还不懂得他们使劲晃动的胳膊和双手会酸会累需要歇一歇，就觉得好玩没玩够。父亲二话不说就喊大哥葆华再来搭把手，让我玩个够。于是我又一次坐上‘飞机’，而且这一次，他们摇晃得更高，我感觉父亲和大哥给我安上了翅膀，我要上天了，我高声地欢呼，‘飞了，起飞了，越飞越高啊。’”

讲到这里，久远的往事历历在目，李光华老人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他的眼角和嘴角似乎都挂起了惬意开心的笑容。

李光华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1927年4月初，正是李大钊被捕的前夕。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城，李大钊将中共北方区委机关迁入东郊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

敌人发现后，立即派出大量侦探在苏联大使馆周围严密监视。

看到环境如此险恶，许多老朋友托人带信，或亲自看望李大钊，劝他离开北京，但李大钊都拒绝了。他说：“要走出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

这种严峻、危险的形势，当时只有 4 岁的李光华是不懂的，父亲避难时是姐姐星华带着他去看望的父亲。李光华老人说：“父亲在苏联兵营避难，我去过一次，骑小自行车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在兵营的广场上有一棵老槐树，老槐树钉的钉子上挂着儿童玩具三轮小自行车，父亲取下小自行车，抱着我去骑小自行车。父亲还推着我，逗我玩，没有跟我说什么，三四岁的孩子，能跟我说什么？父亲弯下腰亲了我的脸，就走了。我看到父亲的背影，越来越远，我就不记着他回来了……”

父亲留给李光华最后一个亲吻，也留给他最后一眼背影。这永不回头的背影意味着什么呢？李大钊会预感到这是和心爱的儿子的永别吗？幼小的儿子在人世间还要经历太多的风雨，却将永失父爱的呵护和引领。可怜天下父母心，李大钊同样疼爱儿女，他是为了让中国更多的孩子能够拥有美好自由的新生活，才不得已对自己的家庭和儿女忍痛割舍的。

1920 年 8 月，李大钊全家由河北昌黎五峰山的老家迁来北京，定居在西城石驸马胡同 35 号，那是一套带院子比较宽敞的平房。

之前，李大钊住在北大图书馆的宿舍，只有节假日还要在不太忙的情况下才能乘坐火车回五峰山与家人团聚。现在有了安定的居所，全家人都来到北京，让李大钊享受到天伦之乐，这是他生活中最为恬静和舒心的时期。

李大钊从旧货市场买了一架风琴，擦得锃亮，放在书房中。雨天他在家时，就弹起琴，教孩子们唱歌。在教唱《国际歌》时，孩子们都记住了其中一句歌词，“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孩子们还记得了一首歌，那是父亲创作的一首歌，叫《黄种歌》：黄种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族自相残，坐叫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洪水纵滔天，只手狂澜，万不负石笔铁砚，后哲先贤。

丈夫低沉浑厚、孩子们稚嫩清脆的合着琴声的歌声，常常让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激情满怀，热泪盈眶。从歌声中，她接受了新思想、

新文化的熏陶，也感受着爱国革命者的高尚情怀。

下雪天，李大钊在家就会让孩子们到院子里扫雪，堆雪人，打雪仗。赵纫兰心疼孩子，怕他们冻着累着。李大钊说：“要从小养成他们能吃苦的习惯。”他还对孩子们说：“将来谁也不能当寄生虫，谁当寄生虫就没有饭吃。”

李大钊特别喜欢下军棋，在他的带领下，全家人跟着一起忙活，自己画棋盘，棋子也是自己做的。

下军棋成了全家人的乐趣，连开始袖手旁观的赵纫兰也在丈夫和孩子们的鼓动下，参与进来。李大钊对她说：“你不能把摆空军阵当成家常便饭。”

在对弈中，李大钊自然是常胜将军，可是大儿子葆华善于动脑筋，棋艺水平提高很快。有一次，李葆华只要向前走一步就会战胜父亲。对父亲敬畏的李葆华明知手中的棋子该怎样冲向这一步，却变得有些举棋不定。一向对孩子很关心很爱惜的李大钊却严肃地对李葆华说：“孩子，男子汉要敢字当先，关键时刻要敢于冲锋陷阵，要敢于担当啊。”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不幸的时光却是漫长的。

李大钊牺牲后，悲恸欲绝的赵纫兰不忘丈夫生前的嘱托，硬撑着瘦弱的身体带着四个孩子回到老家五峰山，她扛起所有的磨难，将四个孩子抚养长大。

1933年5月，赵纫兰因心脏病于北京协和医院凄然长逝，享年49岁。她在弥留之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在她逝世后，组织上追认她为中共党员。

孩子们在父母的熏陶影响下，都学会了怎样在逆境中成长。在失去父母的日子里，他们变得勇敢坚强。他们无愧于李大钊的后代，先后都奔赴了革命征程，都成为了共产党员。

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早在1936年就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在北京做地下工作时，住过贫民窟，蹬过三轮车。他是中共七大代表，并当选为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全国解放后，担任过安徽、贵州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李葆华虽身居高位，却两袖清风，从来不以权谋私。亲属中，从来都没有人张口求李葆华办点私事，因为大家心照不宣，李葆华是不会动用个人的权力和影响去为别人谋私利开绿灯走后门的，李葆华终生都坚守了这个原则。李光华在抗战胜利后，去看望时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晋察冀边区组织部长的哥哥李葆华。按常理说，父母都不在了，长兄为父，李光华也很希望能在哥哥身边工作，毕竟没有了父母，哥哥就是他的依靠了。作为担任晋察冀边区组织部长的李葆华给予自己的亲弟弟一定关照，安排适当的工作和职务是很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兄弟相见时，大哥问寒问暖就是不过问弟弟的工作，李光华意识到大哥不愿他在自己属下工作，大哥不希望手中权力的天平有一点失衡。李光华告别了大哥便只身回到老家，由当地党组织安排了工作。后来李葆华曾对李光华说过：“正因为我们是李大钊的儿子，我们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能辜负父亲对我们的希望。”

李大钊的二儿子李光华 14 岁参加革命，曾任中科院电子研究所党委书记。按常理推测，李光华一定是住在市中心繁华地带的高层小区，或是比较考究的四合院里，可实际他的住所竟是地处偏远的一个很老旧的单元楼房。

李光华的家并不宽敞，有室无厅，地上铺的是很多城里人家已经淘汰的那种人造革地板，房间里连简单的吊灯也没有，而是那种早已过时的日光灯管，家具大约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既普通又陈旧。屋中没有皮沙发也没有布绒的沙发，就是一对沙发造型的硬木椅及手工做的坐垫和靠背垫而已。李光华的一间房既是卧室，又是书房，也兼做客厅。

尽管住房和陈设普通简单甚至简陋，却窗明几净。

李光华的着装也特别普通，穿的上衣布料是卡其布的，洗得都有些褪色了。他的爱人李永兰衣着淡雅，也是一位离休干部。

这就是 14 岁走上革命道路，18 岁奔赴延安，长期做领导工作的正局级离休干部，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儿子李光华的住宅。

想想当下一些官员追求奢华，衣食住行讲排场图豪华，相互攀比阔气，如此比较，这是怎样的差距啊。

再想想，一些人一旦有了一官半职，便自命不凡总觉得高人一头甚至盛气凌人，如此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和李光华这面镜子对照一下，是否该汗颜呢？

在李光华的房间置放的桌子正中，安放着一尊李大钊先烈的瓷质头像，头像旁摆着清香的鲜花。每天凝望着父亲的遗像，李光华又会想到什么呢？

李光华夫妇的子女中，小儿子李建明“文革”中患病毒型脑炎，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落下了残疾。李建明频频发病，给父母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吃穿照顾，看病吃药长年的费用都不用说，几十年来，每天夜里，两位老人都要起来几次为他摆正睡姿，盖好被子，观察有无发病征兆，这对人的精力和心灵是巨大的消耗和折磨。况且李光华已是80多岁的高龄，他得过重病，还硬撑着要照顾残疾的小儿子。

如此窘境，李光华夫妇却从来不觉得委屈，安之若素。他们不想也不愿意给组织给政府添一点麻烦，组织上要为他们改善居住环境，改善生活状况，要给他们派工作人员或请保姆，他们都婉言谢绝了。领导来看望时，李光华总会连连地说，没事，没事。

在北京万安公墓的园林中建有李大钊的陵园，矗立着汉白玉雕刻的李大钊的全身塑像，纪念碑文是由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在李大钊战斗过的地方，都建有李大钊烈士纪念馆。李大钊诞辰100周年、110周年，中共中央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评价李大钊的丰功伟绩。江泽民在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做出了巨大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李光华等亲属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胡锦涛就曾连续两次接见了李大钊的后代。

可以说，我们几代人在上小学时就读过李大钊的事迹，李大钊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可是李大钊的子女们却甘愿做低调自律的普通人。

李光华认真地说：“我不能靠父亲李大钊的光环求私利，他是他，我是我。”

这句话，让人怦然心动，感触颇多。

或许，李光华真正读懂了父爱，也传承了父亲的大爱。

### 三、栋梁任弼时

在奔赴苏俄的中东铁路上，留下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故事，也留下了任弼时的身影和足迹。

1921年初春的某一天。

“呜……”一列中东铁路火车载着夕阳的余晖，缓缓驶进北方重镇哈尔滨。车厢内衣着各异、口音不同的乘客们都将眼睛望向窗外，远处不时掠过的那一片片错落有致的俄式楼房的窗棂上，房檐上，那洋葱头形状的屋顶上，都落着厚厚的一层积雪，不时地被冷风卷起的积雪如烟似雾地旋转着。

“哈尔滨这个城市很洋气，感觉好像到了国外，不过，太冷了。”

“是啊，冷得很，要多穿点，穿厚些。”

有些乘客边议论边赶紧又穿上一些遮挡风寒的衣物。整个车厢内，绝大多数人都裹着厚厚的衣物，做好了御寒的准备。

相比较，在车厢中间坐着的几位年轻学生则有些另类。他们的装束明显地露出南方的特色，穿着都不够厚实，尤其那个看着还有些稚气的最年轻的学生，他的穿着实在有些单薄，与车厢内那些裹得严严实实的乘客们显得格格不入。

“呜……”又响起了火车的鸣笛声，提示着火车即将到站。乘客们都骚动起来，收拾着行李，整理着物品，为到站下车做准备。

列车速度明显减慢，紧接着是一阵刺耳的摩擦声，然后猛地晃了晃，停了下来。车厢里不少乘客被晃了个趔趄，一个大块头的苏联人很生气，大声用俄语咒骂着。

几位青年学生提着旅行包，随着客流下了车。

刚下火车，扑面而来刺骨的冷空气使几位青年学生不由有些哆嗦。

“上海都已经是春暖花开了，想不到哈尔滨还是这样冷。”

“一南一北，温差真是大啊。”

最年轻的学生左手拎着包，右手挥舞着拳头说：“年轻战胜严寒！我们跳几下就不冷了。”

随着几位青年学生活力四射的暖身跳动，他们脚下的一片积雪迸发出“咔咔咔”铿锵有力的响声。

原来这几位青年学生是来自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受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派遣，他们满怀激情和憧憬奔赴苏俄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中东铁路成了他们的红色通道，哈尔滨则成为了他们漫漫旅途必经的红色驿站。

他们中间个子很高，约有 20 岁的小伙子，是来自湖南的肖劲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海军司令。最年轻的还不满 17 岁，也是湖南人，名字叫任弼时，后来成为开国领袖之一，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党中央五大书记之一。

任弼时走上革命征程，是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感召力紧密相连的。毛泽东曾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 年初夏，正在湖南读高中的任弼时看到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关于选派一批人到苏俄留学的通知，便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跃跃欲试。任弼时本来还有一年就可以拿到高中毕业证了，但他说：“我宁可舍弃高中毕业证，也要拿到留学证。”

通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的介绍，放弃学业的任弼时和肖劲光、任岳、周昭秋等人来到上海霞飞路渔阳里 6 号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在这里任弼时和刘少奇成为了同学。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党组织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联合创办的，是培养革命者的红色摇篮，也是负责输送革命青年赴莫斯科留学的基地。追求进步的年仅 16 岁的任弼时在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历经八个月的俄文和马列书籍的学习后，被组织派遣赴苏俄留学。

任弼时和他同行的肖劲光等共六人，是上海党组织派遣的第一批赴苏俄的留学生。不足 17 岁的任弼时，在红色之路赴苏俄的革命者队伍中，是最年轻的一位，也许就应了那句话：自古英雄出少年。

当下十六七岁的年轻人，还被当作孩子，正是受到父母的呵护甚

至长辈宠爱的年龄。他们是在全家保护下生活的，大多会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出远门总要有家长或长辈的陪伴，他们一旦离开，那会让全家人视为最揪心牵挂的头等大事。至于当年十六七岁的任弼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历经万里之遥远赴国外，今天的年轻人几乎连想都不敢想。

任弼时在1921年初春启程前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sup>④5</sup>

正是为了我们今天的“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或许十几岁的任弼时才甘愿冒险奋勇探索未来之路的。

任弼时的小女儿任远芳说：“我父亲任弼时十六七岁和肖劲光等人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很冷，风呼呼地刮着，我父亲穿得很单薄，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带的衣服也不够。虽然我父亲年轻身体好，在哈尔滨还是感冒伤风了。可是几天后在哈尔滨办完出国手续，他就带病坚持上了中东铁路的火车，过了绥芬河边境，来到苏联远东的海参崴。海参崴正闹疫情，对发烧的人都要扣留，我父亲被扣下，就让肖劲光他们先走。第二天在量体温前，我父亲用力活动把胳膊来回摆动出了汗，体温降下来被允许离开，我父亲就去追赶肖劲光一行。当时苏俄内战刚结束，被白匪军破坏的铁路需要修复，边修边通车。那时苏俄严重粮荒，我父亲他们经常连黑面包都吃不饱，又饿又累还带着病，走了两个多月遭了很多罪，才到了莫斯科。为了寻求革命的火种，我父亲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整整学习了三年。”

长长的中东铁路，承载了寻梦和筑梦人任弼时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身影，也见证了任弼时无悔的青春岁月。

1925年，年仅21岁的任弼时当选为中国共青团中央总书记。1926年10月下旬，任弼时赴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此行，依然是走中东铁路赴苏联的。

任远芳还回忆说：“听母亲陈琮英讲过，1926年党中央决定我父亲到苏联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那一年我父亲22岁，和我母亲一起去的。他们辗转到了哈尔滨办了出国手续，走中

东铁路经过绥芬河来到海参崴，最终到了莫斯科，一路上都是坐火车，半年后返回走的还是原路线。后来，我到俄罗斯档案馆专门找了一些资料，找到了我父亲当年出席大会印有照片的代表证。”

1927年4月在中共五大会议上，23岁的任弼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7日，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任弼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sup>⑯</sup>

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各个历史时期，任弼时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奉献了全部心血，功勋卓著。任弼时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全部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

曾经担任红二军政委、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带领部队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之后在延安任弼时又长期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重要职务。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统揽指挥戎马倥偬，在中央领导的岗位上呕心沥血运筹帷幄，任弼时几乎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但在孩子的眼中和心目中，却演绎着特殊的父女情深的故事。

2007年，开国领袖之一任弼时的大女儿任远志此时已年过七旬，在家中，拿着父亲写给她的亲笔信，她深情地谈起了她的父亲。

任远志的家布置得很普通，本人也朴实无华，平易真诚。谈到中午，她只要了盒饭。现在社会上一些所谓的官二代，其父母的官位并不算大，可骨子里透着清高、自命不凡，总是摆着谱端着架子。正如人们形容的那样，干瘪的麦壳风一吹就会飘飘然，东摇西晃，而沉甸甸的麦穗总是耷拉着脑袋。有时浅薄与厚重都是形于内而发于外的。

1931年3月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江西工作。临行前，他望着娇小瘦弱的妻子陈琮英那挺着大肚子即将分娩的身躯，心疼地抚着妻子的肩膀安慰道：“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来，不论是男是女，都叫远志吧，希望这孩子长大以后有远

大的志向。”

任弼时离开上海七天后，大女儿任远志便呱呱坠地了，名字是父亲起好的。

1932年2月，周恩来拍来电报，调陈琮英到中央苏区工作。陈琮英多么希望带上女儿一道去和任弼时团聚啊，可她不能不考虑险象环生的环境。于是，她流着泪将不满1岁的女儿搂在怀里，亲了又亲，然后送回了湖南老家寄养。

1935年秋天，红军长征离开四川甘孜踏上了北上的艰苦历程。茫茫草地，一片泽国，脚下是腐草和臭水遍布其间的瘆人的泥淖。举目四野，浓雾迷蒙，满眼灰突突难以辨明方向。空中时而细雨轻风，时而雪花飘飞，时而又大雨滂沱。这是长征以来所遇到的气候最恶劣，道路最艰难，食物最缺乏的一段行程。

正在行军极艰苦的时刻，一天，露营处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原来是红军女干部陈琮英生下了一个女孩。任弼时望着此时此刻来到人世间的女儿，给她起了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名字——远征。

听到哭声，朱德赶忙来到陈琮英身边，抱起还不会睁眼的婴儿，看看虚弱的陈琮英，乐观地笑着说：“哭得还蛮有气派哩！”随即，放下嗷嗷待哺的婴儿，扛着一根竹竿，拉着任弼时顶着细雨寻找小水塘去为陈琮英钓鱼！多少年后陈琮英还念念不忘，她常说：“那鱼汤，是我这辈子喝到的最鲜美最温暖的鱼汤。”

任远征喝到的第一口奶水，饱含着父母的浓浓的爱。天下父母谁不心疼自己的亲骨肉，谁不愿意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谁不乐意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呢，可是肩负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重任的任弼时和正在长征途中艰难跋涉的女红军陈琮英，不得不再次忍痛割爱，将任远征也辗转送回湖南老家寄养。

任弼时的大女儿任远志从出生的时候就没有见过父亲，不到1岁时离开了母亲，母亲的模样也是没有印象的。她在湖南农村长大，没人知道她的来历，不少人以为她是个孤儿。有些邻家不懂事的孩子见到任远志就会指着鼻子说：“你是个孤儿呀，没爸没妈啊！”

这时的任远志有口难辩，气得够呛，也会委屈得眼泪掉下来。

每逢过春节的时候，村里也会零星地响起鞭炮声，这让很多人露出了笑脸，任远志心里却倍感失落和冷清。别人家的孩子在父母的怀中笑个不停，父母给孩子换上新衣服，孩子喊着爸爸妈妈过年好，还要收到一点压岁钱。而任远志却不知父母身在何方，也不知父母什么时候才能来到她的身旁。

常常是在夜晚万籁俱寂的时刻，她望着窗外闪烁的星光，独自一人轻轻地念叨着：“爸爸、妈妈。”心里就盼望见到父母。父母如果抱一抱亲一亲自己该多好啊。她希望在梦中和父母相见，却美梦难圆，她的泪水常常湿透了枕头。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盼了整整 15 载，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1946 年 7 月 11 日任弼时派人将 15 岁的任远志和在湖南老家另一家寄养的 11 岁的任远征接到延安。

在新市场——延安唯一的一条大街上，一辆中吉普在任远志的对面停下来，陈琮英牵着女儿的手告诉她们说：“下车的那个人就是你们的爸爸，快，去叫爸爸！”

任远志、任远征快跑了几步，感觉热血沸腾心跳加速，真想大声呼唤十几年默默在心中无数次喊过的爸爸，可终因从未见过爸爸而没有张开口。

这时任弼时慈爱地微笑着，将一双来自远方漂泊多年的女儿拥进他宽阔的怀抱，连声说道：“大女儿，回来啦，两个女儿都回来啦！”

任远志、任远征在父亲的怀抱里，流着幸福的眼泪，知道自己再也不是孤儿了，自己和别的孩子一样，有亲爱的爸爸妈妈。从未体验过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当时，任弼时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党中央的五位书记之一，同时还兼任中央秘书长，工作十分繁忙。可是作为父亲的他，也有着拳拳至深的父爱。一有空暇，他便和妻子陈琮英带着两个女儿和在延安出生已经 5 岁的儿子出去散步，一家五口还开心地在延安枣园的绿树前合影留念。任弼时特别喜欢和两个女儿聊天，十分关心她们不在父亲身边时的生活状况。任远志对父亲说：“湖南老家非常贫困，我们学习时总捡别人扔掉的破旧的毛笔，用剪子修修再用，不能用时也舍不

得扔掉。”任弼时感慨地说：“太艰难了，过几天，我就送你们进校继续学习。”在和父母、弟弟朝夕相处了一个月后，姐妹俩分别被送进了延安中学和小学，住校读书。

任远志在延安中学读书，学生几乎全部住校，吃的是延安当时规定的三种伙食标准的最低档。一次，任远志生病了好几天吃不下饭，同学刘少奇的儿子刘毛毛就向食堂要了一碗病号饭，学校也把任远志生病的情况通知了家长。可是任弼时既没有派人来接也没有派人来看望，任远志很不开心。星期六，任弼时派人将任远志接回家。一见面，父亲看女儿真的是病了，心疼地说：“我还以为你不习惯陕北的生活，吃不了苦，所以你的教师通知我时，没有去看你，接你，原来你是真的病了呀！”女儿这才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怨气一扫而光。这次，任弼时留女儿在家里休息了几天，女儿身体好了，任弼时马上让女儿回学校去，并殷殷地叮嘱女儿，要能吃苦，要好好锻炼自己，要努力学习，长大了才能为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

任远志回到延安中学后，愈发孜孜以求刻苦用功。百忙中的任弼时给她寄来长信，信中说：“以前对你说过，学习要靠自己努力，要善于掌握时间去学习。你们这辈学成后，主要用在建设上，建设事业就要有科学知识。做好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必须先学好数学、物理、化学，此外要学通本国文，并学会一国外文。外国文又以学俄文为最好，寒假回家时，我还可以帮助你补学一些。另外你要的地图红蓝铅笔各一支送给你，奶粉白糖各两包。听说叶明也生病了，奶粉、白糖你留下各一包，另各一包送给叶明，你也要多关心叶明。”

浓厚的父爱凝聚笔端，对女儿前途的厚望跃然纸上，任远志更加坚定了学真本领的信念。同时，她也在父亲的信中读懂了父亲博大的情怀，也更加意识到在革命的大家庭中要学会更多地去关心别人，多为别人去着想。

任弼时托人送来的奶粉和白糖，是因为他患有高血压等疾病，组织上为他提供的营养品。他舍不得吃节省下来，还特意分成两份，一份给女儿，一份给叶明。叶明是任远志的同学，是著名的叶挺将军的遗孤。任弼时听说叶挺烈士的儿子生病了，就送来了自己节省下来的

营养品，这饱含着特殊的关爱和深情啊。

热心肠的任远志对生病的同学叶明十分关心，为他熬姜水退烧，帮助他端来病号饭，还耐心地为他补习落下的功课，并且将战争年代很稀有的奶粉和白糖毫无保留地全部送给了叶明。在成长中，任远志以父亲为榜样，时时处处都争取做到别人的利益高于自己的利益。

任远志还挤出时间为父亲做了一双鞋，尽管一只鞋底上歪了，可毕竟针针线线总关情。她见到父亲时，将自己做的布鞋送给了父亲。任弼时高兴极了，迫不及待地换上这双鞋，惬意地走来走去，眉开眼笑地说：“不错，真舒服！还是我的大女儿好啊。”边说着，边将任远志揽到面前，亲吻了任远志的额头。大概因为任弼时年轻时受苏联生活的影响，亲额头已成为他表达父爱的惯常动作。

1947年4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撤出延安城，在转战陕北中，任弼时一家人又分散各处。

在和同学们紧张的日夜行军中，患有夜盲症的任远志因眼睛看不清路而摔伤了，两条腿都肿了，还发起了高烧。当她拄着棍子硬撑着蹒跚而行时，恰被任弼时的警卫员看见，忙把她送到了中央机关临时所在地——王家湾任弼时的身边。

任弼时蹲下身子细细查看任远志脚部和腿部的伤势，既心疼又幽默地逗女儿开心：“轻伤不下火线，小同志你怎么回来了呢！哎呀，伤得不轻哟，好吧，这次跟爸爸住一段吧。”

在那段让任远志终生难忘的日子里，每天任弼时再忙，也不会忘记为女儿摔伤的脚和腿换药，深夜秉灯伏案批文件时，也忘不了为女儿重新盖好蹬开的被子，再掖掖被角。而每当父亲因工作劳累血压升高或头痛或腰酸时，懂事的任远志也总是一遍又一遍地为父亲捏头、捶背。

任远志在养伤期间，不仅得到了浓浓的父爱，而且有幸受到了和父亲同住一孔窑洞的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的关爱，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大女儿”。

有一次，任远志因为在河里洗被单着了凉，高烧不退。毛泽东闻讯，关切地来到任弼时的窑洞口用湖南话对任远志说：“大女儿，我的小老乡，你好些了吗？这里水太冷，以后可不要到河里洗

被单喽，脏就脏点嘛，等以后条件好些咱们再去讲卫生好吗？”逗得任远志笑了起来。尽管当时药物奇缺，毛泽东还是吩咐警卫员取些药来。

周恩来也接连几个夜晚来照顾任远志，用冷毛巾搭到她发烧的头上，还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风趣地说：“大女儿，快退烧吧，我们还要听大女儿唱湖南民歌呢。”

陆定一也跑过来：“我这里还有几颗薄荷糖，大女儿，你含在嘴里，可能好受些。”

任弼时更是时常守在发烧的女儿床前，边看电报、批文件，边摸一摸女儿的额头查看退烧没有，还不时地让女儿多喝水，有时忙得不能合眼。

住在窑洞的日子里，有一件小事让任远志刻骨铭心。

中央临时机关的领导住在王家湾，父亲的窑洞和周恩来的窑洞是里外间。清晨父亲起得早，常去营房和马号附近转转。为了让周恩来不受惊动多睡一会儿，父亲不走过道，而是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窑的小窗，轻轻地从窗口跳下去。

一天早上，他又从窗口跳出去了。周恩来醒来，看看窑洞门没有开，以为任弼时还在休息，便轻手轻脚地穿衣下炕。突然，要咳嗽了，怎么办，周恩来紧皱眉头，用手紧捂嘴巴，急忙走出门去，直到距窑洞十几米处才低低咳出声来。不想咳罢抬头，正见任弼时远远走回，两人相对一愣，周恩来望着任弼时住处打开的窗户，彼此即默然会意。

任远志看到的这一情景，算是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却让她在几十年中都时常会想起。她觉得父亲和周恩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

在王家湾窑洞内领袖人物身边生活的一个月倏然即逝，但在任远志记忆的屏幕中，却留下了永久定格的画面，她感受到了终生的幸运、幸福和自豪。

在依依难舍地离开窑洞前，任远志趴在毛主席的膝盖上请他题字，毛主席抚摸着任远志的头，思索片刻，欣然写下“光明在前”几个字，任弼时在大女儿的本子上写下了“努力学习”这样的希望。

任弼时的小女儿任远芳是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学习说中国话，学习写汉字，第一位老师就是她的父亲任弼时。

任远芳和父亲的相认相处乃至永别都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任远芳是1938年12月8日在莫斯科出生的。当时，她的父母都在莫斯科工作。任弼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调任弼时回国。临行前，任弼时和陈琮英忍痛将女儿送进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当时任远芳只有一岁，还是个蹒跚学步咿呀学语的婴儿。那时父母的形象，在一岁孩子的记忆中是一片空白。

任远芳是在国际儿童院长大的，这里的孩子们来自二三十个国家，都是因父母在国内从事革命斗争，生活动荡无法抚养而送来的，其中还有一些是烈士的遗孤。中国的孩子大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有的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否活着。所有的孩子都享受着平等的生活，尽管国度不同，却彼此亲密无间。任远芳已习惯了集体生活，也习惯了父母不在身边成长环境。

1950年4月，任弼时到苏联莫斯科治病和疗养，派工作人员到伊万诺沃去接任远芳，并给女儿带去了400卢布。任远芳第一次有了零花钱，心里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她马上把钱分成好几份，送给她的朋友，她要让自己的快乐变成大家的快乐。临走时，她还和同学老师依依不舍，因为她从来没有离开过集体的生活环境。不过，很快要到莫斯科去见父亲，又使12岁的任远芳有些激动和兴奋。

任远芳讲述和父亲见面的情景时，真诚地说：“那时我第一天见他的时候，我连爸都叫不出来。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没有爸没有妈，没有这个习惯，也不习惯叫。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没见过，也没叫过，当时也没叫出来。”

当时，任弼时上下打量着十多年没有见面又时常牵挂在心的小女儿，将眼里还闪着好奇和充满陌生感的小女儿揽到面前用力地抱在怀里，连连说：“终于见到我的小女儿喽，小女儿都长这么大了！”一边说着，一边深情地亲吻了小女儿的额头。

任弼时将 12 岁的女儿抱了很久没撒手，任远芳在父亲宽阔的臂膀中，拥有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她的心中荡起了一层层幸福的涟漪。

任远芳和父亲朝夕相处了八天。

这八天，任弼时牵着小女儿的手散步，开心地逗女儿玩耍，并亲自为女儿拍照片，他还为女儿挑选了一套好看的衣服。在女儿睡觉的时候，有时任弼时会静静地坐在旁边，凝望着女儿那香甜入睡的样子，他或许想的是怎样弥补女儿在成长中长期缺失的父母之爱。

任弼时用娴熟的俄语和女儿交谈，询问女儿在国际儿童院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这八天的时间，我爸对我特别关心。因为我不会中文，一句也不会，中国话也不知道。另外我妈妈的名字，我姐姐的名字，还有我弟弟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我爸爸就很认真地给我写了一个东西，写的中文，旁边的地方用俄文标上怎么念这个字，写的字挺大的，非常工整。父亲写上中国、苏联，妈妈陈琮英，姐姐任远志、任远征，弟弟任远远，然后写上你我他简单的汉字。比如中国的中，我爸就用俄文拼上中，我一念这个中，就能发出音来了，我的中文就是这么学的。”

不认识汉字，不会说半句汉语的任远芳，父亲成了她的第一位中文老师和翻译。如今已七十多岁的任远芳珍藏的六十多年前父亲亲笔所写的汉字和标了俄文的教学原件，纸张虽已泛黄，但每一个工整到极致的笔画，都浸润着关怀，父爱如山。

和父亲在一起的八天时间，几乎形影不离。这份外美好的时光，是任远芳一生中挥之不去的最深刻的记忆，她第一次感受和感悟到了孩子在成长期能得到父亲的呵护和关爱是多么温馨和甜蜜。

1950 年 5 月下旬，任弼时带着女儿回国。

在火车上，任弼时仍然认真地教授女儿学习中文，任远芳在父亲边说中文边用俄文翻译的教学中，发出脆亮的声音。任远芳非常聪明，她在国际儿童院的学习成绩经常是班里的第一名，领悟和接受能力都很强。在父亲一个字又一个字的拼读下，她很快地就跟准了父亲的汉语发音：

“我要回中国了，我的家在北京。”

“我要回中国了，我的家在北京。”

“妈妈，姐姐，弟弟。”

“妈妈，姐姐，弟弟。”

.....

休息的时间，任弼时凝望着窗外，任远芳看到父亲的目光是那样的深情和深沉。

从莫斯科到远东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漫长的铁路沿线的山山水地地貌特色，对于曾多次赴苏学习工作及治病疗养累计时间已超过六年的任弼时，真是太熟悉了。

路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或许，任弼时会想到最初踏上这条铁路的情形，那时他才只有十六七岁，为了探索革命的火种，寻求拯救和改变中国命运的道路，历尽艰险义无反顾。这条通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故乡的大铁路，吸引着无数的寻梦者。

望着窗外，山水依旧，可是不断掠过的拔地而起的建筑群，展示了苏联工农业和科技业建设蓬勃发展的喜人变化，而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的新中国，建设还是任重而道远呢。

“呜……”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列车缓慢地停在了满洲里火车站。

“火车停在满洲里，需要等待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下火车去商店买东西，爸爸让他身边的一位叔叔陪我去。一位苏联服务员问我，你是跟谁来的，我说跟我父亲，她问我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我说不知道。回到火车上我问父亲，‘爸爸你是做什么的？’父亲和蔼地回答我说：‘我是坐办公室的，就是普通的工作人员。’”

任远芳回忆到这里很感慨地说：“我们在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孩子都很真诚很认真，当时我没有多想什么。从此，我就记住了我爸爸是坐办公室的，是普通的工作人员。”

回到北京后，12岁的任远芳第一次见到二位姐姐和弟弟，并用刚学会的中文叫任远志为大姐，任远征为二姐，任远远为弟弟，她重新回到了母亲陈琼英的怀抱。

为了让小女儿感受北京的秀美，任弼时带领全家人浏览了颐和园。

偌大的颐和园，园内山青水碧，垂柳依依，古香古色的清朝建筑阁耸廊回金璧辉映，如风情万种的画卷在铺展延伸，让第一次见到中国园林美景的任远芳直呼好看，太好看了。

历尽艰辛坎坷，天各一方的家人终于走到一起团聚了。任弼时将小女儿任远芳和儿子任远远揽在身边，一家人合拍了一张真正的全家福。照片中父母和孩子贴得很紧，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灿烂开心的笑容。

为了让任远芳尽快学会中文，任弼时为小女儿选择了一所住校的小学。

从苏联返回北京，身患高血压等病的任弼时本应继续静养一段时间，可是作为党中央的五位书记之一，他却怎么也躺不住。经毛主席与中央商议，同意任弼时每天工作四小时。但是真一恢复工作，任弼时就把病情抛到脑后，先是把工作时间增至每天五小时，后又要求医生增加到八小时，而实际上每天他往往工作八小时以上。终因劳累过度，任弼时倒在了病床上。

当时的情景，任远芳记忆犹新：“1950年10月26日，在住校期间有人来接我和弟弟，因为弟弟也是住校学习。来人说我爸病得很重，回家一看，满院子的人都哭哭啼啼的，说是我父亲脑溢血，血压太高了，大概高压230，血管破裂。我那时中文也不太懂，就看到不少的医生出出进进的，很紧张。我几乎是跑到我爸爸身边的，连喊着爸爸，我爸爸当时说话已很费劲，他朝着我点点头，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他伸出了手，我就和父亲把手握在一起，想不到这是最后一次握手！”

1950年10月27日12点36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因病逝世，享年46岁。

任弼时病重和逝世后，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几乎都来到任弼时的家中。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亲视任弼时遗体入殓，朱德敬军

礼致哀，周恩来亲手为任弼时遗体盖党旗，毛泽东亲自扶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

首都各界群众4万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亲笔题词缅怀亲密的战友。任弼时是党中央五位书记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英年早逝，令全国人民十分哀痛。

全家人刚刚团聚，幸福的笑容还没有淡去，父亲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任远芳的大姐、二姐和父亲相聚的时间是四年多，而她和父亲在一起说是半年，实际上住校期间每周才回家一次，算起来时间很短，在苏联和父亲在一起朝夕相处的八天，才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父亲的病逝，让任远芳悲痛不已。父亲病逝前后的情景，让刚从苏联回来还不太懂中国话的任远芳，隐约感到父亲不寻常，像是一位大人物。

可是父亲的那句话，“我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却永远铭记在任远芳的心中，她时常望着父亲任弼时的照片，油然生出敬爱之情。

父亲的慈爱、父亲的温和、父亲的自律，无形地影响了她的一生。她知道，父亲的心永远牵挂着女儿，她的脚步永远走不出父亲的视线。作为一代伟人任弼时的女儿，她很朴素、很普通，真是应了那句话，平平淡淡才是真。

有人请任远芳吃饭，她选很普通的饭店，而且饭后还习惯性地打包饭菜，让来访者十分感动。

那些怀着崇高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执着地走在被称为红色之路的中东铁路上的革命先驱，不仅留下了对人民对国家的大爱，也留下了对子女永远的父爱。



李立三与李莎

## 第八章 割不断的跨国深情

提到李立三的名字，很多人都熟知，接着就会想到“立三路线”这个专有名词。

正如军队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顾委原常委伍修权在回忆李立三《一代英杰一生坎坷》的文章中写道：“人们久闻其名，可又大都不知其详，他长期以来被人们当作‘错误路线’代表，甚至‘反面教员’，由于过去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极少介绍立三同志的经历特别是功绩。所以，人们在一段时期内，往往只知道李立三是‘左’倾路线的制定者和代表，而不知道李立三曾经为党和人民还做过很大的贡献。”<sup>⑭</sup>

其实，李立三是赫赫有名的工人运动的领袖和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李立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为李立三彻底平反，恢复了他应有的名誉，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工人运动杰出的领导人之一”<sup>⑮</sup>。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还亲切接见了李立三的夫人李莎。

北京李莎的家中，在客厅的中心位置，悬挂着李立三半身照片，那眼睛炯炯有神透着睿智刚毅的风采。

客厅的布置和格调有些与众不同，既有中国山水画的古香古色委婉别致，又有俄罗斯油画异域风光的豪迈洒脱，至于摆放的家具也是中西合璧，既有大气厚重的中国家具，也有洋气典雅的俄罗斯家具。

李立三的夫人俄罗斯人李莎尽管年事已高，却精神矍铄，走路依然是轻松的样子。李立三的大女儿，北京外国语大学著名教授李英男介绍说，她的母亲已经90多岁了，还在坚持游泳。

李莎说中国话还有些生硬，习惯了俄语交流的李莎说什么，就由女儿李英男来翻译。

说起李立三，李莎一往情深，她的脸上带着欣慰和自豪的表情，她深情地说：“我很喜欢他。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为了这个目标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坚持他的信仰没有变。”

讲到了中东铁路，李莎不无幽默地说：“他是走中东铁路到俄国去学习，我们才认识的，从某种角度看，这条铁路还是我和李立三的媒人呢。”

李英男接过母亲的话题说：“当年的中东铁路，被革命者称作红色之路，因为这是中国通往苏联唯一的一条铁路啊，这条红色之路也演绎了我父母的红色传奇。”

李立三曾在 1925、1928、1931 年三次走中东铁路赴苏联开会、考察或学习，其中第二次在满洲里过境的场面最为曲折。

那是 1931 年初，李立三来到边境小城满洲里，下了火车后，迎接李立三的满洲里交通员，为李立三换上了俄国人的服装，让他装扮成一位俄侨准备过境。

此时的满洲里寒气袭人，风吹如刀，漫天的雪花飘飘洒洒，大地上没有了如茵的绿草，没有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在茫茫的风雪中，显得萧条和荒凉。

夏天这片大草原的青草长势非常茂盛，到了冬天，一些俄侨就忙着割草，然后将一车车干草运到满洲里对面的苏联贩卖给牧马人，因为冬天马的饲料是离不开这些干草的。

尽管中国边境满洲里的警察气势汹汹，对出入境人员盘查得很紧，但是对每天往返贩卖干草的这些俄侨已经司空见惯，基本上不太注意。可李立三装扮的俄侨是新面孔，讲话的口音也不是本地的，说不定会惹出麻烦，于是交通员和贩运干草的俄侨商量让化装的李立三藏在干草堆里。

李立三躺在了车底下，一层又一层的干草压在他的身上，重重叠叠将他覆盖得几乎严丝合缝。雪地上响起“咔嚓咔嚓”的车轮转动

声，交织着呼呼作响的北风。

突然，装满了高高厚厚的干草车猛地晃动起来，这是因车轮碰撞在坚硬的石头上，被狠狠地硌了一下。好在满载干草的车被捆绑得结实，车体只是颤颤地摇晃着，并没有翻车。眼瞅着就要到戒备森严的过境检查哨了，一旦车翻了露出一个大活人，还是一个新面孔，显然就要惹大麻烦了。

被重压在车体最下边的李立三，如芒在背，如刺在身。随着一阵急剧的晃动，那带有冲力的坚硬的干草扎破了他的面颊，刺破了皮肤，几乎没有缝隙的干草堆，也将李立三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坐在马车上贩运干草的俄侨们若无其事地赶着马车，他们只知道藏在其中一辆干草车上的中国人要偷越国境到苏联去，并不知道此人就是在中国叱咤风云的中共领袖人物李立三。

李立三早在法国留学期间，就走上了革命的征途，回国后，192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受党组织和毛泽东的委派，年仅23岁的李立三与刘少奇到湖南安源领导工人运动，开办安源工人补习学校，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还成立了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李立三亲自担任总经理。李立三与刘少奇在安源路矿工人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其间，在李立三和刘少奇的发动和指挥下，安源路矿一万多名工人举行了历时五天的大罢工，并大获全胜，强有力地推动了湖南、江西等地的工人运动。

1925年5月15日，日本人开办的七家棉纱厂关闭，拒发人工工资，顾正红带领工友与厂方斗争，被七厂大班日本人川村射杀。

李立三亲自起草了向日本领事馆严正抗议的交涉使文，并以传单形式向全社会散发。同时，李立三发动和领导了上海人民讨还血债反帝大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通过日本领事馆时，担任现场总指挥的李立三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他的带领下，群情激奋，“讨还血债”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

在上海的引领下，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声援上海的游行示威，反帝运动风起云涌，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最先发起者

就是李立三，他还被公推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1927年初，担任湖北区委书记的李立三，带领群众收回了汉口的英租界，有力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主权和尊严。

1927年4月，在中共五大会议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长。7月中共中央成立临时政治局，李立三为5名常委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在鲜红的“八一”军旗上，也浸染着“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任中央农委书记。1930年6月至9月，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就是“立三路线”的错误，很快他就认识并检查了自己的错误。

1931年初，中央派李立三赴苏联学习。

就这样，李立三走中东铁路来到满洲里，准备过境。

179

李立三有惊无险地通过了满洲里岗哨的检查，“蒙混过关”，他接着换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抵达了莫斯科。

让李立三难以想象的是，此次万里之遥的铁路之行，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他的政治生涯从此从辉煌趋向了暗淡，从巅峰逐渐跌入低谷。赴苏后，他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戏剧性的变化。

李立三在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种种复杂的因素，让他犯了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错误。当共产国际指出其错误后，他很快就停止了错误，并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

尽管李立三对“左”倾的“立三路线”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痛心不已，并多次对工作中的错误进行反思和检讨，可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却紧紧抓住李立三早已改正的错误就是不放手，不断施以排挤和打压的卑劣手段，动不动就拿“立三路线”说

事。批评批评，几乎成了口头禅。在王明、康生的眼皮子底下，李立三长期过着“小媳妇”的生活。李立三多次提出希望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也屡遭王明、康生的拒绝。

李立三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所以他一直保持着昂扬向上的面貌。留在莫斯科以后，他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兢兢业业，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各项工作任务。当时，陈云同志在苏联见到李立三的实际表现，就给他冠以“坦克车”的称号，说的是他不论在什么样的岗位上，不论是顺境、困境，甚至是逆境，都信仰坚定，像“坦克车”一样勇往直前。

李立三在苏联期间，使用的名字叫李明。

1933年深秋，天高气爽，莫斯科街心公园的菩提树一片金黄。公园附近的莫斯科河，河水清澈，水波荡漾，那款款流淌的河水沿着市中心流过，宛如一条长长的玉带环绕着美丽的苏联首都莫斯科，给周边巍巍矗立的色彩缤纷造型恢宏的古典建筑和带有葱头般形状穹顶的俄式教堂建筑，平添了几分光鲜、润泽、灵动的奇美。

莫斯科街心公园的街头艺人用小提琴演奏的贝多芬的乐曲，雄浑而凄美，撩人情愫，动人心弦。前面流淌的河水，宛如音乐的跳动符号，忽而是一片缓缓荡开的层层涟漪，忽而是翻滚跌宕的水花溅起，和那幽幽飘散的旋律相融相织。

正在行走的30岁出头的李明，高高的个头，挺拔的身材，满头蓬松的黑发，有着一双明亮而智慧的眼睛。他身着浅灰色的西装，内穿洁白的衬衣，因为要去朋友家做客，他还特意系了一条海蓝色的领带，显得很英俊。

在高尔基大街的拐角处，他掏出朋友杨松家的路线图，由于平素工作繁忙也不常逛街，所以他第一次要去做客的杨松家地址究竟该怎样走，还真有些把握不住。

正在李明有些犹豫的时候，迎面走来了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姑娘高挑的个头，白皙的皮肤，一双水汪汪蓝宝石般的大眼睛，闪烁着怡人而又清纯的目光，那目光中透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幻想。

李明用俄语向这位姑娘问好，并展开标着路线图的纸条询问地址。

俄罗斯姑娘认真地看了一眼，便微笑着说：“先生，这地址我非常熟悉。”

“那太好了，该怎样走？”

“如果您不介意，我可以带您去。”

“你？你去过这里？”

“我现在要去做客的也是这个地方。我常去，杨松的夫人沙丽达·列依索洛娃是我的好朋友。”

“噢，我是杨松的朋友，我叫李明。”

“我叫丽扎。”

如此的巧合，让李明和丽扎会心地一笑，又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丽扎就是后来的李莎。丽扎曾在远东出版社工作过，在编辑部和杨松及夫人沙丽达·列依索洛娃等一起共事，成为了好朋友。她还和不少中国革命者在一起工作，他们有文化有作为有抱负的优秀品质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丽扎回到莫斯科后，和也来到莫斯科的杨松夫妇时常来往。

听着丽扎的自我介绍，李明频频地点头，他对眼前这位年轻活泼的俄罗斯姑娘有了一些好感。

正说话时，已经来到了杨松的家。“咚咚咚”，丽扎敲开了女友的家门，丽扎和开门的杨松夫人拥抱在一起，接着，杨松也从房间里走出来迎接客人。杨松愣住了，为什么丽扎旁边会有李明，他们从未见过面，怎么会同时到达呢？丽扎讲了路上的巧遇，杨松风趣地笑着说：“两个国家的人，不约而同，挺有缘分哪。”接着他向丽扎介绍：“这是我邀请的朋友李明，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很有才华。”

这一天一个偶然的巧遇，让来自中国的李明和年轻貌美的俄罗斯姑娘丽扎相识了，两个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在聚会时，正值青春年华的中苏青年话题很多，畅所欲言，谈形势谈未来谈人生，海阔天空，大家讨论得都很热烈。

丽扎发现看上去英俊年轻的李明坐在那里，俄语说得不太好，不太爱讲话，偶尔讲几句却谈吐不凡，在真诚中透出博学和睿智，在幽默中流露出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她觉得杨松介绍李明“很有才华”确

实很对，她开始喜欢上这位中国人了。

俄罗斯人有一个习惯，好朋友之间总是相约在一起，或举行节日聚会，或到郊外野游。李明有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的红皮证件，给他们的游玩提供了不少的便利。一到公园划船，在人多船少的时候，李明拿着红皮证件到售票处很快就可以把船租来。丽扎和李明渐渐熟悉起来，彼此似乎都有很多的话要说。

丽扎和杨松夫妇还有他们的好朋友李明经常在一起玩啊，唱啊，跳啊，任小舟在湖中随波荡漾，但是丽扎不知道李明就是在中国大名鼎鼎的李立三。

1934年深秋，丽扎与另外一位女友柯拉瓦一起到李明的住所去看望他，发现李明已收拾好行囊要离开莫斯科。李明此行是到阿拉木图，要在中国的边境附近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这是在执行一项重要使命，他要严守机密，所以只能跟丽扎说要出差去一个远地方，说罢便匆匆告别。

丽扎知道李明是赤色职工国际主席团的成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心里断定他肯定是秘密回国。在共产国际这个圈子里，常有人去执行秘密任务，自己是圈外人，对这种情况，只能心领神会，绝不能问及，她便与他告别。他去了，再没有了联系。

1935年6月的一天，突然有电话找丽扎，她从电话里听出了是自己朝思暮盼的李明的声音，真是高兴极了。丽扎觉得心跳都有些加快了，她放下手中的事情，直奔相约地。

分别近一年的重逢，让他们的话多得永远也说不完。不在一起的日子，彼此都在默默地思念和牵挂着对方，音容笑貌挥之不去。

李明向丽扎坦诚地说自己的真名是李立三。他把自己的详细经历及在政治上所犯过的错误还有他在中国的婚姻、家庭、子女情况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丽扎，毫无隐瞒。他还向她明确表示：他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如果工作需要他随时准备听从党组织的调遣，回国参加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到那时，两人分手将是长期的……

丽扎通过与李立三的交谈，了解到他是一个光明磊落、襟怀坦荡

的人。她对他那传奇般的革命生涯很感兴趣，他的才华和超常的智慧以及坚定的信仰、远大的抱负和脚踏实地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着追求进步的她。她更加信任他，也爱上了他。她想：“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认识了，改正了，就行了呗。”

1936年2月，22岁的丽扎和36岁的李立三在莫斯科结婚了。陈云、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带女儿瞿独伊同十多位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参加了丽扎和李立三的婚礼。

2008年秋天，瞿秋白的女儿，87岁的瞿独伊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记得很清楚，是1936年，在高尔基大街共产国际宿舍六层楼一所普通的房子举行的婚礼，很简单，很朴实，也很热闹，大家在一起品尝了自己做的中国菜肴。丽扎22岁，可漂亮啦，黄褐色头发都上卷非常好看，还有几位丽扎的苏联女友也参加了婚礼。”

婚后，丽扎觉得自己的命运已和丈夫的革命事业融为一体，她应该专心地尽全力照顾好有时都忙到半夜的丈夫，同时她又想接着去考取大学，她试探着对丈夫说：“明，我还年轻，我想上大学，不知……”

没等她说完，李明明确而果断地说：“你上大学是好事，我举双手赞成，革命也需要知识嘛。”

丽扎希望考取法语专业，正巧李明过去曾在法国留学两年多的时间，法语水平是顶呱呱的，于是李明挤时间当起了丽扎的家庭老师。半年后，丽扎以优异的成绩如愿以偿地考取了莫斯科外国语师范学院法语系。

法国作家雨果曾说过：“人生如花，而爱便是花蜜。”

虽然结婚的房间仅有十几米，却被丽扎收拾得窗明几净，简洁而典雅。丽扎如愿考取了大学，李明忙于《救国时报》的主编工作。

每逢节假日，他们便去看话剧听音乐会，还到黑海边去度假。夫妻俩都非常喜欢在海边散步，那海的博大浩瀚，海的潮涨潮落，银白色的海鸥成双成对划破海浪自由飞翔的情景，都会让他们心旌神摇陶醉不已。他们在海水中并肩游泳，任浩渺的波涛在自己的身边翻腾穿越，心里都在默念着高尔基赞颂勇敢者的诗篇《海燕》。

跨越国界的爱情情投意合，其乐融融，在这个中苏合璧的家庭里，溢满着温馨和快乐。

整整两年幸福而平静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

1938年2月24日，清晨，丽扎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给她和丈夫都喜欢的玫瑰花浇水，这是他们俩在花市上精心挑选的，搁置在窗台上，水灵灵地绽放着紫红色的花朵。在一缕冬日的阳光照射下，丽扎发现玫瑰花变得有些枯萎了，她着急地说：“明，这玫瑰花好像凋零了。”“或许房间的温度低，阳光照一照，浇点水就好了，你不要着急。”边说，李明边穿着衣服。

正在此时响起“咚咚咚”急促的敲门声，猝然两个身着警服荷枪实弹的苏联人砸开了房门。

丽扎吓得呆若木鸡，手中的浇水喷壶掉在地上。稍一后退，将窗台的玫瑰花也撞翻在地，玫瑰花裂成了片片碎瓣在地上抖动着。

李明被带走前，穿了一套最旧的衣服，摘下了手中的瑞士表递给了丽扎，镇定地说：“丽扎，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我是清白无辜的，你去报告给中共代表团。”

丈夫被带走了，如此的突变让丽扎如坐针毡，她急促地跑向中共代表团，可是却遭到了冷遇。

实际上王明、康生对李立三的政治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不论给李立三安排何种职务和工作，李立三都是毫无怨言超常地努力做，让王明、康生无从下手。

前不久，李立三在下班途中丢失了一个公文包，两天后在车站找回来，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失密事件。王明、康生却借题发挥，大做文章。而此时正赶上苏联肃反扩大化，李立三的处境就更不妙了。

李立三被捕后，丽扎向中共代表团陈述李立三的冤屈，并向她所在的大学团支部作了汇报，谁知团支部书记已经知道了情况，绷着脸说：“我们要抓紧审查你的问题，好好反省吧！”

丽扎满头雾水满腹疑惑，她暗自思忖：“我，我怎么了？”

团组织召开全院大会处理丽扎的问题，学院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大会主持人发出严厉的警告：“你要慎重考虑，李明是人民的敌

人，你是他的妻子，应该当机立断，马上同李明离婚，一刀两断，划清界线……”

最后，主持人追问她：“你是要你的特务丈夫，还是要共青团团证？”

丽扎怔住了，她热爱革命，热爱共青团组织，同时她也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她坚信李明不是什么日本特务，而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人。她毅然决然地把共青团团证交给了负责人，愤愤地离开了会场。

她一口气跑回家里，扑向母亲的怀抱，大哭起来。

一些好心人劝丽扎，趁着年轻漂亮又是高学历也没有孩子，找一个俄罗斯小伙子重新安排生活吧。

24岁的丽扎坚信自己的中国丈夫是无辜的，在患难的时候，不抛弃不放弃成为她坚守的信念。这是爱情的选择，也是勇敢的选择。

偌大的莫斯科，李明啊，你在哪里？焦急不安的丽扎，像迷失路途的羊羔，在满山遍野呼唤；似失去伴侣的孤燕，在凄凉冰冷的冬夜哀鸣。

当时由于肃反扩大化，莫斯科新设立了许多牢房，丽扎发疯似的大海捞针般到处打听李明的下落。漫天大雪，路面结冰，心急如焚的丽扎迎着凛冽的寒风和迷蒙的雪花，猛一着急摔倒在地扭伤了脚，她忍着疼痛在厚厚的积雪中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她深知，在此危难之际，对一个远离他乡的外国人，除了她没有谁会去关心他。她在内心呼唤：李明，你就是远在天边，我也要找到你。

她去布特尔斯监狱、沃尔托夫监狱、卢边卡监狱、罗捷斯特文卡监狱，去了很多监狱。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队，却都是希望变成了失望。

印象太深刻了，70年后，李莎在北京家中回忆此事，仍历历在目。“立三被捕后，我一定要找到他。当时苏联肃反扩大化，莫斯科监狱人满为患，我就挨个监狱去找，每次都排四五个小时的队，连饭都不敢去吃，不然你就白排队了。终于轮到我时，我通过小窗口把护照递过去，然后就被很粗暴地扔回来，说没有这个人。我一个一个差不多跑遍了莫斯科所有的监狱。”

从冰封雪裹的2月到繁花盛开的8月，整整半年多的时间，究竟走了多少路去寻夫，吃了多少苦去期待，很难用数字来计算。不停地寻找李立三，成为了24岁的丽扎生活中的唯一。

白天磨破嘴皮去询问，夜里梦中唤亲人。

是啊，一个正值青春的苏联女人，她的梦本应是玫瑰色的浪漫和美丽。可是，在失去挚爱亲人的时候，她的梦却是无尽的苦涩和黑暗。

直到1938年8月的一天，日复一日，整整跑了半年时间的丽扎，才在塔岗卡监狱的窗口递上李明的护照后，听到回答说有他这个人，丽扎又问了一遍，得到了明确的答复：“有这个人！”

终于找到了李立三，丽扎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当着很多人的面哭出声来。

丽扎见李立三太心切了，可是由于李立三是政治犯，是不允许会见家属的。经丽扎多次恳求，最后才争取到允许她通过狱方每月转交给李立三50卢布。

找到中国丈夫后，丽扎在莫斯科外国语学院继续学业，她要从每个月的助学金中省出50个卢布送给李立三。她要拼命地学习，因为每个月所有的科目考试全都是优秀才能拿到助学金，只要有一科考试出现“良”字，助学金就会泡汤。这如同走钢丝表演，步步都不容许出错，即使你走稳了一大半稍有闪失就会掉下来，前功尽弃。

为了丈夫能拿到50个卢布，丽扎忘我地全身心投入学业，结果每个月所有科目的考试，科科不落地全都考得精彩。

监狱灰色的墙壁上高耸环绕的铁丝网和那阴森森黑色的大铁门，隔开了两个世界。魂牵梦绕的思念和惦记，化成了苦苦的请求。可是狱警坚持不允许家属见政治犯，不许丽扎越雷池一步，依然是狱方来传递卢布，顶多是捎个话或带个信息。

李莎在回忆讲述这一段时，脸上露出了少许的笑容。她说：“送50卢布，每月都送，每一次都穿最好的衣服，就像恋爱时去约会一样。不让见面，没办法，监狱可以转达我的意思。这不是卢布，递过去的是信息，我支持你，我等着你！”

后来，丽扎知道了在监狱高墙铁网内阴暗的牢房里发生的情景。

当李立三第一次接到丽扎送去的 50 卢布，大哭了一场。因为监狱中伙食极坏，几乎见不到蔬菜，李立三就是靠丽扎给他送来的钱，买来了蔬菜和生活日用必需品。

一种特殊的关爱，可以唤醒被禁闭的灵魂，李立三从丽扎的行动中感到莫大的温暖和支持，从而更增强了他奋力抗争的勇气。他一次又一次给斯大林和苏联内务部写信，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信，陈述他的冤屈，为自己的清白辩护。

新上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和来苏联治病的周恩来都正式出面，为李立三同志担保。

经过一年零九个月的煎熬，1939 年 11 月 4 日，李立三终于被无罪释放了。丽扎与自己心爱的亲人相见时，两人无声地紧紧拥抱在一起，好久好久。丽扎再也管不住涌出的泪水了，李立三也禁不住潸然泪下。这泪水是苦涩还是甘甜？是酸楚还是欣慰？只有顽强坚守的他们相信风雨过后，头顶会出现一片蓝天。

1945 年 5 月在延安召开的划时代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李立三并没有出席会议，毛泽东提到了李立三在历史上的功劳。毛泽东指出：

“至于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sup>⑯</sup>

1946 年 1 月，新当选中共七大中央委员的李立三从莫斯科回到了朝思暮盼的祖国，他担任了中共东北局的领导成员，落脚地就是中东铁路的枢纽哈尔滨。

1946 年 10 月，丽扎在盼望中接到了李立三的来信，被告知一切手续都已办理完备，可以启程来中国了。

此时的苏联，历经了工业化的建设，各方面都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人们的生活也比较稳定，担任中学教师的丽扎，工作很体面，收入也不错。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内战中，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生活贫困而落后。

许多朋友都跑来劝丽扎，如此一个陌生的国度满目疮痍，何必放

着舒适安宁的日子不过，而去飞蛾扑火自讨苦吃。等待这个国家解放了，再去也不晚啊。而且有人拉住丽扎的手不肯让她走，并对她说，你是一个女人，还要抱着才3岁的女儿上路，何必去冒险遭罪呢……

32岁的丽扎，毅然辞别了稳定的工作，抱着仅有3岁的女儿李英男，踏上了通往中国的列车。

列车冒着灰白色的烟尘，缓缓地启动了。

秋的景致天高云淡，一排排人字形的和平鸽在空中自由地盘旋，忽高忽低，忽快忽慢，不时地发出悦耳的鸽哨声。

丽扎望着车窗外，看着那掠过的一片片正在拔地而起的雄伟的建筑，和远处一排排挺拔高耸的桦木林，驿动的心难以平静，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而且要走出国门。

即将要辞别自己的祖国，要告别生于斯长于斯的莫斯科，在这片土地上，有过许多难忘的回忆，沉淀了许多苦辣和酸甜，欢笑和泪水，幻想和憧憬，自己和这片土地紧紧地糅在一起。故土难离，依依难舍，生活中难免有苦难的旋涡和风浪，总有亲人和朋友伸出援手，用拳拳的爱心来帮助自己抚平伤痕。如今远离了亲友，相见时难别亦难，依依惜别，充满眷恋。

随着火车风驰电掣般的开行，丽扎按捺不住翻腾的思绪，禁不住泪湿眼角。

转念一想，丽扎对人生的转折点又充满了希望，因为她坚守着一个不动摇的信念，丈夫在哪里，我就要到哪里去，我已经是中国的儿媳妇，要适应那句中国俗话，夫唱妇随。

火车穿越了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来到了国境线中国一侧的小城满洲里。

十月下旬的满洲里，已是冷风瑟瑟，雪花飘飘。

在积雪的路上，依然有三五成群贩卖干草的俄侨在赶着马车向国境线前行。那垛满了一层又一层枯黄色干草的马车，颤颤悠悠地在雪地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

丽扎凝望着一车又一车满载干草的马车，想起15年前李立三被累累垂垂的干草覆盖起来，压在最下面，扎破了脸，挤压得透不出气

来，冒险偷越国境的情景，她似乎感同身受，如芒在背如刺在身，呼吸都费劲了，禁不住唏嘘喟叹。同时，她对丈夫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追寻心中的梦想，不惧艰险义无反顾的革命精神更是平添了几分敬重。

丽扎在满洲里换乘中东铁路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她看到中俄国境线一线之隔却明显地隔开了两个世界。

再也看不到苏联那边繁荣宁静的景象，车窗外陌生的中国萧条荒凉，远处是炸成一片废墟的屋舍。

火车猛地一晃，车厢内一片大乱。原来是天上飞机投下的炸弹在铁路不远处轰然腾起一片浓浓的黑烟尘雾。倏忽间，车厢内惊慌的呼喊声哭叫声像炸了锅一样，整个车厢被恐怖的氛围所笼罩。

丽扎抱着李英男趴在了座椅的下面，她的心都已提到嗓子眼里，浑身抖动着，她已想好，一旦遇到不测，她就用自己的身体为3岁的女儿撑起保护伞。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火车又开动了，在一路上担惊受怕的走走停停中，火车总算抵达了哈尔滨。

李莎说：“当年，我是坐火车，火车从满洲里到哈尔滨，一路上险象环生。我们上了火车就听到警告，有枪声就趴下。那时在火车上能看到国民党的飞机在天空盘旋，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投下炸弹的，如果炸弹投在了火车上，我们就没命了。”

正是基于对丈夫的厚爱和忠诚，对李立三所从事的革命大业的支持，丽扎才勇往直前置危险于不顾。

哈尔滨成为了李立三和丽扎人生命运的转折点，也成为他们再创辉煌的起点。

重新回到国内的李立三，几乎是废寝忘食奋力拼搏，为迎接新中国的解放忘我工作。

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李莎从莫斯科来到中国后第一个落脚地是哈尔滨。她对弥漫着欧式和俄式建筑风情，被称为“东方莫斯科”的这座城市，感觉如第二

故乡般亲切，对这里的生活习俗也很适应，她还在哈尔滨生下了第二个女儿。

回忆在哈尔滨的生活，耄耋之年的李莎记忆犹新。她颇有感触地说：“我原来的名字很长，叫叶丽莎薇塔·巴甫洛夫娜·基会金娜。我的乳名叫丽扎，李立三根据我的乳名，叫我的中文名字为李莎。李立三说，好，我以后就叫你李莎。我的名字李莎就是在哈尔滨开始叫的。”

年迈的李莎，也还清楚地记得她在哈尔滨居住的地方，当有人问起时，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铁岭街 11 号。”

李莎的名字始于哈尔滨，李莎一生在中国所从事的俄语教学事业，也是开始于哈尔滨这个欧化的城市。

随着解放战争胜利推进，未来的新中国无疑需要大批外语尤其是俄语人才，黑龙江大学的前身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也随之诞生，毕业于莫斯科外国语学院的高才生李莎承担起教授俄语的重任。1946 年底，李莎成为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最早的俄语教师之一，她的名字和教学的照片都被镌刻在黑龙江大学校史馆的展厅展板上和史册中。她所精心培养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的外交人才和俄语教学的骨干力量。

身为首长夫人，李莎谢绝车接车送。李莎曾边翻看黑龙江大学赠送给她的纪念画册边对来访者说：“我当时上班跟百姓一样，坐有轨电车往来南岗。我非常热爱教育事业，尤其哈外专是军队编制，穿的都是军队服装。有些学生基础差一些，可学习的热情挺高，也肯于钻研，他们是为即将解放的新中国而学习，我很喜欢这些学生，所以我给他们上课也很投入，也非常带劲。”

李莎在哈外专教过的学生之一，黑龙江大学俄文教授 80 多岁的刘敏，语带感激地说：“当时，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学俄语很难，李莎老师热情生动的教学使我们提高了信心。她给我们讲苏联文学，选了一首普希金的诗，她的朗诵声情并茂，激发了我们的情感，这帮学生就会了。直到今天，我还能把这首诗背下来……”

1949 年 4 月，在赴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后，李立三的工作

由中共东北局调入党中央，李莎随同李立三离开了生活近三年的哈尔滨去往北京。

在北京香山，毛主席同李立三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通过谈话，毛主席对李立三患难夫妻的经历有了了解。

李莎在北京香山见到了毛主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使李莎终生难忘：“我见到毛主席非常高兴，他还关心地问我来到中国后怎么样，生活是否习惯了，毛主席同我亲切握手，还说了一句好同志！听了这句好同志，我很激动，心里想啊，好同志，是说我吗？”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在开国大典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前排左起刘少奇、毛泽东、刘伯承、陈毅、李立三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sup>⑩</sup>照片印证了李立三当时所处的重要位置。

新中国诞生，让有着特殊经历的李立三更加激发了革命的斗志和激情，他鞠躬尽瘁，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

建国后，李立三长期担任各种领导职务，曾在一段时期内，享受国务院副总理的待遇。

191

有时，政治形势是错综复杂的，因为中苏关系出现了新变化，甚至变得严峻紧张。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俄罗斯人李莎成为了怀疑的对象，有人出面劝李立三应该和李莎办理离婚来划清界线。李立三顶住了压力，并且说我是相信李莎的，我在落难的时候，年轻的李莎没有背叛我，同样，我也不会抛弃李莎的。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李立三和李莎都被打成“苏修特务”。

1967年6月22日，这一天，是李立三一家永远难以忘怀的最伤心和揪心的日子。

这天上午，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关押地被迫害致死，这一天下午，不知中国丈夫死活的李莎，被押解到了秦城监狱。

无论岁月怎样更迭，无论面对李立三政治上绚丽的光环，还是残酷的阴影，李莎对李立三爱情的忠贞从来不变。

李莎感觉和李立三在一起的命运如同过山车，忽高忽低剧烈动荡，可是她心中的那份爱却是永恒的。

在监狱中，李莎与审讯人员经常重复这样的对话：

“你要老实交代李立三的罪行！”

“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李立三没有罪，我不能无中生有。”

“你不老实，就别想从这里出去！”

“你们迟早会知道，是你们错了。”

“你是中央委员的老婆，没有根据我们能抓你吗？”

.....

不论怎样威逼利诱，李莎始终没有对李立三说一个不字。

审讯人员厌倦了，不再理睬顽固不化的李莎。顽固不化的李莎换来的结果，是押在监狱的时间竟然长达 12 年。没有人对话，李莎几乎不会说话了，也不会走路了，满头褐黄色的长发变成了满头的白发，她却硬撑着过来了。这位俄罗斯女性深深地相信中国那句话：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出现。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980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李立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推翻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李立三的一切罪名，彻底平反并恢复李立三的名誉，同时高度评价了李立三辉煌的革命业绩。

李莎看到了风雨过后的彩虹，她落泪了。这一天，竟然是李莎的生日。李莎对家人说，李立三彻底平反，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李莎将一生的心血和挚爱都倾注在俄语研究和教学中，她从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的讲台换成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讲台，她在讲台上辛勤耕耘，诲人不倦，孜孜以求，乐此不疲。直至 80 岁时，她依然担负着繁重的课时，还是笑容满面地站在讲台上。82 岁时，李莎在讲课中突发心脏病才不得不离开心爱的讲台，这时她从事教学已然达半个世纪。

作为国内外著名的俄语教授和专家，李莎培养的学生无计其数，可谓桃李满天下。黑龙江大学俄语教授、荣获全国名师称号的邓军，

就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李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培养的研究生之一。邓军曾说过，没有李莎教授悉心地指引我，就没有我的今天，李莎是我的“亲”老师。李莎还多次应邀为全国优秀俄语教师开办研讨班，并主持编撰了多部俄语教学理论研究的专著，为发展中国的俄语研究和教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李莎在 90 岁时，还带病为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所著的《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承担了俄文译本的审阅把关的重担，此书还曾由有关部门赠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朋友交谈时，李莎曾说过，毛主席和我握手时说过的那句好同志，我要努力做到名副其实。李莎热爱公益事业，并尽心尽力去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她还曾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这位俄罗斯女性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党和国家对李莎也给予了特殊的关怀和高度评价。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和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先后看望过李莎。

2008 年 7 月初，94 岁的李莎应青岛市的邀请，从北京来到了她曾经陪同李立三数次来过的这座海滨城市。

正是青岛最美的时节，大自然在这个时节为这座依山傍海的城市涂抹了绚丽缤纷的色彩。整座城市绿茵茵，碧沉沉，繁花似锦，海边的栈桥公园更是游人如织熙熙攘攘。

李莎下榻在被称为“八大处”的疗养区，这里相对幽静一些。

94 岁的李莎执意要去看看大海，她太喜欢大海了，海的浩瀚博大，使她感悟很多。每每看到大海，她都会想到那句话：比海洋更广阔的应该是人的心灵。

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李莎健步来到了海边。

蓝蓝的天空下，一束束闪烁的阳光倾洒在辽阔的海面上，此起彼伏的波涛溢彩流金，银白色的海鸥贴着海面在悠悠地盘旋。

李莎伫立在沙滩上凝望着大海，或许她会想到俄罗斯的黑海。在滚滚波涛的黑海，她和李立三在海水中并肩游泳，在海边手牵手散步，还共同背诵着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那时年轻的他们会放声喊出《海燕》的名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是啊，沧桑多变，风雨人生，跨国之恋，忠贞不渝。

和中国丈夫李立三在一起的情景恍若眼前，李立三却已离开她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了，她觉得李立三并没有走远，她在家中闲暇时，常常抚摸着李立三生前喜欢的工艺品睹物思人。在客厅里悬挂的李立三照片前，她的心里总有对丈夫说不完的话。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枕着李立三的名字一梦百年。

李莎上车返回宾馆时，车轮刚启动，晴天竟下起瓢泼大雨，雨来得急停得也快，她不经意间回头望着不远处的大海，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大家也不由地转过身去望着大海，于是相互都会心地笑了。

一阵急风骤雨过后，有两道彩虹正在宽阔的海面冉冉升起……

2014年3月20日，是李莎整整100周岁的生日。众多友人与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通了电话，请她转达对李莎由衷的祝福：祝她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李立三与周恩来赴六大途中在哈尔滨长谈时用的大茶缸，现藏于李立三纪念馆

## 第九章 六大从这里出发

201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进程和事业发展都有重大意义。习近平还提到，六大代表奔赴万里之遥的莫斯科，一路上历尽了艰辛。

回溯历史，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将国共第一次合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成果毁于一旦。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挥舞屠刀，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地方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

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大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钊、张太雷、向警予、罗亦农、赵世炎、马骏、陈延年、陈乔年、陈铁军、周文雍等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就是在此期间壮烈牺牲的。

血雨腥风，乌云翻滚，革命处于艰难的低潮时期。一些意志薄弱者在白色恐怖中，变得沮丧彷徨，看不到前途，退出革命。

同时，革命已经进入低潮，许多人却认识不到，脱离实际地去搞一些冒险的斗争，带来不必要的牺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愤怒回应，因为很多同志死在敌人屠刀下，使别的同志产生了一种去拼命的冲动。这种“左”倾情绪，在当时的革命内部是相当普遍的，可以说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历史现象。

反革命势力气焰嚣张，革命力量浴血抗争，在这样严峻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大，总结革命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研究和制定今后的革命方向和路线。这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当时国内几乎找不到召开六大的安全地方，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决定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六大。

怎样才能使全国各地的代表安全地奔赴万里之遥的苏联首都莫斯科呢，中东铁路的历史作用出现了。它几乎是中共六大代表远赴莫斯科的唯一途径。

“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那么六大代表要到莫斯科去，怎么去啊，只有通过这条红色之路，一个是从满洲里出境，一个是从绥芬河出境。”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常好礼这样说。

当时中国通往苏联唯一的一条铁路，就是中东铁路。中东铁路这条连接两国的铁路，也成了六大代表跨越国界的红色通道。如果没有这条铁路作为载体，中共六大在异国他乡召开，是不可想象的。如此用途，是当年的沙俄在修筑这条铁路时，做梦都不会想到的。

当时，中共中央在中东铁路的枢纽和中转站哈尔滨设立了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由哈尔滨地下党组织负责，同时委派瞿秋白的夫人时任中央委员、中央妇女部部长的杨之华协助工作。

197

在人流如潮，欧式建筑鳞次栉比，繁华热闹的百年老街——哈尔滨中央大街的拐角处，现在的红专街14号，有一处非常重要的革命旧址：中共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

哈尔滨被称为“东方莫斯科”，就是因典型的溢满欧式俄式风俗风情如同异国街市的中央大街而得名的。当年这条街不时响起俄罗斯的风琴和口琴的旋律，欧洲人尤其是俄国人在这条面包形状铺展开的方石路上川流不息。如今这里依然是最吸引中外游客的百年老街，但在匆匆行走的人群中，很少有人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红专街14号建筑上镌刻的标明革命旧址的那块牌子。

挂牌子的旧址这条街当年叫面包街，或许街名缘于毗邻的中央大街方石路，与那一块块如同面包形状的方石有关。革命旧址原来是一处临街的平房，如今此地早已建成了楼房。岁月改变了建筑的容颜，却改变不了哈尔滨曾和中共六大的紧密联系。

当年这处临街的平房尽管普普通通，却是汇聚全国各地六大代表

的秘密接待站，是六大前哨阵地，是直接影响和关系到党的六大能否顺利召开的红色驿站。

这座平房是当时哈尔滨县委共产党员阮节庵和沈允慈的家。阮节庵在哈尔滨广播电台工作，沈允慈在哈尔滨电报局做打字员，夫妻二人都有着公开的比较体面的工作，对掩护他们的身份十分有利，他们的家作为秘密交通站是十分可靠的。

他们的家紧挨着喧嚣热闹车水马龙的中央大街，表面看太显眼了，但有一句话说得好，越是危险的地带越安全。

各地的六大代表，根据中央的安排，先后秘密汇聚到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大致四人分为一组分批出发，从上海坐船到大连，然后换乘火车到哈尔滨。从1928年4月初开始，就陆续有六大代表开始启程了。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寸土寸金的街面上靠近马迭尔宾馆处，有一家卖旧衣服的商店。和那些卖洋货和时髦用品的华丽商店相比，这家门面不大的小商店，顾客不算太多。店员小白是一位朝鲜人，汉语说得很流畅，俄语也不陌生，反应也很机敏，他在前面招呼和迎接过往的顾客。站在柜台里面手持算盘老板身份的人，看上去很年轻，却显得成熟稳健。

每当有外地打扮的顾客，边试探着挑选旧衣服边观察着店里的人时，小白便不经意地走上前，用外人不在意只有自己人明白的手势进行联系。确认身份后，小白就会对老板说：“这位先生挑的衣服，用不用到试衣间去试一试？”老板会笑着说：“总得让人家试一试，看看合适不合适，满意不满意嘛。”

这时老板就会走出柜台亲自帮着拿起顾客选好的旧衣服，满脸含笑地带着顾客走进一间与外面隔离的隐蔽的试衣室，此时顾客便会掏出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于是老板和顾客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种接头暗号的方式类似于惊险小说的场面，恐怕电视剧也虚构不出这样的情节。可是在那险象环生的时期，这种看似简单但神秘的接头方式，却可以规避风险，最大限度地保障代表们的安全。

这位仅有22岁的老板，就是负责接待六大代表的哈尔滨县委书记

李纪渊，而店员小白，则是共青团哈尔滨县委的负责人之一。

李纪渊是辽宁人，1925年在北京读书时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培养干部的高等学校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的教务长是瞿秋白，邓中夏担任校务长，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陈望道等都先后在上海大学任教。1927年李纪渊被组织上派遣来东北，先在大连任共青团地委书记，之后来到哈尔滨，先后担任共青团北满地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县委书记。

六大代表接上关系后，就会由工作人员小白安排到一街之隔的那座平房里落脚，由哈尔滨县委委员阮节庵和沈允慈出面接待。

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受党中央的委派，协助哈尔滨县委做接待六大代表的工作，因此她启程得比较早，她是带着7岁的女儿瞿独伊从上海坐船到大连然后坐火车来哈尔滨的。她和同行的罗亦农爱人李文宜都戴着假发髻，装扮成农村妇女，还有两位男同志同行，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湖北人。尽管一路上小心翼翼格外谨慎，还是遇到过意想不到的麻烦。

杨之华这位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在“文革”浩劫中被迫害致死。杨之华生前撰写过文章《在哈尔滨护送六大代表的回忆》<sup>⑤1</sup>，这篇珍贵的回忆文章，使尘封已久扑朔迷离的那段往事得以清晰地浮现出来。杨之华写道：“我们到达大连也受到了盘查，敌人扣押了我们一天，反复地追问我们的来历。当时我们很紧张，唯恐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最后，敌人问我是不是贩卖人口的（因为当时我带着我7岁的女儿），我才放了心。我说：‘她是我的女儿，你们不信，可以验血型。’敌人就放了我们。这一天我们都还没有吃到饭。我们上了火车，列车上也戒备森严，奉系军阀的士兵走来走去。我们怕说话出问题（四个人的口音不同，又都是南方人），所以也不敢在车上买东西吃，把我的女儿饿得哇哇直哭。一直等火车到了长春，天黑下来了，我们才在车站上买了几盒‘旅行饭’吃。到了哈尔滨，我带着孩子住在道里中央大街附近的一处平房里，当时哈尔滨有一位交通联络员是一个汉语讲得很流利的朝鲜族同志，叫小白，还有别的同志。每个代表抵哈后，都由小白或是别的同志通知我，因为我带着孩子便于

掩护……”

平房的主人阮节庵和沈允慈是非常忙碌的，他们既要负责照顾代表们的生活，又要为代表们买好火车票办好出国手续。到了夜晚他们便悄悄地离开自己的家，到朋友家借宿，以便腾出房间让代表们落脚休息。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还能够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是一间平房，我妈妈让代表们睡在里边床上，妈妈和我睡在地板上。妈妈告诉我，有人问和我们在一起的男人是谁，不叫叔叔，要叫爸爸。我当时不知道是为了掩护代表，后来完成任务后，我奇怪地问妈妈，我怎么这么多的爸爸呀？”

有时，时间的阴差阳错，真是耐人寻味。

恰恰在杨之华母女到来的前几天，瞿秋白到了哈尔滨，也是住在了这间平房里。

接待瞿秋白的是哈尔滨县委书记李纪渊，两年前李纪渊在上海大学学习时，他就对给他们讲过课、集博学儒雅睿智刚毅于一身的教务长瞿秋白印象很深，格外敬重，如今师生在哈尔滨相见倍感亲切和欣慰。

难得的相逢，李纪渊想要请昔日的教务长瞿秋白吃点丰盛的饭菜，可是重任在肩的瞿秋白婉言谢绝了。在一家小饭馆吃过简单的晚饭后，李纪渊陪同瞿秋白走在中央大街上。

由于瞿秋白讲话是明显的南方口音，怕引起别人注意，他和李纪渊一前一后地行走，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李纪渊若无其事地走在瞿秋白的身后，表面上很悠闲，却随时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因为他接待的瞿秋白是提前要赴苏联筹备六大的党中央重要领导。夜幕下的中央大街，灯光闪烁，人流涌动，多数都是黄头发蓝眼珠高鼻梁的洋人在逛街购物，还不时传来街头艺人拉手风琴的旋律。但毕竟是在形势严峻复杂暗流涌动的时期，一丝也不能放松警惕。

走在路上的瞿秋白对周围街道很熟悉，不听他的口音，很难想到他是一个外地人。

瞿秋白 21 岁时便来过哈尔滨，当时他的身份是北京《晨报》和上

海《时事新报》特聘赴苏俄采访的记者。他在哈尔滨生活过五十多天。

他在哈尔滨的五十多天里，对哈尔滨的民风民俗和特有的西洋文化有了很透彻的了解，对哈尔滨的街道也是非常熟悉。他在哈尔滨第一次听到《国际歌》，在哈尔滨撰写了著名的《饿乡纪程》一书的前八章，他在深入采访后将多达 13 篇的通讯稿发表在北京、上海的报刊上。

他曾与在哈尔滨的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在松花江上聚会划船，因为他下榻的旅馆福顺客栈就在道里地段街，毗邻中央大街，他曾多次走过中央大街。

光阴荏苒，八年过去了，瞿秋白已从一介书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八年后，走在中央大街上，旧地重游，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瞿秋白，或许会有很多的感慨和联想。

很快，李纪渊陪同瞿秋白来到了中央大街拐角处位于面包街临街的平房里。

在阮节庵的家中，瞿秋白殷殷叮嘱李纪渊要想方设法做好六大代表到哈尔滨后的接待工作，尽全力保证他们安全赴苏。

这段往事，解放后被阮节庵写在了回忆文章中。阮节庵在 1963 年 11 月撰写的《关于哈尔滨地下工作回忆》中写道：“1928 年 4 月间，是个晚上，李纪渊领着瞿秋白到我家，在一起简单谈了一次话。后李纪渊让我照顾好瞿秋白，他先走了。瞿秋白在我家住了一宿。当时说是瞿秋白自己从上海坐船去莫斯科了，那是工作艺术，是为了掩护瞿秋白，实际是从哈尔滨走的。”

瞿秋白知道杨之华带着女儿瞿独伊很快就会来到哈尔滨，他稍作停留，一家三口就可以在哈尔滨团聚。可是肩负重任的瞿秋白难以顾及儿女情长，他马上离开了哈尔滨，远赴苏联莫斯科去提前联系共产国际，做好六大筹备的相关工作。

住在中央大街拐角处平房里的年仅 7 岁的瞿独伊，协助妈妈杨之华做代表的掩护工作，当她向男代表叫“爸爸”的时候，当她和妈妈在地板上睡觉的时候，她想象不到这间房子里也留下过自己想念的爸

爸的身影和足迹。

多数六代表都是从上海坐轮船到大连，然后换乘火车来到哈尔滨。一路上盘查很紧，而且从船上就开始出现紧张的状况，险情时有发生。

1928年4月下旬，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出发前，接到中央特科的紧急通知，说他们在上海的住处已不安全，必须立即转移，正好他们就此踏上前往六大的旅途。为避免发生意外，组织上给他们预订了头等舱。

周恩来留着长须穿着长袍，装扮成一名古玩商人，邓颖超穿了一件半旧旗袍，两个人登上一艘由上海开往大连的日本轮船。

因走得匆忙，准备好的衣服包括邓颖超外借的两件漂亮的旗袍，都没来得及携带，仅带了一个小手提箱。

辽阔的大海，不时卷起层层的海浪。坐在轮船的头等舱内，感到宽敞舒适和平稳。按照坐头等舱的条件，客人们每天都要更换衣服，男士们或是西装革履，系着新换的领带，或是身着质地考究的长袍马褂，戴着金丝眼镜，显得有钱有势很体面的样子。至于女士，佩戴着明晃晃的首饰，流露着珠光宝气的同时，还要再加上时尚华丽的着装，显得光鲜亮丽。

周恩来和邓颖超却无衣可换，老穿着他们上船时的一套普通衣衫，显得与身份不符。他们又没法躲在舱内不出来，坐头等舱的客人，每餐必须到餐厅用餐，有两个客人在就餐时总是注视他们。

那两人听口音是天津人，看身份是商人。机警、沉着的周恩来、邓颖超在他们注视下神情自若，进餐时谈谈笑笑，就如同一对出门旅行的商人夫妇。回到船舱，邓颖超担心地问周恩来：“你看，餐厅吃饭时那两个天津口音的商人，是不是认出我们来了？”周恩来沉着地说：“沉住气，我离开天津八年，你离开天津三年了，现在我们的容貌打扮已经和我们当年在天津时大不相同，他们不一定认得出来。”

邓颖超轻轻叹口气说：“这次偏偏走得匆忙，连别人好意借给我穿的衣服都没有带上。我们这身打扮跟头等舱的客人身份实在不相称。”

周恩来淡然一笑，说道：“事到如今，只能沉着应对，你我都演过戏，只要下决心‘演戏’，我这个古玩商人保险不露马脚，你这位太太可要配合好啊。”邓颖超点了点头。

轮船慢慢地停靠在青岛码头，允许乘客上岸，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走进市区吃了午饭，顺便买了几件像样的衣服，又买了青岛各种报纸带回船舱。这一次，又引起了日本方面安排在船上的密探的注意，一对商人夫妇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报纸呢？

原来注视他们的操着天津口音的两位商人，不是寻常的乘客，而是日本方面的密探。这两位密探一直在暗中窥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行踪。

轮船经过长途颠簸，终于到了大连。乘客们经过连续几天几夜的海上航行，早已对单一不变的海上景色感到厌烦，此时如同出笼的鸟儿纷纷拥上岸边。

在拥挤的人流中，正准备上岸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却被驻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厅派来的几个人挡住了去路。他们首先不客气地问周恩来：“你是干什么的？”周恩来沉着回答：“做古玩生意的。”“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一个留着东洋式小胡子的家伙，指着桌子上放着的一堆报纸气势汹汹地问。周恩来平静地回答：“在船上没事看看报纸，消遣消遣。”邓颖超灵机一动，在一旁插话说：“我先生也做股票生意，报纸上天天都有股票行情，我们不能不留意看啊。”邓颖超这句生意经的行话，让日本警察无话可说。

“你们到哪里去？”日本警察紧追不舍地问。

“去吉林。”周恩来坦然回答。

“到吉林去干什么？”

“去看舅舅。”周恩来从容地回答。

“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几个警察站起来，不由分说，要带走周恩来。邓颖超紧张了，站起来说：“我也一起去吧。”

周恩来瞪了邓颖超一眼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大概是误会，我一会儿就回来的。”

周恩来又对水上警察厅那个官员说：“麻烦你们帮我的太太找个旅馆，并请你们送她到旅馆先住下。”他又像个做惯大生意的阔商人

那样，加上一句：“要大连最好的旅馆，我的太太最讲究卫生。”周恩来那副颐指气使的有钱商人的气派，一时竟镇住了那些日本水上警察。他们慌忙点头哈腰：“请放心，我们送太太到大和旅馆，那是大连最好的旅馆，是我们日本人开设的，卫生条件很好很好，太太一定满意！”

邓颖超无奈，只得强作镇静。望着周恩来跟着几个日本警察上岸，坐进一辆小汽车走了，她的心也随着周恩来而去。但她还必须装出阔太太受了委屈的样子，随一名警察上岸。警察为她要了一辆出租车，送她到旅馆。开了房间，邓颖超焦急地等候着周恩来。她待在陈设豪华的房间里，坐在软软的沙发上，如坐针毡。

周恩来被带到日本水上警察厅，在那里，警察又详细询问了周恩来的出生年月，学历职业。

“你到东北究竟干什么？”日本警察眯缝着双眼问。

“去看舅舅！”周恩来平静地回答。

“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姓周，叫周曼青，在吉林省财政厅任科员。”

“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

“先生是留学英国的吧，把叔叔同舅舅分不清了。”

“我看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

“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那警官霍地站起，仔细查看周恩来的双手。那双手文雅修长，没有拿枪的痕迹。

看过周恩来的双手后，日本警官打开抽屉，取出几张卡片，翻来覆去地看，突然说道：“你是周恩来！”

周恩来泰然自若，坦然问道：“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和周恩来毫不相干。只是我舅舅姓周而已。”

日本警官实拿不出什么证据，也查找出任何破绽，只好放走了周恩来。

时间真是难挨，两个小时刚过，房门一响，周恩来平安无事推门进来了。邓颖超高兴得正想从沙发上跳起来，周恩来用手在嘴唇上按

了一下，示意她不要作声。只听周恩来大声说：“我可真累了，想马上洗个澡。你到卫生间放水吧！”然后他又低声说：“立即销毁接头证件！”邓颖超马上找出证件，到卫生间撕碎，投入抽水马桶，放水冲掉了。她又放了洗澡水，大声叫周恩来：“洗澡水放好了，快来洗吧！”周恩来进了卫生间，邓颖超指指抽水马桶，周恩来明白了，两人相视一笑。

接下来，周恩来买了两张下午去长春的车票，登上火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日本人用中国语同周恩来攀谈，实际这是跟踪他们的特务。周恩来在长春站要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要求交换，周恩来没有名片，但却装着去掏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很对不起。”说着，他又装出要去取小手提箱的样子，那个日本人连忙说：“不必了，不必了！”

汽笛长鸣，长春车站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很有礼貌地和那个跟踪的日本暗探告别。出站雇了一辆马车，在车上，邓颖超回头看看，小声说：“后边好像没有尾巴。”周恩来点点头，没有作声。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脱下西装，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接着和邓颖超又乘火车赶往吉林。周恩来说的舅舅其实是他的四伯父周贻赓（字曼青），说舅舅是斗争的需要，是在糊弄日本警察。他们去吉林是怕日本警察到吉林财政厅查问四伯父有没有姓王的外甥，四伯父回答不上来有可能出事。

周恩来从12岁起，就在东北四伯父家上小学，以后上天津南开学校，也由四伯父供养。周恩来对四伯父很孝敬，正好也来看看老人家。他们在四伯父家住了两天，刚巧，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也来到了吉林。周恩寿是哈尔滨中东铁路局的一名职员，他的家就住在哈尔滨道里公园（后改为兆麟公园）附近。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长大的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和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分别讲述了这段故事。

周秉德说：“我父亲是周恩寿，我是在哈尔滨出生的。我12岁进了中南海西花厅，和我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一起生活。我听他们讲过，当年他们商量好，我伯父先走，先去的哈尔滨，我伯母邓颖超既

是坚定的革命者，又很有人情味，她说她第一次到周家，作为周家儿媳妇要陪老人多住一两天。后来，我父亲陪着嫂子到了哈尔滨。因为伯父伯母他们的证件已销毁，只有等后一批到哈尔滨的六大代表李立三证明他们的身份。我父亲陪着嫂子邓颖超每天都到火车站，一连等了几天，没有等到李立三，嫂子真是着急了，但也只能是耐着性子去等候。一天在火车站出口处，她终于等到了李立三。”

李英男说：“我父亲李立三被邓颖超叫住后有点奇怪，低声说：‘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先行一步，快到了，怎么还在哈尔滨？’当他听说了事情经过后，就去证明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身份，帮他们与哈尔滨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

出席中共六大的共有 17 个省级代表团，其中满洲代表的是东北三省，顺直包括河北、天津、北京，江苏包括了上海，广东含海南岛。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当年的 17 个省级代表团，实际代表了 24 个省份。

各省选出的代表上报党中央，再由中央通知各地代表到上海集中。在上海秘密集中学习一周后，经周密划分，编成约 20 多个组。编组完成后，立即通知共产国际方面，然后分期分批参差出发。

罗章龙曾当选为中共第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其儿子罗平海曾和父亲罗章龙长期生活，对父亲的经历比较熟悉。他说：“我父亲参加六大和苏兆征分一个组，共 4 人，从上海坐轮船，途中上岸停留时，遭遇日本派出所警察盘查，但查无所获就放人了。在大连，他们换乘火车到哈尔滨，听父亲说过，当时东北形势非常紧张。”

罗章龙在《关于参加六大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坐火车到了苏联境内赤塔，先后有 10 余人，共住旅社一层楼。大家聚首一室共道途中经历，知道先前出发的一组同志 5 人，在大连登岸时，即被日本金州警察厅埠头派出所警察认为形迹可疑，带至派出所问话。警察劈头问道：‘你们是上海来的共产党吗？你们来关东州干什么的？’当时被问者故作镇定，把预先准备好的回答及表明正当身份

的证件拿出阅看，日警询问半小时，毫无破绽，即停止询问。后来在火车上遇见向忠发，他告诉我，他与吉光炯等过大连时亦被拘讯1小时始释……”

龚育之也曾回忆说：“我父亲龚饮冰是六大代表，在哈尔滨还做过交通站的工作，包括协助接送往返的六大代表。他是和蔡畅大姐、王仲一，还有一位姓郭的代表编在一个组，共四人，从上海坐船到大连，然后坐火车到哈尔滨。由于当时是白色恐怖时期，大连的码头日本势力很强盘查很严，这一路历尽艰辛很不好走，到了哈尔滨为了防止意外，接头方式也很隐蔽，听说是用火柴盒折断火柴做接头暗号。”

龚育之还说：“提到中东铁路，留下很多革命者的故事，尤其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条铁路更是承载了红色通道的重要作用。由于历史诸多原因，中央党史先搞了七大的研究，七大资料比较全，六大相关的研究正在搞，俄罗斯最近给提供了一些资料。尽管历史久远，六大代表也基本都不在了，史料也相对匮乏，但是深入挖掘和宣传六大相关的人和事，非常有意义。六大的历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最艰难的时期为中华民族崛起百折不挠的精神。”

当年，六大代表分期分批来到哈尔滨，哈尔滨地下党组织秘密接待代表的工作环环相扣，不容半点疏忽。

杨之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每个代表抵哈后，都是由李纪渊或小白通知我，然后我到公园或其他事先约好的地点和代表接头，对外就说我和来人是夫妻。为了避免别人的怀疑，我和每个代表住的地点并不总是一个地方。哈尔滨地下党组织安排我们有时在道里区，有时在道外区，有时也住旅馆，但大部分是住在同志家，就是中央大街拐角的那个平房。我和女儿睡在地板上，代表睡在里边床上。”

为了确保所有到哈的代表不出任何纰漏，一律采取夫妻身份作掩护。如果遇到同时抵哈男代表比较多的情况，哈尔滨县委就会及时安排地下党的其他女同志出面和男代表成双结对。

当时哈尔滨的形势也很紧张，尤其对于外来人员，警察和特务盘

查盯梢看得很紧。

考虑代表们南腔北调又是新面孔人生地不熟，一旦暴露或走露风声，可能随时被捕。牵一发动全身，将直接影响中央六大能否顺利召开，所以代表们一般不出门。吃的用的，办理出国手续和购买火车票等，都由哈尔滨县委承担。哈尔滨接待站还和满洲里及绥芬河接待站取得联系，为代表们精心准备了暗号牌，通常是 67 号或 69 号，与满洲里或绥芬河当地派出的马车排号相吻合。

解放后，阮节庵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些代表陆续来哈尔滨到我家来要‘号’，‘号’是李纪渊预先告诉我的，由我们告诉来人，这个号就是去莫斯科开会过国境的暗号，一共有四十多人。”<sup>⑫</sup>

代表们在哈尔滨停留几天后，便可启程。哈尔滨县委要必保每位代表上火车且都有专人护送全程。对于缺少人手的哈尔滨县委来说，可谓困难重重。但他们顶着压力，迎来送走了几十名六大代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28 年 5 月，满洲省委唐宏经、王福全、于治勋、朱秀春、李任光五位代表从沈阳来到了哈尔滨。由于他们对东北和中东铁路都很熟悉，哈尔滨县委就委托他们分别护送其他来自南方的六大代表从哈尔滨到满洲里或绥芬河。

2001 年，当时唯一健在的当年满洲省委六大代表，100 岁的唐宏经回忆起了这段往事。

那时，唐宏经身体依然比较硬朗，思维也比较清楚。老人回忆说：“1928 年 5 月，我们从沈阳坐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省委给了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 21 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中央大街）一家卖旧衣服的商店接头。接头后，哈尔滨地下党领导把我带到一个秘密的地方，见到了张国焘。张国焘说，你们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协助哈尔滨的党组织，护送南方代表过境，我回到旅馆后把中央的要求向他们四个人作了传达。

“我记得先后两次护送了广东、贵州还有江西代表团，每一次都是哈尔滨接待站负责办好手续买好车票，还给代表发了过境的号码牌。我带他们上火车，一路上他们尽量不说话，一切由我出头。哈尔

滨到满洲里火车要开一天一夜，下车后，满洲里也有交通员带我们，根据手中的号码，找到带号头的马车。马车前面挂着车灯，如果代表手中的号码牌和车灯的号码对上，就把手中的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了。送走代表，我在满洲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返回哈尔滨。”

边境小城满洲里。

在火车轨道旁边的中俄交界处那石头垒砌的高坡上，立有一块醒目的牌子，上面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红色交通线”十个大字。

上了高坡的平台，迎面矗立着一块硕大的花岗岩石碑，上面标明“红色之路简介”的字样。石碑旁边置放着几辆带有车灯标牌号码的马车，号码分别是67号或69号。马车的造型乃至车厢车灯，都很陈旧，斑驳陆离，很有岁月的沧桑感。当然这不大可能是当年六大代表坐过的马车，只是替代品而已。

离开了高坡平台的参观处，眼前是重新修建不久的雄伟壮观的国门。坐上电梯登上约有三层楼高的国门最上面宽阔的平台，向下望，是中俄两国的火车在国门的空间交叉穿梭，向前望，百米之遥便是俄罗斯的国门。

倏忽间，天空暗了下来，接着下起雨来，好在雨不算太大，雨丝随风摇曳淅淅沥沥。

向远望，国界线上连接着一大片辽阔的草地，除几个岗哨外，仅有零散的建筑物，开阔的草地绿草萋萋，道路崎岖，茫茫苍苍，漫无边际。

烟雨迷蒙的满洲里边境，让人感叹和遐思，八十多年前这里曾发生过的神秘而惊险的场面仿佛重现。

曾经在此地走过的罗章龙在其亲笔撰写的《关于参加六大的回忆》一文中，对那一幕是这样描述的：

“车抵满洲里，下车后，天气晴朗，交通员带大家分别缓步向一高大木栅门走去。正徘徊间，忽见一人执长鞭走近前来，细审面貌，知为事先约定迎候之人，遂尾随其后。行约十分钟，见道旁停有马车

十余辆，我们取出暗号牌，与马车车灯号码呼应，那执长鞭者看看我们暗号牌微微点头。

“这十余辆马车，中间一辆特别宽大，车前有栗色壮马四匹，车左边坐有一少年，环眼卷发，状极英武。持长鞭者伫足，略一注视，一跃登右边车座，我们见状，并紧随其后登车。坐定，少年驭者略一扬鞭，驷马昂首扬鬃，并驾齐驱，如风驰电掣，绝尘而去。

“车行半小时后，越过一广阔草原，即缘山岗前驰。山岗列碉堡一群，约每隔 500 公尺即有碉堡一座，堡上哨兵荷枪监视，碉堡外远有马队巡逻。

“此时驭者聚精会神驱车急驰。猝然响起枪声，我们都很难心，注意一听，枪声离得较远，而驭者并不算紧张，东躲西绕，颇有经验，穿插山丘溪谷间。

“约一小时后，行抵一山丘下停车。此时只见四马汗流浃背，毛片尽湿，驭者声称现已越过中国国境，进入苏联境内，可暂休息片刻再前进。

---

“从驭者谈话中知他们二人系父子，父子二人操此业驰骋于中苏国境线上已十余年，勇敢机智，驾轻就熟。

“我们下车稍憩，即有一位苏籍少年向导前来，引导我们四人步行前进，经过苏方岗哨，出示证件，毫无阻留。不久行抵一小车站，略进饮食，随即登上开往赤塔火车，向西续行。”

罗章龙的回忆文章，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过境的真实场景，尤其是堪称叫绝的赶车人那父子俩的形象，跃然纸上，跃然眼前，更跃然我们的心里，实在太感人了。马车上六大代表的生命安危都系于他们的手中，关键时刻，他们淡定从容让代表们一路平安。他们操此业驰骋中苏国境线已十余年，其间，他们迎送了多少往返红色之路的寻梦人啊！

英俊少年和父亲在一起互为依托，凭着超常的驾车技术和智慧机敏，在戒备森严气势汹汹的岗哨和巡逻队的眼皮底下，冒着生命危险为偷越国境的革命者迎来送往，真是值得记住他们。

罗章龙的诗集《椿园诗草》曾为这对父子俩写诗留念。罗章龙诗

的题目是《满洲里寄王熙春与谢黛茜》。

“一九二八年过满洲里赴苏，乘驷马车，御者楚伯洛夫父子。古之造父、王良流亚也。挥鞭疾驰，绝尘而去。”

息马垂鞭意态闲，胪滨破晓一星螺。  
轮蹄电掣惊风雨，造父骅骝共闯关。

在国内白色恐怖笼罩的形势下，哈尔滨也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但哈尔滨地下党组织没有辜负中央赋予的特殊使命，竭尽全力想方设法为六大代表保驾护航。

哈尔滨市中共党史大事记记载：当年哈尔滨六大秘密接待站先后接待了全国各地的六位代表共有四十多位，包括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罗章龙、李立三、蔡和森、夏曦等，并护送他们全都安全出境到达莫斯科。

中共中央党史第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李蓉博士指出：“哈尔滨党的地下组织为接待和护送党的六位代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哈尔滨党组织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也是对我们党的这一次代表大会所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在中共历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中，六大是唯一在国外召开的，也是唯一将全体代表的姓名都用编号来替代的大会。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六大代表名单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编号。从报到之日起，他们就不再使用自己的名字了。会议上发言要叫号，记录也只标明是几号发言，甚至领东西、分配住处、安排交通，也都以号为序。

代表们来到哈尔滨接头使用的是若干根火柴，过境时用的是标明数字的暗号牌，开会时人名使用的是编号，采用这一系列神秘的数字，是缘于安全保密的需要。

据史料记载，出于对代表们的安全考虑，大会组织者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当载有代表的列车抵达莫斯科时，代表们的包间都放下窗帘。待所有的旅客走光后，迎接代表的汽车直接开进火车站的站

台，把代表们从火车上接到汽车里再直接拉到会场门前，汽车一路上也挂着窗帘。代表们一到大会会址，立即换穿列宁服或西装，尽量不引人注意。

大会的会址设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一座花园式别墅里，别墅宽阔幽静，充满了古老的俄罗斯风情。这座三层楼房规模很大，这里也被称为五一村。

为什么大会的会址没有设在剧场、会场云集的莫斯科，而是秘密地设在交通不便的莫斯科远郊的五一村呢？原因还是出于对中方人员安全保护的考虑。因为那个时候莫斯科有很多外国记者和外国情报人员，如果消息走漏了，不利于中方人员的安全。

包括先期已经在苏联学习或工作的共有 142 位代表参加的中共六大，1928 年 6 月 18 日召开，历时一个多月。

中共六大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在党内思想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有人评论说，六大的召开，使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元气。

六大概不畏险阻，毅然冲破层层荆棘，征服重重困难，为了信仰和真理，为了中国未来的光明前途义无反顾。

中共六大是在中国历史关键时期统一全党思想的一个重要会议，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有关部门统计，1928 年召开六大时，全国党员人数是 9 万多人，1929 年 6 月六届二中全会后党员达到 12 万多人，1930 年 12 月，全国拥有的党员人数达到了 15 万。可见，党的六大后，中共党员人数逐步明显增加，革命的局面也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复兴。

中共六大其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早已镌刻在党的史册中，与之相关的传奇故事却穿越了时空，迄今还在延续。

当年邓颖超在哈尔滨火车站等到李立三后，一同来到道里公园（现兆麟公园）附近的周恩来弟弟周恩寿的家中。

李立三在周恩寿的家中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对李立三讲述了一路上遇险和脱险的经过。李立三听着听着，脸色都变了，连声说：

“好险！好险！恩来，你这一次，大约是你的大胡子帮了大忙。当然，主要是你的沉着、机智，还有小超配合得好。我知道你们在学校就演过话剧，都是演戏的能手。”

周恩来耸了耸肩膀摊开了双手不无幽默地说：“没办法，敌人盯得太紧一直跟踪盘查，只能假戏真做，靠演戏智斗嘛。”

说罢，大家哈哈大笑，共庆周恩来、邓颖超这次脱险。

周恩寿忙着找杯子倒水冲茶。

“就用这个大茶缸吧。”李立三一边说着一边从提包里掏出一个白色带红色提手，造型简单但做工精致的大瓷缸。

“噢，我认识，这是法国货。”周恩来用提手提起了大瓷缸，细细端详。

“恩来，有眼力啊。这个大瓷缸是我从法国带回国内的，外表是瓷的，瓷里包着铁，方便实用又结实。”李立三是准备将这个大瓷缸一直要带到六大会场的。

“好，好！就用这个缸子来冲茶。”周恩来对弟弟周恩寿指了指缸子说。

冉冉升腾的热气中，飘散着一缕缕的茶叶清香，银色的月光顺着窗棂倾泻在房间的大茶缸周围。

两位在法国留学时就曾相识相知，并在法国留学时一起加入了革命组织的老战友在哈尔滨见面倍感亲切，他们边饮茶边长谈，谈到很晚才分手。

第二天，李立三就帮助在遇险中销毁了所有证件的周恩来、邓颖超与哈尔滨的六大代表接待站接上了关系。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后来工作变动，家迁到了北京，在北京他也曾搬过几次家。在“文革”浩劫中，周恩寿也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可是不论岁月怎样更迭，怎样沧桑多变，他都一直分外珍惜并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个大茶缸。

周恩寿的女儿、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谈起了大茶缸的往事：

“李立三当年临走时留下了这个大茶缸，这个大茶缸是李立三和我伯父周恩来在哈尔滨喝茶时用过的，他们当时都是六大代表，那时是1928年。我父亲精心保留了好几十年，每次搬家都首先要保护好这个缸子，后来我父亲将这个大茶缸送给了李立三的夫人李莎。”

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眼中含着泪水也讲述了大茶缸的经历：“我去看望周总理的弟弟周恩寿，周叔叔当时住在医院，病情已很严重。他给我详细讲述了大茶缸的故事，最后他微笑着说，他是特别用心地保存了这个缸子，现在该完璧归赵了。我母亲接到这个大茶缸很激动很感谢周叔叔，也非常珍惜，特意放在我父亲挂像的桌子上，还做了一个玻璃罩给罩上。我母亲李莎时常望着我父亲的照片又望着这个缸子，睹物思人。后来，我母亲李莎决定将这个缸子送给李立三纪念馆，让更多人能看到这个文物，知道缸子的故事。”

位于湖南醴陵由胡耀邦题写馆名的李立三故居纪念馆，来这里的游客和参观者络绎不绝。曹培亮馆长介绍说这里有时还会接待一些法国的游客，因为他们知道李立三曾经在法国留学，所以他们挺有兴趣来这里了解一下李立三的经历。

在摆放着已被定为国家级文物的大茶缸前，讲解员正给一批中学生介绍着大茶缸背后的故事。

这个乳白色、提手和缸的开口周边都是红色的大茶缸，这个曾游历了国内外，在特定时刻装满了豪情，装满了珍惜，装满了怀念的大茶缸，耐人寻味，撩人情愫。

当年六大面临的形势云谲波诡，险象环生，连六大代表的姓名都用编号来代替，能够跨越时空保留下来原物，真真切切地见证八十多年前既无比艰辛又悲壮辉煌的历史过程，何其珍贵。

睹物思人，两位不寻常的六大代表在哈尔滨邂逅，用这个大茶缸沏茶畅饮，彻夜长谈的情景恍若眼前，此物印证了一代伟人处乱不惊力挽狂澜的过人智慧。

参加过中共六大的代表都已不在人世。2010年时瞿秋白、杨之华的女儿已89岁的瞿独伊，是唯一健在的见过六大会场的特殊见证者。

当年7岁的瞿独伊陪同母亲杨之华在哈尔滨为六大代表作掩护，

之后随母亲去了莫斯科。在母亲的带领下，她来到了位于莫斯科远郊五一村的六大会场，那是会议休息的时候。忆及当时的情景，瞿独伊记忆犹新：“会场设在别墅的二楼，那是个很大的豪华客厅，一排排整齐的长条凳子，主席台蒙着洁白的桌布，周恩来夫妻都在，我叫周恩来胡子爸爸，叫邓颖超小超阿姨，还有蔡和森、蔡畅、刘伯承、杨尚昆、李伯钊等，他们对我都很热情。正是会议休息期间，邓颖超和几位阿姨就教我唱歌跳舞，我记得是手把手地教我舞蹈，我跳会了，阿姨们就高兴地为我鼓掌加油。”

那时才7岁的瞿独伊不会明白父辈们召开六大的重要意义，更不懂为什么要跑那么远的路到国外去开会，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感受到了父辈们充满斗志还有乐观的精神。尤其是邓颖超等阿姨手把手教她跳舞蹈，节奏欢快舞姿美妙动人，让她的心中溢满了幸福。从那时起，瞿独伊就喜欢上了舞蹈，对舞蹈情有独钟，一往情深，舞蹈伴随了她的一生。

当有人问她，谁是你的舞蹈老师，她会骄傲地说，我的启蒙老师是六大女代表。瞿独伊的房间内摆放的各种荣誉证书，其中就有全国老年舞蹈大赛的奖牌，当有来访者禁不住问她现在还能跳吗，这位新华社的老记者竟然认真地邀请人家到外面看她的舞蹈表演。

在绿柳依依的庭院，只见年近九旬的瞿独伊舞姿优美轻盈飘逸，她还特意换了带钉眼的鞋子，居然跳起了节奏铿锵有力的踢踏舞，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是难以置信。这不由地让人产生联想和感叹，当年她的启蒙教练，那些六大女代表为这位女弟子注入的活力真是久久远远啊。

之后，瞿独伊还说，上世纪80年代，邓颖超在接见她时还问过她：“当年教你的舞蹈还没有忘吧？”

历经多年对中共六大相关的人和事进行深入寻访，在挖掘和整理之余，再次将目光投向哈尔滨中央大街拐角处那处重要的革命旧址，对六大接待站有了更多的感触。

放眼望去，在百年繁华的哈尔滨中央大街方石路上，仿佛依稀听

到了当年六大代表坚定而匆匆的脚步声，看到了哈尔滨地下党组织的革命者们机智勇敢奔波忙碌的身影。

早在 1928 年春夏之交，这条街就成为了红色之路的起点，就已经和当时世人向往的社会主义大本营苏联首都莫斯科紧紧相连了。

# 难忘的中共满洲省委 战斗岁月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

赵毅敏题时年九十八



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赵毅敏题字

第十章 隐蔽战线保畅通

长长的中东铁路，是当年中国通往十月革命故乡苏联唯一的一条铁路。赴苏的革命先驱除少数人坐船到海参崴再到莫斯科外，大多数人都选择走铁路。铁路和海路比，更方便也更节省时间。

各种反动势力绝不愿意看到这条铁路变成革命者来来去去的红色通道，变成传播革命火种的载体，他们将这条铁路严加看管，尤其是在边境地区更是戒备森严，虎视眈眈。

为了保证革命者往返的安全和红色之路的畅通，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国际在中东铁路沿线重要路段包括出入境口，建立了许多秘密交通站。

在云谲波诡的严峻形势下，隐蔽战线的同志们与敌人冒险周旋斗智斗勇，协助和护送革命者出入境，为此甚至付出了生命。

当年分布的秘密交通站可谓星罗棋布，如今大都旧址难寻。至于人和事，早已湮灭在岁月的沧桑中。

历经多年的挖掘和寻访，终于找到了一些当事人的后代，于是那些遥远模糊的往事，渐渐清晰起来。

2012年6月，盛夏的北京，有着中俄两国血统的张秀华、张忆伟和张道滨三姐弟，深情而生动地讲述着他们的中国父亲张宗伟和俄罗斯母亲阿格罗芙娜的感人故事，这段往事如卷起的连环画般被慢慢展开了……

俄罗斯，赤塔郊区的聂尔欣斯克村，是一个普普通通很幽静的小村庄。

1920年的秋天，村苏维埃主席家，组织上送来了一位中国伤病

员，他就是苏联红军华人支队的政委张宗伟。张宗伟是为捍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浴血奋战而负伤的。当时正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外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入侵，内有白匪军遥相呼应，企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村苏维埃主席的妹妹阿格罗芙娜主动帮助工作很忙的哥哥来悉心照料前额负伤的张宗伟。每次换药，她都分外认真而小心。当她为张宗伟前额缠绕纱布时，她的手都有些微微发抖，而且还会温柔地说：“你疼吗？忍一忍，上了药就会好些了。”张宗伟疼得脸上渗出汗珠，却还是硬撑着，并微笑说：“不疼，没事，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这种坚强打动了 26 岁的阿格罗芙娜，她一边为张宗伟的额头缠绕纱布，一边用羞涩的目光悄悄打量这位英俊而勇敢的中国人，心想他多了不起啊。二人渐渐熟悉起来，变得无话不说。阿格罗芙娜知道了张宗伟 17 岁就从中国山东贫苦的农民家庭出来，到海参崴来做工谋生。十月革命时参加了苏联红军游击队，转战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地，他到过列宁格勒、莫斯科，见过列宁，在战斗中他带领华人支队屡建战功。

当时苏联国内是战火不断，又赶上自然灾荒，百姓生活很拮据。阿格罗芙娜想办法弄些好吃的，自己不舍得吃一口，都用来为张宗伟补养身体，对张宗伟照料得是无微不至。

爱情的种子在阿格罗芙娜心中悄悄发芽，爱的脚步也叩醒了未婚的张宗伟诚实的心，二人相爱了。

为了不暴露身份，1921 年春天，在草长莺飞白桦林泛绿的时节，彼此相爱的他们转移到一江之隔一个名叫阿罗棋的村子，在那里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和英俊阳刚的中国男子汉结了婚。

在阿格罗芙娜的精心护理下，张宗伟伤口痊愈了，他对新婚的妻子疼爱有加。生活一直处于动荡，以前没有想在异国他乡安家的张宗伟已经是三十多岁了，现在他遇上了纯朴可爱又美丽的心上人，他暗下决心要为阿格罗芙娜当一把遮风挡雨的保护伞。

婚后不久，新娘听到了噩耗，由于表亲告密，她最亲爱的哥哥被反扑回村的白匪杀害了，阿格罗芙娜扑到丈夫的怀抱中痛哭不已，张

宗伟同样十分悲伤。他劝慰妻子说白匪的反扑是暂时的，胜利很快属于苏联人民。

张宗伟还紧紧拥抱着妻子，为她擦拭着眼泪，并发自肺腑地说，我会保护你一辈子的。阿格罗芙娜觉得丈夫温暖宽阔的肩膀是她今生今世可依傍的靠山。

正如张宗伟所预料的，苏联很快就打垮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进攻，自然灾荒也远离而去，人们开始过上了稳定而幸福的生活。

夫妻俩居住的阿罗棋村，依山靠水，土地很肥沃，战争结束了，张宗伟没有返回苏联红军部队去评功评奖，去要求组织上安排好的工作，而是默默地干起了小时候在山东农村种地的老本行，起早贪黑辛勤耕耘。妻子忙完家务，常来地头紧随其后，帮助丈夫侍弄长势喜人的庄稼。

远山如黛，流水淙淙，田园如画，人在景中，景伴人行。

阿格罗芙娜望着高大魁梧的中国丈夫，感觉虽然二人国度和民族乃至肤色都不同，但她是幸福的。幸福其实是无遮无拦的，它没有围墙，没有国界，就像朗月悬空，就像山坡上静静地吐着芬芳的花，幸福只需要一颗没有蒙尘的真心，需要一双没有偏见的眼睛。

心心相印的夫妻俩不久就有了自己的孩子。

1929年春天，张宗伟告别了长期生活和战斗过的第二故乡苏联，带着全家人回国，从满洲里入境，走中东铁路来到哈尔滨。

当时哈尔滨正处在封建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百姓生活水深火热。抛弃了苏联稳定而幸福的生活，阿格罗芙娜没有后悔。为了和丈夫不离不弃，她还加入了中国的国籍。

1931年，共产国际把张宗伟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党组织，张宗伟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至哈尔滨，张宗伟担任了中共满洲省委的交通员，他们住在南岗区儿童公园附近地下室的家，也成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满洲省委还在这里办过抗日军事训练班，抗日将领李兆麟、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等都在这里学习过。

当时满洲省委同上海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保持着联系。1933年秋，负责这项工作的交通员不幸被捕，省委决定让机警能干又擅长俄语的张宗伟接替这项工作。

张宗伟装扮成商人，以到外地跑买卖为由，奔走于哈尔滨与俄罗斯赤塔之间。因他对苏联的情况很熟悉，又在赤塔生活过，在满洲里出境时，很容易“蒙混过关”。同时，他又奔走于哈尔滨与上海之间，有时还要去大连、山东传递文件。他成为了漫长的中东铁路上的常客，奔波往返于中苏之间，传递和交换着满洲省委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的重要文件和信息。如此重任，考验着张宗伟的勇敢与智慧。

无论是到上海或是赤塔，沿途都关卡重重，他必须巧于周旋，随机应变。比如到上海要从东北走，途经华北，再到华东。这时日寇已对东北实行血腥统治，华北有地方军阀势力盘踞，上海则处于蒋介石政府的控制下，从黑龙江到上海，沿途盘查极严。

又要准备到上海去了，夜色越来越暗，孩子们都熟睡了。阿格罗芙娜在帮助丈夫装文件，她已经知道文件藏在什么地方比较安全了。张宗伟随身携带一只半旧的黄色藤箱，其秘密夹层可藏文件（这只黄色藤箱现陈列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文件都装妥了，阿格罗芙娜给藤箱里塞进几件刚刚洗过的旧衣服，把毛巾、肥皂和牙具放进去，还把摆在家里窗台上不怎么看的小说，扔箱里两本。

“这玩意儿，放里干啥？”张宗伟说。

“有坏蛋盘查，这也能帮你掩护呀。”阿格罗芙娜说完，又关心地凝视着不停咳嗽的丈夫说：“你有肺病，在外也别忘了吃药，处处当心，千万小心。”“我知道。”张宗伟边说边握住了阿格罗芙娜的双手。这双手曾经是白皙滑嫩的，现在却变得粗糙。这双手长年泡在水中，给别人洗衣服挣钱养家糊口。再看看妻子的脸，那曾经美丽动人的脸也变得有些憔悴，那双曾经清澈纯洁的蓝眼睛也平添了惦念牵挂的忧虑神色。妻子抛弃了在苏联较为舒适的生活，不远万里随自己来中国没有享到福而是遭了很多罪。这聚少离多的日子，让妻子带着孩子含辛茹苦在风雨中飘摇，自己曾经在心中许过愿要为妻子和这个家庭遮风挡雨，可是……

张宗伟想到这里，不禁心头一酸，将妻子拥在怀里，他要对妻子说些话，可是妻子用手轻轻捂住了他的嘴。丈夫要说的话，妻子全都在心中。

张宗伟又来到熟睡的孩子们跟前，逐个摸摸孩子们的头发和小脸蛋。他多么想常和孩子们在一起，给孩子更多的父爱，多尽一些父亲的责任和义务。他长眉毛下深邃的眼睛有些湿润，在敌人刀尖上穿行，吉凶难料，对孩子对家庭亏欠的真是太多了。阿格罗芙娜催促张宗伟该休息了，为远行的丈夫操着心的她彻夜未眠。

张宗伟上火车后一直没什么事，火车刚到山海关，不少军警突然上车搜查，怎么办？那些从苏联赤塔带回的文件还有省委的文件不能被敌人搜去。情急之中，张宗伟趁人不备将文件取出放在内衣里，又溜到厕所，将文件迅速地撕碎嚼烂吞到肚子里，回到车厢顺利通过了检查，到上海后他向党中央口述汇报了文件上的内容。

1936年春，正值日寇发动“七七”事变前夕，日伪强化治安，疯狂镇压反满抗日活动，对外来人员进行严密监视，稍有怀疑，便进行拘捕。敌伪特务机关集中的哈尔滨，白色恐怖笼罩全城，斗争环境越来越严酷。

这时，在哈尔滨道里炮队街（后来的通江街）108号平房新开了一家小铺，经营日常杂货，小铺的老板头戴礼帽，身穿褐色大褂，他就是我们熟悉的张宗伟。

其实，这是我党的一个秘密国际联络站，负责人就是张宗伟。随着中共哈尔滨特委成立，张宗伟被派做“特委交通局外国人会见处”的工作。当时，我党与共产国际保持经常联系，这个国际交通站专门负责接送和掩护从国外来的同志。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回国的留苏学生，或从苏联开会回国的同志。这些人一经到哈，很容易成为日伪监视的对象，这个联络站就是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迅速转移他们。

有一次，协助张宗伟工作的国际联络站的交通员向张宗伟汇报说，有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正准备来国际联络站接头，途中遇到了险情被敌人打伤后住进了市立医院。

张宗伟听到消息后，非常着急，可是隐蔽工作的性质，又不能亲自前去。思来想去，他只能委托妻子前去打探虚实。

阿格罗芙娜想办法借了一件白大褂穿在身上，手中还包了一个包袱，很快来到了市立医院。看门的宪兵怔了一下，欲上前阻拦，阿格罗芙娜用俄语说我是这里的护工，又指了指手中的包袱说，这是病人等着要换的衣服，边说边若无其事地走进医院。宪兵看是穿白大褂的女人，又是一位俄罗斯人，于是将信将疑，也没追赶。

进到医院后，阿格罗芙娜逐一推开病房的房门，仔细观察后，没有找到受伤的同志。

正有些焦虑和失望，阿格罗芙娜突然看见在医院走廊里面的角落，放置了一个白色的屏风挡住了去路，屏风的后面不时有扛枪的警察在晃动。于是阿格罗芙娜径直奔着这个方向走去，猛一推门，发现里面床上躺着一个伤势很重、沾满血迹的青年人。

警察拦住了阿格罗芙娜，厉声道：“已经和你们医院说过，这里是一位从苏联偷越过境的共党分子，不经我们允许不许进来。你怎么进来了？”

“我是新来的护工，想看看是不是需要我来护理病人。”

“不需要，赶快离开！”

就这样，阿格罗芙娜终于摸清了底细，她回来后向丈夫张宗伟详细诉说了情况，张宗伟迅速将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这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后被哈尔滨地下党组织想方设法营救出来。

就这样，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张宗伟以食杂店老板的公开身份接送和掩护了很多从苏联开会或学习回国的同志，使他们安全地离开奔赴各地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张宗伟经营的小铺，后屋有个很大的地窖，地窖名义上是小铺存放各种酒类饮料等货物的地方，实际上地窖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空的，这是防备意外情况发生，特意为过往的同志留下的藏身之地。

形势越来越紧张，为防备万一，张宗伟与家人分住。张宗伟不让相隔仅两条街的妻儿来小铺，有时来了也要走后门或以顾客的身份出现。一有动静，张宗伟就让亲人们马上离开或买点东西走开。

张宗伟的二女儿，曾经在国外大使馆工作过的 84 岁的张秀华回忆到此处，禁不住含着热泪说：“到小铺见到爸爸都不让叫爸爸。我母亲在这方面非常严格，告诉我们要记住，不管谁问你们爸爸做什么的，就说不知道，或者说不到外地去做生意了。”

连爸爸都不能叫，想念爸爸的女儿们当时很委屈，她们有时放学后到爸爸的小铺后屋去温习功课，即使在那儿睡着了，爸爸也总要把她们唤醒，送她们回家。

1937 年 4 月 15 日，日寇在哈尔滨全城开始了大检查、大搜捕，对革命爱国人士进行血腥镇压，这就是历史上的“四一五”事件。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魁叛变，使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际联络站随时有暴露的危险。恰恰在此时，有一个隐蔽战线的工作会议要在哈尔滨秘密召开，包括满洲里、绥芬河等地交通站的同志都要赶来开会，张宗伟还是这次会议的召集人。党内出现叛徒，事出突然，张宗伟紧急清理了文件，并在小铺门前的墙壁上挂上了一把扫帚。外人看是小铺卖扫帚，而实际上这是暗号，告诉内部同志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这天深夜，张宗伟坦诚地对妻子说：“最近要出事了，我已经做好了撤走的准备。”“那你为什么不赶快跑？”阿格罗芙娜急切地对丈夫说。“我绝对不能走，因为这里正安排一个会议，紧急通知已来不及，有的同志从外地来可能看不明白我在小铺打的暗号，我若先走了，敌人会抓住来这里的同志的。”张宗伟又深情地望着妻子说：“这些年你跟我受苦了，我没有保护好你和孩子们，真对不起你。一旦我出了事，你要好好拉扯孩子，生活无论多么苦，也要坚持下去，一定要等我们的人来。我们的人来了，他们一定会找你们的，那时候就会好的。”张宗伟的后几句话反复了两三次，他轻轻地拍了拍妻子的肩膀。

作为妻子的阿格罗芙娜抱着最小的孩子在街口远远地观察小铺的情况，到了晚间，夜色如墨，风雪交加，忐忑不安的她抱着孩子都不肯离去。第二天，她见到小铺开门了，她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她悄悄地为丈夫祈祷，希望上天保佑丈夫平安。

1937 年 4 月 20 日，在全城大搜捕的第五天，阿格罗芙娜从远处

望见日本宪兵包围了小铺，路旁停放着多辆汽车和摩托车。最可怕也是最坏的时刻还是到来了。阿格罗芙娜强作镇静走进小铺，一面说：

“掌柜的，我要买面包。”一面向张宗伟居住的后屋张望，屋里一个伪警察瞪了阿格罗芙娜一眼，哼了声：“不在。”阿格罗芙娜不顾一切地掀开门帘冲了进去，一眼望见屋里的丈夫双手已被戴上手铐，日本宪兵正在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张宗伟见到阿格罗芙娜没有说话，一个日本宪兵用力将阿格罗芙娜一把推了出去。

张秀华讲到这段往事，哽咽地说：“我听我妈讲，她早几天就跟我父亲讲让他走，父亲当时完全可以提前离开。可是父亲说：‘我不能走，如果我走了，要牺牲很多人。’出事那天，我妈就往里闯，喊着说，我要买面包，我天天在这儿买，我父亲连看我妈妈都不看。我父亲戴着手铐，被押在摩托车上带走了……”

这就是夫妻最后的一面，面对着和最亲爱的人永别，张宗伟表面上冷漠如冰，沉默无语，可滚烫的内心又会有多少话要说啊。最后一眼对心爱的人连看都不看，作为丈夫和父亲，这就是最大的爱，对妻儿最大的保护。

1937年7月26日，历尽严刑拷打威武不屈的张宗伟在太平桥圈河英勇就义，时年55岁。

张宗伟牺牲后留下五个孩子，最大的女儿15岁，最小的儿子1岁半。

阿格罗芙娜擦干了泪水，带着五个孩子过着窘迫的生活，历尽艰辛和煎熬。

张秀华说：“我们家住在贫民窟，哪有床啊，我们家那时都睡在地板上，也没有被子，把衣服脱了就压在身上盖着睡。穿的衣服都是别人可怜我们送来的大人衣服，老大传给老二，老二传给老三。”

张宗伟的四女儿、78岁的张忆伟说：“记得那时，哈尔滨有一家很有名的饭店叫马迭尔饭店，我妈妈在那里帮人家刷盘子，要干到很晚，有好心人就把剩饭剩菜让妈妈带回家。当时我和弟弟还小，就盼着妈妈早点回来，那时饿啊，饿得够呛，弟弟还不到三岁，饿得哇哇直哭。

“后来，我妈妈去犹太医院当卫生员，有的俄罗斯人对妈妈说，

你何必呢，遭这么大罪，领个白俄‘事务局’的证明，不就有面包、有细粮了？我妈妈回到家里曾经说过：‘我嫁给中国人就随中国人，你们的父亲为了他的信仰，连命都豁出去了，我不能为了一片面包，失去我的人格。’妈妈的这句话，让我一直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能忘。”

张宗伟的儿子，67岁的张道滨很动情地说：“我的妈妈很平凡，也很伟大。”

这位俄罗斯女性，当年村苏维埃主席的妹妹，深深地记住丈夫生前的嘱托，孑然一身，扛下所有的磨难，直到哈尔滨解放。

1946年秋天，哈尔滨刚刚解放，担任松江省政府主席的冯仲云亲自来到了阿格罗芙娜家里，阿格罗芙娜激动万分，“丈夫宗伟的话应验了，我们的人来了！”说到这里，她已泣不成声。

几天后，阿格罗芙娜带着孩子住进了松江省政府大楼里面冯仲云的家，冯仲云和爱人薛雯对他们倍加照顾。这个历经磨难的家，终于沐浴到了党的阳光雨露，他们一直住在冯仲云家里，直到1950年才搬出去住。

烈士张宗伟的这五个孩子，都由冯仲云亲自做了安排。

冯仲云和薛雯还将烈士的三女儿和四女儿改了名字，冯仲云说：“你们要时时记得你们的爸爸张宗伟。”冯仲云夫妇将张道珍改名为张慰伟，将张道君改名为张忆伟。

张忆伟感慨地说：“冯仲云找到我们家，党培养我们成了革命干部，薛雯妈妈和冯伯伯在各方面照顾我们，使我们无后顾之忧。”

1978年9月，阿格罗芙娜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84岁。

张宗伟拎过的黄色柳条包依然在，睹物思人，人却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可是张宗伟烈士英勇事迹的底片，却在隐蔽战线的史册中始终珍存着，并且永远闪耀着特殊的光彩。

有一部电影的名字是《红色满洲里》，主要反映的是隐蔽战线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斗智斗勇，掩护党的六大代表秘密过境的故事。

作为电影难免有虚构的成分，可是电影所反映的满洲里红色交通线却是真实存在的，从上世纪 20 年代初建立，一直延续到 40 年代，从没有切断过。

“南濒呼伦水、西临蒙古国、北接俄罗斯”的满洲里，原称霍勒津布拉格，是蒙古语，意为“旺盛的泉水”，1901 年因中东铁路的修建而得名“满洲里”。

那时，满洲里的边境地带一片荒凉，人烟稀少，是少量的蒙古人的游牧之地。尽管满洲里小镇说不上繁华热闹，但它的交通位置却十分重要。

每天都有从哈尔滨开往苏联赤塔的旅客列车从满洲里驶过，列车在这里过境后，离苏联边境小站 86 号站（后改称“奥特波尔”站）只有 9 公里。86 号站每天有开往赤塔的火车，赤塔每天有直通莫斯科的火车。

满洲里既是中东铁路通往苏联的重要出口，同时又是中东铁路进入中国的起点。如此的交通要道，一直受到中共党组织和共产国际的重视。在此地有我党的秘密交通站，也有共产国际设立的秘密交通站，常常是相互合作，默契配合。

1921 年 11 月，张国焘、邓恩铭、柯庆施、高君宇等人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 年 9 月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4 年 5 月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都是从这里进入苏联的。1928 年春夏之交，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们，大多数是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被送往苏联的，其中有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罗章龙、李立三、蔡和森、邓颖超、蔡畅等。

从 1920 年至 1931 年，经过这条交通线进出中苏国境的人数无法统计，但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是经满洲里去共产国际和苏联以及从苏联回国的。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刘少奇、瞿秋白、李立三、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张太雷、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刘伯承、林伯渠、吴玉章、张国焘、邓恩铭、王烬美、刘仁静、王明、柯庆施、高君宇等，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

越飞、李德也是由满洲里出入国境的。

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记述了他在满洲里去苏联的经历：“1921年10月中旬，我准备去伊尔库茨克参加远东劳动人民大会。我搭乘火车，经南京、天津、哈尔滨直到满洲里。在满洲里，我按照交通线上苏联人尼克罗夫斯基所说的方法，去中国人的理发店理发。用纸包着一件待洗的衬衣，将一张神秘的名片放在衬衣兜里，理完发故意将这包东西遗留在理发店里。我在街上逛一遍之后，再回到理发店去取，理发店老板立即引我到后面一间房内，将衬衣交回，却将名片取去。于是在他们的细心安排下我顺利越境后再搭乘火车到了伊尔库茨克。”

还有许多中共早期革命先驱曾先后出入满洲里，留下了段段故事。

1921年春，张太雷受李大钊的派遣，途经满洲里赴苏维埃俄国伊尔库茨克代表中共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工作，担任中国科书记。

张太雷装扮成商人，由北京乘火车一路艰辛来到满洲里。他先是找到朋友张昭得的表哥，在张昭得表哥的安排下，张太雷裹上大羊皮袄只露出两只眼睛，坐上一架马拉的爬犁乘黑夜开始了惊险的偷越国境的行程。

中俄边境静悄悄，冷森森。月亮在云雾中时隐时现，淡淡的月光洒在雪地上，使暗夜闪射出点点晶莹的光亮。凛冽的寒风使温度降到零下40多度，仿佛要把人的骨髓冻透。马拉着爬犁在山峦起伏的雪原上快速滑行，张太雷紧张地注视着四周的冰雪世界，再转过前面的小山口就到苏俄的地界了。就在张太雷刚刚松口气的时候，东北军的边防哨兵发现了企图越境的马爬犁。骤起的枪声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静，条条红色的火舌像毒蛇般在爬犁周围跳跃。赶爬犁的老乡扬鞭催马利用地势巧妙的左右盘旋，箭似地冲出了纵横交错的火力网，把枪声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1921年，共产国际决定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决定派代表参加并由当时在苏俄的张太雷参与大会的筹备工作。为确保代表们的安全，张太雷对代表们从满洲里越境的路线、秘密接头地点、如何乔装打扮等都作了认真研究，进行了细致

的布置。8月，张太雷途经满洲里回国一方面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助手和翻译，一方面负责联络与组织中国和亚洲等国家选派代表去苏俄参加远东代表大会事宜。张太雷协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就国共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一致共识后，从广州出发经哈尔滨到达满洲里，在苏俄同志的帮助下顺利越过了边境到莫斯科参加了代表大会。

王尽美、邓恩铭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20年代初曾途经满洲里去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

王尽美，原名王灼斋，山东省营县北杏村人，1898年生。

邓恩铭，又名邓恩明，字仲尧，水族，1901年1月5日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堡寨。

共产国际为了推动远东各国的革命发展和对抗美英等九国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决定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山东区支部接到选派代表出席会议的通知后，经过研究，确定王尽美邓恩铭等六人作为山东共产党、国民党及工人、青年等革命团体的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

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着手进行赴苏俄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们从济南买了一批在俄国很畅销的昌邑绸子，扮作小商人于1921年秋出山海关，经奉天、哈尔滨到达满洲里。刚一下火车，零下30多度的严寒使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冻得直打哆嗦。在乘马车前往地下秘密交通站的途中他们仔细地查看沿途的情况。这座与俄国接壤的边境小城充满了北欧田园风光的独特风韵，大街上匆匆行走的人流中，有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毡帽的中国人，也有不少蓝眼睛黄头发大鼻子的俄国人。俄罗斯风格的建筑比比皆是，仿佛到了异国他乡。这时下起了鹅毛大雪，雪花飘落在他们的脸上身上，他们不抖也不擦，睁大双眼尽情欣赏着满洲里的自然风光，并举目向西北方远眺，凝视近在咫尺的苏俄土地。他们真想早一天到达十月革命的故乡，亲眼看一下列宁领导下的俄国人民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王尽美一行找到了交通站，在交通员的护送下进入了苏俄国境，然后乘火车冒着凛冽的寒风长途跋涉到达伊尔库茨克。

1931年6月，伍修权结束了在苏军远东边疆保卫局的工作，经联共中央组织部同意安排回国。他这次是偷越满洲里地区中苏边界回国的。他在《人民文学》1982年第二期上发表的《征程漫漫》文章中，记述了偷越边界回国的过程。1931年伍修权由苏联回国途经的第一站是赤塔，联络站指定他和一位东北籍的同志同行，当时伍修权的俄文名字叫皮达可夫。他们由赤塔乘火车到达中苏边境后与秘密交通站取得联系，准备越境回国。那时已是6月，交通站的工作人员让他换了一身黑色中式衣裤，将组织上发给做越境后路费的一些美钞和中国票子用一条围腰布卷起缠在腰里，除此以外一切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都不让带。工作人员见伍修权身体壮实，让他遇到盘查时说自己是伐木工人，别的什么也不能承认。

黄昏时分来了一辆马车，上面已经坐了几个俄国人，交通站的同志叫伍修权等人夹在俄国人中间坐好，马车向国界行进。到达中国边界哨卡时，哨兵喊道：“什么人？”赶车的俄国“老乡”也用中国话十分轻松地答道：“老毛子。”这是中国东北人过去对俄罗斯人的戏称。这声回答好像把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许多，而马车却没有停留，仍用不紧不慢的速度前进着，就这样进入了中国一侧。

马车离满洲里1公里处，拐到一个俄国侨民家门前，这也是一個秘密联络点。赶车的俄国老乡向主人做了介绍和交代，赶着马车又向别处走了。主人热情地接待了伍修权二人，并对下一步行动做了新的计划和安排。第二天一早，主人叫来一位只有10多岁的俄国小姑娘，让她带伍修权二人到满洲里火车站去。按事先约定，小姑娘在他俩前面50多米处若无其事地引导着，他们则装作根本不认识，悄悄地跟她走到火车站。

这里是边境车站，警察虎视眈眈地打量着每一个人，随时想从人群中抓出什么“赤党分子”或“苏俄密探”来。这时，有个警察冲着他俩过来了，伍修权看着自己身上不洋不土的打扮，默记着事先编好的台词，迎着警察走上前去，还有意同他擦肩而过。之后，伍修权买了火车票，登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

1932年2月，许光达任湘鄂西红军九师二十五团团长。他在应

城战役中受伤，机枪子弹射进离心脏不远的地方。他于3月13日从洪湖地区被组织上送到上海治疗，党中央安排他住在一个亭子间里，等待安排住院。但因我党有一个同志在医院里被特务发现，特务们对各医院都盯得很紧，上海不能动手术，还要等待一些天。两天以后，他得到通知，中央要送一批干部去苏联学习，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学习并治疗。1932年5月，中央交通员把从中央苏区调来的李国华、陈桂、李国实、李文良同许光达编为一组，中央指定许光达任赴苏小组组长。他们从上海乘轮船到了营口，又转乘火车沿中东铁路到达哈尔滨。在哈尔滨集合了10多个赴苏人员，然后由哈尔滨交通站派交通员领他们从哈尔滨上车，到了满洲里。又由满洲里交通站安排，于当夜分乘几辆马车颠簸30余里到了国境线，并在那里隐蔽下来，马车返回满洲里。他们按照满洲里交通站的安排，由护送越境的交通员带领，越过国境后又步行20多里，才到达86号小站。他们在86号小站乘火车，由交通员护送到了赤塔，而后又继续乘车去莫斯科。

1931年11月，满洲里三道街名叫晋丰泰的食杂店，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开张了，门前悬挂的两盏红灯笼在飞舞的飘雪中，更透出喜庆祥和的气氛。

晋丰泰经营的品种有油、酒、米、面、盐、香烟、蔬菜、水果等。由于品种较全又实用，价格还比较实惠，附近的居民常到这儿买东西。

站柜台的老板娘年轻、勤快，待人很热情，也愿意照顾顾客。顾客见了她也同样感到亲切，还时不时将老板娘带的不满两周岁的孩子揽在怀里抱一抱，逗一逗。

老板也比较年轻，待人和善，说话也是东北口音。老板也特别关爱这个孩子，有时食杂店人多，忙得不可开交，调皮好动的孩子便跑到了外面去，老板总是第一时间就追出去，将孩子抱回来，还嗔怪道：“不能乱跑啊，乖乖，要听话呀。”在外人看来，不论是平时还是年节，这一家三口，都是和和睦睦，其乐融融，生意做得也挺兴旺。

实际上，晋丰泰是我党设立的国际秘密交通站，老板纪中发是交通站的负责人，老板娘李芳是交通站的工作人员，二人都是共产党

员。孩子是李芳的，他们公开的身份是夫妻。

李芳是沈阳人，锡伯族，1927年，年仅18岁的李芳就参加了共青团组织，1930年初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这期间，她一直在共青团满洲省委机关工作。

1929年，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他经常参加团省委的一些会议，李芳因工作关系也有机会时常见到刘少奇。刘少奇还曾当面告诉李芳搞地下工作应该注意什么，怎样才能做好党的地下工作等等，使20岁的李芳受益匪浅。

在这期间，李芳还和满洲团省委书记饶漱石假扮夫妻，开展革命斗争。她的勇敢和机敏非常好地配合了饶漱石的工作，还几次让饶漱石化险为夷。但是，危险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早晨，敌人突然闯入团省委机关，将头天晚上因开会太晚而宿在机关的团省委书记饶漱石、团中央巡视员邱九等同志逮捕，李芳当时也在场。敌人同时在室内乱翻，搜查“罪证”。

李芳的裤子上缝有饶漱石让她保存的上海团中央和北满特委的通讯录，那个小本上有许多内部同志的姓名和住址。事关很多人的安危，李芳机智地要求穿裤子。敌人见她一个年轻妇女仅穿短裤，便没有反对。她穿上裤子后又假装肚子疼，要求上厕所，到厕所后李芳迅速将缝在裤子上的通讯录取出撕碎扔进粪缸。

正当敌人搜查时，省委秘书长刘明俨来机关开会，一敲门就被敌人逼进来围住搜查。李芳一看敌人都在忙于搜查刘明俨，屋子里只剩她和孩子，于是急速换上便鞋，插上屋门，抱起孩子从后窗逃走。

开始，敌人看李芳好像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农村妇女，又抱着孩子，所以没有重视，看管也不严。等她逃跑之后，才感到“这个女人跑了，很重要”。

李芳逃出虎口后，首先给团中央用暗语写信，报告满洲团省委机关被破坏的情况。她还和满洲省委秘书处交通员于淑珍接上了关系，将突发的情况进行了汇报。由于李芳报告及时，使不少同志免遭敌手，减少了革命损失。

1931年初，受组织委派，李芳来到哈尔滨北满特委机关工作。

特委机关表面上是一个有钱人家，李芳的身份是这个家庭的保姆“王妈”，每天带孩子做饭买菜，做机关掩护工作。

这一年秋天，特委书记武胡景找李芳谈话，要调她到一个新的地方工作，就是到满洲里秘密交通站工作，假扮晋丰泰食杂店的老板娘。并且说，这种地下工作要严守秘密，不能跟家里人通信。

李芳是在丈夫陶惠明引导下参加革命的，由于丈夫工作繁忙，他俩的孩子一直由李芳带在身边。李芳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丈夫了，她想念和牵挂着丈夫，她很希望临走之前能见到丈夫一面。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要无条件听从组织分配的，况且新接手的工作是不能向任何人讲明的，她相信担任领导的丈夫是会理解她的不辞而别的。

特委书记武胡景的爱人侯志带着李芳到一个公园里，和纪中发接上了头。从此，这两位素不相识的同志，开始以夫妻的身份，承担起国际交通站的重任。李芳买了一些穿的东西，带着孩子和纪中发很快上路来到了满洲里。

为了保证过往同志的安全，除了晋丰泰食杂店作为联络点外，国际交通站还在道北二道街租了一所俄式平房，这所俄式平房里面的大通铺可以同时住上四五个人。

李芳白天要在晋丰泰站柜台接待客人，晚间就在俄式平房里住。李芳还在这里放了一些食杂店的货物，给人的感觉这里就是晋丰泰的备品仓库。

李芳在 1984 年撰写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回忆》中写道：“从哈尔滨来的同志到了，不能马上越境，就暂时住在这个房子里。同志们一到，我就告诉他们，白天不准出屋，不准大声说话。有时怕被人发现，我还让他们在屋里大小便，然后掺和一些别的东西倒出去。我还告诉每个同志，外面有动静也不能吭声，要咳嗽就用被子把嘴捂上，外面的事由我对付。他们都很听话，白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屋里像没有人一样。”<sup>⑤3</sup>

有一段时间，日伪警察在满洲里街面上进行拉网式大排查，重点是针对那些身份不明的外来人口。

天黑后，街面上行人寥寥，冷冷清清，很静谧。

“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惹起了周围一片“汪汪汪”的犬吠，犬吠声打破了沉寂，听上去分外刺耳。

李芳开了门，几个警察闯进屋内，在屋子里四处搜寻。一位警官盘问李芳：“你男人怎么不在家？”“我家掌柜的在食杂店盘点货物，过一会儿就回来了。”李芳边说边给警察递烟点火，并客气地让另外几个警察抽烟。

警察没有停止搜查，在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货物中，用枪托子扒拉来扒拉去。李芳感到眼前的敌人很难缠，但她还是赔笑脸说：“你们都辛苦了，我这是小本经营，进点货不容易，我还靠这点货卖钱养家糊口呢，请你们手下留情啊。”

这时躲在李芳身后的孩子吓得哭了起来。

警官摆了摆手说：“算了吧。”接着他面对李芳说：“最近来的外地人，有些是共党分子，要偷越国境，你可要注意点，别惹麻烦。”李芳点点头回答：“我只管做生意，顾不了别的。”

警官带队正准备撤离时，忽然一个警察回头时发现大通铺下面有一块可移动的木板，他向警官示意并用手指了指那块可疑的木板。

李芳神色镇定、若无其事地走过去，主动掀开了木板，说：“这个是菜窖。谁家没有菜窖呀？”警察追问：“别人家的菜窖哪有你家的大？”“我家食杂店，还要卖菜，菜窖能不大吗？”“放的什么菜？”“大白菜，还有大萝卜。”“这么大的菜窖，藏两个人也没问题哟！”“是放菜，不是藏人，不信你就下去搜，搜一搜不就知道了嘛。”李芳的回答不带犹豫，脱口而出。

李芳抱起了正在哭泣的孩子，趁着警察不注意时在孩子的屁股上用力地拧了几下，孩子放声哇哇大哭起来。李芳望着警察说：“这孩子是不是吓着了，不听话，别哭了，别哭了。快搜，你们赶快下去搜，这孩子得让他睡觉了。”

领头的警察开始看菜窖时，还真有些怀疑菜窖下面可能藏了人，转念一想，如果藏了人，眼前这位农村妇女模样的老板娘，在这么多带枪警察的面前，不早就吓得尿裤子了？她大大方方掀开木板盖子，又主动要求警察下去搜查，就说明她的菜窖没有问题，不怕搜查。正

在琢磨，孩子大声哭叫起来，这让他感到心烦，于是他挥了挥手，带警察们撤走了。

夜色已经漆黑，万籁俱寂。房间里俄式座钟敲响了12下，已是半夜钟声了。李芳心疼地轻轻揉着儿子屁股上被掐得有些青紫的印痕，望着孩子熟睡的小脸，禁不住泪水滴落在孩子的面颊上。静静的夜里，她不由地想起了远方的丈夫，想起了刚才发生的那惊心动魄的场景，如果敌人真的下到菜窖里，该怎么办？会是什么结果？……她几乎不敢再去想了。

机敏的李芳早已听说敌人到居民家中搜寻外地可疑分子的消息，也打探到警察有时会在夜晚搞突然袭击，她便提前将四位准备越境赴苏联的同志，都藏在了大通铺下面的大菜窖里。从上面看，菜窖垛满了白菜和萝卜，可是如果警察真下去搜查，就会发现堆积很高的白菜和萝卜的后面藏着人呢！

长期从事复杂多变的地下斗争，让李芳逐渐成长为一位能够随机应变、机智果敢的革命者。当危险来临时，外表农村妇女打扮的李芳往往能够做到不温不火、淡定从容。

李芳确定已安然无恙了，便在大通铺下面的那块木板上，悄悄地扣击了几下，这是表示已经安全的暗号。藏在下面屏住呼吸、随时准备与敌人搏斗的四位同志，长吁一口气，有惊无险地踩着梯子爬上来。

这一夜显得那样漫长，大通铺上面的四位同志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外屋床上的李芳，斜靠在儿子身旁，也是难以入眠。

厚厚的深颜色的窗帘严丝合缝，完全遮盖了房间里的一切。这座普通的俄式平房也被黝黑的夜色所淹没。

当时，满洲里国际交通站归属于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具体领导的是哈尔滨北满特委所属的哈尔滨彩霞湘绣交通站，这个交通站也是以杂货店为掩护，负责人是老季。

老季经常以办货的名义和满洲里国际交通站保持联系，他们的联系用暗语，以做买卖的方式进行。或是写信，或是在比较紧急的情况下，就通过发电报进行沟通。

如我方人员准备从哈尔滨出发去满洲里，就发“红高粱已准备发

货”，如果说敌人的事，就写“白高粱如何如何”。

在哈尔滨交通站和满洲里国际交通站事先秘密约定好接头暗语后，老季就会将这些接头暗语告诉那些从外地来哈尔滨，再离哈走中东铁路到满洲里的同志，并叮嘱他们接头暗语务必要记牢。

满洲里晋丰泰食杂店的老板娘李芳负责出面接待这些特殊的顾客，有一次以黄瓜和苹果为暗语。

这一天，一位陌生的外地人来到了晋丰泰，他询问老板娘：“有黄瓜吗？”李芳回答：“有，买多少？”来人说：“买两三斤吧。”品种、数量和约定的暗号都对上了。

李芳为来人称了三斤黄瓜，她心想，这只是对了一半，如果他拎着黄瓜走了，说明来者不是同志，只是巧合而已。李芳表面上一切如常，并笑着应对别的顾客，却暗暗地观察刚刚买完黄瓜的外地人的动静。

外地人和李芳又继续对话了：

“有苹果吗？”“有啊，你要买几个？”“五个。”“多一个少一个不行吗？”“只要五个！”“好，好，就五个！”

李芳和来人相视微微点头，会心一笑，自己的同志到了！

岁月沧桑，物换星移，往事早已如烟散去。

有一篇 1963 年时任江西省副省长兼赣南行署主任王淦撰写的回忆录，文章标题是《经满洲里去苏联》。作为亲历者，他写道：“当时，江西中央苏区曾派许多红军军官经上海、大连、哈尔滨、满洲里去苏联学习，我们一行四人受上级指派去苏联学习，一路上几经周折到了满洲里。下车后，由一名伪路警（我秘密交通员）将我们送出火车站，交给了乔装成马车夫的同志，他驾车将我们送到晋丰泰食杂店。我们走进这个店里，看见这个屋子不十分大，店堂有个拐把子形柜台，摆满了日用杂品，周围还有蔬菜、水果等。有个女人在站柜台，我们按照上级交代的联络暗语进行联络，这接头暗语很重要，我们都能倒背如流、一字不差。联系上后，有人带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是一间俄式的平房，里面有一个顺长的大铺，能睡五六个人，外面是站柜台的那个女的带着孩子睡觉的床铺，她来掩护我们，

对我们很负责任、很热心，生活上的事和所有的事都由她来出头应付……”

满洲里国际交通站和苏联交通站经常联络，苏联交通员时常来晋丰泰以喝酒为名，送来报纸、文件，晋丰泰老板纪中发有时也把满洲省委的文件交给他带走，同时秘密约定护送赴苏联的同志越境的时间和地点。

越境的时间，一般都是夜晚，由苏联交通站安排有越境经验的俄侨马车夫驾车，趁着浓浓的夜色，东躲西绕，避开戒备森严的重重岗哨，越过边境。马车夫将同志们送到苏联境内的小火车站，由此上火车经赤塔通往莫斯科。

李芳在 1984 年撰写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回忆》文章里写道：“通常是由一个以铁路扳道工为掩护的苏联交通员，来我们这里把准备越境的同志们接走，苏联交通员在前面走，我们的同志远远地在后面跟着。”

“我和纪中发在满洲里国际交通站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送走七十多位同志去苏联学习或开会，没有发生什么问题。1934 年 5 月，我被派往苏联学习，后来纪中发也调走了，满洲里交通站的工作就由别人接替了。”<sup>③</sup>

在满洲里建立的“红色之路纪念馆”内，可以看到专门展示晋丰泰食杂店的场景。情景再现是用建筑材料精心制作的，布景逼真，栩栩如生，带有明显的年代印痕和质感。当年曾掩护和安全护送七十多名同志越境赴苏联学习或开会的晋丰泰，已经成为满洲里隐蔽战线中的一面旗帜和重要的历史符号。

满洲里市委、市政府正准备新建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陈列馆，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在晋丰泰食杂店遗址上恢复其原貌。

国际交通站的故事很传奇，可老板娘李芳后来又在何方，尤其是她离开晋丰泰之后，漫长的岁月中，她的工作生活是怎样的呢？

李芳 1934 年 5 月离开工作和战斗两年半的满洲里国际交通站后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和民族殖民地研究院学习深造。1936 年 6 月，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东北抗日联军二军，担任二师四团政委兼妇委

书记。这位女政委在抗日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巾帼不让须眉，率领四团的战士英勇杀敌，卓有功绩。

在战争的年代里，李芳与从事地下党领导工作的丈夫陶惠明失去了联系。费尽周折，打听来的消息竟然是陶惠明牺牲了。

1936年12月，李芳随同东北抗日联军二师政委王润成去苏联向中共代表团请示工作，不久与王润成结婚。

李芳在个人生活方面，命运是多舛的，也是不幸的。她由于从事隐蔽战线的秘密工作，不能与家人通信，不能向任何人泄露自己在满洲里晋丰泰的情况，而与原来的丈夫陶惠明失去联系。后来等到的是令她痛彻心扉的消息：丈夫陶惠明牺牲了！让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第二任丈夫王润成到苏联后，又赶上苏联肃反扩大化，被以“日寇侦探嫌疑”的罪名逮捕入狱，李芳也无辜受到牵连，被判刑五年。出狱后在苏联当工人，直到1954年才得以回国。

回国后，经过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审查，李芳恢复了党籍和名誉，后被调到吉林舒兰矿务局工作。

不论命运怎样跌宕浮沉，岁月如何更迭变化，李芳坚定的信仰始终不变。她在舒兰矿务局生活和工作了三十多年，为人很低调。她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同事满腔热忱，但从来不提当年勇，也不愿意讲述自己的功绩。在满洲里，晋丰泰老板娘李芳的名字和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可在吉林舒兰矿务局大家只知道李芳是老党员老革命，却很少有人知道她曾是我党隐蔽战线和抗日战场上的女英雄。

1987年9月，曾长期担任舒兰矿务局工会副主席、名誉主席的李芳因病逝世，享年88岁。

原舒兰矿务局老领导充满敬重和怀念之情说：“我们矿务局的《大事记》上面，在显著的位置上登着李芳的名字和她的照片，她是我们全矿的骄傲。”

李芳的儿媳赵凤臣说：“妈妈不在单位讲她的革命经历，她生前在家里曾对我们谈起过在满洲里做交通员的往事。那时一旦有同志们到来，她还是只能按日常用量做饭菜，仅够外来同志用餐。当时形势很严峻，同志们都是藏在屋子里，冷不丁来了许多人，你不能上街买

很多东西回来，也不能从晋丰泰往回带，怕引起怀疑。加之当时经费也很紧张，所以她常常吃不上饭。反正来一批外来同志，她就要饿上几天。还听妈妈讲过，她有时要到不同地方去联络，还要有不同身份的打扮，也要带上必要的道具，比如一把伞，怎样撑开，怎样放，放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是接头的暗号和暗语，不容得半点马虎。有时周围有敌人盯梢，就更得从容面对。”

在李芳儿媳赵凤臣的讲述中，仿佛依稀看到了李芳当年在隐蔽战线同敌人斗智斗勇、果敢机智的形象，禁不住感叹，在敌人的刀尖上周旋的“老板娘”是何其不易。

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枢纽，经满洲里入境为西线，经绥芬河入境为东线。不论西线或东线都是党的红色交通线。

从东线的绥芬河出境后，抵达的是苏联远东海滨城市海参崴，然后从海参崴换乘火车可以通往莫斯科。

绥芬，满语是锥子的意思，因为绥芬河里生长着一种尖锐如锥的钉螺，满族人因此而称它为绥芬河。绥芬河是发源于长白山麓注入日本海的一条中等河流，当它于万山丛中蜿蜒而来，接近边境时，突然舒展开了腰身，形成了一个冲击平原，这就是东宁平原。中东铁路在设计中就是沿着这条绥芬河谷进入中国境内的，第五站就建在河岸的三岔口村。因此，五站也就叫做绥芬河站。但是在修建铁路过程中，发现从河谷平原穿过太平岭地段的地质结构极其复杂，于是铁路线不得不向北移动 50 公里。绥芬河站也就远离了绥芬河而来到这个海拔 500 多米的山坡上，就是现在的绥芬河市。中东铁路通车后，来自俄、日、朝、英、法、意、美等国的使节齐至，商贾云集，带来了欧洲的商品、文化和建筑。一时间，小小的镇子上同时飘扬着 18 个国家的旗帜，时称“旗镇”。

著名爱国人士张西曼，1916 年到绥芬河考察，后经绥芬河赴俄学习，他最早翻译出版了《俄国共产党党纲》，并同李大钊、陈独秀等组织了社会主义学说研究会，是中国著名早期马列主义传播者。

1921 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绥芬河建立了秘密国际交通站。

从此，绥芬河国际交通站成为中国共产党经“上海－哈尔滨－绥芬河－海参崴－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的这一红色地下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

在绥芬河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李大钊、罗章龙、王荷波等人出席共产国际五大后分批回国时，在国际交通站白俄交通员秘密掩护下，坐马车进城入住欧罗巴旅馆、铁路公寓的一幕幕场景；也留下了张闻天、杨尚昆、陈为人、李震瀛、黄火青、左权、刘伯承、宋一平、刘云、陈启科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先辈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经绥芬河往返苏联，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光辉足迹；还见证了中共六大召开前后，六大代表从这里往返的身影。

已知从绥芬河出境的六大代表有瞿秋白、蔡畅、龚饮冰、孟坚、龚德元等19人。中共六大结束后，代表们带着大会精神分批回国。大部分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经绥芬河回国，少部分由满洲里或到海参崴后经海路回国。从绥芬河入境的六大代表有周恩来、罗章龙、王德三、邓颖超、李立三、蔡畅、邓中夏、杨之华、向忠发、张国焘、龚饮冰、唐宏经（唐韵超）、项英、毛简青、秦曼云、丁君羊、于培真、龚德元、罗明、刘振邦、胡建三、胡锡奎等51人。绥芬河地下交通站为掩护六大代表平安往返，为这次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特殊时期的重要会议的胜利召开和大会精神的回国贯彻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绥芬河出入境通道有别勒洼沟、东北沟、19号界碑、21号界碑等处。六大代表入住的地点主要是绥芬河铁路公寓和欧罗巴旅馆。出境的六大代表由哈尔滨到达绥芬河后，由绥芬河地下交通站安排与一个俄国铁路工人接头，并在他的家中休息吃饭。到了晚上，由这个俄国人带路出境。他们翻山涉水，要走很长时间，第二天早晨才能到达苏联境内的约定地点。周恩来在六大闭幕后留在共产国际工作，完成任务后，与邓颖超、李立三等四人一同途经绥芬河回国。是绥芬河一名白俄交通员赶着一辆拉饲草的马车，掩护周恩来一行四人越过的边境。那是一个雨天，四人藏在饲草里，在安全到达绥芬河后住进铁路公寓，后又经火车转移。罗章龙后来回忆说：“绥芬河当时叫‘五站’，后来我参加党的六大时从苏联回国也是经绥芬河回来

的，我夜渡绥芬河还曾赋诗纪行，‘紫霞垂野暮山焚，皂帽桦鞋夕进军。午夜星繁风正急，衔枚疾走渡绥芬。’”六代表胡锡奎、胡建三与赵毅敏等刚从东方大学、中山大学毕业的学生，总共 27 人于 1928 年 11 月回国。来到中苏边境，因为在苏联穿的都是西装，联络站的负责人说需要到中国境内背一批中国衣服过来，过境回国时给大家换穿。于是赵毅敏和一位来自上海的工人党员一同过境，将绥芬河地下交通站帮助搞到的中国衣服装在麻袋里，再步行背过国境。

著名的军事家左权与刘伯承在绥芬河的故事也很传奇。1930 年春，左权与刘伯承等结束留苏学习生涯，从绥芬河回国。为了避开特务，他们分开行动。再见面时，左权却看到刘伯承后面跟着一个日本密探。左权不顾自己安危，走到刘伯承跟前，巧妙地用俄语约定到前面的杂货店集合。待跟踪刘伯承的密探接近时，左权突然急转身将这个家伙撞倒，然后飞快跑进旁边的巷子，刘伯承也得以脱身闪进杂货店。日本密探一时被撞得晕头转向，待清醒过来，发现已失去跟踪目标。这对老同学则愉快地踏上了奔赴上海的旅程。

241

群山环抱的绥芬河小镇，平时寂寥冷清。但是每天由绥芬河开往海参崴的国际列车经过时，就给这座荒凉的小镇带来了浓浓的洋气，也为色彩单调的小镇增添了一抹光鲜艳丽的色彩。上上下下的乘客们，不仅有俄罗斯人，还有来自欧洲、亚洲其他国家的人。其中一些浓妆艳抹的太太或小姐们或许为了冲淡她们腋窝的异味，故意喷洒浓郁的香水。随着她们勾肩搭背款款而过，那刺鼻的香水味道在徐徐的风中氤氲弥漫开来。

有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对这些洋人太熟悉了，他融入在来来往往的洋人中间，和洋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内几乎形影相伴。

随着“呜呜呜”的汽笛声，开往海参崴的国际列车缓缓地驶离了绥芬河站台。在宽敞舒适、设备考究的车厢里，走出来一位身着笔挺铁路制服英俊的中国青年。他穿行在各种语言各种肤色的洋人之间，安放行李包裹，为他们端送热气腾腾的开水，同时还要收拾卫生，做一些擦桌子扫地的活。这位面带微笑、服务热情周到又非常能干的

中国小伙子常常受到乘客们的赞誉，俄罗斯人会对他竖起大拇指说“哈罗绍，哈罗绍”（很好）。他是绥芬河至海参崴国际列车上的乘务员，他的另一个秘密身份却无人知晓，就是中共党组织委派的国际交通员，负责传递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秘密信件。同时，车上如果有由他秘密带上来赴苏联的同志，一路上他就要利用自己公开的身份，给予全程保护和掩护。

他的名字叫李春荣。

李春荣是天津人，他是随父辈闯关东来到绥芬河的。他父辈的血汗都倾注在修筑中东铁路的劳作中，后来李春荣也成了绥芬河的铁路工人。在铁路机务段工作中，他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1932年初，19岁的他加入了共青团，还担任了团支部书记。他带领进步青年贴标语、撒传单，发动铁路工人购买衣物和食品去慰问抗日部队。由于他机智勇敢表现出色，中共吉东局便选择他做秘密交通工作。

当时这列国际客车，是归绥芬河火车站管理，绥芬河的日伪警察对这列往返中苏之间的火车看得很紧，时常登车巡查。尤其是对车上的中国乘客，盘查搜查是常有的事。

为保证信件安全来往，李春荣开动脑筋，想的办法十分巧妙。李春荣的儿媳吕艳春讲到一个细节，这让人几乎难以想象，颇为感慨。

李春荣的儿媳吕艳春说：“听爸爸讲过，当时是把有关的信件和情报从中国带到苏联，回来的时候再把苏联的信件和情报带回来。这些都是机密，一旦被日本鬼子和伪警察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要藏起来，藏哪呢？爸爸就把用来扫地的扫帚从头上把绳子解开，把信件和文件卷成纸团，小心地放进扫帚掰开很深的地方，放好后再把扫帚绑成原样，让别人看不出来半点破绽。”

李春荣的儿子李世平说：“我父亲掩护和保护了好多赴苏联学习或开会的同志，其中就有中共吉东局老朱的爱人小赵，还有潘庆来的女儿和儿子等，他都是悄悄地把他们带进自己服务的车厢。遇到敌人搜查时，他就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为他们出面打掩护，必要时就把他们藏到乘务员休息室甚至是厕所里。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他就是

这样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

当年，每天从绥芬河开出的国际列车终点站是海参崴。

海参崴，碧海蓝天，风光旖旎。一排排俄式或欧式建筑在海湾的两边，如同打开的屏风隔海相望。在海水的润泽下，加上周边绿茵覆盖，那鳞次栉比的古典建筑，既显出恢宏和厚重的气势，又显得圆润清丽。

冉冉升起的朝阳，为无限的大海增添了壮美。满是火烧云的晚霞飘忽不定，溢彩流金映照着大海。渺渺波涛宛如铺上了一层绚丽缤纷的绸缎，起起伏伏，飘逸美妙。

李春荣从小就喜欢大海，梦想着能有一天到海边走一走、转一转，这是他许久以来的期待。年轻的李春荣在国际列车到达终点站海参崴时，特别想下车去领略一番俄罗斯远东滨海城市迷人的风光，看看大海，感受一下苏联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驿动的心让他跃跃欲试，甚至他不止一次有这样的冲动，可是责任和使命让他停住了脚步。

李春荣在1985年撰写的《在列车上跑交通》这篇文章中写道：

“当时组织规定的联络方法是，列车到海参崴后我不下车，待在最后一节车厢里等待与一名苏联军官接头。那个苏联军官上车后，我们互相交换信件，回到绥芬河后，我将信件交给李文输，他与我单线联系。”<sup>⑤5</sup>

按国际列车规定，车上的工作人员是轮流休息。李春荣在火车上是流动的交通员，休息时他的家成了秘密交通站。

李春荣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我家住在绥芬河一个山坡下，山坡上住着日本守备队，地下党的领导钟子云在绥芬河时，常在我家开会。1933年，满洲省委巡视员杨松到绥芬河住我家，住了有三四天还开了会。从苏联回来的，还有准备去苏联的同志，也时常暂住在我家。”

李春荣的儿媳吕艳春说：“听爸爸讲，绥芬河家里住的地方是一个交通站，开会或有什么事，都由我婆婆在外面放哨，注意外边的动静。怕别人发现外人在这里住，就经常搬家呀。”

李春荣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做国际交通工作时间是1932年至1934年，1934年冬我的工作变动，就不跑国际交通了。随后由苗元庆

跑了一段国际交通。”

1943年，李春荣举家迁往哈尔滨。1952年2月李春荣担任哈尔滨电影机械厂厂长、党委副书记，1980年8月离休。在上世纪90年代末，李春荣逝世。

当年，中东铁路那漫长的两条铁轨是冰冷和沉寂的，可是无数的革命者对这条和苏联莫斯科接轨的铁路却有着特殊的情感和难以忘怀的记忆，这条铁路曾使得他们的生命历程在不经意间出现过巨大的变化。

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副书记的赵毅敏，在2002年7月25日病逝时，已经是99岁高龄。在赵毅敏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一段在中东铁路东端绥芬河做隐蔽战线工作的经历。

赵毅敏的女儿凌楚说：“那是1928年冬天，我父亲和我母亲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国，他们是从绥芬河入境走中东铁路到哈尔滨。本来组织上通知我父亲到上海中央局工作，我父亲也是做好了去上海的准备，可是当时绥芬河交通站遭到敌人破坏，急需要人去接替工作。是去中央局还是去建立交通站，当组织来征求他意见时，我父亲没有二话，表示一切听从党的安排。根据组织的临时安排，我父亲赵毅敏和我母亲凌莎很快从哈尔滨秘密返回了绥芬河。”

赵毅敏的童年是在河南省滑水县城南一个偏僻的农村度过的，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南大学。1924年，20岁的赵毅敏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新思想、新知识，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此期间他因参加反帝救国的学生运动，被法国警察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建党初期的党员。

1925年10月，他受党的委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深造，并很快担任了学校团宣传部长。在中山大学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革命原理，这为他成为职业革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他与来自上海的同班同学凌莎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夜幕下莫斯科红场的座椅上敞开心扉，促膝长谈。他们在风景优美的莫斯科环城河河水中相依相偎坐在船上，悠悠地荡起双

桨。那泛起的层层浪花，伴随着他们放声歌唱。

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让他们从同学变成了伴侣。1926年夏天，年轻的赵毅敏和凌莎在莫斯科结婚了。

从1925年11月至1928年11月，赵毅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整整学习了三年，这三年是他收获新思想、新知识，插上革命双翼的难忘时光，也是他收获爱情的幸福时光。1928年冬天，组织上派他回国工作，于是他携妻子，长途跋涉回到国内。本是绥芬河的过客，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也或许和中东铁路注定有一段不解之缘，赵毅敏回到国内的第一份革命工作就是要在绥芬河建立秘密交通站。

1928年末，在靠近铁路的绥芬河小镇，24岁的赵毅敏化名刘老板，开设了一个不起眼的估衣店，凌莎以店员的身份协助工作。

小店里收购寄卖各式各样的衣物，从俄国人的大衣、长筒靴到中国商人的长袍、马褂，包括农夫的破棉袄，应有尽有。

年轻的赵毅敏身高一米八零，相貌英俊，长期的学校生活使他看上去很有书卷气。外形娇媚的凌莎来自上海，又在莫斯科留学，身上难免透着一些洋气和书生气。在地处偏远的绥芬河小镇，这对阅历非凡的俊男靓女装扮成教师、医生、公职人员等，肯定是惟妙惟肖，扮成商人却有些逊色了。

为了更快地进入角色，他们进入绥芬河小镇一些店铺，悄悄地察言观色，模仿开店老板的神态和动作，机敏聪慧的他们很快从着装到举止包括说话的腔调都已渐渐有商人的味道了。

位于山坡上的估衣店，平时来这里买卖衣物的顾客不算多，显得有些冷清。刘老板和善地坐在门口晒太阳，有时也和附近的居民闲聊，生活显得闲适而安逸。

到了夜晚，小店一改白天的萧条冷清，变得分外繁忙起来。

每每这时，凌莎总是要拉下厚厚的大窗帘，她和刘老板也变得格外警觉起来。他们要用暗号和暗语与来这里的特殊顾客接头，还随时警惕是否有可疑的人出现。

到了夜晚，周围的居民都已酣睡，夜色如墨，一片寂静。

小店白天几乎无人问津的衣物，此时派上了用场。往来于中苏之

间跨越边境线的革命者，都要到这里改换行装。准备到苏联去的，换上俄罗斯的大衣和靴子，从苏联回国的同志，根据不同的需要，换上不同的中国衣物，或扮作商人或扮作苦力再回到内地。

以刘老板赵毅敏和老板娘凌莎为首的绥芬河秘密交通站的工作人员，不仅要为往返途经此处的同志准备好充足的服装和鞋帽，还要掩护同志们秘密出入国境，有时也需要和苏联交通站联系，双方通力合作。

能够保证红色交通线的畅通，传递火种，让他们感到十分自豪。

凌楚回忆这段往事时，深有感触地说：“我父母在绥芬河交通站工作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保护了多批在中苏边界秘密往返的同志们。”

中东铁路发生的往事早已渐行渐远，但凌楚却说：“有些事情是深深印在我父亲的脑海中的，他终生难忘。

“1934年11月，我父亲赵毅敏出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此时，他是在敌人的监狱里历经四年煎熬，刚出狱不久。由于在狱中长期遭受折磨和毒刑，他的身体虚弱不堪。他顾不上休息和康复，拖着瘦弱之躯，毅然从哈尔滨的满洲省委机关深入到珠河，亲自解决由于受‘左’倾路线影响而导致的珠河县部分同志和赵尚志产生的矛盾问题。

“接着我父亲在赵尚志担任司令的哈东支队担任政委，他和抗联战友们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顶着刺骨的寒风和茫茫大雪，与日寇浴血奋战。

“我父亲和赵尚志在战斗中结下了生死友谊。

“1935年初，我父亲接到满洲省委通知，让他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当时要坐珠河通往哈尔滨的火车赶回满洲省委机关接受指示，交通员为父亲买了火车票，赵尚志立刻让出自己的战马还挑选了几匹快马送父亲和交通员赶赴珠河火车站。父亲上了火车，火车刚刚开动一两分钟就出现了惊险的一幕。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将珠河火车站围

得水泄不通，前来抓捕父亲。火车晚开几分钟，后果将不堪设想。

“火车越开越快，父亲终于化险为夷。”

讲到这里，凌楚有些激动：“这是生死瞬间啊。几十年后父亲说到这里很感慨，这一两分钟就决定了我父亲的生和死，等于是死里逃生。我父亲是1935年初走中东铁路从哈尔滨出发，准备经过绥芬河到莫斯科。在绥芬河，他又经历了生死考验……”

赵毅敏到了绥芬河，五年后旧地重游，他凝望着风雪弥漫的小镇，那山坡上一处处简陋的平房，那一片片光秃秃的树木，在风雪笼罩中显得有些迷离和模糊，可是五年前他和妻子凌莎开设估衣店做交通站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赵毅敏找到了交通站的同志，紧紧握手，倍感亲切。

此时交通站正在恢复重建，因为此前交通站由于叛徒告密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交通站的临时负责人坚持要选派两名交通员掩护赵毅敏过境。深知交通站人员有限，赵毅敏对临时负责人说：“这里的环境我比较熟悉，谢谢你们，我看有一位交通员协助就可以了。”

此时，日本侵略者加强了对边境地区的封锁。深夜时，一位年轻的交通员带着赵毅敏悄悄上路。

迎着如刀片般刺脸的寒风，顶着鹅毛般飞舞的雪花，他们艰难地行走在一尺多厚的积雪中。好在赵毅敏曾有过多次在绥芬河掩护同志的经历，对在风雪交加中走夜路也并不陌生。可是，毕竟过去了五年，已时过境迁，当年的岗哨是东北军阀属下的地方警察，如今变成了阴险残暴的日本鬼子和伪警察。各岗哨的位置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国境线增加了许多新哨所。

由于在敌人监狱中遭受了长达四年的摧残和折磨，出狱后也没顾上适当的休息和补养，就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和战斗中，此时，赵毅敏感到体力有些不支。

天蒙蒙亮时，赵毅敏已有些支撑不住了。凛冽的严寒，已让他瘦弱的身体瑟瑟发抖。在越来越厚已接近膝盖的积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让他的双腿发软，全身打晃，但是他依然咬紧牙关坚持着。年轻的交通员对赵毅敏说：“用不用歇一歇？”“不

能休息，这时候休息不得！”赵毅敏凭已往的经验知道，此时体能消耗过多，若停下来，又冻又饿又晕，很可能就倒在雪地上起不来了。于是交通员回转身来等着赵毅敏跟上后，便搀扶着赵毅敏继续前行。

走出灰蒙蒙的树林，隐约看到前面是凸起的一片山岗。

此时，年轻的交通员眼眉和眼角都挂了一层湿漉漉的霜花，但红红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用手指了指对赵毅敏说：“快到了，坚持住呀！”

突然，响起了枪声，而且枪声越来越近，赵毅敏意识到，他们可能是被巡逻的敌人发现了。

交通员拼尽力气连拖带拽地将赵毅敏往山上带，赵毅敏气喘吁吁奋力往上爬，交通员用自己的身体做掩体保护着赵毅敏。一声刺耳的枪响，子弹击中了交通员的腿部，汩汩的鲜血在皑皑的白雪中洇化着，染红着。敌人的脚步声在逼近，在这危急的时刻，年轻的交通员强忍着剧痛，猛地用力一推，将赵毅敏从高高的山岗上推了下去。

滚落到岗底的赵毅敏看到山岗上的敌人已将交通员团团围住，却不敢向山岗下面开枪。他向前方的远处望去，看见苏联的哨兵正向他所在的方向跑来。原来一处山岗，是两国的分界。年轻的交通员在生死瞬间，猛地一推，让自己的同志死里逃生，这是怎样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啊！

由于革命需要，地下工作者都不用真名实姓，那位年轻的交通员叫什么自己都不知道，他被捕后又会怎么样？他为自己挡住了子弹，他的伤势会怎么样？赵毅敏的心被揪得像拧了劲一样疼，心如刀绞啊。

在苏联哨兵的帮助下，经过短暂的休息，赵毅敏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来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赵毅敏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了“中国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最强音。<sup>⑩</sup>他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残暴罪行，用实例和实据介绍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下英勇顽强抗击日寇的事迹，激发起世界革命党人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

回忆到此，凌楚已是潸然泪下，她深情地望着父亲和许多中央领

导人的合影，颇有感慨地说：“父亲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从事过很多工作。回忆历史时，他会说，他和母亲有过一年多在绥芬河做秘密交通员的经历，他感到很荣幸。他还幽默地说，很多交通员都是假扮夫妻，我们算是幸运了，是真夫妻风雨同舟。他还说隐蔽战线的同志默默无闻，他们实在了不起，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掩护和保护当年往返苏联的同志，是他们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啊。”

著名党史大家龚育之生前曾说过他的父亲，当年的六大代表龚饮冰，也有过隐蔽战线的经历。

在龚育之逝世后，谈到隐蔽战线这段往事，其夫人北大资深教授孙小礼说：“我是听育之告诉我，他的父亲龚饮冰参加党的六大后，从莫斯科回国，是从绥芬河入境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就做过交通站工作，是为回国的六大代表作掩护吧。”

“育之说过，1931年他父亲母亲带着他先到天津接着就到东北，在东北中东铁路沿线长春和哈尔滨的地下交通站工作，因为他父亲龚饮冰公开的身份是万源湘绣店老板，长春和哈尔滨都有分店。解放初，龚饮冰陪刘少奇视察时，刘少奇说过要到龚饮冰从前开的万源湘绣店去看一看，因为他从前用过这个交通站，印象很深。不知道刘少奇是去苏联还是从苏联回来，用过这个交通站。后来，从父亲龚饮冰回忆录看到，他说他在中东铁路沿线做交通站工作，曾经护送过很多我们的同志，从这里秘密去苏联学习或是开会。”

龚饮冰当年做地下交通工作公开的身份是万源湘绣店老板，还有一个身份是佛教徒。

前些年有人发现了龚饮冰拍摄的佛教徒照片，经有关部门辗转交给了龚育之。孙小礼教授将这张珍贵的照片拿给笔者，照片中的龚饮冰留着光头，披着一袭袈裟，戴着佛珠，一副虔诚的佛教徒形象。照片拍于何时何处已无从考察，也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从这张已经泛黄、年代久远、真真切切的佛教徒照片，可以折射出当年隐蔽战线的斗争是多么复杂。为了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下和敌人斗智斗勇保护自己保护组织，隐蔽战线的同志们不得已用各

种社会身份作掩护，与敌人周旋。他们真是历尽艰辛。

2012年金秋10月，北京香山。

正是观赏香山红叶最美的时节。放眼望去，满山遍野，重重叠叠，红叶似火，美不胜收。

中国人很看重红色，红色会使人感到喜庆和振奋，红色也会让人引发许多联想，红色的庄重和壮观也浸润在国旗和烈士的鲜血里。

此时想到了凄风苦雨的旧中国，对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充满了向往的那些革命先驱，如同朝圣一样踏上红色之路，去追寻梦想，去撷取火种，万里之遥，义无反顾。

在他们的背后，有众多隐蔽战线的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倾力保护。隐蔽战线的同志们如一片片叶子，映衬着梦想的花朵别样红。

隐蔽战线是看不见的战线，是秘而不宣的。有些真相因秘而不宣、年代久远早已隐藏和湮灭在岁月的沧桑中。尽管四处挖掘，深入寻访，尽力将其中一些人和事真实地再现出来，可这也只是隐蔽战线中的局部和片段而已。

我们相信，总有一种感动是永恒的。隐蔽战线的革命者们所构筑的信仰、人格和精神，不论岁月怎样改变，都能超越时空永远感动我们。

望着满山遍野在风中摇曳如火如荼的红叶，令人情不自禁地想到，这秋天中的红叶不也正是当年隐蔽战线革命者形象的化身吗？

有一首赞美叶子的诗句是这样的：

晓来谁染霜林醉，霜叶红于二月花……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CANTON.

1st Sept. 1946

My dear Mr Braden —

Will you please  
ask Dr Sun know whether you think  
Guetkhan's "Life of Lenin" is in good  
account, so he wishes to have it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soon?

Very sincerely yours  
R.S. Sun

宋庆龄写给鲍罗廷的信

第十一章 向往红色的远方

中东铁路这条红色之路如磁场般吸引了众多革命者从各地来到这里，然后，从这里奔向“远方”。

“远方”不是一般的称呼，而是早年中共对苏俄对共产国际特有的称谓，毛泽东直到1950年访问苏联期间，给国内写信发电报，还总是习惯在末尾签上：“于远方。”

“远方”对于向往光明的人们，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宋庆龄，被誉为“国母”“中国第一夫人”，中国共产党评价她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国之瑰宝”，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1908年，15岁的宋庆龄携妹妹宋美龄乘满洲号轮船远渡重洋，到美国去上学。她们是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

今天无论是男是女出国留学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当时还是清朝末年，封建意识还是根深蒂固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缠着三寸金莲的中国女性，几乎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1913年春，宋庆龄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这时，宋庆龄已由一个天真的少女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女青年，她的爱国思想也随之日趋炽热。

这一年的8月，宋庆龄来到了日本横滨，由于家里的特殊关系，她几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

孙中山是划时代的伟人，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还就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可是辛亥革命并未完全成功，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窃取。

这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处于低潮，跟随孙中山流亡日本的革命党

人，大都两手空空，生活困难，而且不少人对未来失去信心，意志消沉，意见纷纷。

这一年的9月，宋庆龄正式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她帮助孙中山起草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管理经费，尽力帮助孙中山工作，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和孙中山一起工作，让宋庆龄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的意愿得以实现。在与孙中山的频频接触中，她感受到了孙中山愈挫愈奋、斗志弥坚的精神及博学、儒雅的人格魅力。同时，宋庆龄也隐隐觉察到孙中山因革命不成功而产生的一定压抑和海外流亡生活中的孤寂。

这时的宋庆龄还是青春妙龄，情窦初开，她热情如火地工作的同时，心中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也生发出来。夜深人静，一个个浪漫的念头最后总落在孙中山身上，她知道自己的这种情绪缘于对英雄的敬爱，但是她也意识到这种对英雄的仰慕之心已催化成了一种异性间两情相悦的感觉。宋庆龄在朝夕相处中，默默地爱上了自己的导师孙中山。

半年后，宋庆龄终于鼓足勇气向孙中山坦率地表达了爱意：“孙先生，我已经细细想了很久，我没有别的比为你和革命服务能使我更快乐的。”

孙中山已经结过婚，并且有了三个孩子，那是包办的婚姻，当时孙中山只有19岁。在拜天地之前，这对新人从未见过面，更没有机会谈情说爱，除了偶尔相会，长期异地分居。48岁的孙中山投身革命至今，从没体验过真挚的爱情生活。突然，年轻、活泼、美貌的宋庆龄出现了，她把整个身心都奉献给他，对他的事业寄予无限热情，更重要的是她理解他的宏图大略、愿望和理想，并情愿与他同甘共苦，这对他莫大的精神支持，又是人生莫大的幸福。但是孙中山一想到自己的年龄，自己已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他怕委屈宋庆龄，在听到宋庆龄的话后十分迟疑和矛盾，没有作声。

“我不求什么，但愿委身革命，别的什么都不能满足我，只要我于你有用……”宋庆龄恳切地轻轻说。

孙中山心中涌起一股股热浪，他是爱宋庆龄的，几个月朝夕相处

使他深深地了解了她，爱上了她。

宋庆龄凝视着孙中山，勇敢地说：“我愿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的革命工作，而革命是不管年龄的，革命需要我们俩在一起！”

尽管孙中山也非常爱宋庆龄，但是面对这样的大事，他不得不慎重。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坚定地说：“你必须得到你父母的同意才行，我不能对不起你，也不能对不起你父母。”

为了尊重孙中山意见，并取得父母同意，宋庆龄立即从日本回到上海。

一回到上海，芳心已许的宋庆龄急切地向父母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宋庆龄话音未落，宋家骤起轩然大波，全家人都反对这桩婚事。

就连最疼爱她，也对她寄予最大希望的母亲倪桂珍也非常生气：“庆龄，你疯了，他已经快 50 岁了，并且又结了婚，你疯了？”

她的父亲宋嘉树曾资助过孙中山，也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老战士，但这种年龄上的悬殊差距，让宋嘉树怎么想也想不通。最后，宋嘉树苦苦恳求女儿说：“等一等，让我们多考虑一下。”

一等就是三个月，父母还是没有明确的答复，而且他们匆匆地为女儿另择了一个条件不错、年轻英俊的女婿。

宋庆龄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她也听到了父母准备让她与他们选定的女婿见面的消息。

宋庆龄匆匆给孙中山写信，讲明所有的一切，并表明自己绝不会动摇意志和情意。然后她又悄然给父母留了一封信，便毅然离家出走，返回日本了。

这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因宋庆龄不在身边，也时常情绪波动，常常陷入沉思中，感觉怅然若失。他的心在明确地告诉他，他是离不开宋庆龄的。他曾对日本的好友说：“我忘不了庆龄，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

在此期间，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珍也来到日本，她对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爱情表示理解和支持，两人经协议分居，实为离婚。

1915 年 10 月，22 岁的宋庆龄和 49 岁的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办理了结婚登记，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

从此，宋庆龄和孙中山形影相随，相濡以沫，生死与共，她将自己的命运紧紧地和丈夫孙中山及他所追求的事业融合在一起。

1922年，孙中山力主北伐，与陈炯明产生分歧，陈部下叶举要炮轰总统府。在危急时刻，孙中山坚持要和已怀孕的夫人宋庆龄一起撤退。一向温文尔雅的宋庆龄果断地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但却不能没有你，你快走！”宋庆龄边说边用力将丈夫从身边推开，并大声疾呼：“快走呀，快走！”孙中山在卫队的护卫下撤离，他命令留下的卫士务必保护好夫人。

孙中山得以安全脱险，宋庆龄长吁了一口气。可硝烟弥漫，陈炯明的叛军正在聚集，身怀有孕的宋庆龄步履艰难。她怕落入叛军手中，便命令护卫她的卫士开枪将她打死。护卫她的卫士们同仇敌忾，拼死保护她，冲出险境，终于化险为夷。

不久，宋庆龄失去了孕育的孩子，医生说她以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

在抉择生死的关键时刻，柔弱的宋庆龄所表现出的大义凛然，让许多国民党将士折服，其中当初曾反对孙中山和宋庆龄婚姻的人，也开始发自肺腑地称呼宋庆龄为“孙夫人”。

宋庆龄和孙中山既是夫妻又是战友，她对丈夫的爱情忠贞不二，不论是颠沛流离还是迎接胜利，她都是紧随丈夫左右同甘共苦，对丈夫的事业，她也是竭尽全力予以协助。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孙中山还创办了影响深远的黄埔军校。

1925年春天，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前往北京，共商国是。

正在革命形势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一代伟人孙中山却因长期的辛苦劳累倒在了北京的病床上，肝癌晚期的病情致使他的生命正走向尽头。这是他们结婚的第十个年头。

32岁的宋庆龄昼夜精心护理，她期盼丈夫的生命能够出现奇迹。

作为曾留学国外的医学博士孙中山深知自己来日无多，便立下了遗嘱。涉及国事的嘱托是那句后来的传世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

志仍需努力。”涉及家事的嘱托是：“我的书、住宅，全部留给我的妻子作为纪念。”

在弥留之际，他紧紧地握住爱妻的手，凝视许久，然后，他留给身边的亲属和国民党政要的最后一句话是：“要善待孙夫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逝世，享年59岁。

丈夫带着遗憾、未了的心愿和对爱妻无尽的牵挂溘然离世，宋庆龄悲恸不已，禁不住放声大哭。

在国民党“二大”当选为执行委员的宋庆龄，强忍悲痛，她决心要做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捍卫者。

让宋庆龄没有预料到的是，孙中山逝世两年后，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他们撕碎了国共合作的旗帜，疯狂地挥舞屠刀，使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血流成河，白色恐怖笼罩了全中国。

蒋介石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极力拉拢宋庆龄。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宋庆龄在此时刻，愤然公开声明，严厉斥责和坚决反对蒋介石等人倒行逆施背叛孙中山背叛革命的行为，并坚决表态决不与其共事为伍。

由于汪精卫在武汉也背叛了革命，宋庆龄不得已离开了武汉，回到了上海位于淮海路的家中。

宋庆龄缓缓地拉开了窗帘，一抹阳光暖暖地照进了客厅。几年前，她和丈夫还在这里生活，他们坐在沙发上相依相偎，坐在餐桌前一起就餐。那架钢琴在她娴熟而又深情的弹奏下，悠扬悦耳的旋律回荡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站在她身旁的丈夫轻轻地用双手打着拍子附和着她。

二层楼的房子，楼依旧，家居依旧，所有的物品摆放依旧，睹物思人，丈夫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丈夫伟岸的身躯还似在眼前晃动。从幻觉中猛地醒来，宋庆龄意识到，她和丈夫曾共同生活过的这个家，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孤独惆怅了。

此时，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为装点门面，为他标榜的继承孙总理遗愿的招牌贴金镀银，蒋介石对宋庆龄加紧了利诱和威

逼，并屡次派何应钦、宋子文及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霭龄、三妹美龄等人到上海游说。最后，蒋介石掷出了一张王牌，那就是戴季陶。

戴季陶是孙中山的老部下，他还曾参加了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日本的婚礼，这位一向以能说会道著称的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是蒋介石统治的理论家。

戴季陶彬彬有礼地坐在了宋庆龄上海家中客厅的沙发上，巧舌如簧地为南京政府极力辩护。一向温和优雅的宋庆龄进行了坚决的反驳，指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与孙中山的遗愿相悖，倒行逆施，已失去了革命的意义。戴季陶喝了一口茶，放下茶杯，话虽婉转但软硬兼施，对宋庆龄说：

“你不能够早些时候到南京来吗？那里有你的亲族，你也会比较快活一些。”

“假如快乐是我的目的，我就不会回到家中这样的痛苦环境里面，我同情民众，甚于同情个人。”

“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

“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是枪毙我，或者监禁我。”

.....<sup>⑤7</sup>

话已至此，戴季陶只得悻悻离去。

几天后，宋庆龄将戴季陶同她的谈话在《大公报》公开发表，以表达她的革命信念。

夜晚的时候，宋庆龄在家中二楼的卧室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她不经意地向窗外一瞥，竟然发现楼下的门前多了一些鬼鬼祟祟的可疑人员，这些人在门前不远处交头接耳晃来晃去。

蒋介石反革命势力气焰嚣张，在这黑云压城复杂多变的形势下，该何去何从呢？

宋庆龄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她决定去红色苏联，并把办理出国事宜交密友美国人雷娜·普罗梅一手操办。

1927年8月中旬，宋庆龄终于等到了苏联领事馆的通知：即将有一艘苏联轮船从上海开往海参崴。8月22日，宋庆龄发表了《赴莫斯

科声明》。

第二天清晨，宋庆龄在友人的陪同下，悄悄地离开了上海的寓所。门前的那些便衣特务，毕竟对“国母”的尊严还不敢公开冒犯，更不敢限制“国母”的人身自由，于是不敢放肆的他们只好停住跟踪的脚步。

在上海寓所前面的德国公园，早已有苏联领事馆的轿车在等候，宋庆龄和友人上车后，直奔吴淞口码头。陪同宋庆龄赴苏联的原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女儿已提前在码头等候。

他们一行秘密地登上了停泊在吴淞口的一艘苏联货船。在早晨的霞光中，轮船迎着初升的太阳，劈开碧浪驶进浩瀚无边的大海，向海参崴急速驶去。

阵阵海风，似乎吹散了宋庆龄心中沉重的阴霾。望着翻滚的海浪，她也止不住心如潮涌，思绪翻腾。

能够远赴苏联访问，不止是宋庆龄向往已久的夙愿，也是践行孙中山生前未了的心愿。

孙中山曾经多次接见来自“远方”的共产国际代表，同他们亲切交流和探讨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问题。他创立的三大政策之一就是联俄，这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予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也明确表达了他所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是要吸纳和借鉴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的。

苏联政府雪中送炭，资助孙中山创办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同时在莫斯科成立了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的中山大学，让这所大学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孙中山多么想到世人向往的红色苏俄去看一看，看看列宁开创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怎样的，遗憾的是他心有余却因工作太繁忙无暇实现心愿。最后，他病倒了，心愿只能变成遗愿。

孙中山逝世后，苏联政府还特意为孙先生赠送了珍贵的水晶棺椁，以表达深切的悼念。

此行终于可以实现孙中山的遗愿，宋庆龄的内心感到充实和欣慰。

经过漫长的海上颠簸，苏联货船到达了海参崴。接着宋庆龄一行

又换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奔赴莫斯科。

1927年9月6日，宋庆龄乘坐的列车徐徐进站，此时苏联外交部长阿维诺夫、教育部长哥伦泰夫人等政府官员已在瑟瑟的寒风中等候多时了。月台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欢迎的横幅标语迎风招展。

在《国际歌》的雄壮乐曲声中，宋庆龄在原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等人的陪同下走出车厢。政治上的风云变幻，旅途的奔波劳顿，使宋庆龄很疲劳，但是，来到向往已久的世界革命中心，宋庆龄如沐春风。

就在宋庆龄走下火车的那一刻，月台上所有的男士纷纷脱帽，苏联人民以特有的最高礼仪，向孙中山的夫人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宋庆龄说，她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而来，是代表孙先生和中国革命群众来访问和表示感谢的。说罢，她频频向苏联人民招手示意，簇拥在宋庆龄周围的欢迎人群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在莫斯科，宋庆龄会见了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和夫人，斯大林也亲切接见了宋庆龄。苏联政府特派了招待组，专门负责照料宋庆龄的生活。

在陈友仁的陪同下，宋庆龄应邀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发表了演讲。

她用上海话对学生们说：“我们为孙中山的信徒，我们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里接受训练……”

她顿了顿，接着说：“千万不要忘记，孙中山最宝贵的遗训就是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

“只有在孙博士实行三大政策后，实现三民主义的动力才能得以增加，国民党才能得以新生。”<sup>⑧</sup>

能够有机会亲耳聆听孙夫人的演讲，一睹孙夫人的美貌和高雅的风采，中山大学的学生们激动不已，宋庆龄的演讲赢得了阵阵掌声。

宋庆龄在莫斯科期间和曾经在中国长期工作过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相见了。

鲍罗廷在中国期间曾多次受到孙中山的亲切接见，对他的组织能力，孙中山很欣赏和器重。孙中山请鲍罗廷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亲笔签署了邀请鲍罗廷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的委任状。在鲍

罗廷回国期间，1922年至1923年，宋庆龄受孙中山之托，曾经连续给鲍罗廷写了几封信（此信件现存于莫斯科档案馆）。

老友在莫斯科重逢，备感亲切。鲍罗廷夫妇特意邀请孙夫人到家中聚会，宋庆龄和鲍罗廷的夫人还成了好朋友。

在莫斯科期间，宋庆龄还在鲍罗廷夫妇的陪同下，专程拜访了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同时，宋庆龄还应邀到许多地方参观访问，此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健康发展，让宋庆龄很欣慰也深受鼓舞。

在朋友的建议下，宋庆龄还前往高加索农村访问调查。

高加索群山逶迤，雄伟壮观，景色迷人。宋庆龄一行深入乡村农户，了解俄国革命后的农村生活。俄罗斯的风土人情给宋庆龄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革命前后农民们的生活变化，也让宋庆龄一行颇多感慨。宋庆龄亲身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建设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巨大魅力。

宋庆龄在苏联期间的心情是愉快开朗的，苏联充满活力的景象和喜人的新变化，激励着宋庆龄把中国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斗志和勇气。

可是国内传来的消息，扰乱了宋庆龄此时比较平和的心境，让她变得很不开心。

宋庆龄从小与宋美龄关系密切，曾经共同就读于中西女塾，后来又是宋庆龄带着妹妹宋美龄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她对妹妹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她由衷希望妹妹能够找一位理想的郎君过上幸福生活。可是妹妹宋美龄却与蒋介石结婚了，背叛革命的蒋介石竟然成为自己的妹夫，消息传来，宋庆龄内心一度忧伤不已。

接下来，宋庆龄的大姐宋霭龄和弟弟宋子文来信，婉言相劝，希望宋庆龄尽快回国，希望她对蒋介石的看法能有所改变。

种种消息都让宋庆龄感到压抑和忧郁，她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居住德国。在此期间，宋庆龄参加了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宋庆龄离开国内已是三年，气势恢宏的南京中山陵已经竣工。孙中山的棺椁计划从北京移至南京中山陵，并将举行奉安大典，即国葬。

蒋介石非常希望借助于奉安大典，来显示自己对孙中山总理的忠

诚，表明自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虔诚追随者，是国民党事业正统继承人。

蒋介石还频频向宋庆龄示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9 年 3 月 26 日在南京召开，宋庆龄虽在德国，仍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南京政府大张旗鼓地筹备孙中山的国葬，没有孙夫人的参加肯定是名不正言不顺不成体统的，何况蒋介石正要借孙夫人的出席，来昭示自己是孙中山总理正统的接班人呢。

正式邀请国母回国参加国父孙中山奉安大典国葬的电报，飞越千山万水，到了柏林。

宋庆龄知道蒋介石的用意，回不回去呢？一方面是蒋介石的政治圈套，一方面是她深爱着的导师、战友、丈夫的迁陵大典，该怎样在矛盾中做出明智的抉择呢？几经思考，她毅然选择了回国。

临离开德国柏林前，宋庆龄发表了《关于不参加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声明》中明确宣称：“我参加葬礼绝不是，也绝不能解释为缓和或改变我先前发表的宣言和决定，在国民党政策没有完全符合孙中山总理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

《声明》给蒋介石以有力的打击，消息传回国内，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人们翘首以盼宋庆龄回国。

1929 年 4 月底，宋庆龄轻装简从，乘火车离开柏林赴莫斯科。尽管莫斯科春意正浓，但是宋庆龄却无心观赏，一抵达莫斯科便换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直奔满洲里方向而来。

1929 年 5 月 14 日 9 点多钟，载着宋庆龄的列车汽笛长鸣，开进了满洲里车站。

在此之前，满洲里却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长期从事党史和地方志研究的满洲里市史志办的学者徐占信讲述了当年曾发生的宋庆龄险些在满洲里遇害的往事。

当年政局动荡，错综复杂。

由于军阀之间的钩心斗角和利益驱使，身在大连的原直鲁联军司

令张宗昌，对将他革去要职的蒋介石和张学良怀恨在心，寻机报复，他和逃亡在大连的对斯大林耿耿于怀的苏联远东地区白匪将领谢苗诺夫沆瀣一气，联起手来。

他们密谋在满洲里对宋庆龄下手。因为宋庆龄是蒋介石正式邀请回国的，她在中国有着显赫的声望，在国际上也颇具影响，如果在满洲里刺杀了她，然后将此罪名栽在蒋介石、张学良或斯大林头上，势必在国内引起混乱，甚至引起国际纠纷，他们便好从中渔利。

张宗昌和谢苗诺夫派的杀手陆续来到满洲里，边城满洲里变得阴森恐怖。

张、谢的阴谋被情报人员发现，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蒋介石、张学良和冯玉祥将军那里，蒋介石、张学良和冯玉祥火速选派了一大批精良的特工人，从北京、沈阳、潼关等地经中东铁路来到满洲里。黑龙江省最高军政长官、督办万福麟受张学良之命，从省府齐齐哈尔亲自到满洲里坐镇指挥。

经过多日较量，企图谋杀宋庆龄的凶手基本落网。直到最后一天，就在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即将进站时，才在车站的餐厅内抓获了最后一个刺客。原来，得知宋庆龄要在满洲里车站餐厅就餐的消息，刺客在为宋庆龄准备的饭菜里下了毒。

5月14日上午10点火车进站，宋庆龄受到了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实际上宋庆龄下车时，还有二位女性一同下的车。三人的着装、相貌和身材几乎一模一样，让人难以分辨哪一位是真正的国母。原来这是为保护宋庆龄的安全特意安排的。但不少人还是从仪容举止中，认出了她们中的第二位是宋庆龄。在站台上，宋庆龄与站在前面欢迎的官员握手，说：“你们辛苦了！”

随后在万福麟等人的陪同下，宋庆龄来到了贵宾休息室。当有人按原来的安排请宋庆龄就餐并告知是西餐时，她诙谐地说：“我是中国人，吃不惯西餐。”原来她刚下车时，就受到警卫人员“不要吃饭”的提示，宋庆龄立即明白饭中可能有问题，所以她同欢迎她的代表们一边谈笑风生，一边不失礼貌地婉言谢绝了用餐的请求。一个小时后，宋庆龄一行离开满洲里，继续乘车走中东铁路，向哈尔滨的方向。

向行驶。

5月16日下午两点，宋庆龄乘坐的列车徐徐进站。

哈尔滨各界一千多人早已在车站等候，其中既有哈市政要，也有中东铁路官员，还有学校学生及各界群众团体代表和媒体记者。军乐队奏响了热情洋溢的欢迎曲，在乐曲声中，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景惠、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哈尔滨特别市市长何玉芳等走上去与宋庆龄握手问候。宋庆龄微笑着点头，向欢迎的群众表示谢意，群众高呼“欢迎孙中山夫人”“三民主义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

宋庆龄虽旅途劳顿，却神采奕奕，在车站的贵宾室稍加休息后，便乘车前往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

此时的哈尔滨绿色葱茏，春意盎然，正是满城丁香花盛开的时节。一簇簇的丁香随风摇曳，清香四溢，姹紫嫣红的丁香花为春光增添了艳丽。

宋庆龄到哈埠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在大街小巷广为流传。身为国母、中国第一夫人，同时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她的到来可以说是哈埠最大的新闻。听说宋庆龄下榻马迭尔宾馆，许多市民纷纷涌向中央大街，想要一睹她的风采。为了向仰慕已久的国母致意，一些市民，尤其是时尚的女性不约而同地到中央大街的鲜花店选购漂亮的花束。被哈尔滨人称为“玛达姆”的俄罗斯女性对宋庆龄的名字也并不陌生，她们对她的特殊身份和人格魅力心仪已久，她们也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中央大街的鲜花店一时间人满为患，很快所有的鲜花被抢购一空，鲜花店的老板先是惊喜，但很快就变成了无奈，因为店里的鲜花已荡然无存，要想进货已是来不及了。

空气中充满了花香，人们自发地站在街道两旁夹道欢迎，场面空前热烈。华丽典雅的马迭尔宾馆正门上方早已悬挂了醒目的横幅：“热烈欢迎国母宋庆龄下榻马迭尔。”马迭尔门前铺着厚厚的红地毯，十位迎宾员早已守候在门口。另外还有一支由官方组织的欢迎队伍，这支队伍由哈尔滨各界代表、政府官员和中东铁路的工作人员组成，约200人。

在众人的翘首企盼中，下午3点，宋庆龄乘坐的轿车驶入中央大

街，人群沸腾了。

宋庆龄走下轿车，她先是颔首致意，然后又向热情的群众微笑招手。由于是回国参加孙中山的葬礼，所以她的穿着从头到脚都是素色的，但这无法掩去宋庆龄雍容高雅的气质和令人惊艳的美丽，此时宋庆龄 36 岁。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在乐队的演奏声和媒体记者的镁光灯的闪烁下，宋庆龄一行走进了马迭尔宾馆。

1929 年 5 月 16 日下午 4 点，宋庆龄下榻于马迭尔宾馆 305 房间。

宋庆龄此行从德国到苏联再回到国内，日夜兼程，风尘仆仆，可是仍然有许多记者在 305 房间的客厅里等候采访。宋庆龄急于入室沐浴，便委托秘书黄会卿代见。黄会卿逐一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宋庆龄沐浴完毕换好衣服走出房间，有记者提出请她拍照留念，宋庆龄答应了这个请求。

瞬间成为了永恒，宋庆龄的留影历经八十年的风雨变迁，至今仍完好地悬挂在马迭尔 305 房间和宾馆的大厅，成为了历史的见证。

对于群众自发欢迎自己的场面，宋庆龄很是感动。她对《哈尔滨公报》的记者说：“此次到哈，承各界欢迎，兹以匆促就途，不及答谢，请贵报待及感谢。”

当记者问到宋庆龄在德国发表的《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是否有所改变，宋庆龄回答：“在国民党的政策没有完全符合已故的孙中山总理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这一原则，我是不会改变的。我在此愿意重申孙中山学说的基本立场：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二、与中国唯一真正的革命朋友苏联密切合作；三、实现扶助工农的政策。”<sup>59</sup>

宋庆龄的话音刚落，众人就听到不远处的楼梯上响起了慌乱的脚步声，同时还伴随着保安急促的喝令声：“站住，快站住！不许上三楼！”

怎么回事？难道有人图谋不轨？305 房间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宋庆龄的警卫和秘书都围在了宋庆龄的身边，做好了随时保护孙夫人

的准备。

原来情况并没有那样紧张。因为有满洲里发生的事件做前车之鉴，哈尔滨特别市政府在马迭尔宾馆门前设立了警戒线。这时，急欲见到宋庆龄的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任栋梁、候介夫等人硬是冲破了警戒线，闯入了马迭尔宾馆。他们在上楼的时候遭到了保安人员的阻拦。

此时已追得气喘吁吁的保安人员发出了警告：“快站住！再不站住我们可就开枪了！”跑在最前面的学生代表毫不畏惧地回答：“我们是爱国学生，要求面见孙夫人。爱国无罪，你们凭什么对爱国学生开枪？”

负责三楼服务工作的一位马迭尔宾馆的俄侨管理人员，挡住了学生代表和保安人员，他用俄语说道：“肃静、肃静，请不要呼喊，贵宾在此休息，请赶紧离开！”

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的学生领袖、21岁的任栋梁用流利的俄语回答：“请不要剥夺我们中国学生的爱国权利，我们要面见孙夫人，孙夫人已被推选为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同盟大会的名誉主席，我们有重要的事情向她汇报。”

宋庆龄似乎听清了走廊里的争吵，她马上叫黄会卿去探个究竟。这时保安正在对学生连推带搡，想要强迫他们离开。

在黄秘书的及时制止下，出示了证件的学生代表被请进了三楼的会客厅，宋庆龄亲自来到了会客厅，并叮嘱紧随其后的警卫人员：“你们在远处就可以，不要吓到学生。”一些还没有离开的记者庆幸“好饭不怕晚”，他们总算等到了第一手的动态新闻。

坐在会客厅的学生代表见到和蔼可亲的宋庆龄向他们走来全部起立，非常礼貌地向她行礼致意。宋庆龄微笑着与他们一一握手，并请他们坐下谈话，这个和谐的场面被记者抢拍了下来。

学生代表把刚出版的两开本《哈尔滨学生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斗争汇刊》送给了宋庆龄，并简要汇报了从1928年11月起全市学生连续进行反对日本修筑满蒙5条铁路的斗争情况。学生代表说：“我们很尊重孙夫人，您是国际反帝同盟大会的名誉主席，致力于反对帝国

主义和保卫和平的运动，请您支持我们的斗争。”

宋庆龄认真地听完学生代表的汇报后，立即表态说：“你们的斗争是保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是反帝爱国的斗争，应受到国人的同情和赞扬，我坚决支持你们的斗争。”<sup>⑥0</sup>

宋庆龄立场鲜明的表态让学生代表表示无比振奋，他们热烈鼓掌，向孙夫人致谢。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学生，他们的脸上虽然还充满了稚气，但内心中却燃烧着强烈的爱国激情，这让宋庆龄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她觉得十分欣慰。她问刚才和俄侨管理员对话的是哪一位，21岁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校学生联合会主席任栋梁站起身来，宋庆龄示意他坐下，并称赞任栋梁的俄语说得很好。任栋梁说：“我从小在苏联生活过，我的父亲任辅臣在捍卫十月革命的战斗中牺牲了。”

宋庆龄动情地说：“我在苏联访问期间，听说过苏联红军中的中国团团长任辅臣的事迹，我还听说列宁曾接见过任辅臣烈士的家属。”

“是呀，我和妈妈还有姐姐受到过列宁的接见，那时我11岁。”

宋庆龄站起身来走向了任栋梁，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任栋梁的夫人，宋慧琴谈起当年任栋梁受到宋庆龄接见的情景说：“1929年5月，宋庆龄在马迭尔宾馆接见反对日本在中国东北修5条铁路的学生运动代表时，夸奖任栋梁的俄文很好，而且非常爱国。宋庆龄鼓励他为父亲争光，学好真本领，将来报效国家和人民。”

当年宋庆龄的接见，极大地鼓舞了哈尔滨的广大学生。在此之后的第六天，即5月22日，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全市各校的学生举行了规模更大的反帝示威游行。

1929年5月16日晚8点，马迭尔宾馆宴会厅灯火辉煌，大厅布置得华贵典雅。中东铁路公司督办吕荣寰，哈尔滨特别市市长何玉芳等官员陪同宋庆龄步入宴会厅，约有40人参加了为欢迎宋庆龄举行的晚宴。

尽管在场的所有人都希望中国第一夫人能够讲几句话，但宋庆龄还是委托黄会卿代她致辞。“孙夫人此次为总理安葬，特归国料理葬事，行经贵处，蒙此隆重招待，甚为感谢。谨代表孙夫人，借大家之酒为之致谢。”话毕，黄会卿举杯向众人敬酒，宾主起立，举杯相饮。

餐毕，已是晚 9 点 20 分，宋庆龄退席前往火车站。吕督办、何市长等政要殷殷挽留劝宋庆龄好好休息，明天再走。宋庆龄回答：“总理安葬期在即，实不克久事耽搁。”当晚 10 点 40 分，在初夏的夜色中，在空气中弥漫的淡淡的丁香花的清香中，宋庆龄乘坐中东铁路火车离开了哈尔滨。18 日晚宋庆龄抵达了北京，接着参加了西山碧云寺中山先生改殓铜棺仪式和家奠。28 日孙中山先生的陵寝从北京移至南京中山陵。在一系列隆重的仪式中，宋庆龄无疑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受到了加倍的关注，就连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也是礼让三分，可是她始终低调行事，尽力避开媒体的采访和一些政治场面的安排，几乎是沉默地面对一切。

宋庆龄访问苏联、移居欧洲，又在 1929 年 5 月通过中东铁路来到哈尔滨，引起满城轰动。

同样是这一年，一位默默无闻的少年刚在此前走中东铁路也来到了哈尔滨，之后他演绎了传奇的人生，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929 年 4 月，哈尔滨仍然下着雪，霏霏的雪花吻着黄昏中的中央大街，路面和街两旁的欧式建筑，都盖上了一层薄薄的积雪，整条街道宛如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一个 15 岁的男孩刚刚从北京来到这里。他好奇地望着街道两旁的西洋建筑，建筑上面那些栩栩如生的裸体浮雕让他不自觉地脸红。

此时的北京，天气已经转暖，男孩不知道哈尔滨还是风雪满天，所以他并没有带棉衣。他的外衣单薄，难以御寒，也许是因为年轻和初来乍到兴奋，他居然不觉得冷，只顾着睁大眼睛，看着他未见过的洋街、洋楼和洋人。

夜色已笼罩了中央大街，一排排路灯和商店橱窗广告灯饰交相辉映，五光十色。

马迭尔宾馆木质结构的正门十分厚重，但却是自动旋转的，所以想要进去并不难。男孩跟在大人们的身后走了进去，在北京他见到的都是一些古朴陈旧的红灯笼，而这里的吊灯犹如一簇簇珍珠玛瑙。巨大的吊灯造型奇特，令他目眩。

舞厅里传来了优美的音乐，那里面的红男绿女翩翩起舞，许多俄国女郎身着白纱，如烟似雾，轻盈飘逸。

男孩很是惊愕，为什么这里这样开放啊？

他从马迭尔宾馆走了出来。在北京他没有见过几个洋人，可是眼前的洋人实在太多，蓝眼珠、高鼻梁、白皮肤……形形色色的洋人和他擦肩而过。女洋人们脚蹬长筒皮靴，身穿裘皮大衣，有人牵着狗，身上弥漫着浓浓的香水味。

皮靴踩在铺满积雪的路上发出的“咔咔”声，马车车轮碾压在路上发出“嗒嗒”声，手风琴、吉他和口琴的演奏声音交织在一起，美妙无比，回荡在浓浓的夜色之中。

与这里相比，北京的四合院，街道，北京人的着装和生活方式，都显得那样陈旧古板，循规蹈矩。而这里的一切，让他觉得实在是太浪漫了。

他在这条街上走了整整两个来回，雪花还在飘着，这时他感到了冷和饿。于是，走到了中央大街的南端后，他接着向着秦家岗（南岗）中东铁路公寓的方向走去。

“咚咚咚”，他敲响了二姐家的房门。

“你，是你？你怎么来了，这么晚？”二姐开门后，看到满身雪花，冻得有些发抖的弟弟，又惊又喜。

“我下了火车就去了中央大街。”

“你下了火车，就该到家里来，天这么冷，在外面转悠什么？你到哈尔滨来，为什么不先写封信告诉一声呀？”二姐为弟弟换了衣服，倒了一杯开水，边嗔怪弟弟，边忙着为他准备吃的。

“你不写信，也该发个电报，我们可以到火车站去接你。外面这么乱，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我们怎么能放心呢？”二姐夫说到这指了指刚摆在桌上的一大碗加了荷包蛋的面条，笑着说：“你二姐做得还挺快，快趁热吃吧，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家就好了！”

男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看把你饿的，没人跟你抢，锅里还有啊！”二姐心疼地望着弟弟，边说边又到厨房里盛了一碗满满的面条。

这个男孩是谁呢？此时的他极为普通，但后来的他名扬世界。他被人称为“西部歌王”，创作了许多流传甚广的歌曲，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已成为蜚声中外的经典名曲，将被永久传唱。

他就是王洛宾。

提起王洛宾，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个戴着新疆瓜皮帽、载歌载舞的新疆歌王以及他创作的那些歌曲《阿拉木汗》《达坂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掀起你的盖头来》等等。听着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人们就会仿如身临其境走进天山脚下，走进“西瓜大又甜”的达坂城，看着“掀起盖头”的新疆姑娘，感受浓郁的西域风情。

很多人都以为王洛宾是新疆人或是生长在新疆西部，实际上他是纯正的北京人。

1913年12月28日，王洛宾生于北京东城艺华胡同一个职员的家里。他在传统的四合院中长大，小学是在京师八旗子弟学校学习，中学在通县潞河中学就读。王洛宾的父亲爱好音乐，曾在一个美国人开办的教堂工作，这使得王家的家风变得很开明，也让王洛宾对西方音乐有些朦胧的憧憬。

王洛宾的母亲告诉他，王家人都有东奔西走不安分的特点。王洛宾的父亲去过离北京三百多里的保定工作，王洛宾的大哥跑到了三千多里外的南朝鲜釜山，王洛宾的两个姐姐一个远嫁昆明，一个远嫁哈尔滨。

母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王洛宾说：“将来你长大了，还不知道要跑多远呢。”

对远方充满了向往之情，也许是这个家庭的精神遗传吧。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的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很自然地成为了新思想新知识汇集的中心。在学校中可以看到传播马列主义的刊物，在报刊上也可以读到介绍十月革命和苏联人民新生活的报道。王洛宾看到这些报道后感到很振奋，他听说有不少青年都到苏联去了。他最要好的同学的父亲就去了苏联，传回来的消息说，那里人人平等，年轻人也过得很快乐。此时的王洛宾并不懂得太多的革命道理，他只是隐隐感到苏联这个国家可以给人民的生活带来自由、平等

和快乐，对他而言这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于是，王洛宾萌发了到苏联去看一看，甚至到那里生活的想法，这个想法日趋强烈，挥之不去。

通过了解，王洛宾知道要去苏联就要经过哈尔滨走中东铁路。

王洛宾的二姐恰恰就生活在哈尔滨，他的二姐夫时任中东铁路局总翻译。远嫁哈尔滨的二姐回到北京总要讲起哈尔滨的生活，讲那些“老毛子”的趣闻逸事和充满异国风情的中央大街，还讲这座城市很多方面受到苏联的影响，在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上都是中西交融的。每次听到这些，王洛宾总想找个机会到哈尔滨去，然后再想办法去苏联。

此时的王洛宾正处在充满幻想和激情，也容易冲动的年龄。他既没有和学校请假，也没和家里打招呼，便悄悄地买了火车票，离开了北京。

“将来你长大了，还不知道要跑多远呢。”母亲的这句话道出了她的牵挂和不安。果然，羽翼尚不丰满的王洛宾就这样远离了母亲的视线。

家里以为王洛宾失踪了，找到了他的学校和同学的家，母亲急得寝食难安，直到王洛宾的二姐写信回来，大家才知道他的下落。

来到哈尔滨以后，王洛宾很快便被这座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迷住了，他那颗本就浪漫的心灵被彻底激发了。

中东铁路的开通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得哈尔滨聚集了大量白俄贵族和上流社会人士。其中有许多演员和音乐家在国际上久负盛名，他们在哈尔滨登台献艺，举办各种高水准的演出。同时，他们还开办了许多的音乐学校和培训班，让哈尔滨除了被人们称为“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外，还有了“音乐之城”的美誉。

从小喜欢音乐的王洛宾被哈尔滨特殊的音乐氛围陶醉了。他住在南岗铁路公寓的二姐家，尽管二姐很希望和弟弟多待在一起，可他却更钟情于跑出去欣赏和学习音乐。二姐夫没有时间陪他出去，但却帮他弄到了很多演出的门票。

在这段时间里，王洛宾多次出现在中东铁路俱乐部，观看了很多场让他惊叹不已的演出。其中有蜚声远东地区的中东铁路管理局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晚会，有风靡哈埠的戈涅尔爵士乐队舞曲演奏会，有国际大师戈琳娜钢琴演奏会，还有刚刚引进的芭蕾舞和话剧。

那跳动的音符如同滚动的雨滴，时而噼噼啪啪，时而窸窸窣窣地落在了王洛宾的心田，唤醒了他脑海里还在沉睡的音乐细胞。

王洛宾生平所学的第一件乐器是吉他，并且是在哈尔滨学会的。他在铁路公寓认识了著名的作家和音乐家塞克，是塞克手把手教会了他弹吉他。

王洛宾在他的自传中就写了一篇《我和塞克》，他写道：“在哈尔滨，我认识了塞克，塞克当时在一个青年会的音乐沙龙教吉他，我报名参加学习，我也常到他的宿舍玩，他的朋友很多，教吉他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他是真正的艺术家、诗人，画也很好，歌也唱得好，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对他很崇拜，他教我吉他也特别认真。塞克可以说是我艺术上的启蒙老师。”

2012年10月，已经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了，此时的哈尔滨夜幕早已降临，可是乌鲁木齐依然是明亮的白昼。按当地的时差，此时应该是下午5点。

新疆充满异域风情，尤其是维吾尔族聚集的大巴扎，街道两旁满是伊斯兰风情的建筑。这里十分繁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多是维吾尔族人，男人们戴着做工精巧的瓜皮帽，女人们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在广场上有人弹着“冬不拉”，唱着王洛宾创作的歌曲《达坂城的姑娘》：“达坂城的石路硬又平啊，西瓜大又甜，那里住的姑娘辫子长哎，两个眼睛真漂亮……”

在乌鲁木齐这个美丽的地方，王洛宾的儿子王海成凝视着父亲王洛宾创作手稿真迹，自传草稿复印件，还有他撰写的《我的父亲王洛宾》一书，中央电视台为王洛宾拍摄的纪录片光碟，深情谈起了他的父亲王洛宾。

“我父亲王洛宾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他15岁时不和家里打招呼就不辞而别，坐火车去了哈尔滨。他对哈尔滨印象很深，尤其对中央大街很迷恋，他晚年时还给哈尔滨的《新晚报》写了一篇稿子，写了对中央大街和松花江的回忆，很美。他在哈尔滨认识了著名作家塞克，他还给塞克的作品谱过曲，他的音乐处女作《北归》就是

在哈尔滨创作的，哈尔滨的俄侨音乐文化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学习音乐开始于哈尔滨，可以说，哈尔滨也是我父亲走上音乐道路的启蒙城市吧。”

“家里人看我父亲在哈尔滨生活得很愉快，便通过我二姑父，就是王洛宾的二姐夫的关系，给他联系到哈尔滨电务传习所学习发电报，也算是为他将来的工作做准备。可是我父亲没有同意，他的本意是去苏联，他很羡慕苏联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生活，那里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是他向往的幸福世界。他当时特别向往苏联，他还专门打听从哈尔滨到苏联究竟该怎么走。”

晚年的王洛宾在自传中回忆往事写道：“那时，我不懂什么共产主义，也不懂什么马克思主义，我在学校听说过列宁的名字，他领导穷人翻身解放。当时许多进步青年都向往苏联，我同学的父亲去了苏联，说那里年轻人很快乐，很容易生活，而且工人地位很高。我那时非常想到苏联去，去读书，或者工作，自食其力，因为我感觉那时中国社会太黑暗，没有自由，很压抑……”

由于当时哈尔滨的俄罗斯人很多，即被不少市民称为“老毛子”的人随处可见，在生活中，俄语交流很普遍。王洛宾开始学习俄语，他学习俄语的目的很明确，所以很努力，又正是记忆力最好的年龄，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学会了很多日常用语。

他还有意识地询问去苏联该怎样走，大人们就会告诉他：“沿着铁路线一直走，西线到头是满洲里，东线到头是绥芬河，从这两个地方过去就是苏联。不过，太远了，要坐中东铁路的火车去哦。”

跃跃欲试的 15 岁的王洛宾想来想去，觉得要去苏联，还是得靠在中东铁路当总翻译的二姐夫来帮忙。平日里，他观察到二姐夫也时常称赞苏联，对苏联挺有好感的，只是他的工作太忙了，起早贪晚，几乎没有空闲时间。王洛宾终于等到了二姐夫少有的休息日，他和二姐夫开始对话了：

“二姐夫，我想去苏联看一看。”

“噢？那可不是你从北京来到哈尔滨，那是出国，你知道吗？”

“大哥跑到那么远的朝鲜，不也是出国吗？”

“哎呀，咳，你不要跟大哥学。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去苏联？”

“在北京，我就听说有很多青年去了苏联，说那里年轻人生活很好，自由快乐，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发挥，我想去那里学习或工作。”

“男人是需要闯荡，可是你闯得也太早了，你才 15 岁，一个人，家里怎么能放心呢？”

“我非去不可，我做梦都想去。二姐夫，求你帮帮我吧！”

“你先别急，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

王海成谈到这段往事还说：“我的二姑父，就是王洛宾的二姐夫知道我父亲的个性是很执拗的，父亲认定的道路，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啊。最后，通过铁路朋友的关系，二姑父给我父亲在中东铁路的一个小火车站，安排了一个当信号员的工作，就是打旗的，意思是让我父亲通过铁路的工作寻找去苏联的机会。我父亲回忆说，他去的地方叫横道河子.....”

---

1929 年春天，15 岁的王洛宾离开哈尔滨，来到了地处偏远的横道河子火车站，成为了当地铁路员工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群山环抱中的横道河子小镇，一排排树木顺着坡形重重叠叠，在浓密的绿树掩映下，山野中绽放着五颜六色的山花，镇子中间有一条长长的河流，将小镇的建筑从中间隔开。河水款款地流淌，水波荡漾，水清见底。

小镇里的建筑弥漫着俄式风情，其中的教堂建筑非常典雅别致，其他建筑都是带有统一的俄式风格的米黄色铁路平房。

置身于此，虽然比不上北京或哈尔滨的繁华热闹，但是久居城市的王洛宾感到，这里远离了喧闹，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依山傍水的田园风光，恬淡幽美，这让王洛宾觉得很惬意。更让他开心的是，这里离他去苏联的梦想又前进了一大步。

尽管横道河子不是什么大站，却是中东铁路的基地所在，因为规模庞大的中东铁路车库就设在小镇上。每天车库周围都有很多进出的火车头，它们散发着飘来荡去的烟雾，“呜呜呜”的火车鸣笛声

更是不绝于耳。

王洛宾对这样的景象很感兴趣，心想：这地方是来对了，这么多的火车都汇聚在这里，那就是增加了自己实现心愿的机会。这些四通八达的火车总会带走自己的梦想的。

15岁的王洛宾默默地站在横道河子火车站的站台上为过往的火车挥舞着信号旗。迎着旭日，送走晚霞，一天又一天，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时间一长，王洛宾心里就开始打鼓了。这里虽然是半山区，可是夏天的中午，太阳直射下来，还是异常炎热的。汗水涔涔的王洛宾热得难受，甚至心烦意乱，他想，这小小的信号旗还要打多久，才能实现梦想？再想想，自己要去的是苏联，却每天冒着风雨，顶着酷暑，在纵横交错的铁路线上，扮演一个打小旗的角色，真是哭笑不得。

想着想着，他手中的信号旗竟然下意识地掉落在地上。此时二姐夫的叮嘱响在了耳边：“你可不要马虎大意，这信号旗是给过往的火车发信号的，等于发号施令，务必一丝不苟。你的旗打错了方向，你被赶回家是小事，整不好，火车要翻车的呀！”

“呜呜呜”，一列火车鸣着汽笛从远处驶来。王洛宾赶紧捡起了信号旗，按标准的姿势站好，向即将进站的火车发出准确的信号。

两个月后，王洛宾二姐夫的朋友、横道河子火车站的站长终于答应了王洛宾的苦苦请求，让他登上了由哈尔滨始发，途经横道河子，开往绥芬河的列车。

终于可以放飞自己的梦想到苏联去了，一切的艰辛、汗水甚至委屈总算有了回报，所有执着的追求就要变成现实，王洛宾满心欢喜，笑逐颜开。他打听过，到莫斯科太远，在绥芬河过境可以先到西伯利亚地区，或者去海参崴，一步一步来吧。

望着车窗外掠过的风景，天蓝蓝，水清清，花艳艳，绿树摇曳，一切景物在王洛宾的眼中，都显得格外顺眼、好看。他那年轻驿动的心，随着火车轮的快速转动，心驰神往。他在心里不止一遍地呼喊着：“苏联啊，苏联，我爱你！”

此时此刻，15岁的王洛宾才似乎理解了在北京时听到大人说的那句话：“一些青年人争先恐后、想方设法去苏联，那里好像是圣地，

就像去朝圣一样啊！”

在急切的盼望中，火车抵达了中苏交界的绥芬河。

走下火车的王洛宾，顾不上吃饭和休息，便急着打听国境线的准确方向。问明后，便匆匆忙忙，几乎是一路小跑地来到了国境线的岗哨前。

岗哨警察厉声喝问：“你，你站住！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苏联。”王洛宾坦诚地回答。

几位警察看到眼前站立的这个瘦弱的孩子，很是纳闷和惊愕，于是语气稍微平和一些地问：“你多大啦？你有出国手续吗？”

天真的王洛宾以为坐火车到了边界，对面就是向往已久的苏联，走过去就行了。怎么这样麻烦，还要什么手续啊？于是他向警察恳求：“我15岁了。叔叔，我没有手续，我也不明白要什么手续啊！求求你们放我过去，我做梦都想去苏联呀！”

“不行。这是出国，不是国内，没有出国手续怎么能放你过去。快离开这里吧，嗯！”

“叔叔，我是从北京跑过来的，太不容易啦，求你们高抬贵手，谢谢你们了。”

“这是国境线，按规定，没有手续越境是犯法的，就要抓你审讯了。看你是个孩子，是个中学生，不然早对你不客气了。前面就是苏联，你看一看就赶紧离开吧！”

再三恳求也无济于事，王洛宾急得直跺脚。想想所有的努力都泡汤了，已经仅剩几步就可以圆梦了，可是这几步却比登天还难。王洛宾沮丧地低下了头，泪水已经在眼里打转了。

王洛宾抬起头，擦干了眼泪，望穿秋水般地注视着远方。他看到了远远的地方有苏联的哨兵在走动，他还依稀看到了苏联的房屋，看到了蔚蓝的天空下，苏联建筑物上面迎风飘扬的红旗。

15岁的王洛宾跷起脚，瞪大眼睛向远处看了又看，望了又望。

王洛宾无奈地离开了，他坐火车又回到了横道河子火车站，可他已无心再挥动那小小的信号旗了。他听别人议论，不少的革命者也没有任何出国手续，他们都是秘密地“偷越”国境去苏联的。

不甘心半途而废的王洛宾，又乘坐火车辗转来到了另外一处国境线满洲里，准备“偷越”国境。毕竟人生地不熟，15岁的年龄冲动有余，谋略不足，又搞不清楚有什么样的越境路线，他盲目行动的结果是被警察抓住了。多亏了王洛宾二姐夫得到消息后，经多方联系求情，王洛宾才得以安全地回到了哈尔滨。

儿行千里母担忧，尽管王洛宾的二姐夫已经给北京的岳母写信言明情况，可是王洛宾才15岁，又是辍学在外，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如茫茫海洋里的一叶孤舟在漂流，母亲怎能不牵肠挂肚、日思夜想呢？已经半年多的时间，还没有见到儿子回来，坐立不安的母亲给哈尔滨的二女儿接连发来几封电报。

回到哈尔滨的王洛宾怅然若失，郁郁寡欢，好像变了一个人。他的二姐和二姐夫担心弟弟再生意外，两个人便陪弟弟坐上火车，一路看守，将王洛宾“押解”回京。

晚年的王洛宾在自传中写道：“在绥芬河和满洲里的经历，我是一生难忘啊！这是我很大的遗憾，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当时要去苏联的心愿太强烈了，那时的我既冲动，也很单纯。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常常抱怨自己，去苏联一步之遥，别人能过去，我怎么就过不去呢？”

王洛宾的生命历程，始终有一个情结挥之不去，这始于他的中学时代，那就是向往“远方”。梦想去苏联，这个情结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

当年王洛宾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母亲的身边，读完中学后，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本来在哈尔滨学会了不少俄语的王洛宾又选修了俄语，因为他选择的声乐老师霍尔瓦特的夫人就是著名的俄罗斯歌唱家，这位声乐老师不会讲中国话，授课是用俄语。

1934年，王洛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之后，他在北京铁路中学担任了音乐教师。

1937年，王洛宾的母亲去世。埋葬了母亲后，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王洛宾毅然报名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和共产党员、著名作家塞克、萧军等一起跋山涉水，宣传抗战。

这期间，王洛宾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和猖狂，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勇气和力量，他也体会到了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和酸楚。义愤填膺的王洛宾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曲，比如《老乡，上战场》《风凌渡的歌声》《洗衣歌》《血花曲》等，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鼓舞和振奋了抗日军民保家卫国、浴血抗战的信心和斗志。

也许王洛宾 15 岁时的离家出走预示着他的一生都会远游闯荡。山西、兰州、青海、甘肃、新疆等地，都曾是他生活、工作和创作的地方。不论走多远，不论岁月怎样变迁，他内心深处的浪漫情怀总是有增无减。

1939 年夏天，王洛宾在青海协助郑君里导演拍摄《祖国万岁》，其中要拍摄烟波浩渺的青海湖周围碧绿的草地上放羊的场景。郑君里导演临时选中了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的高才生王洛宾和美丽的藏族姑娘卓玛担当牧羊人。拍摄时，身穿藏袍的 25 岁的王洛宾在赶羊时，挥动着的鞭子稍不留神在卓玛姑娘的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子，那匹马惊了，猛地跑起来。骑在马上的卓玛惊呼一声，回头看了一眼，流露的神情似乎很生气，又好像很高兴。

二人继续赶着羊群往前走，不一会儿，趁着王洛宾没注意，卓玛姑娘悄悄地溜到王洛宾的身后，甩起鞭子在王洛宾的背后轻轻地抽了一鞭，接着莞尔一笑，好像是替她的马儿出了气，报了刚才的一鞭之仇。

这些画面都被电影镜头真实地记录了下来。连拍三天后，到了晚上，郑君里导演要用带来的放映机在草原上放电影了。闻讯而来看电影的藏族和蒙古族的牧民多达几百人，远处的人就只能骑在马上看。年轻的王洛宾和卓玛姑娘是骑在一匹马上看电影的。后来有人问王洛宾：“你们两个人骑在一匹马上，怎么看电影啊？”王洛宾回答说：“怎么看电影，你自己去想吧。”

三天后，王洛宾随摄制组撤离了草原上的帐房，撤离了迷人的青海湖。

藏族姑娘卓玛和她的家人骑着马送行，一直送了很远还舍不得回去。

王洛宾是随着摄制组的骆驼队返回西宁的，骑在骆驼上的王洛宾

不停地回头挥手告别。驼铃声声，沙漠无垠。王洛宾再挥手时，回望遥远的地方，骑在马上的卓玛姑娘还在远远地招手……

远处辽阔宁静的草原和少女美丽的身影在王洛宾的眼前闪现。草原上的狂奔，少女高高举起的鞭子，尤其让人无法忘记的是那落在背上的一鞭。一幅幅动人的画面，幻化成一首情歌在王洛宾的心里浅吟低唱：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  
我愿流浪在草原  
跟她去放羊  
每天看着那粉红的小脸  
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我愿做一只小羊  
跟在她身旁  
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这首歌在西宁演出后，不胫而走，很快在各地传唱。

王洛宾的命运，充满着戏剧性的传奇。

故事依然在漫漫的岁月里延续，其结局还平添了几分悲壮。

就在王洛宾的传世经典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诞生不久，他还时常沉浸在和美丽的藏族姑娘卓玛奇遇的温馨回忆中，回味着那疑是天镜落高原、清澈浩瀚无垠的青海湖和湖边草原美景的时候，却从痴迷陶醉的天堂中，猝然间，坠落到了阴森森的地狱里。

1941年春天，在兰州，正负责组建“儿童抗战剧团”工作的王洛

宾，突然被军统特务押走了。他被锁在一辆马拉的木笼囚车里，穿过颠簸的路，穿过整个城市，向兰州城外走去。

一匹老马拉着囚车，摇摇晃晃地走着，车轮碾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王洛宾看着渐渐西沉的昏黄的落日，没有想到自己竟会成为一名阶下囚。自己何罪之有，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怎么想都想不通。

老马“嗒嗒”地走上了黄河桥，木轮子跳动着发出轰隆隆的响声，过了河就到了城北郊外，一片荒凉，人烟稀少。马喘着沉重的粗气，终于到了目的地——东家湾沙沟监狱。这是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军统处沙沟秘密监狱。

王洛宾一生中第一次穿上了囚服。

这座黄河北岸上的监狱陷在一条沟里，与世隔绝，离城有十几里路，监狱用的水都要用毛驴到几里之外的黄河边去驮。

监狱的东面是山，山上设有岗楼，其余的三面都是西北特有的土夯围墙，上面布满了铁丝网。监狱里的小号是用大仓库改造的，小号像鸡笼一般，里面有一个小土炕，土炕上有一堆臭不可闻的脏草，人躺下去腿伸不直，睡觉时得拼命地把头往后靠，把脚抵着草，像一只大虾一样蜷缩地躺着。王洛宾被作为共产党的要犯关在了6号笼里。

王洛宾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把他这个写了这么多抗日救亡歌曲的艺术家送进了监狱。他虽然和塞克、萧军这样的共产党员长期在一起工作，可自己仅是一个进步青年，并非是共产党员啊。另外，塞克和萧军来到兰州从事的都是抗日宣传，他们的到来，给西北的抗日宣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抗日无罪呀！

按惯例，对于不认罪不招供的囚犯，都要先进行严刑拷打。王洛宾被打得皮开肉绽，他质问打他的特务：“难道宣传抗日有罪吗？”换来的是更加凶狠的毒打。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特务开始对王洛宾进行逼供：

“你不要执迷不悟，要老实交代！我们在你的笔记本里发现了列宁的照片，怎么回事？”

“我崇拜列宁，我的笔记本上还抄有列宁的语录和苏联歌曲，我不否认。”

“你是‘赤匪’，我们调查过，你15岁就有偷越国境的行为。”

“我承认我向往苏联，即使叫偷越国境，我的目的很简单，想去那边谋生存，听说那里的生活平等自由幸福，这有罪吗？”

“这些先不论。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就是不是，你们可以充分展开调查嘛。”

“不是共产党员，哼！不是共产党员，你怎么会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嗯？”

.....

此时的王洛宾心里是五味杂陈，是秀才遇土兵，有理说不清了。他是搞艺术的，不是搞政治的，阴差阳错，却让他与政治有了牵连。

王洛宾回忆起一件事情。

1940年，也就是在那前一年，他在兰州很要好的同学介绍他认识了一个人，同学说那个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从苏联回来。那人很神秘，他了解到王洛宾很爱国，思想进步，也很能干，就看中了他。在一个茶馆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那人说：“洛宾，想不想参加共产国际这样先进的国际组织？我们都是这个组织的人。”

他拿出一张俄文表格让王洛宾填写，王洛宾几乎没有犹豫就接过了表格，用俄文填写了。

2012年10月，王洛宾的儿子王海成谈及此事，颇有感触地说：

“我父亲王洛宾对红色苏联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有三个重要的笔记本，抄的全是列宁语录和苏联的红色歌曲。当年在兰州的老同学，陪他去见一个人，据说是从共产国际派回来的。他就问我父亲，你这一生向往什么，我父亲说我最向往的是苏联，我最崇敬的人是列宁。后来，那个人说，你填一张表格，就是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表格。当时也是秘密的，我父亲向往苏联，就用俄文填写了，后来我父亲就被捕了。”

这一张加入共产国际组织的申请表，是否被批准，没有下落，更谈不上参加这个组织的任何活动，可这却让命运多舛的王洛宾被国民党的监狱囚禁了整整四年，受尽了折磨和摧残。

四年后，出狱的王洛宾，更深知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残暴和专

制，他对黑暗、血腥的统治势力，也更加痛恨和蔑视。

建国前，王洛宾参加了解放军，随部队来到了新疆。

1950年，毛主席访问苏联带回来的苏联歌曲集，准备译成中文，尽快出版。当时有关领导在全国各地撒网般地挑选专家，遗憾的是，有些人俄文特别好，在音乐上却是短板，而擅长音乐的人在俄文方面又不是长项。

选来选去，最终的人选浮出水面。有关领导专程来新疆，找到了新疆军区文艺科科长王洛宾，并强调说，尽快尽好地出版苏联歌曲集，这是刚刚访问苏联回国的毛主席交代的任务。

多年来，默默抄录苏联红色歌曲已成习惯，几十年来向往苏联的情怀不变。小时候在哈尔滨学俄语，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又专修俄文专业的王洛宾一展才华的机会到了。他一丝不苟弹奏着钢琴，一遍又一遍地找准音符。每个词句，他都反复推敲，力求翻译得原汁原味。他倾心倾力，昼夜兼程，圆满地完成了毛主席亲自带回来的第一部苏联歌曲集的中文翻译工作。这些脍炙人口的苏联歌曲，很快就在全国各地被广泛传唱。

王洛宾一生创作和改编了一千多首歌曲，他被称为“人民音乐家”“西部歌王”“西部民歌之父”。

他创作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被评选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他的代表作之一《在那遥远的地方》荣获中国文化部、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金唱片特别创作奖”，被法国巴黎音乐学院作为东方音乐教材，被饮誉世界的保罗·罗伯逊、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等歌唱家当作华语演唱的保留节目。

1994年7月，王洛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东西文化交流特别贡献奖”。

1996年3月14日，83岁的王洛宾因病在新疆逝世。5月，他的墓碑在北京金山陵园落成。在外面漂泊半个多世纪的游子，终于回归故里——北京。

2014年，王洛宾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中国十大作曲家之一。在晚会盛典上，王洛宾创作的歌曲代表作《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

爬上来》《阿拉木汗》《达坂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等，在亿万观众的心中久久回荡。

王洛宾走了，他的歌活着，跨越世纪，跨越国界，已成为世界人民心中永远的经典。歌绵绵，情无限，当人们沉浸在王洛宾的歌曲那感人的音乐世界时，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位音乐大师向往“远方”、向往苏联的感人故事呢？

第一次到哈尔滨我不是20岁

我在瀋洲省委做交通員

馮詠安 95歲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六

馮咏莹写给作者的手书

于武汉

## 第十二章 巾帼女杰铸传奇

冯咏莹是红色之路故事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红色之路发生的故事大都由革命先驱的后辈讲述，那些革命先驱已先后过世，而冯咏莹作为亲历者亲自讲述那段难忘的岁月，十分难得。

2008年10月在武汉，已经95岁的冯咏莹虽然步履蹒跚，但身体却依然硬朗，思维也称得上清晰。谈到中东铁路，谈到中共满洲省委的战斗岁月，她记忆深深。

见到老人时，一抹阳光正暖暖地倾洒在老人的身上，她的头发已经是银白色。岁月会使人慢慢变老，但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却会让人重新回到那激情燃烧的青春时光。

在儿女的搀扶下，她写下了一段话。老人认真地伏案书写，每个字都写得很慢，一笔一画都融入了她的情感，让人为之动容。老人写道：

第一次到哈尔滨我不足20岁，我在满洲省委做交通员。

冯咏莹 95岁

2008年10月16于武汉

接着老人在儿女的搀扶下来到武汉的名胜景地东湖。

东湖曾是毛主席到过的地方，在畅游长江后，他创作了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东湖的风景如诗如画，四周的山不算高，环抱着湖水。东湖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波涛汹涌的长江流到此地，已变得风平浪静，水面不时荡起一层层涟漪，平添了几分情趣。

沿湖边的绿柳如伞状般蓬蓬松松，一缕缕细长的枝叶飘散垂落在

地，在徐徐的风中摇曳摆动。高高的梧桐树那茂密的树叶遮住了初秋灼热的阳光，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没有日晒的感觉。人在山水间感觉神清气爽，怡然自得。

冯咏莹的儿女依偎在她的身边，望着一双儿女，老人打开了话匣，敞开了心扉。

老人首先是从她的家庭成员谈起的。老人的家庭关系真比《红灯记》中的李玉和的家庭关系还复杂。但这个特殊家庭成员的命运却是和复杂艰辛的中国革命历程息息相关的，这个家庭发生的故事感人至深。

冯咏莹的哥哥冯仲云是赫赫有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将领，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怀仁堂隆重举行授衔、授勋仪式上他荣获“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勋章是对军人的奖励，而冯仲云身着便装十分引人注意。因为冯仲云已离开军队，所以不能授衔。但由于他功绩显赫，所以授予他两枚勋章。便装授勋，这一殊荣的背后，是共和国对他和抗联的高度表彰。

冯咏莹的丈夫杨光华曾经是湘鄂西临时省委书记，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冯咏莹的儿子斯瓦拉有一半的俄罗斯血统，斯瓦拉的生父是杨光华，冯咏莹是斯瓦拉的继母；冯咏莹亲生的女儿是杨剑如，杨光华是杨剑如的继父。而冯咏莹和杨光华的亲生儿子，在出生仅仅六个多月的时候就在莫斯科失踪了……

可以说，冯咏莹的人生是一段传奇，跌宕起伏、曲折离奇。而传奇的产生，和那长长弯弯的中东铁路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冯咏莹1914年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余巷村，余巷村依山傍水，走在村子的路上，随处可见潺潺的溪水缓缓流过。

地处偏远的余巷村环境清幽、空气清新，如同世外桃源，但同时这里又很闭塞，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代为农。

可是这样的一个小村庄，出了一个青年才俊，他就是冯咏莹的哥哥冯仲云，他不仅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妹妹的命运。

冯仲云小的时候在村子里的私塾读书，小学去了常州，中学去

了省城杭州，离家越来越远，视野越来越开阔。接受新思想新知识的他，鼓励妹妹争取读书的机会。

1926年夏天，18岁的冯仲云考入了最难考取的清华大学，他所考取的数学系在全国仅录取了一名学生。一旦考入清华大学，可谓前程似锦。

本来可以在数学界大展宏图的冯仲云，却选择了另一条人生之路。

1927年5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乌云翻滚，冯仲云却毅然选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冯仲云成为清华大学中共支部书记。

这期间，冯仲云依然关心着农村的妹妹，他给冯咏莹邮寄了不少进步的书籍，如歌德、高尔基、鲁迅、郭沫若、冰心的著作，这使得冯咏莹的心灵如沐春风，她懂得了要改造社会就要努力学习努力奋斗。

1930年，清华大学毕业的冯仲云可以挣钱了，于是他给妹妹邮寄了路费，让她从农村老家来到北京，并四处奔波，把妹妹安排到了中大附中读书。此时，党组织安排他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冯仲云于是特意委托几位清华大学要好的同学关照妹妹的学习和生活。安排妥当后，冯仲云前往哈尔滨做地下党的工作。

人是环境的产物，眼界可以改变人生。

从偏远的农村来到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北京，不止是地域的跨越，也会带来思想的飞跃。冯咏莹像是飞出笼中的鸟一样，飞起来才见到了蓝天的广阔辽远，她不再孤陋寡闻，也不再自卑拘谨。哥哥的好朋友对她很关心，常带她到清华大学的食堂吃饭，有时还给她讲一些社会需要改造的道理，让她接触到了许多新的思想和观念。在他们的引领下，她参加了一些学生活动，加入了进步的学生团体。

她阅读了许多进步的书籍，知道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女英雄秋瑾的爱国壮举，也了解了向警予那样的女共产党员的英勇事迹，她读懂了李清照的千古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成长期的冯咏莹，渐渐摆脱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她相信女性

同样可以独立做事，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男子汉有铮铮铁骨，女人也可以巾帼不让须眉。

文化的汁液将 16 岁的少女冯咏莹浇灌得外美如花、内秀如竹。

秋去春来，年复一年。冯咏莹一直很想念哥哥，对哥哥心存感激。没有哥哥的指引和帮助，她就会永远生活在落后闭塞偏远的农村，裹着小脚成为农家妇女，浑浑噩噩了此一生。

在北京的学习和生活费用都是哥哥按月寄来的，冯咏莹感受到了真正的爱。她从哥哥的来信中，知道他除了有正当的职业外，还在哈尔滨从事着艰苦的革命工作，她相信哥哥的选择。

就在北京学习和生活的第四个年头，1934 年春天，冯咏莹接到了哥哥的来信，希望她尽快来到哈尔滨。

哥哥的来信，让冯咏莹毫不犹豫地中断了学习，她买了车票，匆匆登上了北京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不足 20 岁的冯咏莹单身一人，千里迢迢独闯日本侵占区，要面对怎样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但冯咏莹对这一切全然不顾，令她不安的并非是自己在旅途中可能会遭遇什么意外，她满心牵挂的是兄嫂的安危。

此时的冯咏莹特别想尽快见到哥哥，几年来哥哥的来信都是叮嘱妹妹安心学习，这封信打破惯例第一次提出让她尽快到哈。哈尔滨是所谓的满洲国的地盘，是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区，冯咏莹在报纸上常看到日本鬼子在东北烧杀抢掠、血腥镇压抗日军民的消息，难道兄嫂遇到了什么险情和不测？

想到这里，冯咏莹心揪得很紧，泪水也止不住要流下来。她怕别人发现她的慌乱，便在座位上扭过身去，面向窗外。车窗外那快速掠去的景物，她无心观赏，火车车轮飞速转动、发出隆隆的声响，让她焦虑的心愈发提到了嗓子眼，一直“怦怦怦”跳个不停。

辗转到哈尔滨，按照哥哥来信告诉的地址，冯咏莹终于找到了兄嫂。

“来得正是时候。”这是冯仲云见到妹妹后的第一句话。

“我以为哥哥和嫂子遇到什么危险了，把我急坏了！”冯咏莹边

说边细细端详面容有些憔悴的哥哥，眼泪夺眶而出。嫂子薛雯为妹妹擦拭眼泪，自己的眼睛也有些湿润了。

原来，由于内部出现了叛徒，中共满洲省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担任满洲省委秘书长的冯仲云和担任满洲省委交通员的薛雯都遭到了敌人的通缉，此时正处在险境中。

冯仲云深知负责传递省委文件和情报的交通员不可或缺，非常时期，时间紧迫，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员，他觉得妹妹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适合，可以接替薛雯的工作。

对于哥哥的安排，冯咏莹二话不说，立即答应了，她表示会竭尽全力去做好。

那时的共产党员内心世界真是纯洁又简单，一心向党，从不为自己或亲人的利益作过多的考虑。冯仲云只想自己的妹妹合不合适做交通员工作，却不想妹妹一定会遇到的危险，妹妹还只是个未经世事的中学生啊！面对冯仲云的义举，现在许多党员部干部会脸红的。冯咏莹也够简单的，哥哥是她最敬重，最信任的人，哥哥可以替她作决定，让她干什么，她就答应干什么。今天的青年人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很可能会大吵大闹，骂自己的哥哥薄情寡义，把自己往“火坑”里推。面对冯氏兄妹，我们是否应该有所思索呢？

嫂子薛雯向接替她工作的小姑子冯咏莹重点介绍了交通员工作的注意事项和联络方式，殷殷叮嘱小姑子一定要注意安全。

此时形势十分严峻，为防止意外发生，短暂的相见后便要分离。

冯咏莹紧紧握住亲人的手，难舍难分，她有无数心里话要向亲人倾诉，她多么希望能和哥哥和嫂子在一起多待一些时间，多看他们几眼啊。

根据组织的安排，冯仲云将要奔赴抗日前线，薛雯则要带着儿女回到江苏老家从事革命工作。

在艰难困苦、险象环生的年代，恩爱夫妻一南一北，生死难以预料，天各一方，重逢遥遥无期。

即将走上战场的冯仲云将儿子和女儿抱在怀中，亲了又亲。此前刚传来消息，冯仲云和薛雯的老战友，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了。听到这个消息，冯仲云和薛雯很悲伤。冯仲云心

情沉痛地对妻子说：“咱们的女儿别叫囡囡了，从此后改名叫‘忆罗’吧。”“忆罗”“忆罗”，对战友的怀念都埋藏在女儿的名字中。

冯咏莹将刚见面的侄子和侄女抱过来，喃喃地念着名字：“坚仁、忆罗，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健健康康地长大啊。”她在念着孩子的名字时，明白了他们父母的心。“忆罗”的含意是怀念战友，“坚仁”的含意不就是要坚韧吗？是啊，坚韧不屈，这是革命者的操守和信念啊。

冯仲云和薛雯对不足二十岁的妹妹也充满了牵挂，夫妻俩轻轻地拍着冯咏莹的肩膀，再三叮嘱：“要挺住，学会坚强和坚韧，要注意保护自己啊。”

多少伤心事，最难是别离，一家人再次拥抱在一起，互道保重。

此一别，夫妻、兄妹竟然是整整分别了12年。

12年，历尽战火、九死一生的冯仲云成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带领抗联将士，奋勇杀敌。

12年，在战火中，薛雯带走的儿子坚仁不幸死于敌人的炮火之中，薛雯带着女儿忆罗参加了新四军，英勇抗敌。

12年，一轮明月照南北，硝烟弥漫，音信两茫茫。夫妻、兄妹之间难觅消息，生死未卜，只能是梦中相见。

冯仲云与薛雯分别后，一南一北，信息不通，生死不明，但两人始终忠贞不渝，心心相印，婚姻关系坚如磐石，被传为佳话。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抗联将领再婚者不乏其人，有人也曾给冯仲云介绍过抗联女战士，也曾有女战士追求他，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们的红色爱情故事，受到了陈云、彭真、林枫等中共东北局的领导的高度赞扬。当薛雯1946年在组织帮助下到达哈尔滨时，东北局的领导设宴招待冯仲云夫妇，并说：“女同志要好好向薛雯同志学习！”“男同志要好好向冯仲云同志学习！”

1934年4月，冯咏莹在哥哥冯仲云的介绍下，开始做满洲省委交通员，接替了嫂子薛雯的工作。

亲人含泪依依分别，哥哥和嫂子临危不惧，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冯咏莹。每每想起兄嫂，她就减少了孤独感，恍若他们就在她身边，一股力量便在她的心

中油然升起。

冯咏莹刚开始工作不久，就遇到了一件让她刻骨铭心、一生不忘的事情。一天，满洲省委决定在哈尔滨道里区俗称“偏脸子”地带的一处房屋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这里是冯咏莹和另外一位女同志的住地。

为了应付恶劣的环境，安全地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当时规定无论在何处开会，都要设置警号（即暗号），警号多用窗帘、花盆等物为标记。这次召开省委常委会，通知到会的人注意的警号是窗帘。窗帘挂上就可以进屋，没有窗帘就说明出了问题，则不能进屋。

和冯咏莹在一起的那位女同志，由于连日秘密发送传单，太忙了，一时疏忽，竟然把在这里开会的事情给忘了。她见天气挺好，就让新来的冯咏莹把窗帘摘下来洗了。冯咏莹是协助这位女同志进行工作，她不知道窗帘是要为即将在这里秘密召开的省委常委会做警号用的，她将窗帘用力地洗了一遍又一遍，洗得干干净净。

快到开会的时候，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何成湘一到门口，看到窗帘没挂，以为这里出了问题，便匆匆撤离了开会地点，并立即去阻止其他来开会的常委同志。

之后，省委迅速派人到这里悄悄地侦察情况，才知是因为那位女同志疏忽大意忘了开会的事，造成了一场虚惊。

这件事情，对冯咏莹触动很深，一个窗帘挂与没挂就可能牵动大局，在细节上不可大意，有时细节就决定成败。她也认识到，地下工作要始终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容不得半点疏忽和粗心。

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想象当年党的交通工作，会是怎样进行的。可以说，这个工作绝非是跑跑腿动动嘴，送文件传递情报而已。

1980年12月，冯咏莹亲笔撰写的《满洲省委党内交通工作情况的片段回忆》文章，是这样记述的：“我们当时做内交工作与上下级联系都是单线的，联系是都规定接头暗号、记号、特征、时间等，如果对不上联络暗号或过了时间是绝对不接头的。外出工作时，常常化装，有时扮一般的家庭妇女，有时扮阔太，有时扮学生，也有时扮成

要饭的乞丐。”

冯咏莹谈及往事，感慨地说：“在满洲省委的时候，我做交通员，记得日本人在东北占领时，那种形势险得很，敌人盘查得很紧。有时文件很重要，怎么拿呢？要想办法，有时放在化妆盒，粉盒，点心盒里头，有时放就放在耳朵眼里，字要写得很小要装得下。我现在还存着这个习惯，字写得小小的。遇到形势特别紧的时候，就要将省委指示和传达的内容完全由脑子记下来，背下来，到各区进行秘密口头传达。我现在的记忆还好，跟那时的训练也有关系，唉，不容易啊……”

当年，年轻的冯咏莹倾心倾力地做好这个特殊岗位的工作，不可否认开始时她含有一些对兄嫂感恩的因素，她要对得住哥哥和嫂子的信任。渐渐地随着思想觉悟的提高，她摆脱了个人因素，就像哥哥和嫂子那样，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在复杂多变险象环生的斗争环境里，她不断成长，工作能力和经验也由最初的青涩逐渐变得圆熟起来。

有一次，省委要送一批文件出去，因数量多，就用一只皮箱装着，并雇了一辆小轿车。

因工作需要冯咏莹已会一些常用的日语，她精心地打扮成一位摩登时尚的日本妇女，和一位穿着西服的男同志装扮成一对情侣。两人坐车驶入一个路口搜查站时，伪警察气势汹汹地吼叫着：“停车！快停车！”几个伪警察扛着枪边喊着边向停在路边的轿车走过来。

坐在车里的年轻男同志稍有些紧张，冯咏莹搭着他的肩膀，递了一个眼神暗示他不要紧张。同时，冯咏莹若无其事地用日语说起玩笑话，并轻轻地抚摸着男同志的肩膀，男同志倏忽间便镇定下来，听着冯咏莹的话，两人还嘻嘻哈哈地笑出声来。

警察“咣当”一声打开车门，看见车里是一对青年男女，说话的女子还是个日本人，表情傲慢，对他们不理不睬的。伪警察看到这个阵势，二话不说，挥手放行。于是这辆藏有非常重要文件的轿车就轻而易举地通过了敌人的搜查站。

做交通员必须沉着、镇静、临危不惧，装什么像什么，不露出半

点破绽，所做的一切都是紧紧围绕怎样顺利完成任务来进行。

正如冯咏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许多做交通员工作的同志都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只要为完成任务，什么个人得失都是不顾及的。”

地下工作，尤其是身处机关的地下工作，有许多铁的纪律，不容破坏。这是保证党的地下组织安全的重要措施。

冯咏莹在回忆文章中曾写道：“党在地下活动期间，对党员，特别是机关工作人员要求极高，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如我们当时都很年轻，爱看电影、照相，但是由于电影院密探多，照相易留把柄，因此组织上规定不准看电影，不准照相。为了保证组织和个人安全，我们都严格遵守党的规定。又如，在工作中如果和某人接上了头，只能说这一次的任务，其他都不能问也不能说……”

作为满洲省委交通员的冯咏莹，她所住的地方，常常是搬来搬去。其中南岗区光芒街 22 号（原小戎街 2 号），带有庭院的三室一厅的俄式平房，冯咏莹也在这里住过。

房间里的家具和摆设，看似普通，却都有不寻常的机关。

客厅的沙发坐上去软软的，也很舒服，可是沙发里面是掏空的，藏有各种文件。

墙上的壁炉和中东铁路沿线比比皆是的俄式平房必备的壁炉一样，是用来取暖的，不同的是这里的壁炉既可以取暖，又有特殊用途。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文件就立即投放在里面，壁炉可使厚厚的文件倏然间灰飞烟灭，外面却了无痕迹。

客厅中间摆放的是比较讲究的麻将桌，省委领导开会时以搓麻将为掩护，稍有风吹草动，领导们手中的麻将便派上用场，交谈的话语也围绕着出牌来说，麻将成了挡箭牌，领导的身份变成了大玩麻将的麻友。

一旦发生了险情，通过房子的后门可以快速撤走，客厅地板下面的地窖也可以藏身。

窗棂上的大窗帘，窗台上的花盆，都是设置的暗号。

这处俄式平房，既是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地，也曾是冯咏莹的

哥嫂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和交通员薛雯居住的家。

冯仲云和薛雯的儿子坚仁、女儿忆罗都是在这里出生的。

冯仲云公开的身份是东北商船学校著名的数学教授。他拥有这样一套三室一厅的俄式平房也并非特殊，他们夫妻在此居住，也不会引来外人的疑惑。

作为一名教授，冯仲云的薪水不算少，可他的工资多数都充当了党的活动经费。即使这样，冯仲云和薛雯还是从所剩不多的家庭生活费中挤出来一部分，每个月都及时邮寄给北京的妹妹冯咏莹作生活费。

就是在这里，冯仲云将从北京赶来的妹妹介绍给组织，接替薛雯的满洲省委交通员的工作，指引妹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就是在这里，兄妹别离，夫妻别离，孩子别离，依依难舍，天各一方，不知何时能团圆……

冯咏莹置身于此，仿佛能感到亲人的温度和味道，睹物思人，却不知亲人今在何方，生活会是怎样。

住在这里的冯咏莹，到了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外面下起了绵绵的秋雨。在沉寂黝黑的夜色中，“滴答，滴答”的声音清晰入耳，窗外不停的雨声点点滴滴，似乎也在敲打着她飘飞的思绪……

她想起了溪水潺潺的江苏老家，想起了多年未见的父母，想起了哥哥和嫂子还有他们的孩子。哥哥不仅培育她成长，还将她引上了革命之路，哥哥和嫂子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是激励她献身革命的榜样，她从他们的身上明白了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哥哥和嫂子的言行，宛如点点滴滴的雨珠滑落在她的心扉，使她的内心变得温润和振奋。

窗外，绵绵不绝的秋雨，依然在沉寂的夜里飘落着……

1934年10月的一天，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

就在这天，省委通知冯咏莹搬到道里的一处平房，和从外地新调来的一位男同志以夫妻的身份组成机关。

这个时节，天高云淡，风清气爽。这天晚间是仲秋节。冯咏莹

在房间里望着窗外，天空中已是繁星闪烁，一轮月亮从云层中露了出来，越来越圆，越来越亮。

她拉上了又大又厚的窗帘，这是她第一次在哈尔滨过仲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可是战乱的年代严峻的形势，已容不得她想太多了。

最近日伪势力异常猖狂，巡逻警察时常在夜间进行搜查，抓捕抗日志士。

为避免惹麻烦发生意外，组织上规定冯咏莹要和这位新来的同志装扮成夫妻，还要在一个床上睡。

对组织上的安排，冯咏莹向来都是没有一个说不字。

她吃了几口月饼，然后特意留了一块圆圆的月饼放在桌子上。她隐约觉得人海茫茫，在仲秋节的晚上能和这位新来的同志见面，也是一种特殊的缘分。可是，她的内心又有些局促不安，新来的男同志会是谁呢？由于当时党的地下工作有严格的规定，她只知道这是一位重要的同志，并不清楚这位同志的来历和其他事情。按照规定，组织上没有介绍交代的，她是不能多问的。

冯咏莹作为省委交通员，在传递文件的过程中，有时也要和男同志在公开场合扮成情侣或夫妻作掩护，可文件安全传递后，完成了任务，这种遮人耳目逢场作戏的事情也就即刻结束。

要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在一起，扮成夫妻，甚至要在同一床上睡，对于冯咏莹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第一次，她心里有些忐忑。

“砰砰”有人在窗户上轻轻地敲了两下，然后又在房门“咚咚”也敲了两下，声音便戛然而止。

这正是事先约好的暗号，自己的同志到了。她轻轻地开了房门，和新来的男同志互用暗语接上了头。

“你喝水吧。”冯咏莹将冒着热气的水杯放在了桌子上。

“谢谢你。今天是仲秋节啊，我给你带了两块月饼，你吃吧。”男同志边说边将包裹着的月饼递到冯咏莹的手中。

“谢谢。”冯咏莹将手中的月饼放在了桌子上，用手指了指桌子上放在盘子里的月饼说，“我还给你留了一块呢。”

“好，我们在仲秋节见面也是有缘分啊。这块月饼，我们就每

人吃一半吧。俗话说吃梨不能分开吃，这个月饼可以分，合在一起是圆的嘛。”男同志将冯咏莹留给他的那块月饼掰开，一半递给了冯咏莹，一半留给了自己。

冯咏莹咀嚼着月饼，不由望了望眼前第一次见面的男同志。高高的个子，形象英俊，显得很年轻，气质非凡，稳重中透着成熟，浓眉下的那双眼睛闪烁着真诚和智慧。她觉得组织上介绍说新调来的同志是一位很重要的同志，看外表和举止言谈的确有些与众不同。

男同志很大方地询问：“你多大了？”

冯咏莹回答：“我 20 岁。”她想问问男同志的来历和来这里后的职务，话到嘴边就收住了。她只是好奇地问了一句：“请问，你多大了？”

“噢，我 26 岁了。”男同志接着说，“咱们休息吧，明天还要工作呢。”

“怎么睡哟？”冯咏莹有些羞涩，嗫嚅地说。

“噢，我睡在外面，你在里面，有什么事，我可以保护你的。”边说着，看似很疲劳的男同志，就躺在了床外边。

295

冯咏莹只好蹑手蹑脚地坐在了床的里面。

她又下意识地往紧里面的床沿靠了靠，可已经没有再退缩的余地了。

躺在同一个床上 26 岁的男同志，离她近在咫尺。那英俊的脸庞，那阳刚挺拔的身体，甚至裸露的浑圆的臂膀，都清楚地展现在她的眼前。她也闻到了青壮男人的气息和味道，这让从来没有和陌生的男人这样近距离挨在一起的冯咏莹，浑身如窣窣的电流穿过，心跳加快，脸上也急速地泛起了红晕。

冯咏莹虽然不再是满脑子封建意识的旧女性，男女授受不亲在她那也不是不可逾越的清规戒律，她在工作中和男同志假扮情侣或夫妻作掩护，必要时，挽个手或搭个肩膀，她也会顺其自然。但是，今天的情况却让她难以平静。

20 岁的她，毕竟是青春妙龄，从生理和心理上都处于一个微妙的时期，第一次和异性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她真的感觉有些无所适从。

她在想，仲秋之夜，按民间习俗正是亲人团圆之时，她一个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孤单单的女青年，平日里都是孤灯相伴，这一夜身边竟躺了一个年轻的男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猝然间，身边的男同志翻了一个身，她的心又“扑通扑通”跳了起来。

夜已深了，房间里钟声响起，在静谧中，钟声显得很响。

男同志似乎被钟声敲醒了，他睡眼蒙眬地望着旁边缩作一团的冯咏莹，轻声说：“光顾我自己睡了，对不起。你别坐着，快躺下。咦？瞧你穿得多厚，是不是把外衣脱了吧。”

侧过身去的男同志又笑着说：“哎呀，我不会把你吃了，快关灯吧。”

于是，冯咏莹只好脱掉了厚厚的外衣，躺了下来，顺手关掉了床边的台灯。

由于厚厚的窗帘将窗户遮盖得很严实，熄灯后，房间里显得黑漆漆的。

这时，外面响起了呼呼的风声。

这一夜，冯咏莹几乎没有合眼。

几天过去了，冯咏莹内心逐渐恢复了平静。

近期形势十分危急，凶残的敌人随时会半夜进入民宅搜查。为了同志的安全，扮成夫妻睡在同一个床上，组织上这样的安排是革命工作的特殊需要啊。

渐渐地，冯咏莹接受了和男同志同睡一张床的现实，她也能按时入睡了。

这位躺在冯咏莹身边的男同志是谁呢，他的来历如何呢？

他原来就是党中央派来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

26岁的杨光华来自家乡湖北，年轻有为，历经革命风雨的考验。

1926年，18岁的热血青年杨光华在家乡洪湖组织了制伞工会，出任纠察队长。1927年，19岁的杨光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河阳秋收起义，历任沔阳县委书记，湘鄂西临时省委书记，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sup>⑥1</sup>

他曾和贺龙长期在一起浴血奋战，成为革命战友。贺龙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帅。

冯咏莹望着悠悠流淌的湖水，回忆她和杨光华相识、相恋、结婚的情景，不胜感慨，她说：“当时组织上就决定让我和他配假夫妻，住一个房间，而且要在一个床上睡。我忘不了第一次见面，是过仲秋节呵，我那时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有很多的顾虑。可是过些日子，我发现杨光华同志很规矩，很好。在这个过程中就了解他熟悉他，渐渐地我们彼此有了感情，都很相爱。经组织同意，我们就结成了夫妻。”

一位是满洲省委交通员，一位是满洲省委书记，由假夫妻成了真夫妻，堪称红色传奇。

冯咏莹在她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和杨光华同志是1934年12月份住机关时结婚的，当时即使是我们这样亲近的关系，按照党的地下工作的要求，也不允许互相过问对方的职务和来往信件。我当时只知道杨光华是满洲省委负责同志之一，并不知道他担任什么职务（以后才知道他是满洲省委书记），甚至连他的籍贯都不清楚。”

读了这段亲历者回忆的这段文字，让我们禁不住怦然心动，感触颇多。

1934年10月，受党中央委派，杨光华从上海来到哈尔滨后，重建了遭到敌人破坏的满洲省委，由赵毅敏担任组织部长，谭国甫担任宣传部长，张林担任团省委书记，省委委员有杨靖宇、魏拯民等人，秘书处有雾仙和冯咏莹。

杨光华在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期间，卓有成效地落实党中央“一二六”指示，以抗日救国为旗帜，不分贫富，不分职位高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发动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商人包括宗教界人士投身抗日。在满洲省委的引领下，抗日烽火燃遍东北大地。

为了提高各地干部的领导水平，增强各地党组织的战斗力，同时提高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游击队的军事素养和战斗力，杨光华先后分别举办政治和军事短期培训班，由省委宣传部长谭国甫具体负责，杨光华还亲自担当了授课任务。

多才多艺的杨光华还以杜嘉的代名，创作了振奋人心朗朗上口的《抗日先锋歌》和激励民众奋起抗争的《满洲地狱歌曲》。

杨光华在《抗日先锋歌》中写道：“赴国难，共伸义愤，破日寇血染战袍，百战铁将军。勇杀敌，齐奋进，朔风难冷救国心，抗日先锋威风凛凛……”

驰骋丛山密林的抗日将士们山谷作枕，大地为床，吃树皮，食草叶，喝雪水，这铿锵有力的《抗日先锋歌》，似战鼓，如号角，为他们击鼓助威，激励他们奋勇杀敌争做抗日先锋。

抗日硝烟早已散尽，歌声仍然萦绕在抗联老英雄的心中。

2013年5月，在哈尔滨东北抗联老战士，黑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敏的家中，90岁的李敏回忆往事如数家珍，她说：“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创作的《抗日先锋歌》，我们抗联战士都会唱。那时候条件太艰苦了，所以我特别喜欢那句歌词，‘朔风难冷救国心，抗日先锋威风凛凛’。这句歌词太好了，很豪迈，很激励人呢！”

闻名遐迩的东北抗日英雄赵尚志，就曾在逆境中得到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的鼎力支持。

当年，由于珠河县委部分领导“左”倾思想严重，和赵尚志产生矛盾，开除了赵尚志的党籍。杨光华闻讯后，委派省委组织部长赵毅敏深入到珠河县委和赵尚志领导的抗日部队走访调查。在听取赵毅敏汇报后，杨光华亲自批示恢复赵尚志的党籍，鼓舞了抗联部队的士气和斗志。

在生活中，由假夫妻变成真夫妻的杨光华和冯咏莹，性格相投，志同道合。他们都是为了党的事业，远离亲人从南方来到哈尔滨。他们既是革命的战友又是生活中的伴侣，从未谈过恋爱的他们，非常珍惜这份特殊的缘分和情感，彼此关心，深深相爱着。有一次，冯咏莹半夜发烧，身体非常虚弱，作为地下工作者，他们需要尽可能隐蔽自己的身份，尽量不在医院等公开的社会场合留下记录，所以冯咏莹坚持不去医院。在家中，杨光华细心地为冯咏莹用毛巾一遍一遍热敷，冯咏莹高烧不退，他又将生姜切成丝煮成姜汤，冯咏莹恶心呕吐难以下咽，他就用小勺一口又一口地喂到嘴里。在他精心的照料下，冯咏

莹终于退烧了。

1935年5月，正是满城丁香花姹紫嫣红竞相盛开的时节，冯咏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怀孕了。

作为省委书记的杨光华，重任在肩，工作非常繁忙，常常要忙到很晚才回家。当27岁的他知道自己要当爸爸了，内心充满了幸福和快乐。作为丈夫和准父亲，他也和常人一样对不久就将分娩的妻子格外呵护。

有时，挺着大肚子的冯咏莹说：“这孩子用脚踢我呢。”

杨光华好奇地俯下身贴着妻子的肚皮说：“让我听听，哎呀，小家伙在动，有造反的精神大闹天宫呢，还挺有劲。”

冯咏莹半开玩笑地说：“这是革命者的后代，遗传了抗争精神啊。”

杨光华开心地笑起来：“革命自有后来人啊。”

就在孩子即将出生，冯咏莹急需杨光华照顾的时候，杨光华接到通知要他赴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对于组织上的安排，杨光华是没有二话的，可是杨光华又多么希望能够陪伴照顾冯咏莹和即将出生的孩子，他真想看到母子平安，亲亲孩子可爱的小脸蛋再走啊。可是党性和责任感使然，他又不得不尽快上路。

临走前，杨光华对妻子殷殷叮嘱，依依惜别。

他安慰妻子说：“你要保重，要照顾好自己和我们的孩子。”

妻子也劝慰自己的丈夫：“你一切放心，工作要紧啊。”

他握住妻子的手说：“我很快就回来了。我们俩是中秋节见面的，这是天作之合，我们很快就会团圆的。”

妻子紧紧握住丈夫的手说：“我们一起吃的月饼，很难忘。中秋节，但愿人长久——”

杨光华将妻子揽在怀里，抚摸着妻子的双肩，深情地说：“千里共婵娟。”

杨光华再次俯下身来贴着妻子隆起的肚子，贴了好一会儿，喃喃地说：“爸爸听到了你的声音，叫爸爸啊，要听妈妈的话，等着爸爸……”

冯咏莹艰难地挺着肚子倚靠在门口，向走出家门的丈夫招手致意，杨光华停住脚步回望着妻子，并又挥了挥手。在夫妻彼此关切的视线中，杨光华远去了。

冯咏莹已经看不见杨光华的身影了，依然倚靠在门口向杨光华消失的方向远望着……

21岁的冯咏莹想不到此一别，竟是茫茫无期难重聚。

杨光华在交通员的护送下，从哈尔滨坐上中东铁路的火车从绥芬河出境赴苏俄。

在杨光华出国后不久，冯咏莹在同志们热心的照顾下，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孩子白白胖胖很招人喜欢，逗一逗就会露出笑容，还会“咯咯”地笑个不停，形象也很英俊，挺像父亲杨光华的。

冯咏莹拒绝了组织上安排她休假的照顾，顾不上产后调养和休息，一心扑在了工作上。

日伪当局为加强控制，在哈尔滨设置的搜查站不断增加。为了应付敌人的盘查，有时为了保证省委文件的安全传递，冯咏莹就将文件秘密地塞在孩子的尿布里，用孩子作掩护。

1936年4月，组织上安排在交通员岗位上已经工作了两年，没出任何纰漏的冯咏莹赴莫斯科去学习深造。

能够有机会到十月革命的故乡，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去学习，这是年轻的冯咏莹向往已久的夙愿，她感到欣慰和振奋。

此时有的同志担心冯咏莹带着6个多月的孩子，万里迢迢远赴莫斯科，一路上会很辛苦，尤其是在跨越国境时会增加负担和风险，便提出可以帮助冯咏莹来照顾孩子。

冯咏莹婉拒了同志代她照顾孩子的好意。

她想，再苦再难冒着风险也要带上孩子，这孩子是杨光华最牵挂和惦念的。能把孩子带到莫斯科，让丈夫看到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儿子起个名字，一家人得以团聚，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临走前，冯咏莹连夜为孩子做起了衣服。平时一心忙于工作的她，觉得自己对孩子的关爱和呵护实在是太少了，她望着窗外飘洒着的雪花，生怕孩子经不住风寒。她将拳拳的母爱都编织在为儿子赶制

的棉服中，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针针线线总关情啊。

冯咏莹抱着6个多月的孩子，在风雪中坐上了中东铁路的火车。到了绥芬河，却遇上了麻烦。

冯咏莹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心情很沉重，她说：“到了绥芬河下火车，因为日本人看得很严，交通员带着我们白天在村子里转，晚上过境。本来交通员是熟悉秘密过境路线的，可是我怀里的孩子哇哇大哭，越哭声越大，就只好又返回到村子里。交通员劝我把孩子留下来，因为孩子的哭声一旦被敌人听到就会出危险了。我真心要把孩子带到苏联去见他父亲，就坚决不肯把孩子留下，我最终说服了交通员。第二天都半夜了，我用棉被捂住孩子的嘴，防止他出声跟着交通员向国境线跑去。我心揪得难受，也要上不来气了。咳，真难受啊……总算硬撑着闯过去了……”

“我抱着孩子过境后，做火车到了海参崴，苏方发给我服装，又坐上火车走了12天，到了莫斯科。”

听着冯咏莹缓慢低沉的讲述，眼前幻化出一幅画面：年轻的妈妈怀抱着6个多月的孩子，在漆黑沉寂的半夜里，颤抖着手用棉被捂住孩子的嘴，被捂的孩子的呼吸细若游丝，已无力啼哭，命悬一线，心如刀绞的妈妈抱着已发不出来声的孩子深一脚浅一脚踉踉跄跄前行。这是怎样一幅让人酸楚，令人震撼的画面啊。

如此折腾，孩子活了下来，让人觉得庆幸，也不禁感叹，才6个多月的孩子，生命力何等顽强，真是命大啊。

长长的中东铁路，通往世人向往的红色苏联。在众多革命者留下往返身影和足迹的红色之路上，这个小生命，在红色之路的史册上续写了新的一页，可谓创造了奇迹。

杨光华临别时曾说过：“我很快就回来了，我们很快就会团圆的。”言犹在耳，出国已近一年却没有信息。冯咏莹猜想，或许因工作需要，丈夫暂时留在苏联了，但即便如此也该来信告知啊。

冯咏莹作为一名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非常自律，她不会主动去询问组织上没有向她说明的事情，但她内心却很困惑。

尽管紧张的交通员工作，让她会暂时忘掉牵挂和忧虑，可是每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望着身边一天天长大的孩子，对丈夫的想念和惦记，如春天的青草割了一茬又长一茬，魂牵梦绕，挥之不去。

她抱着孩子坐在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听着火车快速行驶时车轮发出“隆隆”的响声，心情好多了。即将见到丈夫，孩子也第一次见到亲生的父亲，一家人能够得以团圆，这是 22 岁的冯咏莹历尽了艰险磨难后，心里最高兴的事。

然而，让冯咏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到了莫斯科，迎接她的将是一场噩梦。

此时，冯咏莹迫切想见面的丈夫杨光华，却正在遭王明、康生的政治排挤打压，处在被审查的逆境中。

原来，杨光华在上海中央局工作期间，曾经抵制过王明、康生的错误路线，王明和康生便怀恨在心。

此时的王明和康生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趁杨光华来莫斯科汇报工作之机，对杨光华鸡蛋里挑骨头肆意诬陷和迫害。

杨光华来到莫斯科后，冷板凳坐了一个月。一个月后才通知他在共产国际招待所二楼一间会议室召开满洲省委工作汇报会议。

杨光华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本子上也认真地撰写了汇报提纲。在会上，杨光华很全面地作了满洲省委的工作汇报。汇报完毕，王明建议先休息一会儿，于是大家都走出会议室，这时王明一反常态走到杨光华身边，亲切地问杨光华的身体如何，并建议他到南俄罗斯去调养些日子。一个俄国人走到王明面前，用俄文同王明交谈几句，然后锁上会议室的门走了。杨光华急忙和王明说他的本子还在会议室里，王明看了看表说该午休了，下午接着开会，再拿本子也不迟。

下午再开会却换成三楼的会议室。杨光华对王明说，他的笔记本还在上午开会的那间会议室里。王明反问：“你汇报还用笔记本吗？”

杨光华说：“可以不用，但本子必须拿出来。”王明敷衍说：“回头我让他们拿出来便是了。”杨光华汇报完毕，王明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总结，会议就算结束了。杨光华又提出要取回笔记本，王明却不耐

烦地说：“在共产国际的机关里，你还不放心吗？”

然而，就在会议的第二天，该招待所职工支部就传出一条重要消息，说杨光华故意丢失一个秘密的本子，已被招待所清扫工拾到送交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了。接着，杨光华便被监查委员会拘留审查，杨光华试图解释，却受到不许诬蔑王明同志的严重警告。

1935年7月29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早在湘鄂西根据地时，杨光华就被选定为出席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三人团团长。现在杨光华就在莫斯科，却没有让他参加会议。<sup>⑫</sup>

杨光华只能无奈地接受没有期限的审查，审查期间是不允许写信的，也得不到外面的信息。

这时的杨光华对妻子和孩子的思念十分强烈，他常常在想：他们母子平安吗？孩子长得什么样？省心吗？他曾贴着妻子的肚皮听孩子的胎音，依稀听到孩子连踢带打的声音，太好玩太可爱了。他猜想，小生命这样好动有劲头，十有八九应该是个儿子。

在妻子最需要丈夫关爱，在儿子最需要父亲呵护的时候，他却不在妻儿的身边，他恨不能立刻飞到妻子和儿子的身旁，可惜自己的翅膀被折断了，想飞也飞不动了。他与外界隔绝，感到很压抑，有种窒息的感觉。

1936年5月，恰巧在杨光华离开家门一整年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儿子万里迢迢到了莫斯科，望穿秋水般地要见他，要和他团圆。那六个月大活泼可爱的儿子也等待着父亲的拥抱和热吻，等着父亲给起名字，但这一切，杨光华却全然不知……

冯咏莹回忆到这里，沉默了好一会儿。她用手捋了一下银白色的头发，脸上现出了无奈和无助的表情，她想接着往下说，声音却有些哽咽了。

女儿杨剑如握住母亲的手，稍停片刻，激动地说：“妈妈到了莫斯科，康生不让妈妈去见爸爸，妈妈第一次向组织反问为什么？康生严厉地说，杨光华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正在审查，不许见。康生说：‘孩子交到幼儿园，以后你要安心学习，不许见孩子，影响学习不’

行。’那时孩子还不会叫妈妈，六个月的孩子哪有会叫妈妈的。很快就有人把孩子抱走了，妈妈心里非常痛苦，经常夜里想孩子，哭泣不止，又没法见到。

“妈妈翻来覆去地想，不相信爸爸会有问题，她实在难以接受，终于鼓足勇气，去找了王明，她用共产党员的人格向组织保证，杨光华在满洲省委工作很能干，很有成就，大家也都拥护他。王明却说：

‘他在满洲省委之前的工作你了解吗？他早就犯过错误了，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算长，要划清界限。’妈妈提出要见见孩子，王明回答：‘不要见，学习要紧还是孩子要紧？你还年轻，学习很重要嘛。’”

当年，冯咏莹见不着孩子心如刀绞，尤其到了晚间，她习惯性地伸手去轻轻地搂孩子，却搂不着，空空的。白白胖胖活泼可爱的儿子不在身边，她的心像掏空了一样，眼泪窣窣落下来。这孩子在跨越国境线时被棉被把小嘴捂得透不过气来，是死里逃生。千行万里，历尽磨难来到了莫斯科，却被一张无形的铁网死死地罩住，难以逃脱。自己和丈夫同在莫斯科，近在咫尺却仿如人间天上难相见。让儿子见到自己的父亲，让父亲看到自己亲生的儿子，给他起个名字，一家人骨肉团圆，怎么就像水中月镜中花可望不可即，成为了奢望呢？孩子才仅仅六个多月，还不会叫妈妈和爸爸，连个名字都没有取呀！想到这里，冯咏莹就觉得心里像灌满了铅块，堵得实在透不过气来。

莫斯科的幼儿园星罗棋布，太多了，儿子究竟被送到了哪一家幼儿园，冯咏莹人生地不熟，无从查寻。她在共产国际内部问了几个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都是不了解或不知道。

就这样，杨光华和冯咏莹唯一的孩子，从此杳无音信，下落不明。

冯咏莹被安排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那个年代的革命者组织观念特别强，尤其是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冯咏莹更是明白其中的道理，她马上去参加野营训练，然后全身心地投入联共党史、世界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军事学、外语等学科的学习中。她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思想、新知识，同时她也希望借紧张繁忙的学习忘掉烦恼和忧伤。

稍有空闲，她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拿出儿子的照片仔细地看，看完后小心翼翼地藏在身上，过了会儿，再又将照片拿出来看。

放下又拾起的是儿子的照片，拾起放不下的却是对儿子无尽的思念。

又到了中国传统的节日中秋节，冯咏莹幸运地分到了一块中国月饼。她默默地将月饼掰成两半，耳边响起了杨光华的声音：“这月饼，我们就每人吃一半吧，吃梨不可以分，这月饼可以分，合在一起就是圆的呀！”杨光华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夫妻近在咫尺，却被无形的铁网隔在了两个世界，变得遥不可及。月亮都圆了，什么时候人才能团圆呢？

冯咏莹伤感的泪水，悄然地滴落在被掰开的两半月饼上。

她原想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别的什么也不再去想，可是她真的做不到。对孩子和丈夫的思念，是她心中抹不去的印痕，注定挥之不去。

正在莫斯科被迫接受隔离审查的杨光华，与世隔绝，妻子和孩子的信息他一无所知，全都蒙在鼓里。他牵挂着走后满洲省委的工作，焦虑地惦念着一年多音信皆无的妻子和孩子。他想写信，却不被允许，他心急如焚，焦急等待，等来的却是无休止的厄运。

由于杨光华在上海中央局担任组织部长期间，对康生和王明表示过不满，康生和王明对此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康生和王明故意将杨光华隔离审查拖延了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其间，杨光华反复申诉，据理抗争，不承认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罪名。尽管如此，康生和王明还是以“笔记本泄密”事件为借口，将杨光华下放到斯莫林斯克省一个偏远小镇的纺织厂做纺织工，监督劳动。

1937年，杨光华被押解回到了莫斯科，康生和王明对杨光华的政治迫害变本加厉，加之苏联肃反扩大化，杨光华被苏联内务部以奸细、间谍的罪名判处5年徒刑。惨遭5年牢狱之灾后，受尽精神和肉体摧残的杨光华，又被流放到极度寒冷和荒凉不堪的北冰洋区域服苦役。

杨光华先被发配到乌黑达列沃尔古达的铁路建筑工地干重体力

活，每天挖路基、扛枕木、抬石头，吃的是最低标准的黑面包，吃不饱没有力气干活，给的黑面包就更少。这样恶性循环，致使杨光华几次晕倒。

后来，杨光华又被送到森林伐木场，浩瀚的原始大森林，居民寥寥，人烟稀少，甚至没有地名，统称伐木场。这里伐木主要靠斧头和钢锯，杨光华和一个老犯人锯一棵五六个人合抱的大树，锯完了树，他已站不起来了。下工时，两膀像脱臼似的迈不动步子，躺在工棚潮湿的木板床上，全身的肌肉如刀割针刺般疼痛。

杨光华不断地鼓励自己，要顽强地活下去，不要倒下，不要生病，只要活着就有回到祖国的希望，就能洗清这不白之冤。

光阴荏苒，年复一年。

在苦难中煎熬的杨光华，也时常会思念妻子和从未见过面的孩子，可他觉得他和妻子、孩子分隔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第八分校学习二年后，1938年6月，冯咏莹回到了国内，辗转来到了延安。

长时间得不到杨光华的音信，杨光华生死不明，让冯咏莹感到很茫然。她听到有人说，杨光华失踪了，后来又听说杨光华已经死了，这让冯咏莹由失望变成了绝望。

冯咏莹只能开始新的生活，她在延安与汪小川结婚了，可是仅仅几年，汪小川有了新的爱人。1944年，冯咏莹与汪小川离婚。个人生活屡遭不幸、命运多舛的冯咏莹有些心灰意冷，她决定一生单身了。

1946年，冯咏莹从延安来到了哈尔滨，担任了东北烈士子弟学校校长。她把发自内心的母爱都献给了烈士遗孤，这些烈士子弟学生都亲切地称冯咏莹为冯妈妈。

1946年5月中旬，满城的丁香花如火如荼地绽放了，花红似锦，清香四溢。这时已在新四军的薛雯和同样是新四军战士的冯忆罗，从南方来到了哈尔滨，母女俩见到了已担任松江省政府主席的冯仲云。冯仲云派人找到了妹妹冯咏莹。分别了整整12年，历经战火硝烟的生死考验和天各一方的苦苦守望殷殷期盼后，一家人终于在哈尔滨团圆了。

12 年前，哈尔滨乌云翻滚，暗流涌动。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和交通员薛雯夫妻双双遭到敌人通缉，急需转移。冯咏莹在哥哥的召唤下来到哈尔滨，接替了嫂子薛雯的工作。当时因情况紧急，见面匆匆，分别的话都没时间多说。一家人分成三地，天各一方，音信两茫茫。12 年后，重相聚，哈尔滨已经解放，天是明朗的天，满城的丁香绚丽灿烂。冯咏莹望着 12 年来第一次见面的哥哥和嫂子及侄女，非常开心。她看到兄嫂已从青年变成中年，岁月改变了他们的容颜，禁不住感叹人生能有几个 12 年啊。兄嫂和孩子历经战火纷飞的生死劫难，又幸运地走在一起，团圆了。可是回望自己这 12 年，个人的情感生活，几乎是不堪回首。她的青春花蕊刚刚绽放，便遭遇了挡不住的严寒风霜的侵袭和摧残。在漫漫岁月中，她读懂了人生的无奈，也读懂了命运的多舛……

冯咏莹不愿也不敢再想下去了……

历来对妹妹分外关心的冯仲云亲切地说：“听说了你的情况，你很不容易，可是你都 32 岁了，总不能一直单身一个人啊！”

薛雯握住冯咏莹的手，笑着说：“妹妹，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人生路还长着呢，咱们要往前看，我来帮助你找一位合适的对象。”

经历了第二次不幸婚姻的冯咏莹已然打算独身一生了，她深知最体贴她的哥哥和嫂子真心牵挂她的个人问题，她只能淡然地说：“随缘吧。”

热心的嫂子薛雯连续几次为妹妹牵线搭桥选择对象，冯咏莹却都没有动心，婉言推辞了。

1952 年 7 月，担任松江省政府主席的冯仲云奉调进京，薛雯和孩子也随同移居北京。

依然单身一人的冯咏莹，满腔热忱、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

1954 年，冯咏莹出任了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

当时东北烈士纪念馆文物、展品及烈士事迹都比较匮乏，冯咏莹组织了一个专门的挖掘小组，深入到东北抗联老根据地，整理和挖掘了一大批革命文物。同时，她又派出许多同志实地采访，把英雄的感

人事迹公之于众。

当年曾在冯咏莹馆长手下工作后来任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的王卫东深有感慨地说：“当年冯馆长派出了研究部研究员到辽宁、吉林征集资料、采访老同志，搞了一大批资料。比如说魏拯民、杨靖宇、李兆麟、赵尚志、赵一曼、陈翰章等著名烈士的事迹，都是在这个时候撰写完的。老同志的回忆录，搞了十多本子，300万字，两台打字机，从1957年开始打字，天天打，打了半年。这些烈士的事迹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出版，填补了空白，我认为这是东北烈士纪念馆工作的第一个里程碑。”

现任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刘加量，还曾专程去武汉看望过老馆长冯咏莹。刘加量说：“冯咏莹1954年到1961年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当馆长，6年多的时间，开创性地进行工作。1934年时，她曾经是满洲省委交通员，所以她把这视为第二故乡，她是带着深厚的感情忘我地工作的。这6年多的建树，为东北烈士纪念馆后来成为全国示范性展馆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作为老党员老革命的冯咏莹对工作呕心沥血，对同志充满亲情，她带着抗联老战士看病，为抗联老战士热心做红娘，帮助他们建立幸福的家庭。

当冯咏莹看到别人婚姻美满的时候，在欣慰之余，也会回忆自己的情感历程，初恋初婚的感觉，她是难以忘怀的。

思念犹如一根长长的丝线，扯不断，理不乱，却常常萦绕在她的心头。

尽管岁月漫漫，她的内心不再是那样的冲动和沉重，可是每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还是会将珍藏在身边几十年的儿子的照片左看右看。下落不明的孩子如今怎么样？是生是死？她不敢再想。

每每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的夜晚，她也会情不自禁地将一块月饼掰成两半放在桌子上的盘子里，木然地凝望窗外天空中升起的圆圆的月亮，耳边仿佛响起了当年和杨光华分别时彼此的对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许多年前，她就听说杨光华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关于月饼的故事，她是刻骨铭心的，她忘也忘不掉。

冯咏莹做梦也想不到，这两个半块月饼，分久必合了。

遭受康生、王明政治迫害，在苏联落难 21 年的杨光华终于盼到了云开雾散的时候，他终于挣脱了那张无形铁网的笼罩和羁绊。

1956 年初夏，杨光华历经 21 年的冤案得到平反，中共中央组织部为杨光华恢复了党籍和名誉，他从苏联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

20 年前，1936 年，冯咏莹抱着她和杨光华唯一的孩子，走的是中东铁路，从绥芬河出境赴苏联。20 年后，杨光华回国也是走这条铁路也带了一个孩子，这是他和一名苏联女工结婚所生的已经 7 岁的斯瓦拉。这两个孩子在同一条铁路走过，而且都是男孩。

杨光华在苏联流放的后期，九死一生身患重病，在绝境中他得到了苏联当地一位女工的关心和照顾，这位好心的俄罗斯女工将奄奄一息的杨光华送到医院救治。后来，杨光华与这位俄罗斯女工结婚，生下了儿子斯瓦拉。当杨光华盼到了回国的喜讯，这位俄罗斯女工考虑不能习惯中国的生活，便与杨光华离了婚。她担心体弱的杨光华无人陪伴，便将他们的儿子斯瓦拉交给了杨光华，让斯瓦拉陪伴父亲。

1956 年 5 月 4 日，杨光华带着 7 岁的斯瓦拉坐火车来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

杨光华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中央组织部一位副部长代表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接待了杨光华。<sup>③</sup>这位在苏联北冰洋流放都没有落过泪的硬汉子，像孩子回到母亲怀抱一样痛哭起来。

在杨光华的内心深处，久久不能忘怀、始终牵挂的是前妻冯咏莹和他们的孩子。有一次，黑龙江省的领导来看望他这位当年的满洲省委书记，他就问他们是否知道冯咏莹的消息。当他得知冯咏莹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担任馆长，并且已经离异多年仍然独身时，便连夜在北京写信，询问冯咏莹的生活，询问他们的孩子今在何方。杨光华在信中表示：“爱情不附加任何条件，我依然爱你。希望尽快复婚。”

冯咏莹没有想到，杨光华居然还活着，这 21 年后才有的音信，让冯咏莹百感交集，激动不已，禁不住潸然泪下。真是人未见面，泪满面，捧信手抖，心颤抖。

回忆往事，让人心潮起伏，难以平静。冯咏莹的女儿杨剑如不由地叹了一口气，感慨地说：“爸爸给妈妈的第一封信问到孩子的去向，妈妈回信很痛苦地说，我和孩子到了莫斯科后，康生派人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他们不允许我去看孩子，我再也没能够见到孩子，也找不到孩子的下落，我只能给你一张孩子的照片。想想，作为母亲历尽艰辛把孩子带到莫斯科，却没把孩子带回来，这是怎样揪心的痛苦啊……”

孩子成为了当年康生和王明对杨光华进行政治迫害的牺牲品，可是作为母亲的她，觉得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她一生都在心痛和内疚。

在北京的杨光华，向中央组织部提出了想要到黑龙江省工作的申请，不久便得到了组织的批准。

1957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当年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和满洲省委交通员，历经了22年的生死别离、雨雪风霜，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一天复婚，这一天对他们来说有太多的内涵和意义。

23年前的这一天，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二人要假扮成夫妻，于是有了第一次见面，那就是在中秋节的夜晚。当时的冯咏莹20岁，杨光华也仅有26岁。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已经分别了22年。再相聚，依然将一块月饼习惯性地掰成两半，彼此将那半块月饼递给对方，细细品尝人生百味，百味人生。二人禁不住百感交集，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当晚，风清气爽，满天繁星，中秋节的月亮悬在空中，还是那样圆。

历经了22年的风雨人生，离别之苦，从旧走到新，从昨走到今，从梦走到真，恍若隔世的两个人重新走到一起，如同枯木逢春。尽管容颜已改，风华不再，可是42岁的冯咏莹和48岁的杨光华却更加懂得如何珍惜这失而复得的婚姻。

这一天，因公出差，公事缠身的冯仲云和薛雯，特意从外地给妹妹和妹夫打来电话，表示由衷地祝福。

已经83岁的王卫东谈起半个多世纪前参加杨光华和冯咏莹的婚

礼，依然记忆犹新：“那是 1957 年中秋节晚上，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会客厅办的婚礼。参加人员就是馆里的职工，有 40 多名吧，没有邀请外单位的人员，很简朴，就是吃点糖果，抽点烟，喝点茶水。大家知道杨光华是个才子，就请他表演节目，杨光华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诗歌，还表演了口技。他的口技不比专业的差，学鸟叫像鸟叫，学青蛙叫像青蛙叫，模仿什么声音都跟真的一样。那天晚上，大家很热闹，同志们都为冯咏莹馆长重新获得幸福而感到格外高兴呀。”

杨光华是 1927 年入党的老党员、老领导，来到黑龙江享受省级待遇，组织上对他很关心，几次提出要给他解决住房问题，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保持革命传统的杨光华，总希望和群众打成一片，他坚守平平淡才是真的理念，在日常生活中低调俭朴。

杨光华和冯咏莹复婚后，将杨光华年迈的母亲接到哈尔滨，加上他们各自的孩子，三代人就住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院内小平房里。院内的一排小平房是职工的临时宿舍，条件很简陋，可是冯咏莹和杨光华夫妇却毫无怨言。一年又一年，他们住在这里，以苦为乐，乐此不疲。

王卫东谈到当年杨光华和冯咏莹两位老革命身居高位，在生活中却处处低标准时，不由地竖起大姆指，赞不绝口：“我那时单身，也住在馆里的宿舍，跟他们有些接触。他们夫妇带着孩子，还有老妈，五六口人住那二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平房宿舍，也没有卫生间，厨房是集体厨房。有一次，我早晨起来看见杨光华背着老妈上医院，那时杨光华都 50 多岁了，一步一步走的。50 多岁的人了，杨光华身体也挺瘦弱，背着老妈气喘吁吁。唉，他有专车，上班的时候有轿车来接他，他满可以用车，挂个电话就行了。我说的这事情，不是亲眼所见，别人都不会相信。杨光华是党的高级干部，那干部真是高尚的人格啊！”

听着王卫东老人口中发出的由衷赞叹，想象着当年杨光华背着老妈步履蹒跚上医院的情景，不由感叹，他背起的是一位老党员的一身浩然正气，他心甘情愿地居住在陋室，坚守的是一位老革命的气节和操守。

带老妈去医院看病，他满可以用车代步，居住条件轻而易举就

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善，他却宁可自己受些苦，也不给党和人民添一点麻烦。

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历尽劫难和生死考验，杨光华和冯咏莹的气节、操守始终不变，他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一直视党和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无论岁月怎样变迁，他们从来没有更改自己坚守如一的信仰，那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为了照顾杨光华，使他的身体能够得到恢复，组织上安排他在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的党史研究所任顾问。杨光华总想多做一些工作，来弥补他在苏联落难时所失去的时间，他常常是起早贪晚地工作。

谈起父亲杨光华，斯瓦拉颇有感触地对笔者说：“我父亲主要忙于历史和党史的研究工作，为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尽自己的力量，他写了许多回忆录。他和我见面时间不是很多，我始终认为，无论历史多复杂，他对党的忠诚、坚定的信念从未动摇，这在我心中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历经了悲欢离合的这个特殊的家庭，溢满了温暖、温馨，浓浓的亲情滋润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田。

杨光华对冯咏莹的女儿杨剑如视为掌上明珠，疼爱有加，让这个女儿自己提出了随父姓，改姓杨。冯咏莹对有着一半俄罗斯血统的杨光华的儿子斯瓦拉如同亲生，给予了细心周到的关爱。工作繁忙的冯咏莹经常挤出时间到俄国人开的秋林公司，去买一些俄罗斯风味的小点心和面包，带给斯瓦拉。在斯瓦拉的学习上，冯咏莹检查作业，向来都是一丝不苟。她以母亲的深情厚爱，殷殷关注着子女们成长进步的点点滴滴。至于对年迈的婆婆，冯咏莹更是加以悉心照料。

1961年，由于工作调动，杨光华和冯咏莹一家离开哈尔滨，去了湖北武汉。

1957年复婚后，这对有着传奇色彩的夫妻，相濡以沫，心心相印，形影相随，携手度过了甘苦与共的人生岁月。

1991年，湖北省原政协副主席、83岁的杨光华在武汉因病逝世。

岁月悠悠，母子情深。经历过失子之痛的冯咏莹将所有的母爱都给予了斯瓦拉，不论风雨坎坷，不离不弃。

身材魁梧高大、一头黄色卷发、眼睛呈灰色、高鼻梁，有着中俄两国血统的斯瓦拉，亲切地依偎在冯咏莹的身边，凝望着款款流淌的湖水，动情地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从生活到学习，包括衣食住行，冯妈妈都非常关心我。当年上山下乡，冯妈妈还到我下乡的农场去看我，可以说对我的体贴无微不至。冯咏莹妈妈比我生母还要亲，因为我生母在我7岁时就和我分手了，我跟冯妈妈在一起已经有50年了……”

已是黄昏时分，绚丽缤纷的晚霞映照在清澈如镜的东湖水面上，在苍茫的群山环抱中，悠悠流淌的东湖水斑驳陆离，溢彩流金，分外迷人……

冯咏莹深情地说：“东湖挺美，松花江也很美呀。我还想回去看一看哈尔滨，那是我的第二故乡，很难忘啊！可年纪太大了，行动不方便。不过，有时候我梦见了哈尔滨，也梦见过那条铁路啊……”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

### 第十三章 红色基因代代传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许多革命者为民族解放奋不顾身，无力照顾自己的儿女，还有许多革命先驱抛头颅洒热血牺牲在革命征途上，他们的儿女就成为了孤儿。

为了给世界上的革命者解除后顾之忧，1933年苏联政府在莫斯科以东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小城建立了一所特殊学校，就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这座三层高的红色砖房曾收留过85个国家2000多名儿童。有117名来自中国的红色后代在这里度过了他们不平凡的童年。

这些来自中国的红色后代大多数或跟随父母，或由组织派人护送，秘密走中东铁路出境，来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2008年9月，已是83岁的蔡妮坐在藤椅上回忆着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生活。

蔡妮的家庭可谓非同寻常，堪称红色家族。她的奶奶葛健豪开一代先风，1919年底59岁的她携儿子蔡和森和女儿蔡畅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蔡妮的母亲向警予也随行其中。1920年，蔡和森与美貌的向警予在法国留学时结婚。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对同在法国留学的李富春印象很好，认为李富春很有出息，她便支持女儿蔡畅与李富春处朋友。后来，蔡畅与李富春也在法国留学时结婚了。在葛健豪这位女中豪杰的引领和鼓励下，她的儿子蔡和森、儿媳向警予，还有女儿蔡畅、女婿李富春都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解放后，蔡畅成为新中国首任妇联主席，李富春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蔡妮的父母都是中共党史上彪炳史册的翘楚人物。她的母亲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及早期领导人之一，女权主义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第一位女中央委员，是

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毛泽东曾称“她是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她的父亲蔡和森是毛泽东的同学和挚友，在党的三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在党的五大上蔡和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又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六大上，蔡和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谈及母亲，蔡妮说：“我小时候的印象，母亲长得非常漂亮，她工作太忙了，很少能见到她，我幼年时生活在奶奶的身边。记得有一次，妈妈赶到长沙奶奶家，对奶奶说，让我带女儿睡一宿吧。妈妈搂着我，用手轻轻地拍着我，在妈妈好听的儿歌中，我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听到了妈妈的呼吸，妈妈醒来后又将我抱在她的怀里亲吻了我的脸颊，然后又为我唱了两首悦耳动听的法国歌曲。我当时竟然有些羞涩，因为和妈妈在一起的机会太少了，对妈妈有些陌生。这次和妈妈在一起是我最难忘的甜蜜的记忆。”

“我妈妈在我 3 岁时，1925 年去了苏联，是从上海坐船到大连，再坐火车到哈尔滨，走中东铁路从满洲里出境去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两年，1927 年回国的。”

1928 年 3 月 20 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在武汉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国民党对她实施了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大义凛然，严守党的秘密，严守共产党员的操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崇高品格。国民党反动派决定在 5 月 1 日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里处决向警予。向警予视死如归，在走向刑场的路上，沿途向广大群众进行演讲。国民党对此极端恐惧，宪兵们殴打她，想让她不再说话，但她仍然坚持地讲下去。刽子手向她嘴里塞进石沙，又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血沫从她的嘴角流出。向警予被押赴余记里空坪刑场，牺牲时 33 岁。

母亲壮烈牺牲时，蔡妮只有 6 岁。

父亲蔡和森对永失母爱的蔡妮，关爱有加，他经常挤出时间看望由老母亲照顾的女儿。每次到长沙，他都会特意给女儿带上一些好吃的和女儿喜欢的洋娃娃。

蔡和森曾经 4 次远赴苏联，他的行走路线都是从南方来到哈尔滨，接着坐中东铁路的火车到满洲里再出境赴莫斯科。

1929年秋天，在长沙奶奶的家里，蔡妮看到大人们都开始忙碌起来，奶奶为她赶制了好几件衣服，姑姑蔡畅还亲手为她织了一件橙黄色毛衣，蔡妮很高兴自己拥有了这么多好看的衣服，更让她感到高兴的是，爸爸要和她一起走，带她出远门。

蔡妮好奇地问奶奶和姑姑，出远门到底要走多远呢？

奶奶葛键豪和姑姑蔡畅不能明确告诉蔡妮走多远，要到什么地方，因为此行是秘密的。她们只是叮嘱蔡妮一路上要听爸爸的话，同时难免对只有7岁的蔡妮恋恋不舍。尤其是年逾花甲含辛茹苦常年照顾蔡妮的奶奶，明白和疼爱的孙女在此一别，意味着什么，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她从头到脚细细地打量着朝夕相处的孙女，俯下身来轻轻地捧着蔡妮的笑脸看了又看，不知所以然的蔡妮有些纳闷地望着奶奶那充满慈爱和牵挂的眼睛，心想：这是为什么呀？

蔡妮说：“我在苏联学习和生活了24年，回国后，我第一个想看的人就是奶奶。姑姑蔡畅告诉我，奶奶没有等到孙女回来，已离开人世了。这时我明白了当年我和奶奶告别的时候，她为什么对我瞧个不停，看了又看啊。”

蔡妮还回忆起了1929年的冬天爸爸蔡和森提着一个小皮箱带着她一路北上的情景。蔡妮说：“我们从南方先是坐船，然后坐火车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还去照了相，父亲说要把我的照片寄回长沙，给奶奶和姑姑看。从哈尔滨又坐上火车走中东铁路到了一个寒冷的地方，那就是满洲里。满洲里风雪交加，冻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记得来了一个陌生的叔叔，就是交通员吧，带着我们在夜晚出境的，后来坐火车到了莫斯科。这一路的路程实在太漫长了，有半个多月吧，我都惊讶了，爸爸带我出远门，原来是去了另一个国家。”蔡和森此行去苏联，是党中央安排他到莫斯科治病，同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初到莫斯科，蔡和森被临时安置在联盟宾馆一个比较窄的房间，只是一张单人床，7岁的蔡妮和爸爸挤在一起睡。爸爸的呼吸和温度，让蔡妮禁不住想起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的那个夜晚。

蔡和森还带蔡妮到莫斯科公园游玩，爸爸牵着她的手，坐进了过山车的座椅里，并为她系好了安全带，笑着说：“女孩子也要学会

勇敢和坚强。”蔡妮认真地点了点头说：“爸爸，你放心，我会做到的。”

清脆的铃声一响，过山车开始缓缓地启动，接着开始逐渐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高。到了最高处，几乎远离地面有5层楼的高度，过山车悬在高空中稍停片刻，倏然间，猛地来了一个大翻转，坐在座椅上的人来了一个头朝下的大翻身。接着，急速坠落，伴随着游人“啊，啊”的惊叫声，眨眼工夫，过山车已将人带入平地，然后又是急速上升，升高到空中。忽高忽低，忽快忽慢，周围的景致如万花筒般飞速变幻，这让蔡妮有些惊恐。

游戏结束后，下了过山车的蔡妮扑到爸爸的面前，她搂紧了爸爸有些瘦弱却高高的身体，内心逐渐平稳了下来。

爸爸牵着她的手问她：“怎么样，好玩吗？”蔡妮回答：“太好玩了，只是太快太高，让我刚才有些害怕。”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人生不都是平坦的路，肯定会经历起起伏伏，曲折坎坷，人要学会勇敢和坚强。”蔡妮似乎明白了爸爸的叮嘱，她摇晃着爸爸的手说：“我记住了，不会忘记的。”

为了让女儿玩得高兴，在碧波荡漾的河水中，蔡和森带着蔡妮划船。坐在船上的蔡妮望着远处岸边那葱茏的绿树和蓝天飘浮的朵朵白云，想起了妈妈向警予曾经给自己唱过的法国歌曲，那歌声犹在耳畔，她还没有听过爸爸唱歌，于是她就让爸爸给她唱首歌。

蔡和森一边划船，一边为女儿唱起了俄罗斯歌曲《喀秋莎》：“正当梨花开遍了原野，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村庄……”铿锵洪亮、雄浑悦耳的男中音，在悠悠流淌的水面上回荡。歌声伴着划桨声，在水面上荡起了层层的涟漪，蔡妮禁不住为父亲动人的歌声鼓掌喝彩。她觉得自己被浓浓的父爱环绕，心旷神怡，陶醉不已。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需要工作和治病的蔡和森将女儿送进了莫尼诺国际儿童院。

1930年深秋的一天，秋风萧瑟，落叶飘零。

蔡和森踩着满地枯黄的落叶，来到国际儿童院，向8岁的女儿蔡

妮告别，并与儿童院主任打招呼，要将蔡妮长期留在儿童院，请他们照看。

蔡和森看到天真活泼的女儿对儿童院已不陌生，开始学着用俄语和小朋友交流，并已融入了集体生活，感到很欣慰。蔡妮笑着对爸爸说：“我记住了，要学会勇敢和坚强。”蔡和森听了女儿说的这句话，高兴地笑了。临别前，蔡和森留给女儿蔡妮一张照片作为纪念，那是他在疗养院修养时穿一身白色的西装照的。

蔡妮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一别，竟是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蔡和森回国后不久，1931年6月，在参加香港海员工会的一次重要会议时，不幸被叛徒顾顺章认出而遭到反动派的逮捕。8月，在广州英勇就义时年仅36岁。

蔡妮6岁时失去母亲，9岁时又失去父亲，从此她成了漂泊在异国他乡的孤儿。父亲牺牲后的她“长期无人认领，失去与亲人联系，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1933年，蔡妮在黑海古尔祖夫夏令营度假，恰好李立三也在。他一眼认出蔡妮是蔡和森、向警予的女儿，就把她抱在怀里，高兴地说道：“我是你父亲的战友，我认识你！”李立三把她父亲遇害的事告诉了她，并要她“长大后为父亲报仇”。蔡妮后来说：“跟李立三的偶然相见，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李立三为我做了很多事，帮我跟国内亲人联系，我很感激他。后来是他送我进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在苏联莫斯科度过了24年的漫长岁月，蔡妮在莫斯科医学院毕业后于1953年回国，成为了一名新中国急需的优秀医务专家。

父亲蔡和森对女儿一再叮嘱的那句话，一直伴随着蔡妮的成长历程，在人生风雨的磨砺中，蔡妮渐渐地真正感悟到了父亲的叮嘱究竟意味着什么。

和蔡妮出国时的年龄一样，同样是7岁的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1928年5月下旬，在母亲杨之华协助完成哈尔滨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工作后，同母亲一道从哈尔滨坐中东铁路火车经满洲里出境远赴莫斯科。

党的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留在了莫斯科，杨之华则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培训班学习。由于父母的工作学习非常繁忙，瞿独伊被送进了由苏联红色救济会组建的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后来转入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她在苏联学习和生活了近 15 年。

2009 年 10 月，经历了物换星移岁月沧桑、88 岁的瞿独伊依然珍藏着父亲瞿秋白当年寄给她的明信片。明信片正面是才华横溢擅长绘画的瞿秋白亲笔画的“勿忘我”的花束，一束“勿忘我”在几许绿叶的衬托下，开满了白色的花蕊，花很小，却很茂密，在空白处，有蹿出的花瓣在绽放，溢满了活力，透出了淡雅、别致、隽永、灵动的情趣。侧面是瞿秋白用中、俄文书写的文字：“送给独伊。爸、妈于 1930 年 8 月 1 日，克里米亚。”

随着岁月慢慢流转，明信片通体都有些泛黄。可是那束溢满了父亲深情厚爱的“勿忘我”，依然摇曳生姿，栩栩如生。

当时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和杨之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会不定期地去探望在国际儿童院生活的女儿。

瞿独伊双手捧着异常珍贵的明信片，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她的讲述，让人看到了身为政治家、党的早期领袖瞿秋白作为父亲所表现的鲜为人知的极富温情的一面。

“我记得是在 1929 年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积雪，父亲把我放在雪橇里，他拖着雪橇跑，故意把雪橇拉得忽急忽慢，有时假装跑不动或摔一跤，用手蒙住脸装哭。这时我就喊妈妈：‘妈妈，我跌跤都不哭，爸爸跌一跤就哭，真娇气！’妈妈忍俊不禁地笑着说：‘孩子呀，爸爸是逗你玩呢。’于是大家拍手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回荡在天空中，似乎周围一切都在为我们幸福的一家而快乐。

“父亲时常给我写信，而且每次都要在信上画一幅画，有山水画，有卡通画，还有漫画，画什么像什么，惟妙惟肖。有一次，他在明信片上画了一个大飞艇，还在旁边写道：‘你长大了，也要为中国建设这样的大飞艇。’父亲就是这样激励我要为将来建设祖国努力学好真本领。”

1930年秋天，因国内斗争的需要，瞿秋白和杨之华告别了已经9岁的瞿独伊，从苏联返回了中国。

此时的瞿独伊虽然远离了父母，可是她已经如鱼入湖般完全融入了国际儿童院的集体生活，不仅和中国而且和外国的小朋友都能和睦相处，成为亲密无间的小伙伴。

就在她快乐成长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将她快乐的生活撞击得粉碎，让她少女的心灵猝然间颤抖不停。

“我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经历的最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是我永远失去了爱我的父亲。

“那是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儿童院的一批孩子在乌克兰的一座城市参观，苏兆征的儿子苏和清在附近的橱窗阅报栏里看到了大事，急匆匆过来让我到阅报亭那边去看一看。我忙过去浏览俄文报纸，忽然从《共青团真理报》看到了父亲瞿秋白牺牲的消息，我惊呆了，感觉天旋地转，两条腿软绵绵地不停抖动，站都站不稳了。苏和清还有别的同学赶紧过来扶住了我，我止不住失声痛哭起来，那一年我才13岁。”

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就陆续建起了孤儿院、幼儿园，来收养革命者的后代，为革命者解决后顾之忧。

1933年建立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从建筑规模、环境、设备和教学规划及布局上，都堪称很完美。

为了把红色后代培养成为栋梁之材，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开设了幼儿班、小学部、中学部和大学部。许多红色后代在这里生活和学习了长达20多年，短的也有十几年。孩子们从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一切生活和学习的费用全都由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来承担。

偌大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汇聚了来自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朝鲜、日本、美国、中国等几十个国家的红色后代。这里的孩子国籍、种族、肤色、形象、语言迥异，包括年龄也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这里人人平等自由，各个国家的孩子亲如兄弟姐妹，共同分享着国际大家庭亲情交汇其乐融融的幸福生活。

烈士的女儿、曾在国际儿童院生活了十几年的于彬在回忆录中深

情地写道：“我们是小班生，也就是幼儿班，大多出生在俄罗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出生后就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了，儿童院的保育员成了我们的父母，来自世界的孩子都成了兄弟姐妹，国际儿童院成了我们的家。”

一些中国革命者的后代甚至在出生几个月后就来到这里，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只知道饿了就“哇哇”地放声大哭，正在嗷嗷待哺的时候，他们是喝着苏联保育员的乳汁长大的。

最难侍候的是几个月大的婴儿，需要保育员一把屎一把尿地照料。孩子生病的时候，保育员要披星戴月昼夜不离地看护，孩子吃完药后再一口一口地喂水，半夜发烧的孩子乱蹬被子，还要给孩子掖好被角。保育员们与这些孩子非亲非故，但不是父母却胜似父母。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孩子们的成长离不开苏联保育员和老师们的精心呵护。

孩子们在小学部时的课程设置就已经很全面了，包括了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还有劳动、体育、音乐等。老师大多数都是苏联人，有时也请来外国教师，比如请德国人来教德语。那个年代，在苏联学校里，德语是第一外语，英语是第二外语，其次是法语。

红色后代瞿独伊和蔡妮，她们八十多岁时年事已高却依然思维敏捷，多才多艺，身板硬朗，性格直爽达观，这与她们早年在苏联接受的培养和教育是密切相关的。

瞿独伊说：“在国际儿童院，苏联老师让我们从小就要热爱劳动，教我们女孩子学缝纫机，男孩子学木工，同时还邀请在莫斯科开会学习的革命者来给我们讲革命道理，劳动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都让我们受益匪浅。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就有外语课，有德国老师，半天讲俄文，半天讲德文。德国老师要求我们在吃饭前用德语喊口令，我们排着队唱着德语歌进入食堂，一声令下，安静地就餐，吃饭时有必要讲话也只能用德语，这样一来，德语的日常用语我们很快就学会了。

“那时，我们的生活很有规律，也很有创造性。苏联老师组织我们夜行军，男女同学都要参加，还组织我们到大森林里练习骑马，开始女孩子还不敢骑，后来都争前恐后骑马。在活动中，大家都很坚

强勇敢，也都很有激情，同时增强了集体主义观念。这些活动为我们日后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啊。”

谈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蔡妮深有感触地说：“国际儿童院为孩子们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组织了音乐、美术、手工、缝纫还有体育和舞蹈小组，我参加了舞蹈组，我们排练过许多受欢迎的舞蹈节目，还和专业舞蹈团同台演出，我们的外出参观、旅游和社会活动也挺多。

“1939年5月我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作为中国儿童代表一起应邀参加了白俄罗斯的一个城市举办的大型活动，受到热烈欢迎。那时的生活既快乐又充实。有一些参观者来我们国际儿童院前，以为这里的孩子没有父母陪伴，肯定都会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们看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后，很有感触说：‘这里的孩子真的很幸福，孩子的快乐是装不出来的呀。’”

不论怎样，在孩子们成长的日子里，毕竟父母不在身边，有些孩子因父母牺牲成为了孤儿，有些孩子在有了记忆后对父母的印象是一片空白，还有些孩子连父母是谁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长期缺失父爱、母爱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幸的。

可是和国内硝烟弥漫、血雨腥风、贫瘠落后的生相比，和父辈们在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随时可能牺牲相比，他们又是格外幸运的，他们学习生活的环境简直就是宁静祥和的世外桃源。

他们分享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发展的累累果实，受到了先进、系统、科学而文明的教育，学到了过硬的本领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同时在俄罗斯音乐、艺术和文学的耳濡目染中心灵也得到了滋养和熏陶。

他们不止得到了苏联老师的谆谆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心，还感受到了苏联人民真挚炽热的关爱。每逢节日，苏联各界人士还会为孩子们送来各种礼物，同孩子们载歌载舞搞联欢活动，并纷纷将孩子接到家中，让孩子们感受家庭的温馨和幸福。

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德国法西斯进逼莫斯科。苏联政府和人民在残酷的战争中，依然全力照顾和保护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在敌机

轰炸的时候，国际儿童院的院长和老师员工，首先想到的是孩子的安全，他们尽心竭力为孩子们撑起遮风挡雨的保护伞，有的老师甚至为了保护孩子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群情激昂，尤其是年龄稍大的孩子们纷纷要求上前线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其中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还亲笔写信给斯大林，表达请战的决心。虽然连续写信请战，但斯大林都没批准。

中国共产党对在苏联成长的红色后代非常关心，1939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任弼时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看望了那里的中国孩子们，1940年赴莫斯科疗伤的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专程去看望了红色后代，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勉励他们学好真本领，将来报效祖国。

1946年，毛岸英回到父亲的身边，毛泽东见到归来的毛岸英甚是欣喜，随即便挥毫给毛岸青写了一封信：“岸青，我的亲爱的儿：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成为国家栋梁，好为人民服务……”<sup>⑥4</sup>

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在苏联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者的后代，同样殷殷牵挂，寄托厚望。

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长大的蔡和森、向警予烈士的儿子蔡博，得知毛岸英秘密回国的消息，为毛岸英能够幸运地提前回国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他有许多心里话想通过毛岸英转达给他所敬仰的毛泽东。他提笔写了一封信，向毛泽东汇报自己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和今后的打算，表示要多掌握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本领，尽快回到祖国去。正在读大学的蔡博还把另外几名在莫斯科钢铁学院共同学习的中国同学找来，一起在信上签了名字。

毛泽东接到由毛岸英转交的这封信后，十分高兴，立即复信。他在信头写上蔡博和几位给他写信签名的红色后代的名字，并另起一行写上“青年同志”，表达了他对在苏联学习和生活的中国红色后代整体的关爱之情。

毛泽东在信中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

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适当的。……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希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紧紧地握住你们的手。”<sup>⑯</sup>信的落款时间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八日。

毛泽东同中东铁路也有着不解之缘。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两个月，毛泽东就于1949年12月初踏上了开往苏联的专列。这是新中国开出的第一列专列，而这辆专列走的就是中东铁路，在满洲里出境，然后横穿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毛泽东不光走了中东铁路还在中东铁路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毛泽东在中东铁路的西端边境小城满洲里给中央并西南局写信，就西藏问题做出重大决策。毛泽东主席在信中明确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2月31日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把“解放西藏”作为1950年的一项光荣的战斗任务。

1950年新年第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迎接一九五〇年元旦》。社论中写道：“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全中国统一大业。”就这样，中东铁路又与西藏有了一次交集。<sup>⑯</sup>

从1950年开始，在苏联长大的中国红色后代陆续回国。

1950年8月，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老院长亲自将第一批回国的孩子们送到汽车上，并委派了几名苏联老师全程护送孩子们到中国的边境城市满洲里。

漫长的火车旅途，孩子们希望越慢越好。

苏联的8月是自然风光最美的时节，可是车厢内的孩子们很少有人观赏车窗外如万花筒变幻的迷人风光，他们纷纷簇拥在苏联老师的身旁和苏联老师不停地交谈着。

他们不时地望着车厢内悬挂的钟表，巴不得时间能够停住，因为他们不愿意和朝夕相处很多年已是最亲的人分手。可是钟表的时针不停地走动着，那移动的时针在无情地剪断着孩子们和苏联老师最后的时光。

火车到了满洲里，要和一路送行的苏联老师们分手了，此一别不

知何时再相见，师生之间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难舍难离，哭成一片……

苏联政府和人民培养了一批中国红色后代，为他们插上了飞翔的双翼，这些红色后代成为建国初期各领域的精英和拔尖人才，在急需大批人才的新中国派上了用场。

在人才济济的红色后代中，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儿子蔡博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钢铁专家；刘少奇主席的儿子刘允斌成为了核专家；在东北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王毓峰的儿子王苏南，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快艇艇长；著名红军将领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成为了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者……

早期著名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烈士的儿子苏和清毕业于莫斯科电影大学摄影系，回国后，成为了中国新闻电影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苏兆征早年曾领导了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1927年6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同年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同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1929年1月，苏兆征带病回国，忘我地投入工作，不久病重住院。他在弥留之际，对闻讯赶到医院探望的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邓颖超提出希望将他的亲属送往莫斯科。同年2月20日，苏兆征病逝。

谈起遥远的往事，苏和清说：“我父亲积劳成疾，因病去世，那时我才8岁。很快，党中央便派专人来护送我和母亲还有姐姐去苏联，那是1929年3月吧。我们从南方坐船，然后又坐火车到了东北哈尔滨，接着又坐中东铁路的火车从满洲里出境去了莫斯科。”

在北京苏和清老人的家里，摆放着一张他和周恩来总理的合影照片，苏和清接着讲起了他与电影结缘的历程和周总理对他指引和支持的往事。

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其生活的轨迹大致相同，不论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最后都集中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然后考

取大学。苏和清也是如此，与众不同的是，苏和清很早就迷恋上了摄影，还将此作为个人的理想去追求。

苏和清对摄影的爱好，始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当时儿童院每两星期为学生们安排一次摄影课，请来照相馆的师傅授课。有位老师将苏和清拍摄的一张学生上钳工课的照片寄给《少年队真理报》，照片不但刊登出来，并且获了奖，奖品是一个铅笔盒。这次偶然的奖励，让苏和清很受鼓舞很兴奋，激起了他对摄影极大的兴趣。

有一次，苏和清到孙中山先生的顾问、曾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庭夫妇家做客，鲍夫人推荐他到夜校去学习摄影。从此，他对摄影更加孜孜以求、刻苦钻研了。

1939年，苏和清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莫斯科电影大学摄影系。同年9月，周恩来到苏联治病，他召见了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孩子们，逐个询问他们各自的情况。

当周恩来得知苏和清已考入莫斯科电影大学摄影系的消息时，非常高兴，他拍着苏和清的肩膀说：“你肩扛的摄影机是个重要的武器，你能学摄影这很好，我们在延安很少有人会拍电影，希望你学成后回国，多拍些八路军和根据地的影片。”

望着周恩来伯伯炯炯有神且充满期待的目光，年轻的苏和清真诚地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地说：“请周伯伯放心，我会努力学好摄影，将来回国后，为革命事业多拍一些好片子。”

苏和清用积攒的钱购买了一个普通的相机，他利用业余时间，背着相机，到处去捕捉大自然中那些奇妙的景象。他拍下了清晨鲜花上面晶莹剔透的露珠；拍下了花到盛时蜂蝶闹的景象；拍下了飞珠泻玉流淌的河水；拍下了浩瀚海洋上轮船驶过海浪汹涌卷起千堆雪的壮美……

在专业上，他更是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向老师虚心求教，大学几年，往往教室里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就是中国学生苏和清。

1942年，毕业于莫斯科电影大学摄影系的高才生苏和清被分配到阿拉木图联合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助理。从此，苏和清开始了他的专业

摄影生涯。

在阿拉木图联合电影制片厂，苏和清参加了《侵略者》《伊凡雷帝》《阿巴依》等多部影片的摄影工作。他边工作边学习，业务水平不断提高。

练就一身过硬本领的苏和清归心似箭，几次提出回国申请，苏联政府考虑红色后代的安全，等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冬天，终于批准了苏和清的申请。

在苏联学习生活了17个年头已24岁的苏和清，依然走当年赴苏联的行走路线，从莫斯科坐火车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满洲里入境，走中东铁路秘密回到了国内。

回国后不久，党中央将他派往八路军晋察冀军分区政治部，任电影摄影师。从此，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了崭新的一步。

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同国民党军队展开激烈战斗。苏和清和电影队的其他同志奔赴战斗第一线，冒着枪林弹雨、炮火硝烟，拍摄了解放石家庄、清风店、正定等战斗的场面。这些素材随后编辑成“华北军区新闻第一、二、三号”，军区政治部给主摄影师苏和清评记了一等功。这一年，经过战火考验的苏和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3月，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县举行了划时代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设备简陋，没有灯光照明的情况下，苏和清巧妙地利用了自然光，并运用了在莫斯科电影大学所学到的先进技术，将胶片的格式重新设计，调整到最佳状态，成功地拍摄了《七届二中全会》纪录影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看了影片都很高兴，毛主席风趣地说：“我们也有过留洋的摄影师喽。”周恩来亲切地呼唤苏和清在苏联期间用的名字，欣慰地笑着说：“秋秋啊，学有所成，派上用场了嘛，好，好哇。”

1949年春天，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中共中央进入北平，这一天是3月25日。苏和清扛着摄影机，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的壮观景象都拍摄了下来，这些震撼人心的场面瞬间变成了永恒的经典。

建国前夕的 1949 年 6 月 25 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苏和清又用他的摄影机记录下了这些珍贵的历史画面。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苏和清在天安门城楼的东侧，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把隆重的开国大典从头到尾完整地拍摄了下来。

这些溢满激情异常珍贵的历史素材，剪辑到他与苏联摄影师合拍的大型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中，此片荣获了 1951 年斯大林奖金一等奖。

作为中国新闻电影事业创始人之一的苏和清，从 1945 年起到 1985 年的 40 年间，亲自拍摄并参加编辑、编导的影片多达近百部。建国后，历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政治活动，作为主摄影师的苏和清都参加了拍摄工作。他用辛苦的汗水和超常的智慧创造了事业的辉煌，为我党和我国人民留下了大量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也为我国电影事业创造了一笔不可替代的价值久远的宝贵财富。

---

330

瞿独伊归国后的经历也十分丰富。离休后弹琴、画画，并获得全国老年舞蹈大赛金奖的瞿独伊，身板硬朗，步履轻盈，精神矍铄，谈笑风生。

瞿独伊 7 岁时便随母亲杨之华远赴苏联。她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长大，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或许她继承了才华横溢的父亲的天赋，她多才多艺。

瞿独伊是跟随母亲杨之华在 1946 年回国的。回国后，辗转到了延安，受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亲切接见。这一年的 8 月，瞿独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安排在新华社工作。在战争年代里，瞿独伊作为新华社的随军记者，要经常跟随部队不断转移，风餐露宿，而且还时常要披星戴月进行夜行军。但紧张严酷的战争环境，没有让瞿独伊犹豫退缩。

为了报道第一手的新闻，瞿独伊多次主动请缨上前线。新华社的领导考虑她是一位女同志，又是瞿秋白烈士的女儿，为照顾她的安

全，开始不让她前往。瞿独伊却说：“前方的战士流血流汗，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要去采访英雄的事迹，报道战地新闻，为他们加油鼓劲作宣传。”在她的恳求下，领导批准了她的请求。从此在枪林弹雨的第一线，经常可以见到手拿采访本的瞿独伊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火线采访战地新闻的情景。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瞿独伊以随团翻译的身份，有幸陪同以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瞿独伊亲眼看见毛主席，亲耳听到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声音，此时，天安门广场红旗飘舞，彩旗猎猎，礼炮声声，万众挥舞花束，雀跃欢呼，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一片沸腾。一种自豪感在瞿独伊的心中油然升起，激动不已的她热泪盈眶。

恰恰在此时，一件让瞿独伊永生不忘的喜事来临了。

“群众游行还没有完，廖承志就来叫我，‘快去，快去。’边说边把我带到了广播电台，让我用俄语播送毛主席那句话，‘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还有用俄语播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稿子都已经译好了，是现场直播。这是非常神圣光荣的任务，我倾心倾力，一字不差地完成了用俄语现场直播的这个特殊任务。在用俄语播送的时候，我特别激动，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有多少人流血牺牲，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

通过电波，瞿独伊用出色的俄语传达了毛主席的庄严宣告，这声音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

建国后，瞿独伊大部分时间是从事翻译工作。当时全国妇联和全国总工会等单位都曾借调瞿独伊去工作，北京召开的一些国际会议以及苏联代表团访问中国时，也纷纷邀请瞿独伊去当翻译。

瞿独伊曾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做翻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周恩来总理赴苏联访问，随行的翻译就是瞿独伊。瞿独伊精心保存了一张当时为周总理现场做翻译的照片。

这张珍贵的照片，全景是一个规模很大既庄重又典雅的会议厅，会场悬挂着中苏两党的党旗，周围坐满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及各

界代表。在照片正中的讲台上，气度非凡神采奕奕的周总理正在向座无虚席全神贯注的与会者发表讲话，而站在周总理身旁的就是担任翻译的瞿独伊。

瞿独伊不止珍藏了这张历史照片，还将她当时担任周总理翻译穿的那套衣服也保存了下来。这套款式大方简朴通体都是天蓝色的上衣和裙子，还依然笔挺。

瞿独伊深情地说：“这套衣服就是当年在苏联我为周总理做翻译时穿的，半个多世纪了，我舍不得穿。让我最难忘的是，我向大会作翻译时，周恩来总理还特意用暖瓶给我倒了一杯开水让我喝。本来我应该为周总理倒水，没想到周总理那么大的人物，在大庭广众面前为我一个小翻译、普通工作人员亲自倒水，我真的是为之感动不已。在细节上，看出周总理伟大的人格，至今想起，我深深地怀念周总理……”

讲到这里，瞿独伊老人已是眼含热泪，唏嘘喟叹了。

在瞿独伊的生命历程中，她还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从1950年3月开始，瞿独伊和丈夫李何受组织委派前往苏联，肩负起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的创建重任。

在艰苦创业的日子里，因人手匮乏，工作量又大，他们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日。选社址，跑审批，搞基建，组织落实分社的内部机构，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繁重的工作致使瞿独伊消瘦了很多，她却始终精神饱满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

历经几年的时间，在瞿独伊和丈夫李何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使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得以成功创建，打开了新华社通往世界的一个窗口。

当年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少数人在建国前就秘密回到国内，而大多数人则是从1950年夏天开始陆续回国的。

回到北京后，许多孩子找到了父母，但还有近30名孩子无家可归。他们不会说也不认识汉语，甚至饮食习惯也很难适应。这些孩子

都在 10 岁左右，怎样安排和照顾好这些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一时间成为了比较棘手又亟需解决的问题。

1950 年 9 月，时任松江省政府主席的冯仲云在北京开会期间听说了这种情况，便主动向中央组织部有关领导提出，可以将烈士的遗孤和暂时找不到父母的近 30 名孩子接到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过渡一段时间。

这些孩子最初被哈尔滨市委安置住在南岗区的国际饭店，可是有些孩子太顽皮，嬉笑吵闹声影响了其他旅客的休息，还有时因玩耍碰坏了东西。

至于他们的学习，本想让他们能尽快学会汉语，便将这些孩子安排到东北烈士子弟学校就读，可是他们都不会汉语，根本听不懂讲课内容。

几经辗转，只好将他们送往中东铁路办的学校，可学校提出要想住校，就需要检查身体，不仅这些孩子而且和他们有过接触的人群，包括东北烈士子弟学校二三百名学生都要进行一番体检，这非常麻烦也难以做到。

住学校有困难，住宾馆影响旅客休息也不是长久之计。

冯仲云的女儿冯忆罗感慨地说：“想来想去怎么办，我父亲母亲就说，干脆到我家里去，于是将近 30 个孩子就住到我们哈尔滨的家里。有些男孩子真的很顽皮，有时我一进家门，就看到高高的大树那粗壮的树枝上骑坐着好几个孩子，其中有的孩子还顺着树枝爬到屋顶上。

“为了照顾好孩子们，我父母还特意请了一位苏联厨师来做饭。这近 30 个人的伙食，每天需要买菜，主要任务压在了我母亲的身上。她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操办这些事，还经常跑到南岗秋林公司，给孩子们买俄罗斯小点心。我母亲生活上对他们关心照顾，在教育上也是严格把关，检查他们每个人的作业，一丝不苟，常常忙到深夜。”

安置近 30 名孩子的住处并非易事。孩子迁来后，冯仲云把他的会客厅、办公室和他的休息室都腾出来作为孩子们的住处。时任松江省政府主席兼哈工大校长的冯仲云，工作非常繁忙。他回到家后，几乎

没有什么地方休息，他的卧室成为了集办公、会客、看书于一体的地方。

为了不让孩子们住的地方拥挤，受委屈，冯仲云和薛雯夫妇决定让女儿冯忆罗住进学校，让儿子冯松光住进了幼儿园。

冯仲云的儿子冯松光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那时才3岁，冷丁让我离开了父母，我心里很难过，而且平时也看不到姐姐，挺孤独。有一次妈妈薛雯让警卫员接我回家，回家后我抱着妈妈哇哇痛哭起来，就觉得是不是父母不要我了。”

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曾经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老共产党员冯仲云和薛雯，对红色后代寄予了特殊的关爱和呵护。

烈士的后代杨冬回忆起最让他难忘的一件事：“当时，我也就10岁吧，很淘气。我在学校期间和同学吵了架，影响了上课，老师找到了家里。我知道自己惹了祸，有些害怕，就悄悄地趴着门缝听里面的动静。老师问，谁是杨冬的家长，冯仲云伯伯马上回答：‘我就是杨冬的家长。’老师说：‘杨冬太淘气了，影响大家学习，学校准备开除他。’冯伯伯笑着说：‘不要开除，要教育为主嘛。一个孩子如同一棵小树，在成长期剪枝修叶可以长得更好。淘气的孩子往往很聪明，引导和培养好了，就可能出息成人才哟。’这件事，让我记忆犹新，尤其是冯仲云伯伯说的那句话，‘我就是杨冬的家长’，让我这个从来没有家长，也没听说过这两个字的孩子感到特别温暖，感动得都想哭。”

当年住在冯仲云家里的红色后代赵漪莲回忆往事，深情地说：“冯仲云那时是省长，我们几十个人呢，住在他家里，冯仲云伯伯和薛雯妈妈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这帮孩子从来没有在家里生活过，没有父母，又是小孩子，难免做些过格的事。有些男孩子特别淘气，有时搞恶作剧都能爬到房顶上去玩耍，冯仲云伯伯和薛雯妈妈从来没有发过火训斥过，而是耐心地引导。薛雯妈妈有空就管我们，吃穿什么都管，还给每一个孩子过生日，我们都叫她妈妈。”

近30名红色后代，在冯仲云和薛雯的家中，整整生活了两年。朝夕相处，春去秋来。1952年秋天，冯仲云因工作调至北京。冯仲云一

家人迁居北京，孩子们纷纷赶至哈尔滨火车站，含泪依依相送。

岁月荏苒，时事流变，真情永驻。

在冯仲云家居住过的孩子们，长大后也都相继回到了北京。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感悟的加深，他们对冯仲云和薛雯的感情日益加深。尤其是当冯仲云在“文革”浩劫中遭受迫害含冤去世后，每年的节假日，他们都会到家中去看望薛雯。大家回顾过去的生活，交流现在彼此的情况，尽情地唱歌、跳舞，仿佛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每次聚会，他们都是自己动手做饭，然后像当年一样，围拢在薛雯身边。每次聚餐时竟然有五十多人，这里面不只有当时在哈尔滨生活过的孩子们，也有一些被他们称为哥哥和姐姐的红色后代，如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等。这些红色后代被薛雯当年无私照顾无家可归的孩子们的真情所感动，便也自发地加入了看望薛雯的群体中。

曾经在冯仲云家中生活过的红色后代蔡娥丽情深意切地说：“当年薛妈妈不让自己的孩子住在家里，腾出地方让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孩子们住了两年多，一直到冯伯伯和薛妈妈离开了哈尔滨。他们对我们太好了！不光是我们在哈尔滨住过的那些孩子，还有我们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曾一起生活过的其他孩子们都到他们家里聚会，薛妈妈有病时，我们到医院看望她。她去世时，我们都参加了她的追悼会，非常想念薛妈妈。”

人间最贵是真情。至于远在俄罗斯的母校，更是红色后代梦绕魂牵、永存感恩之心的第二故乡。

从1998年庆祝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建院65周年至今，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李富春、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邓发、陈昌浩、高岗等原中共中央领导和革命烈士子女家属近百人，多次自费坐飞机飞往莫斯科母校，其中多数红色后代已多次重返。一些年事已高的红色后代，甚至拄着拐杖，坚持前往。每次重返，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自发为母校捐款捐物。一些因病卧床的红色后代，也委托当年的同学带去礼物，表达自己对母校的一片爱心。

重返母校的队伍浩浩荡荡，他们回到了孩提时生活的“家”，可他们已不再年轻，年长者已八十开外，年轻的也年届七旬。

岁月流转，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前的生活环境必然有所改变，可是他们依然兴致盎然地走进教室坐在课桌前，走进餐厅坐在餐桌前，走进图书馆坐在阅览的座位上……他们走进的这些地方，会让他们脑海中所有记忆的帷幕徐徐开启，眼前的场景都是伴随他们成长的符号和标识。睹物思人，当年的学习和生活景象一幕又一幕出现在眼前，既清晰可辨，又如幻如梦，他们恍若又回到了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青少年时代。

他们携手走进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娱乐大厅，情不自禁地唱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流行的电影《夏伯阳》中的歌曲：“英雄夏伯阳在乌拉山脉闯荡，率领部队像雄鹰一样扑向战场……”接着，他们又自然、深情地齐声唱起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校歌《我们不投降》……

意犹未尽的校歌会引领他们来到校园旁塔尔卡河边那片茂密的树林，就是在这片幽静的树林里，苏联老师组织男女同学进行夜行军的训练。同样在这里，苏联老师还组织男女同学学习骑马，女同学们从不敢上马，到坐不稳，到最后英姿飒爽娴熟地骑马奔驰。在这片树木里，他们学会了勇敢和坚强，知道了集体荣誉，团结就是力量。

转过身来，凝望着阳光照射下明亮如镜的美丽的塔尔卡河，河水荡漾，绿树葱茏，微风阵阵，他们重新呼吸这里清新的空气。塔尔卡河曾留下他们孩提时代游玩的身影和足迹。还是这条格外熟悉的河流，原貌未变，可是重返此地的他们容颜已改，俯看悠悠依旧的流水，禁不住感叹，似水流年，逝者如斯啊……

旧地重游，重温旧梦，一草一木一景一物总关情。沧桑多变，思念永恒。

红色后代们也非常思念当年的苏联老师和员工们。

庆幸的是阔别了半个世纪，他们历经四处寻访和奔波，终于找到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当年的保育员多·易·麦奥罗娃和塔依西亚·佩特罗夫娜。他们喜极而泣，和年迈的保育员相拥相抱，如同回到慈母的怀抱。遥想当年，有些咿呀学语、嗷嗷待哺的中国幼儿就是喝着苏

联保育员的乳汁，在她们的怀抱中一天天渐渐长大的。无论风有多急，雨有多骤，雪有多大，天有多冷，苏联保育员都会为亟需呵护的中国幼童撑起保护伞，撑起一片晴空。

在红色后代“回家”的大队人马中，其中任远芳、杨冬、于彬等十几位同学还欣喜地寻访到了他们的苏联老师阿·谢·博加切夫斯卡娅。坐在已是满头银发的苏联老师家中，他们备感亲切和温馨，和老师交谈着，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他们纷纷为老师献上礼物，并分别合影留念。有的同学还带来了珍藏多年的当年老师在课堂上教学的照片，十几位同学望着坐在面前的已年迈的老师，看看照片中的老师，再看看照片中的自己，抚今追昔，回首往事，止不住心潮翻涌，久久不愿离开。

红色后代还见到了当年为他们服务的电影放映师和服装管理员等老员工，他们还专程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老院长的墓碑前致哀献花。当年老院长和老师员工，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曾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他们的安全。

中国有句唐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可以说，每一次重返母校，也都意味着很快将要离开，聚散总有时，可是人间自有真情在。红色后代对他们成长的第二故乡和中俄人民之间传统友谊十分珍惜，真情在他们心中永驻，无法湮灭。

2008年9月，几十位红色后代从北京飞往满洲里。

在连接中俄两国铁路的国界交界处早已建立的规模恢宏的红色之路纪念馆里，新扩建的红色后代展厅已经落成，这几十位来自北京的红色后代就是应邀前来参加红色后代展厅揭幕仪式的。

这个永久性的纪念场所宽敞明亮，展示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李富春、林伯渠、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罗亦农、赵世炎等近百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烈士子女特殊成长经历的图文。在众多红色后代积极提供资料和国内各档案馆的鼎力协助下，展厅内展出的图片、资料、文物等十分丰富，林林总总。当年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也用实物建成，栩栩如生。

地再现了红色后代当年生活学习的情景。人们可以不出国门，在这里就能走进当年红色后代成长的历程，走进那段难以磨灭的红色历史。

人生是不可复制的，不能彩排，也不能重来，可以说红色后代的成长史，是不可替代的。他们向世人展示的成长史，无疑是中俄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的真实写照，他们的成长历程，也折射出中国革命进程前世今生是怎样一路走过来的。

尽管红色后代晚年重返当年的母校和来满洲里参加揭幕仪式的活动，都是坐飞机飞来飞去，可是他们记忆深处的人生坐标和命运转折，都是和一条铁路紧密相连的。

几十位来自北京的红色后代参加完红色后代展厅的隆重揭幕仪式后，漫步走向了外面，近在咫尺的雄伟的满洲里国门下，中俄两国的列车在不停地往返穿梭，轰隆隆的火车车轮奔驰转动的声音不绝于耳。

放眼望去，铁路的轨道无边无际，虽然这条漫长的铁路早已改变了名称，已不再叫中东铁路了，可是这条铁路行驶的线路没有变，中俄两国的火车依然行驶在百年前中东铁路修筑的路基上。

几十年没有来过这里了，随着岁月的流转，红色后代都已步入人生的晚年，旧地重游，勾起他们许多的回忆，他们禁不住要在这条曾与他们命运息息相关的铁路线上，走一走，看一看。

不论岁月如何更迭，也不论这条铁路的名称如何改变，这条铁路作为重要的历史符号和印记，是难以磨灭的。

细细地回望这条铁路，回望历史，让红色后代不由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当年沙俄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修筑了路基，铺上了冰冷的钢轨，将俄国的西伯利亚与中国东北连接在一起。当年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无疑是为了扩张，可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漫长的通往俄国的中东铁路，竟成了革命者的红色之路。

这条红色之路，成了传播马列主义，播撒革命火种的窗口和载体。那“轰隆隆”火车奔驰转动发出的声音，好似中华民族崛起前剧

烈的躁动。近千名革命先驱、民主志士、先进青年前赴后继地在这条路上走过，他们为了追寻美好的梦想，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相继奔赴十月革命的故乡，为找到拯救和改变血雨腥风的旧中国的革命道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大业弥坚，任重路远。一路走来，几多风云变幻，几多坎坷艰辛，几多上下求索。这条长长的中东铁路，演绎了多少鲜为人知又感人至深的故事啊。

尽管中东铁路的往事早已渐行渐远，早已在沧桑的岁月中如烟散去，可是红色之路所承载的那段红色历史，是不该也不会被人们忘却的。那一段激情燃烧、追寻真理的红色历史是不会被岁月的泥沙带走的，会在人们心中永驻，因为总有一种感动是永恒的。





中共六大代表哈尔滨秘密接待站原址

## 后记

在完成这部书稿后，觉得自己的内心似乎被掏空了一样，但又感到格外的充实和欣慰，没有空虚和茫然的感觉。

书中人物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以及他们身上散发的正能量，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不仅将这些记在了厚厚的采访本上，也都深深地牢记在了心里。他们的形象在我的心中是鲜活、丰富、立体的，我带着情感将他们融化在笔端，我要做正能量的传递者，这也是我由衷的心愿。

在物欲横流、充满诱惑、生活节奏飞快的当下，我历经数年，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那段历史的探寻中，如苦行僧般奔赴多地寻访线索和相关人物，曾遇到很多困难，也有过困惑和动摇，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其无形的动力，就是源于采访的那些人和事给我带来的振奋和吸引。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曾联想到，登泰山、攀黄山所领略到的不仅是巍峨壮丽，还有很多别致的景物也让人流连忘返。

空泛的豪言壮语，概念化的介绍，从未真正打动人心，相关的人物也会略显单薄，缺乏说服力。

实际上，每个人在短暂的生命中都经历过曲折坎坷，都有过苦辣酸甜，都会有夫妻之爱、儿女情长和对亲人的牵挂惦念。再伟大的革命者也会既有铮铮铁骨的一面，又有温情柔软的一面。

命运像手掌的纹路一般曲折却又掌握在自己手上。

那些革命者为了追寻真理和美好的梦想，弃小家为大家，将大爱献给了国家和民族的振兴。正如裴多菲在诗中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他们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民族的脊梁，是由多重因素构成的，革命者背后鲜为人知的命运流转，他们的爱情、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更富有感染力，也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都是逐渐走向完善和成熟的。

我在深入采访中感到，其中一些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如陈独秀、李立三等，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复杂性，在党的早期，作为领导人的他们，在革命道路的探索中，曾犯过右倾或“左”倾路线的错误，也经历了政治命运的多舛，可是他们对于社会进步、民主、文明的追求和救国救民的信仰始终不变，他们辉煌的历史业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当年发生在中东铁路上的红色故事建国后因种种原因并未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故事早已淹没和隐藏在岁月的沧桑中。可恰恰是这条长长的铁路，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民族的解放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也承载了许多革命先驱和仁人志士感人至深的往事，这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在被中共早期革命者称为红色之路的中东铁路上，留下了许许多多革命者的身影和足迹，本书所反映的人物和事件，只是其中的部分而已。我愿意继续深入挖掘，如淘金者一样，孜孜以求，努力开采出更多的历史文化的宝藏。

历史贵在去伪存真，真实还原历史也是一部纪实文学的根基所在。

单纯去查阅一些史料并不难，难的是拂去历史的烟尘，让那些真实感人的故事浮出水面。为此，我在反复研读大量的史料、人物传记和访问各地的党史专家的基础上，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对当事人和众多革命者的家属及后代的采访上。其中一些被访者，经我多次走访，成为了忘年之交。通过他们深入细致的真情回忆和讲述，让我减少了对历史人物的生疏感，当我拿起笔写作的时候仿佛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在此，真诚地感谢所有的被访者，那些珍贵的文物和图片的提供者，感谢中共黑龙江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长李延芝，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丽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李

蓉博士，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贾宏图对本书的指导和支持，还要感谢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相关领导及部门的鼓励与支持。

开始创作本书时正逢一场大雪，纷纷扬扬、铺天盖地，那飞舞的白色的雪花洗涤着我的心，激发着写作的激情。

完成这部书稿时，已是春回大地，绿树葱茏，鲜花绽放。

是啊，落雪是无声的，雪花是单纯的白色，但正是无声孕育了有声，而白色也是一切颜色的底色，雪融化成了无形的水，润泽成大地的春意盎然、花红柳绿。联想到革命先驱们高尚的情操和洁白如玉的品格，他们不正是雪花，孕育了共和国绚丽夺目的春天吗！

纵观历史人文景观，往往让人情不自禁、浮想联翩，就如茫茫雪山孕育的浩浩长江总会让我们禁不住感叹：“大江东去，浪淘尽……”

那么，淘不尽的又是什么呢？

## 受访者及资料提供者名录

姓 名	人物简介	采访时间	地 点
龚育之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其父龚饮冰为中共六大代表，时年 77 岁	2006 年 5 月 14 日	北京市
孙小礼	龚育之夫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时年 80 岁	2012 年 10 月 8 日	北京市
韩 光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常务书记，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时年 95 岁	2006 年 7 月 2 日	北京市
韩晓明	韩光女儿，中华医学会原秘书长	2012 年 10 月 13 日	北京市
赵毅敏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副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时年 98 岁	2001 年 5 月 4 日	北京市
赵漪莲	赵毅敏女儿，在前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2012 年 10 月 7 日	北京市
凌 楚	赵毅敏女儿，北京市退休干部	2012 年 10 月 7 日	北京市
王光美	刘少奇之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时年 80 岁	2001 年 4 月	北京市
李文海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其老师尚钺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	2001 年 5 月 6 日	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
李 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博士	2012 年 10 月 9 日	北京市

姓 名	人 物 简 介	采 访 时 间	地 点
李 莎	李立三夫人，曾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外国语学院俄文教授，时年94岁	2006年6月12日，2008年6月多次采访	北京市 青岛市
李英男	李立三女儿，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2006年12月， 2008年6月， 2012年8月 三次采访	北京市
李雅兰	李立三女儿，北京市退休干部	2008年6月	北京市
周秉德	周恩来侄女，12岁入住中南海，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长大，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图片社副社长	2012年8月8日	北京市
陈琮英	任弼时夫人，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时年98岁	2000年6月	长沙市蓉园宾馆5号楼
任远志	任弼时大女儿，北京市离休干部，时年76岁	2007年9月	北京市
任远芳	任弼时小女儿，在前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北京市退休干部，时年75岁	2008年8月， 2012年9月 两次采访	北京市
任远远	任弼时儿子，部队干部	1994年6月	长沙市蓉园宾馆5号楼
李光华	李大钊儿子，北京市离休干部，时年84岁	2007年10月18日	北京市
李永兰	李大钊儿媳，北京市退休干部，时年80岁	2008年10月18日	北京市

姓 名	人 物 简 介	采 访 时 间	地 点
瞿独伊	瞿秋白烈士女儿，北京市离休干部，时年 89 岁	2008 年 8 月， 2009 年 10 月，2010 年 7 月曾多次 采访	北京市
陈长璞	陈独秀孙女，安徽省安庆市政协常委	2012 年 11 月 3 日	安徽省 安庆市
罗平海	罗章龙儿子，北京市退休干部，时 年 84 岁	2008 年 6 月， 2012 年 10 月 两次采访	北京市
蔡 妮	蔡和森、向警予烈士的女儿，在前 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北京市离休干 部，时年 83 岁	2008 年 9 月	北京市
苏和清	苏兆征烈士儿子，在前苏联长大的 红色后代，北京市离休干部，时年 86 岁	2007 年 9 月	北京市
俞寿臧	俞秀松烈士弟弟，上海市退休干部， 时年 86 岁	2006 年 6 月	上海市
俞 敏	俞秀松烈士继子，上海团市委干部	2006 年 6 月， 2012 年 11 月 两次采访	上海市
冯咏莹	湖北省政协离休干部，曾担任中共 满洲省委交通员，时年 95 岁	2001 年 5 月 初次采访， 2008 年 10 月 16 日再采访	武汉市
杨剑如	冯咏莹女儿，武汉市退休干部	2008 年 10 月 16 日	武汉市
斯瓦拉	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儿子，武 汉市机关干部	2008 年 10 月 16 日	武汉市

姓 名	人 物 简 介	采 访 时 间	地 点
薛 霏	曾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交通员，北京市离休干部，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夫人，时年 88 岁	2001 年 5 月	北京市
冯忆罗	冯仲云、薛雯女儿，北京市离休干部	2001 年 5 月， 2012 年 10 月 曾多次采访	北京市
冯松光	冯仲云、薛雯儿子，北京市离休干部	2012 年 10 月	北京市
邓 爽	东华学校校长邓洁民女儿，北京市离休干部，时年 89 岁	2008 年 9 月	北京市
朱兆祥	东华学校校长邓洁民女婿，著名科学家，协助夫人邓爽多年坚持搜集邓洁民校长相关史料，时年 90 岁	2008 年 9 月	北京市
马为平	马骏烈士孙子，北京市老干部局原副局长	2012 年 10 月	北京市
马为公	马骏烈士孙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总编辑	2012 年 10 月	北京市
张小曼	最早马列主义传播者之一张西曼的女儿，中国民盟机关退休干部	2012 年 10 月	北京市
李多力	黑龙江省原省长李范五儿子，在前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部队退休干部	2008 年 6 月， 2010 年两次 采访	北京市
李黎力	黑龙江省原省长李范五女儿，北京市退休干部	2012 年 10 月	北京市
李 敏	东北抗联老战士，黑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时年 90 岁	2013 年 5 月	哈尔滨市
杨 冬	在前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部队退休干部	2008 年 6 月	北京市
蔡娥丽	在前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北京市退休干部	2012 年 9 月	北京市

姓 名	人 物 简 介	采 访 时 间	地 点
于 彬	在前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北京市退休干部	2007 年 10 月	北京市
黄 健	在前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中国著名跳高教练，时年 81 岁	2008 年 8 月 18 日	北京市
王海成	著名作曲家“西部歌王”王洛宾的儿子，现从事对王洛宾先生文化遗产整理及传播工作	2007 年 4 月， 2012 年 10 月 两次采访	乌鲁木 齐市
宋慧琴	十月革命时中国团团长任辅臣烈士儿媳，北京市退休教师，时年 95 岁	2008 年 6 月	北京市
任公伟	十月革命时中国团团长任辅臣烈士孙子，北京某高校教授	2008 年 6 月	北京市
任光伟	十月革命时中国团团长任辅臣烈士孙子，沈阳艺术馆研究员	2006 年 5 月	沈阳市
熊振东	列宁卫士李富清生前单位领导，新疆兵团工一师医院原院长，时年 82 岁	2012 年 11 月	乌鲁木 齐市
张玉兴	列宁卫士李富清生前同事，新疆兵团工一师医院退休职工，时年 76 岁	2008 年 11 月	乌鲁木 齐市
马守华	列宁卫士李富清生前同事，新疆兵团工一师医院原总务科长，时年 77 岁	2008 年 11 月	乌鲁木 齐市
辛晓龙	新疆自治区财政厅退休干部、文史收藏研究者	2012 年 10 月	乌鲁木 齐市
刘 仁	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泽荣儿子，航空专家，离休干部，时年 85 岁	2007 年 6 月， 2008 年 5 月， 2009 年 10 月 三次采访	北京市

姓 名	人物简介	采访时间	地 点
李永昌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一书作者	2007 年 10 月	沈阳市
赵凤臣	满洲里交通站负责人李芳儿媳，吉林舒兰矿务局退休人员	2012 年 6 月	吉林省
段文桥	满洲里交通站负责人李芳前单位领导，舒兰矿业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2012 年 6 月	吉林省
庄委林	满洲里交通站负责人李芳生前单位同事，舒兰矿业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中心干部科科长	2012 年 6 月	吉林省
李世平	绥芬河国际交通员李春荣儿子，哈尔滨市电影机械厂退休干部	2012 年 6 月	哈尔滨市
吕艳春	绥芬河国际交通员李春荣儿媳，哈尔滨市电影机械厂退休工人	2012 年 6 月	哈尔滨市
张秀华	绥芬河国际交通站负责人张宗伟烈士女儿，外交部离休干部，时年 84 岁	2001 年 5 月， 2008 年 10 月，2012 年 6 月三次 采访	北京市
张慰伟	哈尔滨国际交通站负责人张宗伟烈士女儿，哈尔滨市公安局离休干部，时年 79 岁	2006 年 5 月， 2008 年 10 月 两次采访	哈尔 滨市
张忆伟	哈尔滨国际交通站负责人张宗伟烈士女儿，北京市退休干部，时年 78 岁	2001 年 5 月， 2008 年 10 月， 2012 年 6 月 三次采访	北京市

姓 名	人 物 简 介	采 访 时 间	地 点
张道滨	哈尔滨国际交通站负责人张宗伟烈士儿子、北京市退休干部	2001年5月，2008年10月，2012年6月三次采访。	北京市
季明华	王荷波烈士生前领导工运所在地南京浦镇车辆公司原机关党委书记，时年76岁	2012年10月	南京市
陈 红	抗日英雄赵一曼孙女，四川汽车检测中心站副站长	2005年8月	成都市
马继民	抗日英雄杨靖宇孙子，郑州铁路局职工	2005年8月	郑州市
赵尚文	抗日英雄赵尚志妹妹，哈尔滨市退休干部，时年86岁	2005年8月	哈尔滨市
刘 敏	李立三夫人李莎教授学生，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教授，时年82岁	2012年5月	哈尔滨市
邓 军	李立三夫人李莎教授学生，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教授、博导、全国名师	2012年12月	哈尔滨市
郝建恒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时年85岁	2012年7月	哈尔滨市
徐景南	哈尔滨工业大学俄文教授，时年81岁	2012年7月	哈尔滨市
王卫东	东北烈士纪念馆原馆长，时年83岁	2012年6月，2012年11月两次采访	哈尔滨市
刘加量	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	2012年7月	哈尔滨市

姓 名		人 物 简 介	采 访 时 间	地 点
唐宏经		中共六大代表、大连市离休干部，时年 100 岁	2001 年 6 月	大连市
杨 刚		十月革命时“中国营”营长包其三孙子	2006 年 8 月	北京市
姚金果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2006 年 6 月	北京市
孙振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馆长	2006 年 6 月	北京市
李维青		政协新疆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2012 年 11 月 7 日	乌鲁木齐市
汤永才		政协新疆自治区委员会文史办原主任	2012 年 11 月	乌鲁木齐市
齐若雄		中共新疆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宣教处长	2008 年 4 月	乌鲁木齐市
曾林平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处长	2008 年 5 月	杭州市
吴光辉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	2012 年 10 月	南京市
沈建中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处级调研员	2012 年 11 月	上海市
常好礼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2008 年 4 月， 2012 年 11 月， 2013 年 8 月 三次采访	哈尔滨市
王新志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2006 年 3 月， 2006 年 10 月， 2007 年 5 月 三次采访	哈尔滨市

姓 名	人 物 简 介	采 访 时 间	地 点
姜建平	哈尔滨铁路局党委宣传部部长	2006年3月	哈 尔 滨 市
吴 霖	中共绥芬河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2008年5月	绥 芬 河 市
陈树辉	满洲里市广播电视台副局长	2006年3月, 2008年9月 两次采访	满 洲 里 市
徐占信	满洲里市档案史志局副局长	2006年3月	满 洲 里 市
戚克强	中共牡丹江市委宣传部处长	2008年9月	满 洲 里 市
王绘沣	中共海林市委宣传部科长	2008年9月	黑 龙 江 省 牡 丹 江 市 横 道 河 子 镇
陈守英	海林市横道河子镇宣传委员	2008年9月	黑 龙 江 省 牡 丹 江 市 横 道 河 子 镇
李德志	南开中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2012年10月	天津 市
张艳秋	铁岭市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银冈书 院纪念馆馆长	2012年10月	辽宁 省 铁 岭 市
曹培亮	湖南省醴陵李立三故居纪念馆馆长	2012年11月	湖南 省 醴 陵 市

姓 名	人 物 简 介	采 访 时 间	地 点
张绍强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旧址，外国语学社旧址纪念馆馆长	2012 年 11 月	上海市
曹明龙	黑河市旅俄华工纪念馆馆长	2012 年 6 月	黑龙江省 黑河市
李云桥	东北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员	2012 年 11 月	哈尔滨市

备注：被访者 75 岁以上标注了年龄，对其中部分人士几次采访，标注的年龄均为最后一次的当年年龄。

# 附录

## 附录一

### 参考文献：

- ①《早期革命家的故事》——《瞿秋白的故事》5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
-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瞿秋白文集》第1卷，《饿乡纪程》3—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 ⑫《早期革命家的故事》——《瞿秋白的故事》5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石仲泉、陈登才主编）
- ⑬《中共党史人物传》原文发表于《文物天地》1984年第3期，标题为《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战》，任栋梁注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 ⑭《李鸿章》258页（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董守义著）
- ⑮《三十六棚》1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哈尔滨车辆厂厂史编写组）
- ⑯《中共党史人物传》——《任辅臣》2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0卷，张雅莹著）
- ⑰《中共党史人物传》——《任辅臣》2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0卷，张雅莹著）
- ⑱《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战》（《文物天地》1984年第3期，任栋梁著）
- ⑲《中共党史人物传》——《任辅臣》2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0卷，张雅莹著）
- ⑳《中共党史人物传》——《任辅臣》2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0卷，张雅莹著）
- ㉑《列宁的中国卫士李富清》5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李兴沛著）
- ㉒《列宁的中国卫士李富清访苏日记》6页“1957年11月3日会见周总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李富清口述，李兴沛整理）
- ㉓《瞿秋白文集》第7卷，《饿乡纪程》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 ㉔《哈尔滨与红色之路》14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 ㉕《俞秀松纪念文集》19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 ㉖㉗㉘㉙《俞秀松纪念文集·俞秀松的日记、书信、文摘》（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 ⑩《俞秀松纪念文集》——《怀念亲人俞秀松》9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安志洁著）
- ⑪《俞秀松纪念文集·俞秀松的日记、书信、文摘》（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 ⑫《名人传记》，2008年第6期，23页（《两个神秘的中共一大国际代表——追寻马林和尼尔斯基的踪迹》，叶永烈著）
- ⑬《春园诗草》11页（湖南岳麓书社，1987年，罗章龙著）
- ⑭⑮《哈尔滨党史资料》1987年第一辑10页（《忆陈为人同志》，韩迭声著）
- ⑯《哈尔滨革命旧址史话》3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张福山、周淑珍著）
- ⑰《马骏》3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马骏著）
- ⑱《回忆马骏烈士》邓颖超著，《民族画报》1963年第2期。此文收入《马骏》一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
- ⑲⑳《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个人和一家人》人民文学出版社，钟法权著。
- ㉑《早期革命家的故事》——《陈延年的故事》30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石仲泉、陈登才主编）
- ㉒《早期革命家的故事》——《陈延年的故事》30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石仲泉、陈登才主编）
- ㉓《宋庆龄》中央电视台六集文献纪录片
- ㉔《周恩来画传》3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编）
- ㉕《任弼时画册》30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研究组编）
- ㉖《任弼时画册》248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研究组编）
- ㉗《李立三红色传奇》上卷1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李思慎著）
- ㉘《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 ㉙《李立三红色传奇》上卷437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李思慎著）

- ⑤0《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9页原版照片（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 ⑤1《哈尔滨党史资料》1987年第一辑76页（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 ⑤2《哈尔滨党史资料》1987年第一辑74页（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 ⑤3⑤4《哈尔滨党史资料》1987年第一辑203页（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 ⑤5《哈尔滨党史资料》1987年第一辑204页（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 ⑤6《赵毅敏纪念文集》103页（赵毅敏纪念文集编委会2004年）
- ⑤7《宋庆龄》中央电视台六集纪录片
- ⑤8《宋庆龄大传》115页（团结出版社，2003年，陈冠任著）
- ⑤9《哈尔滨与红色之路》29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 ⑥0《哈尔滨与红色之路》30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 ⑥1《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1卷，《杨光华》3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李云桥著）
- ⑥2《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1卷，《杨光华》3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李云桥著）
- ⑥3《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1卷，《杨光华》3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李云桥著）
- ⑥4⑥5《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8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 ⑥6《雪域长歌》1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张小康著）

## 附录二

### 照片、信件、题字：

1. 列宁给刘泽荣签名文件系刘泽荣儿子刘仁 2009 年在北京接受采访时向作者提供。
2. 俞秀松和盛世同结婚照系俞秀松继子俞敏 2006 年在上海家中向作者提供。此照片曾刊发在《俞秀松纪念文集》（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当代出版社，1999 年）。
3. 东华学校校长邓洁民一家合影由邓洁民女儿邓爽 2008 年 9 月在北京家中向作者提供。
4. 任弼时写给大女儿任远志的信由任远志 2006 年 7 月在北京家中受访时向作者提供。
5. 李立三与李莎照片由李立三女儿李英男在 2013 年 7 月向作者提供，此照片曾刊发在《李立三红色传奇》一书（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年）。
6. 赵毅敏题字系赵毅敏 2001 年在北京家中接受采访时挥毫题字，赠送给作者。
7. 冯咏莹手书系 2008 年 10 月 6 日冯咏莹在武汉家中接受采访时现场手书赠与作者留念。
8. 其余偏扉照片皆为公版。
9. 目录所用照片系中东铁路老建筑照片，为公版。



